

柬埔寨史

第4版

大卫·钱德勒 著 许亮 译

A History of Cambodia

FOURTH EDITION



A History of Cambodia

FOURTH EDITION



定价：42.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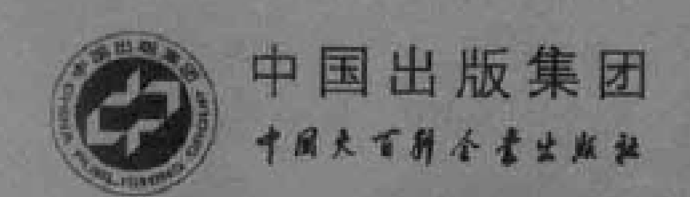


第4版

柬埔寨史

大卫·钱德勒 著 许亮 译

A History of Cambodia



图字:01－2011－0511

First Published in English by Westview Press,

A Member of the Perseus Books Group,

under the title A History of Cambodia(4th ed.) by David Chandler.

This edition has been translated and published under licence from Westview Press.

The author has asserted his right to be identified as the author of this Work.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柬埔寨史/(美)钱德勒著;许亮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3.7

ISBN 978－7－5000－9199－8

(世界历史文库)

Ⅰ.①柬… Ⅱ.①钱… ②许… Ⅲ.①柬埔寨—历史 Ⅳ.①K335.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48638号

责任编辑 李玉莲

责任印制 倪 亮

装帧设计 罗 洪

出版发行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阜成门北大街17号

邮政编码 100037

电 话 010－88390635

印 刷 北京永生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开 本 640×960 1/16

印 张 21.5

字 数 278千字

印 次 2013年8月第1版 2013年8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42.00元

《世界历史文库》出版前言

在全球化时代，关注世界各国各地区文明发展的源流、现实和未来，不仅仅是新世纪人文学科的一个重点课题，也是许多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强烈兴趣所在。甚至，关注别国热点，不亚于关注自身状况，也已经成为心态开放、视野开阔的许许多多当代中国人的一种精神生活方式。然而，至今我国尚未出版过一套相对完备的世界国别史及地区史丛书，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缺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版业虽然陆续推出过一些国别史、地区史，但既无规划，也很分散，而且主要集中在英、法、美、俄、日、德等大国，覆盖面过于狭小，更遑论完备与权威了。为此，中国出版集团公司通过深入调研，邀约史学界专家进行多方论证，精心策划组织出版这套《世界历史文库》。

《世界历史文库》主要选收国别史、地区史的通史性著作，以国别史为主体，适当辅以地区史。计划共出版80种，2年内出齐。文库编辑委员会特邀我国世界史学界著名学者专家担任学术顾问，精心遴选著作。编选者和学术顾问一致认为，每个国家、地区的历史只选一种著作，因而要求此一种应是在学界已获得广泛定评的上乘之作，且最好是最新成果，作者应为著名史学专家，原出版者也应是知名的出版机构。原著使用的语种主要是英语、德语、法语、俄语、日语等，中文译者应基本上是史学专业人士或具有较高史学修养的翻译家。总之，学术性、权威性、完备性、可资借鉴性以及可读性，是《世界历史文库》编选出版工作所追求的目标。

显而易见，入选《世界历史文库》的著作，只是给读者们提供了关于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历史一种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并可资借鉴的优秀文本。在史学领域里，治史者所拥有的材料、眼光、立场以及才学识见的不同，必然导致历史研究结论与叙述状态的迥异，相信读者们会在阅读研究时注意加以辨别。上下数千年，人类一直在探寻自己的历史，寻找“信史”，追求“良史”，以期获得历史的真相和启悟。正如清代著名思

想家龚自珍所说:“出乎史,如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治史、读史的目的是为了发现并把握历史发展的规律,这是人类认识自身与寻求发展的需要。因而,寻找“信史”——要求史家叙述历史时具有很高的可信度,是其正当的要求。而追求“良史”——希望史家叙述历史时,在可信的基础上能正确揭示历史的内在真相与内在规律,达到“知兴替”而经世致用的目的,则是其最高的要求。宋代曾巩在《南齐书目录序》中曾提出“良史”的标准:“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世界历史文库》编选出版工作就是要坚持提供“信史”的原则,努力追求“良史”的境界,竭诚为我国史学研究者提供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并可资借鉴的优秀文本,并满足各界读者了解世界各国各地区历史的需要,增进国际文化交流,为我国文化的繁荣发展作出贡献。这是编辑委员会和各位学术顾问的共同心愿和追求。

编辑出版工作不周之处在所难免,恳请批评指正!

《世界历史文库》编辑委员会

第4版前言

该书是1983年第一次出版的。非常感谢西维尤出版社（Westview）的斯蒂夫·卡塔拉诺（Steve Catalano）鼓励我对本书重新修改出版。卡塔拉诺先生最近才成为Westview众多富有才华而又热情助人的编辑之一，他一直同我就本书进行合作。我也非常感谢该项目的编辑凯·马瑞雅（Kay Mareia），以及汤姆·莱西（Tom Lacey）在排版编辑中的辛劳和帮助。跟此前的几版一样，本书献给我的孩子们。

该书的结构和总体路径保持未变，但我重新编订了第2、3、4和5章的内容，以反映出2000年第3版出版以来所发表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我特别参考了"大吴哥项目"、克劳德·雅克（Claude Jacques）、克里斯托夫·鲍狄埃（Christophe Pottier）、阿什利·汤姆森（Ashley Thompson）和迈克尔·维克里（Michael Vickery）的开创性研究成果。书中其他内容我也努力与最新学术成果保持一致。书中最后几页涉及2000年以来的最新事件，这得益于对柬埔寨的几次访问和同很多人的讨论，包括埃里克·戴维斯（Erik Davis）、尤张（Youk Chhang）、彭妮·爱德华兹（Penny Edwards）、凯特·弗里森（Kate Frieson）、斯蒂夫·赫德（Steve Heder）、唐·詹姆森（Don Jameson）、约翰·马森（John Marston）、温姜（Un Kheang）和金·塞德瑞（Kim Sedara）。

我对柬埔寨的研究兴趣已有近半个世纪，在学术上得到很多人的帮助，很高兴能在此表示感谢。最应该感激的是我的妻子苏珊（Susan），她是第一个鼓励我撰写本书的人，还有过世的保罗·穆斯（Paul Mus），他激发了我研究生阶段最初两年的研究兴趣。我还要感谢我以前的学生本·基尔南（Ben Kiernan）和约翰·塔利（John Tully），还有很多同事和朋友，包括乔伊丝·克拉克（Joyce Clark）、克里斯托弗·哥斯查（Christopher Goscha）、安妮·汉森（Anne Hansen）、亚历山大·欣顿（Alexander Hinton）、海伦·杰瑟普（Helen Jessup）、亚历山大·肯特（Alexander Kent）、查尔斯·凯斯（Charles Keyes）、朱迪·莱杰伍德（Judy Ledgerwood）、易安·马伯特（Ian Mabbett）、米尔顿·奥斯本（Milton Osborne）、萨弗罗斯·波（Saveros Pou）、莱昂内尔·韦龙（Lionel Vairon）、约翰·威克斯（John Weeks）和海勒姆·伍德沃德（Hiram Woodward）。名单应该更长。正如保罗·穆斯生动地写道："人在朋友的帮助中建立自己的事业。"

2005 年，本书第 3 版在高棉语研究中心的资助下出色地翻译成高棉文，译本在柬埔寨人中引起兴趣，这让我深感欣慰，我希望一些读过译本的人将来能够成为研究自己国家的历史学家。

最后，我要用几行文字来表达我对最近去世的五位亲切且富有才华的学术旅伴的哀掉之情。他们是梅·埃比哈瑞（May Ebihara）、理查德·梅尔维尔（Richard Melville）、英格丽德·穆安（Ingrid Muan）、雅克·内波特（Jacques Népote）和戴维·怀亚特（David Wyatt）。我思念他们的友谊、他们的陪伴和他们的对柬埔寨历史与文化的真知灼见。

大卫·钱德勒

2007 年 2 月

墨尔本，澳大利亚

插图目录

目 录 Contents

第1章 导 论

本书大体考察了柬埔寨两千年的历史。第2—5章是关于18世纪之前的历史，剩下的几章是关于1794年到2007年的历史。 1

写作本书的一大原因是想弥补东南亚史学的一块空白。自1914年阿代马·勒克累（Adhémard Leclère）的《柬埔寨史》一书出版之后，就再没有一本关于柬埔寨通史的著作面世，① 法文或英文的研究成果也要么是局限在特定历史时期，要么是主要依靠第二手资料。② 而且，在过去的约六十年里，勒克累的很多观点和历史断代——更不用说他的研究方法——也已经被其他学者所修正，或者被新的文献所削弱，或者被考古发现所改变。鉴于柬埔寨的殖民时代在1953年结束，需要在此前历史的基础上对它进行认真分析，本书从第5章到第7章探讨的所谓中间时期，尽管明显是连接吴哥时期和现代柬埔寨之间的桥梁，但却经常被研究者所忽视。

也就是说，重新修订该书的时机已经成熟。我将对主要资料重新

---

① Adhémard Leclère, *Histoire du Cambodge* (Paris, 1914). 又见乔治·戈岱斯发表的评论（*Bulletin de l'Ecole Franqaise d'ExtrêmeOrient* [*BEFEO*] 14 [1914]: 47 - 54）。

② 这样的成果包括：Martin Herz, *A Short History of Cambodia* (New York, 1958)；David P. Chandler, *The Land and People of Cambodia* (New York, 1991)。又见 Ian Mabbett and David Chandler, *The Khmers* (Oxford, 1995)；John Tully, *A Short History of Cambodia* (Sydney, 2006)。

检查，综合其他人的学术成果，并把自己主要关于19世纪和20世纪的研究成果纳入整个历史框架中。我的想法是，这本书主要是面向非专业读者和大学本科生的。

本书探讨了多个主题。其中一个是有关夹在泰国和越南之间的地
2 理位置对柬埔寨政治和社会的影响。该议题从18世纪后半叶以来就一直非常重要，但在近期其重要性有所减弱。本书将在第6章和第7章对该主题进行详细讨论。从18世纪80年代开始，两大敌对邻国的出现迫使爱好争吵的柬埔寨统治精英要么两强选其一，要么借助区域外大国的力量企图保持中立，这一情况持续了200年。19世纪的柬埔寨国王，对两种道路都有所尝试。后来的诺罗敦·西哈努克（Norodom Sihanouk）、朗诺（Lon Nol）和波尔布特（Pol Pot）都试图选择第二条道路；1979—1991年的柬埔寨国，前期称为柬埔寨人民共和国，则选择成为越南的保护国。联合国的保护（1991—1993）使柬埔寨摆脱冷战的影响，几个相互竞争的保护国在柬埔寨事务中保持中立。20世纪90年代末，柬埔寨和越南加入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1993年柬埔寨改国名为柬埔寨王国，此后一直避免受外来干预，不过近些年来，中国日益成为柬埔寨政府的重要盟国和援助国。

另一个主题是关于现代柬埔寨与过去的关系，这在今天也是一个焦点。毕竟有关吴哥的历史，都是由法国殖民者解读、恢复和遗留下来的。为什么有如此多的柬埔寨人忘记了这段历史，即便有所记忆也是主要作为神话被记住？在尚未独立的时候，恢复过去的记忆和辉煌又有何意义？在吴哥王朝与现代柬埔寨之间的时期里又发生了什么？以及通过什么方式将早期的历史同后吴哥时期、殖民地时期、1954年后发生的事情衔接起来？如何记住、教育和内部化解20世纪70年代的革命事件？现在仍有来自政府方面的压力，要求在柬埔寨历史教学中回避太具争议性的东西。

第三个主题源于普遍渗透在柬埔寨人思想、政治和社会关系中的保护和等级问题。在柬埔寨大多数历史时期，似乎掌握权力的人（不只是自己这样认为，几乎所有人都有这种想法）要比其他人更有价

值，老人在人们的观念中也享有很高的地位。从早期所谓柬埔寨印度 3
化到14世纪上座部佛教开始传入，在这段时期里尽管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但这种秩序基本保持没变，一些平等主义思想渗透到柬埔寨社会关系中去，但不是很多。[①] 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柬埔寨人一定是经历了不可思议的数个世纪，才至于能够普遍安于这种低级现状。如果确实如此，个人的身份经常同自己的从属地位联系在一起，那么政治独立又有何意义？

最后一个主题与第三个主题有关，源于一种惰性，这似乎是很多像柬埔寨这样的农村社会所具有的特征。直到最近，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柬埔寨没有可以替代农业的生计产业，也没有任何形式的增量式社会进步，柬埔寨人也不会去寻找这些，因为寻找的后果可能是遭受饥饿或当权者的惩罚。柬埔寨人还是重复着以前的生活——收获庄稼，养活家庭。农村、家庭和宫廷中的生活方式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显然，这种态度符合上层阶级的利益，并能保持社会的有序，但这个过程并没有我们所想象的那样会招致下层阶级的愤慨。究竟如何维持其他社会阶层的稳定？在整个柬埔寨的历史中，治理（或 *rajakar*，字面意思“王室工作”）在任何情况下都是那些某种程度上不用自己种地的人所享有的特权，被统治者为这些人种植粮食以换取他们的保护。

鉴于这种保守思想，有些学者认为，至少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柬埔寨及其人民还是处于“僵化不变”和“沉睡”状态。僵化不变的观念适合法国殖民当局需要，因为它意味着顺从。后来观察家看到，一些“非柬埔寨式”的革命活动试图创造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不过这些努力走上错误的方向，没有发挥合适的作用；还有一些“非柬埔寨式”的因素，促使柬埔寨成为全球舞台中的一员。

当然，僵化不变的观念是对历史一种过于简化的解释，但它在柬

① 见 Lucien Hanks, “Merit and Power in the Thai Social Order”,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Vol. 64 (1962): 1247 - 61; David Chandler, “The Tragedy of Cambodian History Revisited”, in Chandler, *Facing the Cambodian Past: Selected Essays, 1971 - 1994* (Sydney and Chiangmai, 1996), pp. 310 - 25。

埔寨历史研究者和持有保守观点的柬埔寨人中间会持续存在很长一段时间。在本书中该观点将会受到削弱，后面每一章中都会记录柬埔寨人生活的一次重大转变。第一次切实感受到的转变发生在公元初年，
4 随着人口和资源的流动，柬埔寨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一个印度化的政治实体，这在第 2 章中会讨论到。第二次变化是公元 9、10 世纪时吴哥王朝的权力集中，这会在第 3 章中谈到。很多学者将吴哥政权视为是卡尔·魏特夫（Karl Wittfogel）东方专制主义和马克思关于亚细亚生产模式的典型例子。[①] 吴哥政权遗留下很多宗教石碑和雕塑等丰富遗产。第 4 章会讨论到另一次转变，1177 年占城（Cham）侵略者摧毁了高棉人都城，后来在高棉君主阇耶跋摩七世（Jayavarman Ⅶ）的领导下重新建起一座佛教城市，阇耶跋摩七世是一位大乘佛教教徒。1220 年阇耶跋摩七世逝世，在此后的一个世纪里，又发生了一次转变：大部分柬埔寨人从信仰一种带有些许大乘佛教色彩的松散的湿婆派（Shaivistic）印度教，转而信仰上座部佛教——一种产生于今天泰国中部的宗教，第 5 章中会讨论这一变化。十五六世纪时吴哥被人遗忘，就在同一时期柬埔寨人口重心向南部转移，二者很可能在柬埔寨历史上产生了至为深远的影响。

由于资料的稀缺并且难以考证，对柬埔寨历史的中间一段时期，即从被遗忘的吴哥王朝到法国殖民统治，很难进行研究，但是有一点可以明确，这段时期与此前的吴哥时期有很大的不同。首先，上座部佛教的传播（以及随之而来的泰人文化的影响）降低了围在国王身边寻找恩宠机会的祭祀家族的地位。吴哥时期，这些家族通过他们同王室资助的宗教机构的联系，控制了吴哥周围的大量土地和劳动力。由于这些机构被寺院（上座部佛教寺院）所取代，那种曾经行之有效的社会动员方式也随之失灵，而且大规模的复杂水利工程（受益于这些工程，吴哥时期稻谷一年两季，有时一年三季）也被荒废。受这些变化的影响，再加上人

---

① 见 Centre d'études et de Recherches Marxisres (comp.), *Sur le "mode de production asiatique"* (Paris, 1969)。又见 Michael Vickery, *Society, Economics, and Politics in Pre - Angkor Cambodia: The 7th - 8th Centtrries* (Tokyo, 1998), pp. 7 - 16, 311 - 12。

口的外迁，精英阶层数量减少，而他们的利益却更具商业化。

对我们来说不幸的是，这些转变发生在缺乏文献记载的时代。通 5
过文献资料，我们可以考察这一转变前后的柬埔寨社会，但并不是在这些转变发生的时候。比如我们还不清楚为什么当时这么多人改变宗教信仰，这一过程是怎样完成的。类似的问题是，尽管很明显牵涉一些经济刺激，但还很难说为什么（以及什么时候）拥有土地的吴哥贵族转变为更加热衷于贸易的贵族，或者被后者所取代。

十七八世纪，柬埔寨被它的地理位置所害。它的首都地区——金边（Phnom Penh）/乌东（Udong）/洛韦（Lovek）——位于包括缅甸和暹罗在内的上座部佛教文化地区的东部边缘，并且非常靠近已经中国化的越南正在扩张的南部边界。换句话说，这个地区位于文化的断层带。这一现实影响到柬埔寨统治者的思想和行动，把他们拉进毫无取胜希望的现实政治游戏中去。18 世纪末，柬埔寨受到内战和外国入侵两方面的摧残；甚至在好多年里没有国王。第 6 章和第 7 章论述的 19 世纪早期，或许是后吴哥时期最黑暗的一段。到 19 世纪中期，柬埔寨几乎沦为一个失败国家。安东（Duang）国王（1848—1860）统治期间，经历了短暂的独立之后，柬埔寨又沦为法国的保护国。相比于继续接受泰国的霸权，柬埔寨统治者可能更愿意法国保护的状态，但是法国很快就实行类似以前越南强加给柬埔寨那样的“文明使命”，当时柬埔寨国王的自主权受到很大削弱。

殖民时期柬埔寨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变化同东南亚其他地方所发生的类似，但其激烈程度比不上受系统殖民统治较长的爪哇、缅甸和菲律宾。像其他殖民地一样，席卷柬埔寨的变化有助于组建柬埔寨民族国家的架构。这种架构在 1945 年曾短暂地出现过，1953 年再次出现。[①]

---

① 见 David Joel Steinberg et al.（eds.）, *In Search of Southeast Asia*（Honolulu, 1987）, pp. 177 - 244，书中讨论了“民族国家架构”的观念。编写此书的很多作者在另一部书中进一步扩充了这些观点，见 Norman G. Owen et al.（eds.）, *The Emergence of Modern Southeast Asia*（Honolulu, 2005），特别是 pp. 161 - 283。

第8章和第9章论述的殖民时期，3个最明显的变化表现在对外
6 贸易、交通和人口方面。第一次大量种植用于出口的稻米和玉米，并且开始种植橡胶，这些都把柬埔寨同东南亚以外的世界联系起来。从来不曾特别强大的柬埔寨经济，部分依附于外部世界。政治独立并没有改变什么，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柬埔寨大部分外汇收入仍然靠出口稻米、橡胶和玉米赚取。

殖民地时期和殖民地以前相比，柬埔寨最显而易见的区别也许表现在交通方面。到20世纪20年代，乘汽车两天就能横穿柬埔寨——就在50年前还要花费数月时间。柬埔寨人通过公路、铁路前往全国各地，为他们的产品寻找市场。伴随这种新的自由迁移而来的社会变动显然非常重要，但是这却很难准确地用档案材料来证明。

最后，如果在1863年有一个柬埔寨人欢迎法国人的话（假使法国人的形象确实受到欢迎），那么到了1950年就有四个柬埔寨人对法国人说再见。当柬埔寨开始沦为保护国的时候，估计人口不到100万，到1950年初人口超过400万。由于国内局势保持和平和引进改善卫生条件，法国领导了一场人口革命，到20世纪60年代人口猛增，很快就给柬埔寨资源带来严重压力。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种压力变得更为严重，现在柬埔寨人口达到1300万。①

日本在二战期间占领柬埔寨具有多大的决定意义，这很难说，特别是因为直到1945年3月法国仍然保持着对柬埔寨名义上的控制。然而事后可以看到，1945年夏日本同意柬埔寨独立，这对很多柬埔寨青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是很明显的。20世纪40年代末期，法国重返印度支那后，一种新的政治意识形态——以要抵抗不要合作，要独立不要从属为主要内容——受到很多人的追捧，包括柬埔寨农民、佛教高僧和受过教育的上层精英。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倾向于选择革命途径来改变现状，当然也偶尔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这些发生在20世纪

① 关于20世纪70年代柬埔寨人口参见J. Migozzi, *Cambodge: Faits et problèmes de population* (Paris, 1973)。

40年代到50年代初期的变化，成为柬埔寨后来政治思想的基调。这个内容将在第10章论述。

柬埔寨虽然在1953年获得独立，但它的经济状况跟法国殖民时期 7
没有什么变化。在前国王现在称为亲王的诺罗敦·西哈努克较为仁慈的独裁统治时期（1955—1970），教育普及，经济繁荣，现在很多年过50的柬埔寨人还称那段时期为黄金时期。不过，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随着越南战争的升级和西哈努克对柬埔寨政局控制能力的下降，新的力量兴起，包括由柬埔寨共产党（Communist Party of Kampuchea，缩写CPK）领导的革命运动走向前台，一位叫桑洛沙（Saloth Sar）的中学老师领导着柬共，他就是后来的波尔布特。

1970年3月，柬埔寨国民议会通过投票将西哈努克赶下台。此后不久，新组建的亲美政府宣布柬埔寨实行共和。这一举动结束了柬埔寨一千多年的王权统治（1993年又恢复），其背景是越南共产党的入侵、美国卷入越南战争以及柬埔寨国内政府与忠于西哈努克武装力量之间兴起的战争。柬共很快取得了反政府武装力量的主导权。这场残酷的战争持续到1975年4月，当时共产党（也就是西方社会众所周知的红色高棉）取得胜利。

在接下来的三年里，红色高棉政权摧毁和推翻柬埔寨很多制度安排，强制市区人口离开城镇和都市，像农业劳动力一样并排耕作（士兵和柬共干部除外）。新政权还取消货币、市场、正规学校、佛教活动和私有财产。在奔向社会主义乌托邦运动中，大约有两百万柬埔寨人，或者说每四个人中就有一个人死于疲劳工作、营养不良或缺乏治疗，还有的是被处决而死。

1977年，民主柬埔寨（Democratic Kampuchea，缩写DK）领导人决定要发动对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战争。此举断送了自己的命运。此时，农村地区的经济灾难和对柬共高层成员忠诚度的怀疑，促使波尔布特和同伴在党内启动清洗运动，在这期间，至少有15000人被送进秘密监狱接受调查，在被迫提供详细但经常是虚假的认罪书后遭到

8 处决。[1] 还有数万人，主要是柬埔寨东部地区，因为被指支持越南1977年和1978年的入侵而被杀。这些人被说成是长着柬埔寨人的身体却怀有越南人的思想。这些恶行加速了民柬政府的垮台，为越南的入侵铺平了道路。1979年后，柬埔寨（此时国名先是称为柬埔寨人民共和国，后改为柬埔寨国）在越南人的保护下努力站起来。这些年，柬埔寨政权屈从于越南人的指导和控制，尤其是军事防务、内部安全和对外关系等领域。

20世纪80年代，联合国多次投票谴责越南对柬埔寨的入侵，承认民柬代表占据联合国席位。柬埔寨人民共和国得不到外交承认（除越南的盟国的外），也就不能获得发展援助，因而国家经济恢复缓慢。抵抗力量声称受西哈努克、柬共和一个缺乏组织性的中产阶级团体的领导，他们在泰国得到庇护，并且美国和中国带头领导联合国予以支持。在80年代，波尔布特的武装力量估计有2万到4万人，也获益于中国广泛的军事援助。

重新寻找和形成柬埔寨自我身份的过程不是重建革命前柬埔寨面貌那么简单，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及以后这一过程仍在持续，同时还在进行着另一个转变，即今天的柬埔寨已经是东南亚这一更大家庭的一员，并已走向全球市场。

鉴于这一系列变化的重要性，再考虑到有关柬埔寨的经济数据比较缺乏，本书除了捎带提及外，很少谈到柬埔寨的资源或者该国的经济。除了会在最后一章所讨论到的最近在柬埔寨沿海发现储量巨大的石油资源外，柬埔寨经济在本书探讨的两千多年历史中没有什么变化。从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生产领域取得显著的发展成就。

在第2章所讨论的柬埔寨历史早期，谷物的种植，其中很可能大部分是水稻，养活着湄公河三角洲的人民，也就是中国人称的扶南。

---

① 见 David Chandler, *Voices from S－21: Terror and History in Pol Pot's Secret Prison*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1999)。在各省监狱中被处决的人数可能更高，见 Henri Locard, " Le Goulag des khmers rouges", *Communisme* (1996): 127－64。

中国史料记载，柬埔寨农民在人工小池塘（高棉语叫 *trapeang*）里蓄 9
水，用来洗澡，或许还用来灌溉，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社会动荡时期。当时柬埔寨农村经济在经历了快速扩张之后，又在很大程度上陷入瘫痪。第3章会讨论到吴哥大规模的水利工程推动了早期技术的发展。季节、水、稻子和基础农业之间的关系在柬埔寨历史上始终至关重要。不过，主食之外的补充食物可能有一些变化。野生猎物的数量无疑减少了，近代柬埔寨人可以获得进口的加工食品。但是，主要的补充食物——鱼、根茎食物、本地种植的香料——世世代代很少改变。现在学术界越来越细致地关注起吴哥经济，发现吴哥经济有些特别之处，跟大部分邻国不同，吴哥从未使用过任何形式的货币。

直到最近，柬埔寨的农村工艺总体上保持未变。罐、镰、牛车、无光泽的陶器和棉布——能够说出名字来的只有这五种——从12世纪出现在吴哥浮雕上到今天，似乎没有什么改变。

柬埔寨经济保持不变的第三个方面是出口领域。直到殖民时期，用于出口的种植作物（主要是橡胶、玉米、胡椒和稻米）改变了柬埔寨的民族经济，而在此之前，柬埔寨出口的货物大部分是森林里的野生产品，如犀牛角、兽皮、象牙、豆蔻、漆器和香料等。出口这些产品换来供柬埔寨上层阶级享用的奢侈品，因此留意当时负责收集这些产品的林区居民同平原地区农业居民之间的共生关系是很重要的。这种关系会在第6章论述19世纪历史时有所探讨。

关于柬埔寨经济的另一个议题是季风每年带来的损害。和东南亚很多国家一样，柬埔寨有两个而不是四个显著区别的季节。受东南季风控制的雨季，从5月一直延续到11月。其余时间是旱季。这些年
来，稻农和行政人员根据雨水的多少来调整他们的活动。雨季时，柬 10
埔寨很多地方被水所淹。因而，至少在殖民时期以前，军事行动几乎从来没有在雨季天气进行；同时，一旦进入雨季，由于田地里没有什么农活可做，青年人正好利用这几个月，或者短期旅行，或者到寺院修行。

与东南亚大陆的其他国家不同，柬埔寨没有南北走向的山脉，可以成为阻碍军事渗透的屏障。北部边界和柬越边界的一部分是低矮的山丘。这些对于外敌入侵——无论是吴哥时期的占婆抑或是最近的越南——从未是大的问题。柬埔寨易受攻击的地势条件是柬埔寨历史上反复出现的一个特点，也是柬埔寨对外关系中的一个主题，这在吴哥衰落之后尤为明显。反之，在柬埔寨的强盛时期，它也很容易向东部平原和泰国中部扩张，将统治领域延伸到越南人没有完全占领的湄公河三角洲。

一方面，由于在 20 世纪 50 年代以前柬埔寨都没有深水港，海上商船需从南中国海逆流而上才能到达柬埔寨首都。另一方面，以外国军队为代表的外部影响力倾向于通过陆路进入。第 4 章所论述的柬埔寨改信上座部佛教就是这一渗透同化过程的一个例子。

我所列出的柬埔寨历史中的变与不变在 1975 年时曾受到攻讦。当时柬埔寨的历史经验正受到民柬政权的挑战和抹杀，他们极力割断革命时期的柬埔寨和过去发生的任何事情之间的延续性，不管这种延续性是真实存在的还是想象中的。[①] 1973 年间，美国的 B-52 轰炸机从关岛和泰国起飞，在柬埔寨农村地区投下数吨炸弹，几乎是美国在二战期间向日本本土所投炸弹的两倍。这对柬埔寨农村社会带来多么严重的破坏，我们对此也知之甚少。

美国轰炸造成的农村破坏和柬共对过去的批判都给柬埔寨人民的记忆和行为造成重大影响。进入 21 世纪，柬埔寨是一个被自己最近的
11 历史所伤害而与自己远古的历史紧密联系起来的国家。它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将一座遗迹展示在国旗上的国家。

柬埔寨过去的复杂性应该促使历史学家不要对柬埔寨做出盲目预

① 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见 David Chandler, "Seeing Red: Perceptions of Cambodian History in Democratic Kampuchea", 载 *Facing the Cambodian Past*, pp. 233 – 54。又见 Claude Jacques, "Nouvelles orientations pour l'étude de l'histoire du pays khmer", *Asie du sudest et monde insulindien*, Vol. 14 (1982): 39 – 57。最近时期，柬埔寨学校中很少教后吴哥时期的历史，而关于红色高棉的历史现在（2007 年）则完全不教。

测。现在柬埔寨还只是处于部分全球化的后革命阶段，在此时就对柬埔寨社会的前景做出断言，还有些太早，也很困难。但是民柬政府发言人习惯称之的“两千年柬埔寨史”仍然与最近发生的事情和今天的柬埔寨人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出于这些原因，柬埔寨历史应该得到持续的关注，这正是本书接下来希望所能提供的。

第 2 章　柬埔寨历史的起源

13 没有人确切知道人类在今天柬埔寨境内生活了多长时间，他们来自何处，以及大约在公元 3 世纪传入使用印度字母文字之前他们都使用什么语言。然而，根据对柬埔寨西北部拉昂斯平（Laang Spean）洞穴中同位素碳 –14 的测定，早在公元前 4200 年这里的人就知道如何制造陶器。大约在一千年以后，在靠近海洋的另一个洞穴中也开始有人居住。估计第一批到达此地的柬埔寨人要比上述两个时间早很多；在柬埔寨东部发现的石器文化证据，要更为原始。在三隆森（Samrong Sen）发现的头盖骨和人骨，生活在约公元前 1500 年，表明史前柬埔寨人跟今天的柬埔寨人在体质上非常相近。①

关于早期柬埔寨人源自今天的中国、印度还是东南亚的其他地方，在学者中仍有争论；有关史前时期在该地区出现的不同民族迁徙浪潮的理论也是如此。但最近的发现表明，在史前时期东南亚大陆出现了比较先进的文明，一些学者甚至认为这里是最早种植水稻和最早炼铜

---

① 参见 C. Mourer, "Contribution à l'étude de la préhistoire du Cambodge", *BEFEO*, Vol. 80: 143 – 87。也可参见 J. P. Carbonnel, "Recent Data on the Cambodian Neolithic", in R. B. Smith and W. Watson (eds.), *Early Southeast Asia* (Oxford, 1979), pp. 223 – 26; Donn Bayard, "The Roots of Indo – Chinese Civilization: Recent Developments in the Pre – history of Southeast Asia", *Pacific Affairs* (PA), Vol. 53, No. 1 (Spring 1980): 89 – 114。

的地区。不管怎样，公元初期生活在今天柬埔寨境内居民所说的语言很有可能同现在的柬埔寨人或高棉人的语言有联系。孟—高棉（Mon-Khmer）族语系广泛分布在东南亚大陆，以及一些岛屿和印度部分地 14
区。现代越南语，虽然深受汉语的影响，也是高棉语系的一个远亲。很难说出这些语言是在什么时候互相分离的；有些语言学家认为，这种分离发生在几千年以前。高棉语不是这个地区的新到者，这不同于东南亚大陆的其他民族语言（越南语除外）。语言的连续性是柬埔寨历史研究者们产生兴趣的众多因素之一。拉昂斯平洞穴的意义不仅在于人们在那居住了很长时间（通过对洞中最新的碳 - 14 测定，到公元 9 世纪还有人类活动），还在于这里出土的最早时期的陶器，其制作方法和雕刻模式在大约 6000 年的时间里都保持未变。

法国人经常强调柬埔寨历史的“僵化不变”，是他们在 19 和 20 世纪给该地区带来了变化和文明。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一观点被波尔布特的革命政权所承用，他们宣称柬埔寨人沉睡和被奴役了 2000 年。这两种论点忽视了大量事实。20 世纪 70 年代的革命是柬埔寨自史前时代以来所经历的第五次重大变革。革命前的柬埔寨人不像波尔布特那样蔑视传统，正如一句柬埔寨谚语所说的，“不要选择一条笔直的路，也不要拒绝一条曲折的路，选择你的祖先走过的路”。或许，这一保守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这种以生存为导向型社会的特征，在这类社会中任何社会试验都可能导致饥荒，能够产出足够食物的技术代代相传。

我们对史前时代柬埔寨人的日常生活知之甚少，但我们确实知道他们的饮食同今天的柬埔寨人相似，包括吃很多鱼。早期的房屋好像很可能高出地面，需要用梯子方能进入。衣服不是很重要，中国古书记载称柬埔寨人都是裸体。大约公元前 1000 年以后，柬埔寨人居住在防御型的村庄里，通常是圆形，类似今天居住在柬埔寨、老挝和越南

15 的一些部落。在柬埔寨东部已经挖掘出这样的村庄遗址。[①]同该地区其他早期居民一样，柬埔寨人很早就饲养猪和水牛，他们采取所谓的"刀耕火种"方法种植水稻和块茎作物，这种方法在整个热带地区以及中世纪的欧洲都很常见。早期居民很可能把自己很多风俗和信仰传承给该地区的后来居住者，但是我们不能确信这一点，而且用我们今天在所谓原始部族或21世纪农民中所看到的东西去解读史前和早期的柬埔寨，本身就存在危险。我们不能确定现代的风俗在过去了这么长时间后是否发生变化。例如，柬埔寨人的发型在18世纪初期发生了很大变化，20世纪70年代在革命政权下再次改变。

尽管如此，自吴哥时期（从9世纪到15世纪中期）以来，甚至过去几千年来，柬埔寨人生活和思想中某些成分不可能发生很大的变化，特别是在农村地区。这些成分可能包括在农历新年玩的乡村游戏，祖先灵魂（纳塔/*nak ta*）与石头、历法和土壤的相互联系，对水神和龙的信仰，文身护佑的观念，以及嚼槟榔的习惯，等等。

印度化

当我们讨论柬埔寨在公元初年所充斥着的革命性变化时，柬埔寨"僵化不变"的观点已经不复存在。这就是长达几个世纪之久的印度化现象，即柬埔寨人吸收或选择印度文化元素的过程，该过程持续了一千多年。[②] 没有人准确地知道这一过程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它在不同的时期又是如何发生作用的。法国和荷兰学者提出的有关印度化

---

① 见 Yashushi Kojo and Sytha Preng, "A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 of a Circular Earthwork at Krek, Southeastern Cambodia", *Anthropological Science*, Vol. 106 (1998): 229 – 44; Charles Higham, *Early Cultures of Mainland Southeast Asia* (Bangkok, 2002), p. 185。

② 见 I. W. Mabbett, "The Indianization of Southeast Asia",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JSEAS*), Vol. 8, No. 1 (March 1977): 1 – 14, and Vol. 8, No. 2 (September 1977): 143 – 61; Paul Mus, *India Seen from the East*, trans. by I. W. Mabbett and D. P. Chandler (Clayton, Australia, 1975); and Michael Vickery, *Society, Economics, and Politics in Pre – Angkor Cambodia: The 7th – 8th Centuries* (Tokyo, 1998), pp. 51 – 58, 该书强调了社会因素。有关语言学的依据，见 Judith M. Jacob, "Sanskrit Loanwords in Pre – Angkor Khmer", *Mon – Khmer Studies*, Vol. 4 (Honolulu, 1977), pp. 151 – 68; Michael Coe, *Angkor and the Khmer Civilization* (New York, 2003) pp. 63 – 64, 该书对这一时期做了较完善的总结。

的理论，通常不重视本地选择的因素。另一方面，一些学者则倾向于过分夸大本地因素的重要性。正如乔治·戈岱斯（George Coedes）所说，受过印度文化培养的学者通常强调印度的“文明使命”，而那些受过社会科学训练的学者，则强调本土反应。①

历史学家必须对交流的双方都要关注。文化变迁的过程是复杂的。16
什么时候以及为什么印度文化元素要比当地文化更受欢迎？哪些元素被吸收，哪些被修改，还有哪些遭拒绝？在讨论印度化过程中，我们遇到一些人类学家冠以“大传统”和“小传统”的范畴，前者与印度、梵文、宫廷和印度教相关，后者与柬埔寨、高棉、乡村和民俗信仰有关。在柬埔寨的案例中，这种分类并不是特别有用。我们不能贬低大传统在柬埔寨乡村生活中的重要性。比如，僧侣佛教在乡村是否适合？或像祖先崇拜和民间故事等小传统是否会发生在宫廷之中？农村智慧总是能渗透到宫廷之中，在印度教史诗、佛教传说或本生经（*jataka*）故事中所崇拜的王室价值观也渗透到农村生活中。今天，柬埔寨城市和农村文化传统还以类似的方式相互作用。

尽管如此，印度化过程使得柬埔寨成为一个类似于印度的地方。例如，在 19 世纪柬埔寨农民仍然穿着具有鲜明印度特色的服装，他们很多行为方式更像印度人而不像他们的近邻越南人。例如，柬埔寨人用匙子和手指吃饭，用头搬用货物；他们包头巾而不是戴草帽，穿裙子而不是裤子。乐器、珠宝、字母和手稿也呈现出印度风格。也有可能印度人在较早的时候把养牛技术介绍到柬埔寨；东南亚大陆的其他地方，在很大的程度上还不掌握该技术。

史前时期印度和柬埔寨之间的贸易可能在印度梵语化之前就早已开始。实际上，正如保罗·穆斯所认为的，柬埔寨和印度南部，以及现在的孟加拉，很可能都属于“季风亚洲”文化，这种文化强调祖先

---

① G. Coedes, *The Making of Southeast Asia* (London, 1966), pp. 54 – 55. 我们可能永远都不会知道古代南印度的 Calukya – Pallava 铭文是在什么时候、通过什么方式传达柬埔寨的什么地方，也不会知道它又是如何适应高棉人的书写的。

和守护神在农业循环中的作用。[①] 他们通常供奉天然类似或人工雕成的石制阴茎。这样的祭祀被认为能够保证土地产量。虽然类似这样的崇拜不只限于亚洲，但正如穆斯所指出的，游历过柬埔寨的印度旅客
17 会“认为”这与印度祭祀湿婆（Siva）及其伙伴的仪式类似。同样，一个去过或听说过印度的柬埔寨人，也会将他所崇拜的神视为印度的神。

大约在公元后第一个500年里，印度向柬埔寨提供了文字体系、众神传说、诗歌韵律、记载诗歌语言（梵语）、社会等级（不同于种姓制度）方面的词汇、佛教、普世王权思想，以及对政治学、社会学、建筑学、绘画、天文学和美学新的观察方法。如果没有印度，吴哥绝不会已建成；然而，不像中世纪的巴黎是罗马的一个城市，吴哥从来不是一个印度城市。

印度在柬埔寨的影响不是通过殖民或武力强加的。印度军队从来没有入侵柬埔寨，如果个别印度人常常在柬埔寨享有很高的地位，部分原因在于他们使当地人相信他们配得上这种地位。当印度人作为冒险家或者商人第一次来到柬埔寨时，他们融入当地居民中。或许，曾经去过南亚次大陆的柬埔寨商人经常把印度的信息带回来。中国的殖民和文化帝国主义在越南人中造成身份危机，而印度化在柬埔寨人中从未产生身份危机。柬埔寨从未抵制过印度，而印度在何种情况下也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此外，与越南同汉族中国的关系不同，在大约14世纪以后，柬埔寨不再需要印度的理念、批准或建议。印度化赋予柬埔寨精英一种生活模式和语言，而它又不只局限于政治方面。在柬埔寨精英阶层语言和行为中体现出的等级安排，虽然受到印度模式的一些影响，但从没有形成显著的种姓制度，从而在整体上影响到柬埔寨社会。在农村层面，种姓考虑从来没有扎根；中世纪柬埔寨宫廷中类似于种姓制度的安排，可能只不过是一套仪式程序，以显示对印度

---

① 见 Paul Mus, *L'Angle de l'Asie* (ed. S. Thion) (Paris, 1977), 特别是 pp. 109 -21。

传统的尊重。[1] 柬埔寨印度化的另一个副产品是柬埔寨民族主义。与越南人的民族主义不同，它通常不标榜成一个反对外国军事和思想入侵的产物。相反，直到近代，国家认同被看作在柬埔寨内部发挥作用的所有社会安排的总和，而印度化和源于印度的生活因素仅是构成总和的一部分。它们源于印度的事实（就像我们的音节经常是从希腊和 18
罗马借鉴而来）并没有成为引起柬埔寨人警惕的原因。

跟许多东南亚国家一样，传说柬埔寨源于一个外国人与龙女哪基（*nagi*）的姻缘。龙女的父亲是水国的国王。根据一种版本的神话，一天一个叫作混填（Kaundinya）的婆罗门，携带一张神弓，来到柬埔寨海岸。龙女划船出来遇到他。混填用箭射中龙女的船，龙女害怕，就嫁给了他。在结婚前，混填给她衣服穿，作为回报，她的父亲龙王"吸尽了覆盖在地面上的海水，扩大了他女婿拥有的土地。后来混填建起首都，改国名为'Kambuja'"。[2]

如同"柬埔寨"这个名字一样，这个神话起源于印度，有可能反映了在印度南部雅利安化过程中隐约存在的冲突状况，而不是发生在东南亚的一个事件。如果说作为"事实"它毫无用处，但它又向我们提供了研究柬埔寨历史的一个有意思的起点。在这一神话里，柬埔寨人把自己看作一种文化和自然联姻的后代。岳父的接纳并为他排干海水建立王国，是混填成功的关键。这种观念对柬埔寨人来说非常熟悉，直到最近，新郎必须要在结婚前同岳父母一起生活一段时间以获得他们的同意。在神话中，当地人（也就是神话中的龙）对这个婆罗门非

---

① I. W. Mabbett, "Varnas in Angkor and the Indian Caste System",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JAS), Vol. 36, No. 3 (May 1977): 429 – 42. 铸币似乎是另一项高棉人没有模仿印度人的行为。

② L. Finot, " Sur quelques traditions indochinaoises ", *Bulletin de la Commission Archéologique de l'Indochine* (1911), pp. 20 – 37. 又见 Evéline Porée – Maspero, " Nouvelle étude sur le nagi Soma", *Journal Asiatique* (*JA*), Vol. 238 (1955); Jacques Népote, " Mythes de fondation ET fonctionnement de l'ordre sociale dans la basse vallée du Mekong", *Péninsule* 38 (1999), pp. 33 – 65。又见 Michael Vickery, "Funan Reviewed: Deconstructing the Ancients", *BEFEO* 90 – 91 (2003 – 4): 101 – 43, especially 105 – 9。直到吴哥时期 *Kambuja* 的名字才在柬埔寨碑文中出现。

常尊重，并给王国起了一个印度名字（第一次出现这个名字是在公元9世纪柬埔寨一篇碑文中），以示对他的纪念。[①] 后来，历代柬埔寨国王都把祖先追溯到神话中这对夫妻，除此之外，这对夫妻还象征着太阳和月亮之间的联姻。看来，要想成为合法的国王，就必须同时既是柬埔寨人又是印度人。

扶南

中国官方资料记录了混填神话。实际上，有关柬埔寨在公元后最
19 初几个世纪历史的文字资料几乎都是由中国人记载下来的。考古发现成为补充材料，特别是在二战期间由路易斯·马勒雷（Louis Malleret）督导的考古队发掘的古代贸易城市遗址，该遗址位于湄公河三角洲现在越南俄厄（Oc-Eo）村附近。[②]

在俄厄遗址和吴哥博瑞（Angkor Borei）出土的罗马钱币追溯到公元二三世纪时期，还有一些同一时期的印度手工制品，包括印章和珠宝。马勒雷认为，这个港口在公元4世纪的时候衰落。然而，当时有关该港口的记载没有保存下来，我们不知道当地居民如何称呼此城。[③] 根据此城的位置和出土的文物，马勒雷认为在公元后最初几个世纪里往来于印度和中国的朝圣者和贸易商使用此港口。从城市规模可以看出，它在贸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城市被海岸所环抱，处于出入南中

---

① K. Bhattacharya, *Les Religions brahmaniques dans l'ancien Cambodge* (Paris, 1961), p. 11n.

② Miriam T. Stark, "The Transition to History in the Mekong Delta: A View from Cambodi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istorical Archaeology*, Vol. 2, No. 3 (1998): 175 -203. 该文总结了对吴哥博瑞的研究成果，在扶南统治前后博瑞一直都是一个重要城市，可能还是扶南的都城。还见 Higham, *Early Cultures of Mainland Soutbeast Asia*, pp. 235ff。

③ Louis Malleret, *L'Archéologie du delta du Mekong*, 4 vols. (Paris, 1959 -63)，特别是 Vols. 1 and 2。很多关于俄厄和其他遗址的越南语研究成果还没有翻译过来。见 P - Y Manguin, "Les cités états de l' Asie du Sud - Est cotières", *BEFEO* 87/1 (2000): 151 -82。

国海的“拐弯处”，是船舶的理想港口。[①] 该城可能为往来于印度和中国之间的货物提供仓储地，还是从柬埔寨和越南森林内地收集货品的出口。

直到20世纪，森林产品和贵金属还是柬埔寨主要的大宗出口产品，包括黄金、大象、象牙、犀牛角、翠鸟羽毛、野生香料如豆蔻，以及漆、皮革和香木等林产品。像橡胶和胡椒这样的种植作物出口品，是在殖民地时代发展起来的。20世纪柬埔寨外贸中的主要产品——大米，在早期很少出口，当时该地区每人的大米产量几乎只够养活自己。需要说明的是，那些高价值、低产量的货物是由森林居民而不是城镇居民种植或捕获的。他们运送这些货物到达俄厄之前，可能走了很远的路程，贸易商也是携带货物或钱币不远万里赶来跟他们交换。

直到最近，许多学者认为俄厄就是被中国古文献称之为“扶南”王国的海港，乔治·戈岱斯（根据语言学证据而不是考古发现）认为扶南位于通称为巴普农（Ba Phnom）的小山丘附近，地处柬埔寨东南
部，湄公河东面。根据戈岱斯的说法，“扶南”源于古高棉语对山 20
（*bnam*）的称呼，他认为王国的祭祀中心在巴普农。早在公元5世纪，柬埔寨把湿婆视为山神而崇拜，或许就在巴普农举行这种仪式。一位到中国的印度旅行者这样记述：“其国俗事摩醯首罗（Mabesvara Siva）天神，神常降于摩耽山（Mt. Mo – Tam）。土恒暖，草木不落。”[②]

保罗·惠特利（Paul Wheatley）认为这种崇拜源于印度南部，那座山不是巴普农，而是离此不远的另一个山丘，在今天越南境内。[③]

---

① 见 O. W. Wolters, *Early Indonesian Commerce: A Study of the Origins of Srivijaya* (Ithaca, N. Y., 1967); Wang Gungwu, “The Nanhai Trade: A Study of the Early History of Chinese Trade in the South China Sea”, *Journal of the Malay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JMBRAS*), Vol. 31, No. 2 (June 1958): 31 – 45。

② 引自 G. Coedes, *The Indianized States of Southeast Asia* (Honolulu, 1968), p. 61。不过，扶南的都城可能是在吴哥的博瑞。见本书第18页注释②。译者按：这段引文出自中国史书《南齐书》卷五十八，列传第三十九，《蛮·东南夷》，这是奉扶南国王之命访问中国的天竺僧人那伽仙向南齐皇帝介绍扶南情况。

③ Paul Wheatley, “The Mount of the Immortals: A Note on Tamil Cultural Influence in Fifth Century Indo – China”, *Oriens Extremus*, Vol. 21, No. 1 (June 1974): 97 – 109.

不管哪座山是宗教仪式旧址，这些证据都很好的证明扶南是一个重要的统一王国，它的政治中心与其中一个山有密切关系。对中国人来说，此地的重要意义在于扶南接受中国皇帝册封，并在公元 253 年至 519 年间不定期地向中国皇帝进贡。一个世纪后的梵文和高棉文碑铭可以供我们研究，但这些碑铭并没有提供当时存在一个重要王国的证据。[①] 虽然如此，有可能是柬埔寨的小部落偶尔联合起来，自称为王国，目的是便于向中国朝贡（这是促进贸易的理想机会）或者寻求中国帮助来对抗自己的邻国。也有可能是，因为中国人希望扶南成为一个王国，后来又由于法国学者急于为公元 9 世纪在柬埔寨西北部发展起来的中央集权王国吴哥寻找前身，这样扶南才被认为是一个重要王国。

尽管中国的古文献资料在很多方面都用得着，但也给历史学家带来一些问题，因为很多文献不加鉴别地重复以前材料编纂的数据，似乎这些数据仍然真实可靠。尽管如此，中国资料常常像下面一则关于扶南的描述那样生动逼真：

> 国王的住处有两层阁楼。用尖木栅栏取代城墙作为防御工事。这些房子都覆盖着一种生长于海边的植物叶子。叶子有六到七英
> 21 尺长，形状像一条鱼。国王骑着大象。他的臣民相貌丑陋，皮肤黝黑。他们头发卷曲，既不穿衣服也不穿鞋子。他们以种地为生，耕种一年，收获三年……这些野蛮人有自己的史书，甚至有自己的文字档案。[②]

在扶南时期，小的邦国以种植旱稻和根茎作物为生，百姓崇拜湿婆神，而远离俄厄的内陆地区仍然靠狩猎和采集为生。有证据表明，

① Vickery, "Funan Reviewed", C. Jacques, "'Funan,' 'Zhenla': The Reality Concealed by These Chinese Views of Indo – China", in Smith and Watson, *Early Southeast Asia*, pp. 371 – 79, and O. W. Wolters, "Northwestern Cambodia in the 7th Century",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BSOAS*), Vol. 37, No. 2 (1974): 355 – 84.

② 引自 L. P. Briggs, *The Ancient Khmer Empire* (Philadelphia, 1951), p. 29。

至迟在公元 500 年的时候，灌溉体系引入，这是一个重大进步，促进了邦国同内陆地区的融合；排水技术可能更早就开始使用。在混填神话中将排水归功于龙王的善治，不过关于这次革新以及印度化最为重要的一段文字见于中国记载，它最先出现在中国另一种版本的神话传说：

> 当时一个名为混填的婆罗门统治了这个国家。神宣布要他来治理扶南，于是他前往那里……扶南百姓出来迎接，并推选他为国王。他效仿印度模式建立国家制度。他要臣民停止挖井，而是在此后改修水池；几十个家庭可以联合起来共用一个水池。①

七八世纪的碑铭暗示宗教场所附近的稻田都是得到灌溉的，湄公河三角洲（Mekong Delta）地区的航空照片显示淤塞的运河可能除了用于运输外还用于排水。② 如果灌溉技术在 9 世纪之前已广泛应用，规模也不会特别大，村庄是前吴哥时期柬埔寨社会最具特征的构成单位，除了 7 世纪时期伊赏那补罗（Isanapura）联合体（也就是现在磅通省附近著名的三波布鲁库/Sambor Prei Kuk）。实际上，伊赏那补罗是由围绕一个共同宗教仪式中心的众多村落组成，举行仪式的石头建筑得以保留下来。即便在大约公元四五世纪时引进水稻种植技术以后，可以灌溉的地区，也就是跨村落组织控制的地区，面积也不是很大。 22
而且，即便是在印度教化程度较高的社区掌握了灌溉和水稻种植后很长时间里，大多数内陆村民很可能仍然继续种植旱稻和根茎作物，并以狩猎和采集来补充饮食。

---

① 同上，p. 28。

② 见 P. Paris，"Anciens canaux réconnus sur photographes aeriennes dans les provinces de Takeo et Chaudoc"，*BEFEO*，Vol. 31（1931）：221 – 24 和 Paris，"Anciens canaux réconnus sur photographes aeriennes dans les provinces de Takeo，Chaudoc et Rach Gia"，*BEFEO*，Vol. 41（1941）：365 – 70。又见 Paul Bishop et al.，"OSL and Radiocarbon Dating of a Pre – Angkorean Canal in the Mekong Delta"，*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31（2004），pp. 319 – 32。Bishop 认为争论中的吴哥博瑞运河，曾在公元前 500 年到公元 500 年之间使用。

需要种植水稻的是人类而不是土地本身。记住这一事实，再联系到该地区的低人口密度（除了爪哇、巴厘和越南的红河三角洲外），就容易明白为什么在整个东南亚的历史中总是以控制人口的多少而不是土地大小来衡量统治力和权力。当然，人口压力可能促使包括阇耶跋摩二世（Jayavarman Ⅱ）在内的一些柬埔寨统治者开拓新的领土，迁移人口到此种植稻米。柬埔寨历史上有过这样的时期，比如12世纪阇耶跋摩七世（Jayavarman Ⅶ），控制辽阔土地成为国王威望的重要一部分。尽管如此，控制领土本身（大多数情况下只是林地）没有控制人口那么重要。

事实上，土地所有权可以转让的观念（不同于土地的使用），似乎并没有在前吴哥时期有所发展。土地休耕三年就得收归国家控制。至少在理论上，国王是国家所有土地的拥有者，这意味着他可以把土地的使用权作为奖赏授予百姓。我们将会看到的，很多吴哥时期的柬埔寨语碑文，都涉及复杂的土地和劳力使用权之争。从碑文记录和公元8世纪之前的建筑遗迹中，找不到支撑在柬埔寨境内存在大一统国家的证据，除了吴哥博瑞外也很少有关于城市中心发展的证据。从保存下来的碑铭中我们知道，精英阶层成员中似乎存在某种传承性，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精英阶层中互相通婚传统造成的。

在我们现在称为柬埔寨的这片土地上，像东南亚早期的其他地方一样，包含众多小的国家，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朝廷和统治阶层，他们各有自己的追随者，也就是既要为他们种植粮食还要应征为他们打
23 仗的人。估计，这些小王国之间既互通贸易，也互相攻击，特别是为了争夺奴隶。每位国王在没有外面侵扰（或者是侵扰别人）的情况下，似乎也可能把自己视为万能的君主，既从印度人的教诲中获益，也作为当地首领承担着明确的柬埔寨职责。

领导能力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勇武来衡量，而勇武要靠战场上的胜利、广大追随者的拥护以及举行宗教仪式和提供保护方面所展现出的能力来体现。如J. D. M. 德雷（J. D. M. Derrett）所指出的，提供保护同降雨量一样，是农业社会的必要条件：保护国家免于敌人的进攻，

免于对手的统治，免于自然力量的破坏。[1] 由于认识到这种必要性，扶南和整个柬埔寨历史上的最高统治者，通常在其王号后面加上“跋摩”（*varman*）的后缀（原意是“盔甲”，后来有“保护”的意思）。

最高统治者们认为，如果没有超自然力量的保护，他们将不能生存，为此他们中很多人通过向湿婆神献祭，在一定程度上获得这种保护。至少在一段时期内，他们得到印度婆罗门教其中一派的支持，即所谓的巴苏甫塔（*pasuputa*）。在约公元五六世纪的时候，兽主派在印度和东南亚其他地方深受欢迎。[2] 这些流浪的苦行僧宣扬个人对湿婆神的奉献比小心翼翼地遵循婆罗门礼仪、命运和业缘会得到更多佑护。从技术上讲，统治者的献祭并不需要巴苏甫塔的代祷，他们之中一些人大概也没有这么做。在任何情况下，这些自觉的印度教徒都被视为上等人，是“不断降临”到圣山上的湿婆神使者，他们自己也这么认为。湿婆神的力量通过君王及其祭祀仪式传递到世人和土地中，这是柬埔寨社会凝聚力的一个重要源泉。[3] 这也是柬埔寨持续性的源泉。一直到1877年，每年在农事开始之时，人们就到巴普农向湿婆神祭祀。正如5世纪中国文献资料所描述的，这些仪式的目的是能带来丰收，跟中国的仪式一样，由当地官员主持。[4]

在扶南时期，佛教在柬埔寨同样兴盛，佛教价值观充斥着柬埔寨人对社会的思考中，在某些方面很像前面讨论的勇武和救世的观念。 24
在两种思想体系中，权力和能力——特别是对那些没有掌握它们的人来说——被认为是对前世善行的回报。权力的失去、缩小或缺乏向人

---

① J. D. M. Derrett, “Rajadharma”, *JAS*, Vol. 35, No. 4 (August 1976): 605. 原文是：“农业人口迷恋权力，权力正是生活的核心。土地失去保护和降雨是无法耕种的。”有关勇武的话题见 Vickery, *Society, Economics, and Politics*, pp. 190 – 96。

② K. Bhattacharya, “La Secte des Paçupata dans l'ancien Cambodge”, *Journal Asiatique* (JA), Vol. 243 (1955): 479 – 87. 这些观点已经被维克里书中的观点所掩盖，见 Vickery, *Society, Economics, and Politics*, pp. 321 – 417。

③ O. W. Wolters, “Khmer ‘Hinduism’ in the Seventh Century”, in Smith and Watson, *Early Southeast Asia*, pp. 427 – 42.

④ 见 David Chandler, “Royally Sponsored Human Sacrifices in Nineteenth Century Cambodia: The Cult of Me Sa (Uma Mahisasuramardini) at Ba Phnom”, *Facing the Cambodian Past*, pp. 119 – 36.

们揭示了此人前世曾经做过的错事。因此，一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是由他的前世表现所决定的，而他在此时此地的行为决定了他何时转世以及转世后的地位如何。因而为了提高个人地位，一个人应该行善积德，如资助寺庙或施舍僧侣，为神像贴金，或资助举办宗教节日。通过这些活动，个人能够获得救赎。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吴哥最大的寺庙同样被认为属于这种赎罪行为，是国王通过他们的直系祖先与神灵达成的交易。当时乃至此后没有人会知道这项交易是否成功，但是如果有忽视此举的想法，意味着几乎不会有转世的可能。

“保护者”、“委托人”和“随从人员”，这些观念在柬埔寨后期历史中变得非常重要——他们是了解19世纪柬埔寨社会和一定程度上了解当今柬埔寨政治生活的有用钥匙——但如果认为柬埔寨在六七世纪时候就有非常类似的情况是危险的。例如，我们对统治者如何上台或他们如何招募追随人员知之甚少。我们不知道是什么使得追随者甘愿为主子服务，以及经常提供哪些服务。有证据表明，我们可以把前吴哥社会描述为一个由领导层和追随者组成的集合体，他们占据着领土空间和社会空间，这些空间被分为中心和外围两部分，与印度术语曼荼罗相对应，但是这一术语在当时的柬埔寨没有政治含义。随着多中心化，柬埔寨趋于分散，我们称之为“社会”（即总的聚合）的各个部分各自独立行事，或者以零星的方式发生联系。

然而，事情没有这么简单。地方性的宗教崇拜，如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埃夫利娜·波雷—马斯佩罗（Evéline Porée - Maspero）和
25 其他人在柬埔寨考察发现的那样，[1]普遍强调社群的福利而不是个人的，因为如果没有社会集体工作，就不能灌溉水稻。农村生活需要联合起来，巴普农的献祭是这种公共性的一个例子。其他的崇拜还包括保留至今的在农业年份举行一系列开场仪式——扶神犁、推沙塔等等；与逝者进行谈判为王国祈福的王室崇拜活动；播种完稻田后，在洪水

① 见 Evéline Porée - Maspero, *Etude sur les rites agraires des cambodgiens*, 3 vols.（Paris, 1962 - 69）。

泛滥的江河里举行赛船。这些崇拜仪式最初是互相对立的（又是大传统和小传统之间的矛盾），但实际上它们是相辅相成的。

除了上层阶级外，柬埔寨普通家族的谱系没有持续下来，因而纳塔或祖先都没有姓氏。他们或者是成为特定地区人们象征性的祖先，或者是因为他们死在这儿就成为这块土地的保护者。生活在定居区的纳塔性格温顺，可以交流；而那些生活在森林或偏僻地区的纳塔则被认为更加强悍和充满敌意。当在一个地方定居多年，祖先留下来的传统就会在此积淀，当然像中国和越南那种程度的传统积淀在柬埔寨比较少见。[①] 在前吴哥时期的记载中，几乎没有谈及纳塔，但是通过现代数据追溯，我们可以断定印度教和当地信仰之间经常是融合多于冲突。

实际上，早期到此的中国人就注意到这种融合趋势。例如，在关于湿婆神经常降临摩耽山的那段文字中，也提到当时受人尊敬的菩萨或未来佛。有时，两个印度神合在一起，例如湿婆同毗湿奴（Vishnu）合成诃里诃罗（Harihara），一个深受吴哥国王敬仰的复合神。诃里诃罗把湿婆（世界的创造者和破坏者）与毗湿奴（世界的保护者）的特征融合在一起，提供了一系列灵感，还展现出理想的君主能力，能够平衡掌握相反的力量。[②]

不同宗教的融合进程，主要表现为各地的精神力量接受印度神的名字，就像基督教早期希腊、罗马诸神在地方化过程中被重新命名一样。印度教庙宇建立的地方经常选在那些早在印度仪式传入之前就常

---

① 见 Institut Bouddhique (comp.), *Pracbum ruong preng pbak ti 8* [Collected folktales, Vol. 8] (Phnom Penh, 1971)。有关于纳塔的讨论，我的观点见于 *JSS*, Vol. 61, No. 2 (July 1973): 219 - 21，又见 Ang Choulean, "Le sol et l'ancetre: L'amorphe et l'anthromorphe", *JA*, Vol. 283 (1995): 213 - 38 和 Alain Forest, *La Culte des génies protecteurs au Cambodge* (Paris, 1993)，里面有一些非常有价值的译文。

② 见 Paul Lavy, "As in Heaven, so in Earth: The Politics of Vishnu, Siva and Harihara Images in pre - Angkorian Khmer Civilization",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JSEAS) 34/1 (February 2003): 21 - 36。

26 举行各种庆典的地方附近；吴哥宫殿地下就有新石器时代的遗址。[①]需要强调的是，居住地和宗教思想的连续性深深扎根于柬埔寨文化中。如果是在统一和繁盛时期，祖先就会变为印度神灵，而当印度教和其僧侣减少或消失的时候，这些神灵又变回祖先。根据20世纪30年代保罗·穆斯对吴哥和越南占婆的研究，在最近时期，人们将印度的神像和寺庙当作纳塔的神秘产物来崇拜，而不是作为源于印度的产物。[②]出现这种情况，部分是因为用来解释和说明这些神像和寺庙的占婆人与柬埔寨人精英阶层的文学已经丢失或无法破解，而农村百姓的宗教生活语言在很大程度上保存下来，并且从前印度化时代到殖民时期大体未变。

如保罗·穆斯所指出的，最持久的图腾崇拜是对林加（lingam，即用石头雕刻成的男性生殖器）的崇拜，这样的崇拜广泛分布。对林加及其与之相关的其他崇拜，显示出祖先神灵、祖先与林加赖以“生长”的土地和附近用于农业耕种土壤肥力之间的联系。鉴于宗教崇拜的地域性（一个林加可以从一个地方移到另一地方，但一次只在一个地方起作用），以及林加是村社保护神的观念，在吴哥时期，这种崇拜受到当地统治者或国王的密切监督。根据中国古文献记载，早在公元5世纪时，在老挝南部林加帕瓦塔山（Lingaparvata）——现在称为沃特山（Wat Ph'u），该山以有一个高约18米（59英尺）的巨大天然林加而闻名——举行的祭奉山神的仪式中包括以人作为祭品。[③]林加帕瓦塔像巴普农一样，作为祖先遗址受到好几位吴哥国王的保护。

扶南王朝一直持续到公元6世纪。在此期间，柬埔寨的政治中心

---

① W. Solheim, "Regional Reports: Cambodia, Laos and Vietnam", *Asian Perspectives* (*AP*), Vol. 3 (1960): 25.

② Paul Mus, "Cultes indiens et indigènes à Champa", *BEFEO*, Vol. 33 (1933): 367－450. 又见 Ashley Thompson, "Paul Mus vu de l'ouest: à propos des cultes indiens et indigènes en Asie du Sud－Est", 载 David Chandler and Christopher Goscha (eds.), *Paul Mus* 1902－1969: *l'espace d'un regard* (Paris, 2005), pp. 93－108。

③ 关于林加帕瓦塔的论述见 Claude Jacques and Philippe Lafond, *The Khmer Empire: Cities and Sanctuaries from the* 5*th to the* 13*th Century* (Bangkok, 2006), pp. 65－69, and Michael Coe, *Angkor*, pp. 76－77。

位于今天金边的南部和东部。这个时期，印度和中国之间的贸易发展迅速，而主要贸易货品是佛教用品。当地的宗教活动强调忠心信奉湿婆、毗湿奴、佛陀，以及较小的或地方性的印度教神灵，特别是女性神灵，也就是所称的 *kpoñ*。①政治集中在村庄和村庄群落，而不是组织 27
严密的王国，如迈克尔·维克里所指出的，水稻灌溉造成粮食盈余和社会分化，但他后来没有进一步发展此观点。从历史学家的角度来看，关于这段历史所要强调的重点是，我们从中国文献里了解到当地的习俗、中央集权和商品贸易，我们听不到柬埔寨人的声音，我们所能得到的公元 7 世纪之前的信息都是以碑文的形式存在。实际上，在扶南王朝衰落之后，我们的资料才变得更加丰富和坚实。

柬埔寨早期的政府和社会

在柬埔寨发现的最早的有年份可考的高棉语碑文刻于公元 611 年，梵文碑文则刻于两年之后。② 公元 7 世纪以来大约有 200 块有确切时间的用高棉文字或梵文刻成的碑文保留下来。这些碑文为我们拼凑出一幅柬埔寨社会画卷。根据碑文，柬埔寨社会至少非正式地分成掌握梵语的人和只会高棉语的人两部分。几百年来，梵文用于描述神灵，高棉语则是柬埔寨人的主要语言。柬埔寨人受到神灵护佑，并由祖先和本地最高纳塔向后传承，而神灵不能这样做。梵文碑铭以诗歌的形式，为国王和统治阶层歌功颂德，如建造印度教寺庙，举办佛教法事，战争凯旋，以及向僧侣和婆罗门奉献礼物。一些讲述者追溯或篡改他们的族谱，似乎是为了牟利或者杜撰先祖的功德；很多人以牺牲社会其他成员为代价赞扬婆罗门；所有碑文都会高度赞美那些有权势的人，毕竟是他们允许建造寺庙和撰写镌刻碑文的。根据印度学专家所说，很多碑文精心打磨，用词微妙，排列精巧，可以与同时期印度梵文诗

① 有关 *kpoñ* 的分析见 Vickery, *Society, Economics and Politics*, pp. 151 – 55。

② 见 P. N. Jenner, *A Chronological Inventory of the Inscriptions of Cambodia* (Honolulu, 1980)。1935 年法国学者在吴哥博瑞发现了最早有年份可考的柬埔寨碑文。有趣的是它是关于女神 kpoñ 的记载。Vickery, *Society, Economics, and Politics*, p. 105.

相媲美。

高棉语碑文都是以散文样式写成。它们记录了寺庙的建设过程和
28 日常管理细节，比如某一特定机构下有多少人及他们的名字。碑文还登记了寺庙所珍藏的宝物，并列出在寺庙管辖范围内的稻田、果园和池塘规模等。其中很多碑文大体记述了奴隶的职责，并制定征税额度（以劳役或实物形式），用于支持寺庙僧侣。其中很多碑文都是以诅咒（都是用高棉语写成）结束，威慑那些有蔑视、抢劫和破坏寺庙想法的人，诅咒他们数代遭受惩罚。

仅看到所谓大传统和小传统的区别是梵文和高棉文，或许有些过于简单。梵文代表着财富、诗歌、复杂的内容、巧妙的语言、僧侣，以及与神灵沟通，是保护者使用的语言；高棉文代表着贫困、散文、简单的目录、奴隶和凡人世界，是被保护者使用的语言。这两套碑文都使用同样来自印度的字母，通常都由同一石匠雕刻。如果诗人和僧侣愿意，他们大概能够读到这两种碑文。但是这些碑文想读就能读到的吗？一般情况下，刻在寺庙门柱或独立石碑上的文字，可以看到，但还有些文字档案很可能保存在容易变腐的其他地方。之所以有些文字被刻在石头上，原因可能是石头上的文字被用作特殊目的，它们是神灵的载体。石头是不用在世俗建筑中的，包括宫殿和普通住宅，都是用木头、竹子和其他易腐材料建造。而且，上层阶级声称梵文是受神青睐的语言；石头代表着永恒，也就是死亡。柬埔寨人把向祖先诉说的话刻在石头上；如果碑文是梵文刻的，就是使用神的语言。诅咒或效忠的誓言，刻在石头上会更加有效。

此外，碑文的法律效力也不应被忽视。比如，把赠予土地的言行刻在石头上，受益人会得到认可和保护；同样，诅咒（用高棉语写）刻在石头上可以防范盗贼和避免被掠夺。

说梵语和高棉语之间的区别也是种庄稼和不种庄稼的人的区别。
29 每个人都梦想“拯救自己脱离种地的命运”，但很少有人成功。在吴哥时期，那些不需要种地的人大部分分属于不同的种姓团体，约占整个社会人口的 1/10。这些人包括职员、工匠、妃嫔、艺术家、高级官

员、寺院住持，还有王室的仆人、亲戚和士兵。因为他们很少从事奴役劳动，且除了少数重要的人外，他们也不会捐助修建寺庙，所以这些人几乎不会出现在柬埔寨的碑文中。此外，遗漏这些人的记载，意味着我们将永远都不会知道设计和雕刻宏伟的吴哥塑像和寺庙的人的名字。实际上，到公元7世纪时，当时的伊赏那补罗城已经是整个东南亚地区最宏伟的石头建筑群，比爪哇（Java）出现类似规模的建筑要早一个世纪。这些自由人介于以王宫和圣山为代表的社会高级场所与周围的稻田之间，我们仍然不能称他们为中产阶级，因为把这样的术语挪到此处并不妥当，而且我们有关这些人的信息非常零散。

像这些源于西方的社会术语，其含义让我们茫然，在研究其他柬埔寨社会群体时也有类似情况。我们注意到，扶南时“王”（*raja*）的含义要比中世纪的欧洲少很多。另一个重要的名词“*knjom*”，可译为“奴隶”，在高棉语中似乎比英语中的“奴隶”有更多不清楚的含义。首先，正如朱迪斯·雅各布（Judith Jacob）所指出的，在前吴哥时期，“*knjom*”只是14类奴隶的一种。① 他们有不同层次的社会地位，不同的起源，以及多种义务。那些在田地里辛勤劳作的人，类似于美国内战前南方的黑人奴隶。而其他人，特别是附属于寺庙的，可能将自己视为半文书工作人员。然而，所有这些人都可以被买卖和赠送，他们没有逃跑的自由，也不是仆人。他们中很多人可能都是有契约在身，为了清偿债务，自己或父母签订卖身合同。他们是农奴吗？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该对术语能否互换保持警觉。20世纪70年代共产党人认为早期柬埔寨是封建社会，这是不准确的。虽然当时社会带有明显的剥削性，并清楚地划分为有产者和无产者。其中，无产者中有些好像 30
已经好几代都依附于某一地方，但断定他们是隶属该地的奴隶，证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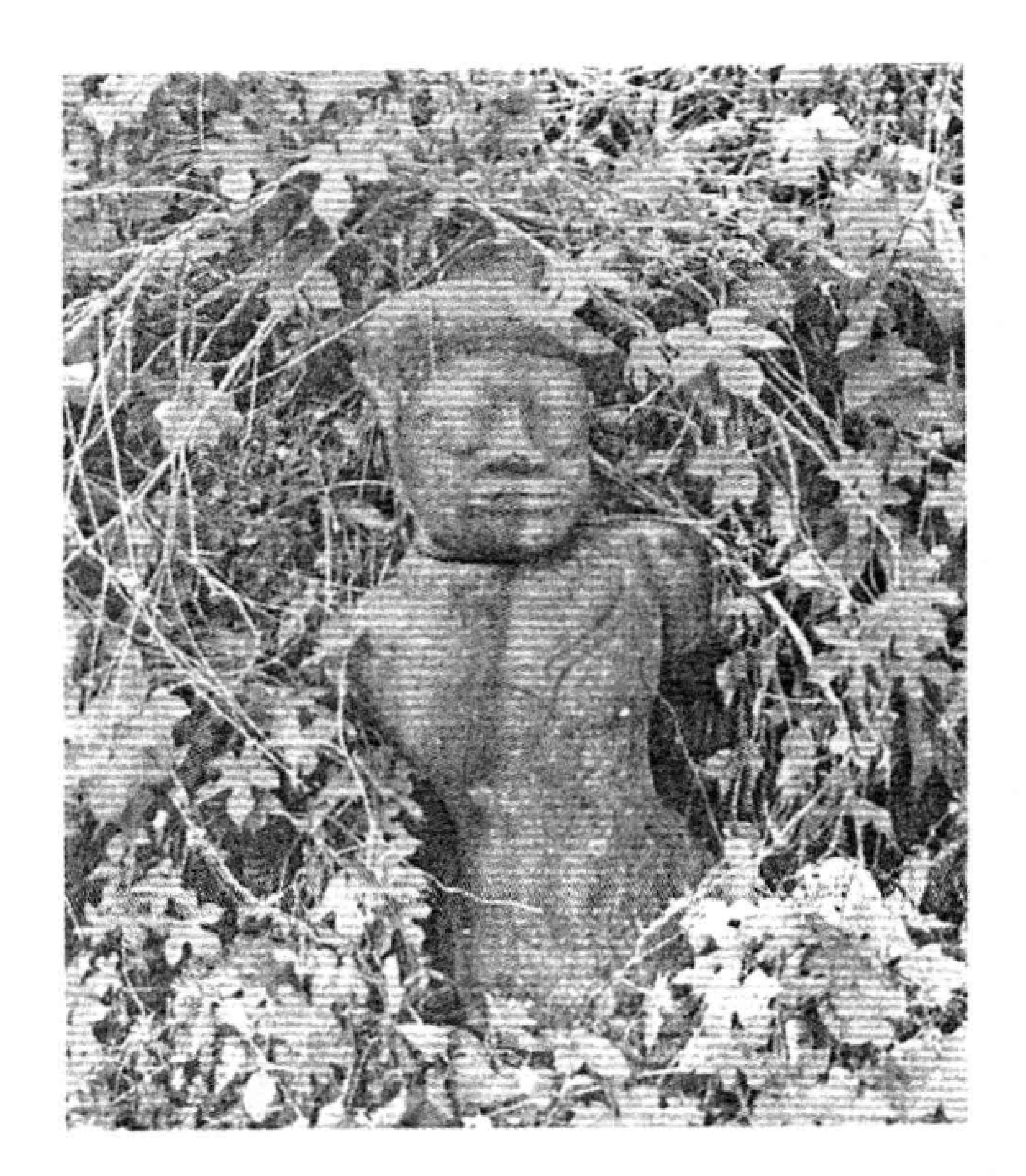
① J. Jacob, “Pre - Angkor Cambodia”, 载 Smith and Watson, *Early Southeast Asia*, pp. 406 -26, 又见 Jonathan Friedman, *System, Structure, and Contradiction in the Evolution of “Asiatic” Social Formations* (Ann Arbor, Mich., 1975), 特别是 pp. 373ff., 以及 Michael Vickery, “Some Remarks on Early State Formation in Cambodia”, 载 Marr and Milner (eds.), Southeast Asia in the 9th to 14th Centuries, pp. 95 - 116。

并不充分。这只能够说明这种奴役义务是可以继承的，并且他们是依附于某一地方而不是某一领主。有些村民可以自由种植稻米，但不能自由迁移，还有些人似乎归寺庙和上层阶级成员拥有。实践和理论似乎都随着时间和地点的不同而变化，很难对这一时期的柬埔寨社会做出概括。

从碑文中获得的证据表明，在任一特定时期内构成柬埔寨人口大多数的是各式的奴隶。自由农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和精力来履行义务，包括承担公共事务，为领主做事，在寺庙中服务或者在战争中服役。实际上，他们中很多人要么是战俘，要么是战俘的后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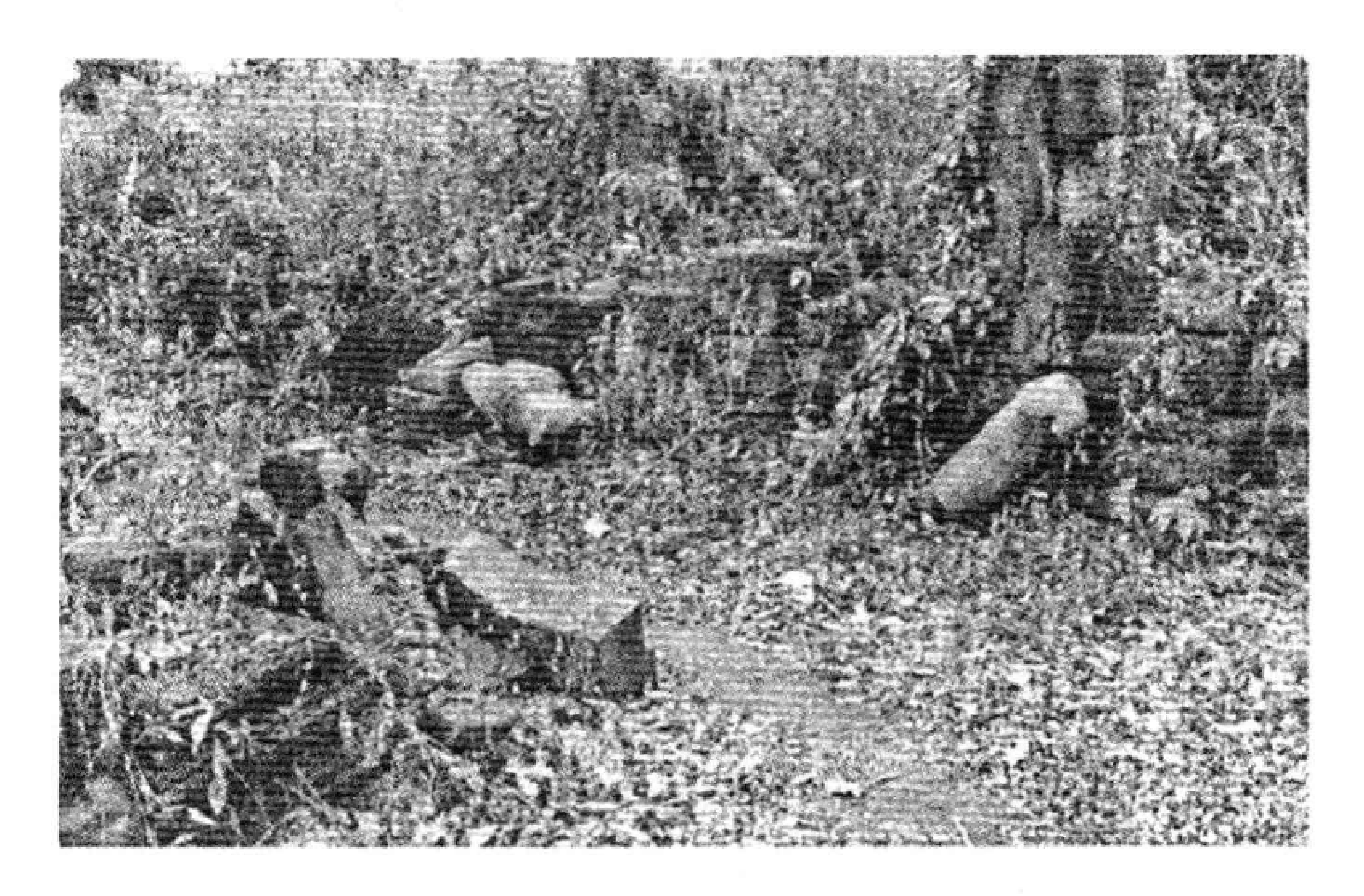
无论奴隶登上或退出柬埔寨历史舞台，留下的仅仅是名字。他们的名字将梵语和高棉语文字融合起来。碑文按照从带有敬意（比如一些 *knjom* 的含义等同于 Mr. 或 Mrs.）到带有贬义（像“狗”，“不完美”，“红脸”和“臭味”等奴隶名字）的顺序排列名字。总的来说，奴隶得到受肯定的梵语名字（如“热爱正义”，“湿婆的奴隶”或者“教规”），往往享有稍高于其他奴隶的地位，他们中很多人可能是音乐或舞蹈艺人。其中很多名字在依然被今天柬埔寨社会所接受，如花的名字，就被广泛用到女孩子身上。

前吴哥时期奴隶与美国内战前奴隶的另一个不同之处，是前者生活的村庄、吃的食物和奉行的信仰同那些享有自由的人（这里指同时期的种地自由农）和受奴隶服侍的主人没有很大的不同。如果不看 *knjom* 这一身份标示，他们通常具有非常相似的文化背景，而当时城乡之间的差别既无意义，也不是很大。况且，作为寺庙的仆人，很多奴隶（*knjom*）
31 要参与一年中举办的各种仪式，如为镀金佛像洗身、换衣和抱着佛像环绕寺庙游走，还有佛像正式开眼时，他们簇拥着王室的游行队伍，当王室轿子经过时做些点缀工作。奴隶（*Knjom*）生活在伟大神灵的周围。他们可能认为这是功德无量的事情，也就意味着能够得到神灵的庇佑。他们认为自己同社会中的其他人一样，努力追求自我的救赎。他们为僧侣住持服务，僧侣住持为神服务，还有什么方法比这更能救赎自己？



在磅湛省附近森林中出土的公元 9 世纪塑像（图片提供：作者）

通过追溯过去柬埔寨人的生活和研究浮雕、塑像、文物和碑文，我们可以得出上述初步结论。不过在研究柬埔寨历史中几乎总是碰到这样的情况，就像我们关于农民的研究，却听不到农民自己的声音。农民会说什么呢？不禁还会问第二个问题：农民会向谁说话？当然， 32
大多数柬埔寨农民是坦率和主张人人平等的，但如果有外人在场，他们不愿意冒风险。农民对上层阶级具有明显的顺从倾向，一些学者据此认为在柬埔寨传统社会中存在一种基本的和谐关系。但在柬埔寨历史上充斥着叛乱和内战，1970 年以后的事情应该让我们对那些主张柬埔寨农民具有天生顺从性的学者保持警惕。农民声音的缺失，让我们很难认定柬埔寨社会关系具有和谐性，同样也很难认定柬埔寨充斥着持续动荡的传统。大多数时候二者兼而有之。



磅湛省附近森林中被遗弃的公元9世纪塑像（图片提供：作者［1962］）

然而，前吴哥时期的柬埔寨，甚至包括吴哥王朝本身，都不是一个统一的专制国家。相反，它是由一群诸侯分享专制政治话语权和控制权。这些诸侯——其中一些是女性——都自视为绝对的统治者，相互之间相互争斗，各自独立。不过，迈克尔·维克里根据高棉语碑文判断，在整个8世纪（中国的文献资料没有谈及这一时期，因为没有来自柬埔寨的朝贡到达中国）柬埔寨在政治上变得更加具有凝聚力。
33 柬埔寨的融合得益于人口的增加、水稻种植技术的提高、地方权威统治方式的改变，以及像战争凯旋或长期和平等明显具有偶然性的因素。随着柬埔寨重心的继续北移，相比于沿湄公河上游的诸侯国（在三波及其他地方），在现在吴哥周围的阿宁迭多补罗（Aninditapura）地区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前吴哥时期的碑文分布情况表明，柬埔寨人口集中的地方——正是20世纪人口集中的地方，而不是吴哥时期人口集中之地——是在湄公河沿岸和洞里萨湖（Tonle Sap）低地，特别是今天的金边南边，其他的聚居地区处于湄公河上游，在今天桔井市（Kratie）附近。

直到近年，还有学者试图证实中国史书上的真腊（Chenla）就是当时柬埔寨诸多小国的总称，19 世纪时越南人也称柬埔寨为真腊。实际上，中国史书中有“水真腊”和“陆真腊”之分，前者位于湄公河三角洲，后者显然是位于湄公河上游地区，可能靠近今天老挝南边的沃特山。中国朝廷并不介意夸大这些所谓未开化国家的重要程度，以获得他们的朝贡。19 世纪和 20 世纪的欧洲学者，或许忘记了欧洲中世纪或者非洲前殖民地时期王国多样化的特点，也愿意将真腊视为承接扶南的一个中央集权王国，从而勾画出一幅清晰的柬埔寨历史进程，从最早时候的诸多“实力”小国发展成以吴哥为中心的统一国家。①

不过，克劳德·雅克在一篇简短但有说服力的论文中，已经质疑了这一解释：

> 碑文表明在这个高棉人国家里存在众多小的王国和领地，那些中国人称之为扶南或真腊的国家，是否存在至今不明，即便存在也是众多国家中的一个，或者是最重要的一个。一些诸侯似乎有时候能够或多或少控制众多领地，但是这种情况只是暂时的。②

不管怎样，能够非常明显地看出，到公元七八世纪的时候，像扶 34
南（及东南亚其他地方的类似国家）这样的沿海贸易国家已经衰落，或者演变成深入腹地的内陆国家，如柬埔寨的被称为“真腊”的诸多国家。这些新王国的财富主要来自广泛的水稻种植和劳动力的动员，而不是来自自给自足的农业和贸易。源自印度的意识形态，以建筑、雕塑和碑文的形式保存至今，似乎在塑造和指导柬埔寨社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或许是因为这种等级思想能够把靠武力榨取农民盈余的

---

① 见 Briggs, *Ancient Khmer Empire* (Philadelphia, 1951), pp. 38 – 57, 该书有关于这方面证据的汇总。有关最近这方面的讨论见 Michael Vickery, “Where and Whar Was Chenla?” 载 François Bizot (ed.), *Recherches nouvelles sur le Cambodge* (Paris, 1994), pp. 197 – 212, 以及 Vickery, *Society*, *Economics*, *and Politics*, pp. 33 – 35。

② Jacques, “ ‘Funan’, ‘Zhenla’ ”, p. 376.

行为变得合法化。如迈克尔·维克里（Michael Vickery）和乔纳森·弗赖德曼（Jonathan Friedman）在与其他人讨论国家形成过程时所指出的，随着时间推移，宗教仪式可能日益与财富联系在一起，而财富又与超自然能力捆在一起。[①] 然而，从现存的档案材料中再现这一过程是不可能的。就柬埔寨曲折历史而言，重要的是认识到在公元七八世纪发生的地理、经济转移，到公元十四五世纪时又发生逆转，还有就是在公元9、10世纪第一次变革浪潮时伴随着吴哥王国的形成，在第二次变革浪潮时伴随着一个新王国的建立，这个王国以今天的金边地区为中心，它在历史上没有留下不朽的遗迹，也没有很大野心，是一个多少有些外向型的国家。

---

① Friedman, *System*, *Structure*, pp. 341 -44. 这方面的讨论还见 Michael Vickery, "Angkor and the Asiatic Mode of Production" (unpublished seminar paper, Monash University, November 27, 1981)。

第3章 吴哥的王权与社会

学者通常将公元802年至1431年之间的柬埔寨历史称为吴哥时期。事实上，这两个年份既不是开始的年份也不是结束的年份。柬埔寨北部，也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吴哥国（这个名字来源于梵文 *nagara*，意思是“城”），在公元9世纪兴起时，讲高棉语的民族已在那里居住了几百年。此外，虽然在公元15世纪的时候该城的大部分已被遗弃，但仍然作为居住点保留着，并在16世纪70年代的时候短暂恢复为皇城。更重要的是，吴哥的主要寺庙之一——吴哥寺（即寺庙之城），很可能从未被高棉人遗弃，因为吴哥寺内收藏有公元15—19世纪间各世纪的佛教雕像，以及最晚至1747年的墙壁碑文。[1] 当19世纪50年代法国传教士和探险家“发现”吴哥遗址的时候，院墙之内还是一个繁华的佛教寺庙，由数百名世袭奴隶维护着。 35

公元802年和1431年仍然具有很大的价值，因为这两个年份标示了柬埔寨历史上一段伟大时期。在这六百年间的不同时期内，柬埔寨——在碑文中称为 Kambuja - desa——是东南亚最强大的国家，吸引着众多访客和朝贡者，他们来自西边，即后来的泰人王国，还有更远的来自今天的缅甸和马来西亚。

---

① 见 B. P. Groslier, *Angkor et le Cambodge au XVIe siècle* (Paris, 1958)。

吴哥历史的资料来源

36 在这一时期，真正能够系统统治的时段并不常见，且相对短暂。况且，我们对这一时期的社会状况知之甚少，以至于不能对所有柬埔寨专制君主做出分类。据我们所知，其中一些君王没有什么作为；其他一些君王留下大量碑文、寺庙、佛像和公共工程。一些君王建立起集权式的多层次统治，其他君王似乎只能控制几百个追随者。从 L. P. 布里格斯（L. P. Briggs）、乔治·戈岱斯和克劳德·雅克的对历届国王的研究中，可以确定一个事实，那就是这些国王都能指挥不同的民族。[①] 从社会上层看（在社会上层已经出现文字资料），我们可以很容易的概括吴哥时期，但却很难分析透彻。从艺术的风格、载体和主题看（包括柬埔寨诗人运用梵语的能力），可能会看到社会的进步、发展和衰落，但却不能解释为什么有的时期进步而有的时期衰落。从社会底层看，同样能够很容易概括出那个时代与近代的连续性，但是我们仍受材料缺乏所困。

资料缺乏确实是大问题。我们已经在第 2 章讨论了那些梵语或高棉语碑文，但需要重视的是要看到这些带有偏见性的碑文是如何扭曲吴哥社会面貌的。梵文诗歌描绘了君王的丰功伟业；高棉语碑文则通过记录因管辖权争端产生的诉讼和注册在案的奴隶，展现出社会的细节。我们可以通过对比两种碑文推断官员履历；我们可以通过对比这些碑文窥见当时的物质文明，特别是那些提供寺庙财产和人员清单的碑文。但是，这就像根据讣告、遗嘱、契约、7 月 4 日演说和其他小的资料再现美国历史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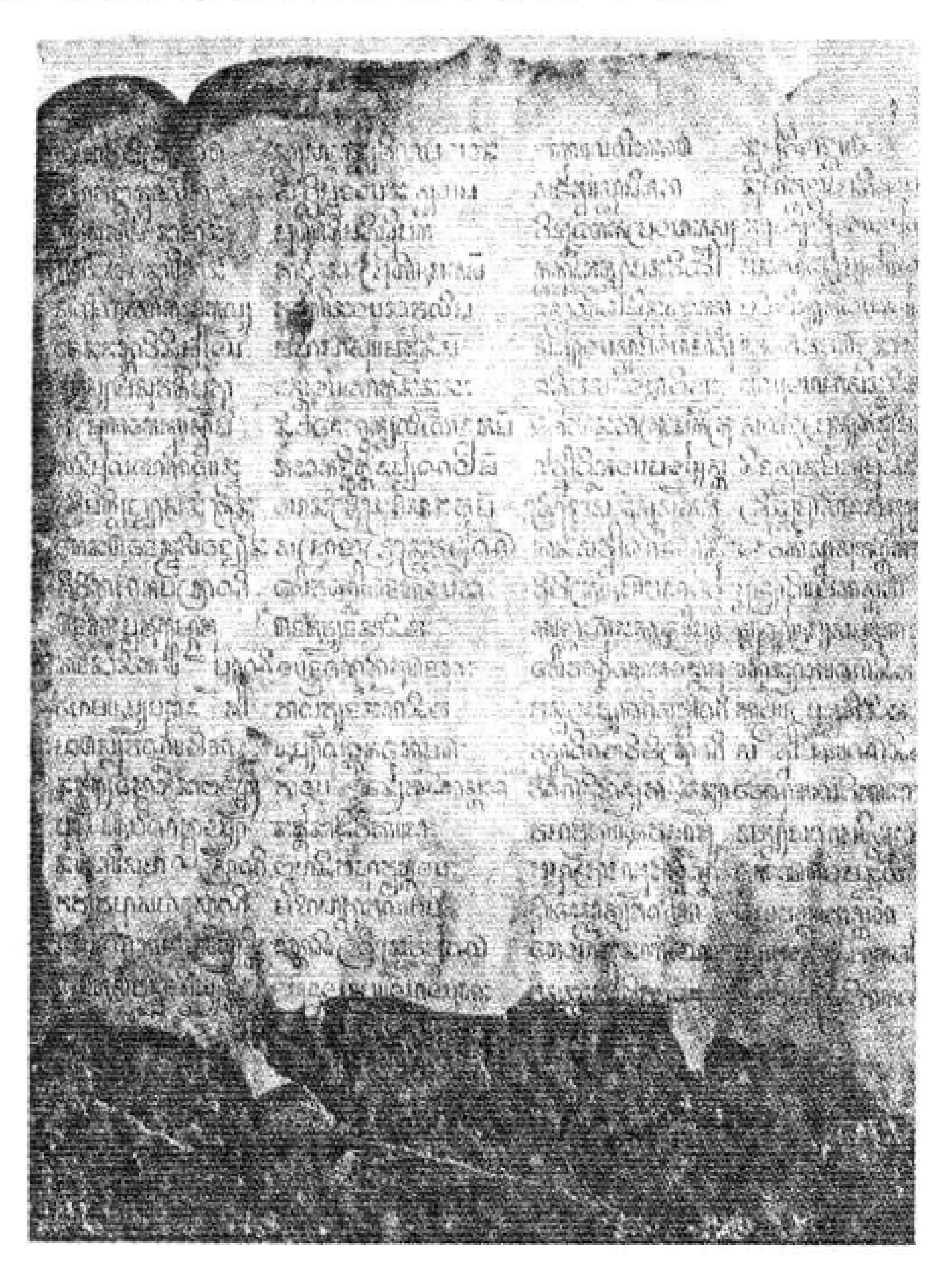
当然，这些资料都要在时间上仔细定位。除了一些例外，吴哥历史的编年架构（特别是在位君主的时间）已经得以重建，虽然柬埔寨人自
37 己对此早已忘却。重新编年的工作并不好做。这项工作或许占据了法国

---

① 有关这方面的总结见 Briggs 的 *The Ancient Kbmer Empire*，以及 Coedes 的 *The Indianized States of Southeast Asia*。最近的研究见 Claude Jacques 的 *Angkor*（Paris，1990），以及 Bruno Dagens 的 *Angkor：La Forêt de pierre*（Paris，1989）。

学者乔治·戈岱斯（1886—1968）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戈岱斯是柬埔寨和早期东南亚史最优秀的学者，他不愿意臆测碑文中没有涉及的问题，他把自己收集起来的很多柬埔寨碑文资料留给了后来学者。①

标有时间的碑铭作为永久性建筑的一部分（建筑的有些部分已经消失），会被植立在环境优美的地方。尽管如此，除了极少数例外，碑文没有记录下柬埔寨农村百姓的生活细节，也没有清晰记录下发生在吴哥和其他地方的政治运作过程。相反，它们通常暗示一些异常事情（人与神之间达成一致的事情），“上层”的诗歌和“下层”的散文记录下这些奇闻异事。碑文提供给我们的“历史”，在某种意义上像是很多或明或灭的火把，随时随处在东南亚大陆上空闪烁。通过每个亮点，我们可以环顾四周，发现历史中的一些细节：X寺庙是在哪一天由何人为祭祀哪位印度神灵而建；寺庙有多少奴隶，奴隶的名字和性别都一一标明，并能根据是否可以走路判断出是不是儿童；寺庙的占地向东延伸至一条溪流，向南伸至一座小山，向西向南至其他地标等。其他信息就没有了。对于寺庙如何适应时代背景，它的捐助者是否有官职，以及寺庙使用了多少个月或世纪，我



公元9世纪的柬埔寨碑文（图片提供：克劳德·雅克）

① G. Coedes, “L'Avenir des etudes khmères”,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des Etudes Indocbinoises* (*BSEI*), Vol. 40 (1965): 205 - 13. 该章后面的内容如同所有有关柬埔寨的学术著作一样，很大程度上基于戈岱斯和他同事及学生在法兰西远东学院的工作。

们知之甚少。在一些碑文中记录着，捐助者的子孙回来重新修复寺庙以纪念先祖；其他寺庙似乎只在某一捐助者资助的情况下才维持下来。

我们研究柬埔寨历史的其他信息来源是寺庙本身和寺庙里的塑像浮雕，以及遍布于柬埔寨地下的吴哥时期的文物。这些资料告诉我们很多信息，关于柬埔寨上层社会宗教信仰的顺序和重点，关于某些印
39 度神话的流行情况，以及反应精英阶层先入为主的认识。它们还能告诉我们当时流行的服饰、发型和首饰，这些已经用于判定艺术风格的年代。浮雕对于了解当时的武器装备和战略战术提供了很多信息；建于13世纪的巴戎寺（Bayon）中的很多浮雕，提供了大量关于柬埔寨人日常生活的详细资料。

除了事迹、讣告和演说辞外，我们还可以研究吴哥人的舞台造型，很多人扮演成神话中人物；还可以研究浮雕，这些浮雕再现了吴哥人的日常生计。我们所缺少的资料是文档，这比其他资料都更为重要，能够提供柬埔寨的社会概况；还缺少那些在地下发掘出的资料，能够就有关税收、土地所有权、日常生活和民间信仰提供详细信息。

阇耶跋摩二世和吴哥王朝的建立

公元802年发生了什么？刻于1050年的斯多加通（Sdok Kak Thom）碑文，位于现在的泰国东南部，很多年来一直是关于柬埔寨年表和宗教历史的重要资料来源，但是其中一些说法最近引起一些学者的质疑。碑文告诉我们，在公元802年，我们称之为阇耶跋摩二世的君主来到吴哥城北边的库伦山（Kulen），参加了祭祀仪式，不知怎么他就成了“普世君主”。[①] 碑文特别说明，这场仪式也是祭祀提婆罗阇

---

① G. Coedes and P. Dupont, “L'Inscription de Sdok Kak Thom”, *BEFEO*, VoL 43 (1942 – 43): 57 – 134. 又见 I. W. Mabbett, “Devaraja”,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History* (*JSEAH*), Vol. 10, No. 2 (1969): 202 – 23; Mabbett and Chandler, *The Khmers*, pp. 88 – 90; and Nidhi Aeusrivognse, “The *Devaraja* Cult and Khmer Kingship at Angkor”, 载 K. R. Hall and J. K. Whitmore (eds.), *Explorations in Early Southeast Asian History* (Ann Arbor, Mich., 1976), pp. 107 – 48。Michael Coe, *Angkor*, p. 100，该文注意到库伦山仪式发生在查理曼加冕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两年之后。

（*devaraja*，这是一个梵语词汇，意思是“众神之王”）的仪式。毫无疑问，这一崇拜是将君王和湿婆联系起来。这一仪式显然早在阇耶跋摩在柬埔寨东南的巴普农举行“吉祥神奇之祭”之前很多年就已经开始了。①

阇耶跋摩二世和他的儿子阇耶跋摩三世没有留下关于他们自己的碑文，这让学者怀疑他们作为吴哥王国的建立者，其重要性被夸大了。斯多加通碑文内容主要是关于一个僧侣家族，二百多年来该家族一直主持提婆罗阇庆祝仪式。碑文提供的传记性内容非常有用。阇耶跋摩 40
二世在位期间显然曾在不同的时期在柬埔寨的 5 个地方住过。他似乎是从柬埔寨东南的巴普农附近搬迁至湄公河流域上游靠近三波的地方，又向西占领了阿宁迭多补罗，后又搬至洞里萨湖的北面和东面，在那里他可能控制着一个城市，并建立了几座小的寺庙。

阇耶跋摩在这些地方都做了些什么？即便我们知道的关于他的故事都是真的（有关他的故事远比以后许多国王丰富的多），仍然存有一些神秘色彩。他是谁？来自哪里？克劳德·雅克在一篇比较有说服力的文章中，认为阇耶跋摩在约 770 年的时候从一个叫做爪哇地方（可能是个岛的名字，也可能是苏门答腊的一个王国，或者是其他什么地方）来到此处，当时他有 20 岁。② 据在巴普农地区发现的公元 10 世纪的碑文记载，阇耶跋摩二世最先采取的行动之一是举行仪式，“使得爪哇不能控制神圣的柬埔寨”。我们无从知道仪式都包括些什么，以及为什么阇耶跋摩二世急于在此时并以这种方式宣布他的独立性。克代斯指出，虽然该仪式明显早于在库伦山举行的仪式，但可能只是当时王国内很多地方举办的众多仪式的一个，因为阇耶跋摩在此后 30 多年里不断变换地方。

下面的推论很具有诱惑性但都不全面。在巴普农举行的仪式是不是从爪哇引进来的？或者正是这个仪式把阇耶跋摩二世同扶南王国祖

---

① K. 956, from Wat Samrong, *IC*, Vol. 7, pp. 128 - 29.

② C. Jacques, “La Carrière de Jayavarman II,” *BEFEO*, Vol. 59 (1972): 194 - 220.

先灵魂联系起来？这场仪式如此重要，以至于在两个世纪后主要记载其他事情的碑文中也会提及。考虑到巴普农作为祭祀圣地，其重要性持续到最近的20世纪40年代，第二个推论很吸引人，但是缺乏支持它的依据。

克劳德·雅克、迈克尔·维克里和奥利弗·沃尔特斯（Oliver Wolters）一直追寻阇耶跋摩早期生涯的其他经历。① 主要是包括一系列军事行动，并通过婚姻和赠地跟当地有势力的人结成同盟，这些人愿意在一定程度上效忠这位自称万世之主的新来者。一个未注明时间的碑文记载了阇耶跋摩二世统治疆域分别与“中国、占婆、海洋和豆蔻芒果之乡（可能是位于西部的一个地方）②”接壤。

41 把吴哥地区吸收到柬埔寨古王国中用了二十多年时间。有关这一时期的碑文没有保存下来，似乎此时期的寺庙都比较小，或者是用易腐材料建成。没有资料记载的这些年一直都是个重要时期，因为正是在这段时期柬埔寨人重塑的国家和王权观念一直在积聚着力量。要谨慎使用“国家”和“王权”这两个术语。国家或许仅是用来区别于当地人和外人的一个名字（Kambuja - desa）。柬埔寨人是当地人，效忠于一个特定的“普世”国王，这个国王跟他们之间的关系有点像湿婆神与其他诸神的关系。也许这两个观念都是来自于爪哇，但是柬埔寨人很可能已经从经世致用的印度文学中有所了解，当时婆罗门的一些名门望族对此非常熟悉。

用于支持这些观点的证据出现在阇耶跋摩死后很久的碑文中。但是沃尔特斯、维克里和雅克已经令人信服地指出，在柬埔寨的历史进程中，阇耶跋摩二世把各个相互分散的地区结合成具有自我意识的整

① 同上。又见 O. W. Wolters，“Jayavarman II's Military Power：The Territorial Foundation of the Angkor Empire”，*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rc Society*（*JRAS*）（1973）：21 - 30。有关阇耶跋摩二世进一步的讨论参见 Vickery，*Society*，*Economics*，*and Politics*，pp. 393 - 408，以及 Hiram Woodward，“Mapping the Eighth Century”，未发表论文，2006。又见 Elizabeth Moore，“The Prehistoric Habitation of Angkor”，载 *Asian Archaeology*（1994），pp. 27 - 35。

② *K.* 989，stele from Prasat Ben，*IC*，Vol. 7，pp. 164 - 89. 可能是指中国管辖的越南北部。

体。阇耶跋摩二世是否成功完成了这项任务（甚至这项任务是否在他的头脑中出现过），还受到质疑，因为还有很多模糊不清的地方笼罩着他的统治。不过，可以确定的是，其身后的历代国王都把阇耶跋摩二世奉为王朝的奠基者和用特殊视角看待柬埔寨的始作俑者，这种视角不同于他们的视角，或许与更多的地方先祖的视角也不同。阇耶跋摩二世也致力于更现实的目的。柬埔寨民间意识总是强调崇拜与特定地方有关系的祖先（或称“纳塔”）。诃里诃罗洛耶（Hariharalaya，今天的罗卢奥斯/Roluos）曾经是柬埔寨的王都，阇耶跋摩二世最后在此定居，后世君主都会到此纪念祖先的创业精神，直到最近，每个柬埔寨村庄还保留着这种崇拜。

认为崇拜提婆罗阇在某种程度上是把国王变为神或神化君主的仪式过程，这种观点并不是完全站得住脚，但是几乎所有柬埔寨国王都和湿婆神有关联，这方面的证据非常丰富，无论是仪式方面的或认识方面的，即使提婆罗阇崇拜这样的仪式或许并没有斯多加通碑文作者与之后的学者像我们这样认为其如此重要。换句话说，这种崇拜是一 42
种对国王的崇拜，而不是对具体某个神的崇拜。赫尔曼·库尔克（Hermann Kulke）认为这一崇拜包括湿婆、提婆罗阇本身或者诸神之王的神像，人们抬着这些神像在吴哥街道游行（其他王都在节日时也是如此）。可能在吴哥初期，当阇耶跋摩二世将柬埔寨从爪哇控制中解放出来的时候，这种崇拜起过纪念性的作用。也有学者对此有不同观点。①

耶输跋摩和他的继任者

阇耶跋摩二世的儿子阇耶跋摩三世即位时年纪很轻，是一个猎象手，曾“英明地”治国，于公元877年去世。② 提供有关他信息的作

---

① Hermann Kulke, *The Devaraja Cult* (tr. I. W. Mabbett) (Ithaca, N. Y., 1978). 还见 Mabbett and Chandler, *The Khmers*, p. 90, 以及 Hiram Woodward, “Practice and Belief in Ancient Cambodia”, *JSEAS* (32/2) (2004): 249-61。

② G. Coedes, “Les capitales de Jayavarman II”, *BEFEO*, Vol. 28 (1928): 116.

者对延续提婆罗阇崇拜有特殊的兴趣，因为斯多加通碑文关于谁资助提伐罗阇崇拜谁才是柬埔寨唯一的合法统治者的推论，或许不一定正确。特别是在10世纪中期以后，这可能已经被印证。但有意思的是，阇耶跋摩三世的继任者，第一个在诃里诃罗洛耶建设寺庙和镌刻碑文的国王，只是含混地提及这位先王，将自己的正统性追溯到阇耶跋摩二世一个妻子（不是阇耶跋摩三世的母亲）的亲戚和一对我们一无所知的“国王”。继任者大概是想以此方式摆脱阇耶跋摩篡位影响，因而将自己的血缘同吴哥前的统治者联系起来。

事实上，因陀罗跋摩（Indravarman）（公元877—889年在位）自己就是一个篡位者，这或许就是其家族谱系混乱的原因。他的统治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这是20世纪30年代艺术史学家菲利普·斯特恩（Philippe Stern）所描述的众多具有三阶段模式君主行为的第一个王朝。[1]

第一个阶段是兴办水利灌溉工程，以示对臣民和土地中水神的敬重。因陀罗跋摩统治期间，在诃里诃罗洛耶建造了一个大水库以存蓄雨水。这就是著名的因陀罗塔塔卡（Indratataka），面积300公顷（大约650英亩）。一块碑文告诉我们，因陀罗跋摩刚一即位就许下诺言：
43 “五天内我将开始挖土兴建水库。”[2] 修建水库的另一个目的是，通过改变梅鲁山（Mt. Meru）的地貌和其在人们心中的地位（梅鲁山主峰被湖泊所环绕，被认为是诸神神秘的家园），来彰显国王的权力以及国王与神之间的结盟达到什么样的程度。将这个北印度神话移植到布满水域的柬埔寨来，本身就不无讽刺意味，它们不是美国大学城里的哥特式塔楼。

第二阶段是国王树立父母和其他祖先的塑像以示纪念，通常把他

---

① P. Stern, “Diversité et rhythme des fondations royales khmères”, *BEFEO*, Vol. 44, No. 2 (1951): 649 - 85. 又见 Hermann Kulke, “The Early and Imperial Kingdom in Southeast Asian History”, 载 David Marr and Antony Milner (eds.), *Southeast Asia in the 9th to 14th Centuries* (Singapore, 1989), pp. 1 - 22。

② A. Bergaigne, *Les Inscriptions sanscrites du Cambodge* (Paris, 1882), p. 127.

们装扮为神的形象。因陀罗跋摩在用灰泥粉刷的砖建寺庙群，也就是今天著名的波列科寺（Preah Ko，意为“圣牛”），兴建父母的塑像（如同别的国王所建的一样，雕像中还包括他的外祖父母以及阇耶跋摩二世及其妻子，并描绘成湿婆神及其配偶的化身）。

这个建成于公元879年的迷人寺庙，开创了现在称为罗卢奥斯式柬埔寨建筑风格。[①] 后来成为代表该风格的几个重要特征——包括在一系列同心护城河与城墙之内围建寺庙群的传统——在波列科寺第一次出现。寺庙精致的雕刻和出众的花边说明这种技艺先通过雕刻木料获得很大发展。尽管规模比后来的寺庙小，作为因陀罗跋摩纪念性建筑——波列科寺和巴孔寺（因陀罗跋摩的庙山），从理念到外观，都远比先前的任何建筑壮丽，这暗示这一时期的宗教思想和社会动员取得很大发展，但还缺乏其他证据支持。

波列科寺的一块碑文（“在如同跨越险海的战斗中，他用傲慢敌人的头颅铺就了一条小路；他的军队在这条小路上前进。”）指出因陀罗跋摩通过征服那些未指名的竞争对手，成了宇宙之王。这块碑文还告诉我们：“似乎因陀罗（Indra）厌倦了制造出这么多的国王，为了给三界带来欢乐，他造就了这个名叫因陀罗跋摩（字面意思是‘受因陀罗保护’）的国王。”[②]

在远离罗卢奥斯的地方发现的碑文表明，因陀罗跋摩至少短暂控制着泰国东北部和湄公河三角洲。其中一块碑文为纪念他的老师（阇耶跋摩二世的堂兄弟）而刻，延续了早期的文风：

---

① 有关这一风格的讨论见 G. de Coral Remusat，“Influences javanaises dans l'art de Roluos”，*JA*，Vol. 223（1933）：190－92。又见 Michael Vickery，“The Khmer Inscriptions of Roluos（Preah Ko and Lolei）：Documents from a Transitional Period in Cambodian History”，*Seksa Khmer*（new series，1999）：47－92，维克里注意到：“这些碑文表明这个以罗卢奥斯为中心的国家统治着柬埔寨北部广大地区，从现在的西北边界延伸到桔井省，包括磅湛省和磅通省。另一方面，没有迹象显示在前吴哥时期柬埔寨的核心地区，也就是现在柬埔寨的中心和南部地区，建立起任何权威。”（p. 84）

② K. 713，stele from Preah Ko，*IC*，Vol. 1，pp. 18－31. 印度教和佛教都有“三界”的概念，见 G. Coedes and C. Archaimbault，*Les Trois mondes*（Paris，1973）。

44 征服世界的统治者，站立在梅鲁山山坡上，比有时遥远的太阳还要稳固。

站在中国、占婆和耶婆提（Yavadvipa，可能指爪哇）诸王之上，他的统治就像一顶由很多茉莉花环组成的完美无瑕的王冠。[①]

像这样关于国王辞藻华丽的记述，都是按照神的传统特征进行修饰的，把国王塑造得跟神相似。诗人的写作技巧包括直接罗列这些特征和通过运用隐喻、明喻和双关等手法间接揭示某些特征。就像通过诗的方式描绘国王如何与神相似一样，寺院就是神界的目录和画卷，呈现神的影像。在这个意义上，寺院具有双关的含义，并且映射出另一个世界。

菲利普·斯特恩所发现的因陀罗跋摩计划的最后一个阶段，是建立一座庙山。这就是现在所知的巴孔寺。该寺呈梯形金字塔状。与水库或波列科寺不同，巴孔寺专供国王本人使用，并且在他死后当作石棺。戈岱斯估计从阇耶跋摩二世开始有13位吴哥国王，都建立过这样的庙山。[②] 这些庙山并没有全部留存下来，那些得以保存下来的庙山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研究。首先，这些庙山被设计成神山梅鲁的复制品，而梅鲁山坐落在位于天地中心的喜马拉雅山北边。像梅鲁山一样，庙山诸神之家，也是死后升天的杰出人物（不只是国王）之家。庙山也是陵墓，存放着国王的骨灰。有些庙山，特别是吴哥寺，还是天象观测台。[③]

巴孔寺是柬埔寨第一座主要以石头而不是以砖块建筑的寺庙；可

---

① K. 809, from Prasat Kandol Dom, *IC*, Vol. 1, p. 43.

② 引自 S. Sahai, *Institutrons politiqttes – et organisation administrative du Cambodge* (Paris, 1970), p. 42n。公元8世纪早期吴哥地区的阿约寺可能是早期的庙山。见 Bruno Brugier, *Le prasat Ak Yom: Etat des connaissances* (Paris, 1994); Vickery, *Society, Economics, and Politics*, p. 391; 以及 Helen Jessup, *Art and Architecture of Cambodia* (London, 2004), pp. 60 – 61。

③ 见 Eleanor Mannika, *Angkor Wat: Time, Space and Kingship* (Honolulu, 1996); 以及 R. Stencel and Eleanor Moron, "Astronomy and Cosmology at Angkor Wat", *Science*, Vol. 193 (July 23, 1978): 281 – 87。

能除了建于公元8世纪的阿约寺（Ak Yom）外，巴孔寺也是第一座金字塔形式的建筑。20世纪30年代，法国考古学家重建了这座寺庙，但在此之前，巴孔寺几乎所有的浮雕已经不复存在。

因陀罗跋摩的儿子耶输跋摩（Yasovarman，889—约910年在位） 45
是一个重要国王。有关他的碑文和建筑表明他想比他父亲做更多的事情，重点关注皇城周围的柬埔寨。以他的名字将吴哥“城”命名为耶输陀罗补罗（Yasodharapura），一直延续到14世纪初吴哥城被遗弃。

耶输跋摩第一个正式行动似乎是资助兴建“一百”个偏僻的寺院，每个寺院要备有为王室休养的地方，并制定一套规章制度。[①] 现在发现了12块大约相同的碑文与这些寺院有关，其中2块位于罗卢奥斯附近，6块来自柬埔寨东南部。耶输跋摩通过他的母亲，声称从前吴哥时期起，自己家族就同柬埔寨东南部有关系。碑铭的分布说明，柬埔寨（Kambuja - desa）不仅作为一种理想，还作为一个概念正在获得承认。

此后不久，耶输跋摩建造4座砖庙来纪念他的父母，他在父王所修水库的中央建起一个小岛，寺庙就建在岛上，现在称为洛利神庙（Lolei temples）。在水库的东北角——在柬埔寨的宗教思维里这是一个表示敬意的方向[②]——他建起一条通向西北16公里（10英里）长的大道，计划在那里建立都城。这个区域现在坐落着吴哥建筑群。

耶输跋摩之所以选择吴哥，可能是受他计划在那里的一座山峰上建造自己庙山的影响。他的选择曾包括克龙山（Phnom Krom），但离洞里萨湖太近；还包括波克山（Phnom Bok），但又离得太远。[③] 不过，他还是在这两座山上建造了小寺庙。他把主寺庙建在今天的巴肯山

---

① 见G. Coedes，“A la recherche du Yasodharasrama”，*BEFEO*，Vol. 32（1932）：84 - 112，以及Bergaigne，*Inscriptions sanscrites*，pp. 166 - 211。

② 关于东北的重要性见P. Paris，“L'importance rituelle du nord - est et ses applications en Indochine”，*BEFEO*，Vol. 41（1941）：301 - 33。

③ 见B. P. Groslier，*Inscriptrons du Bayon*（Paris，1973），p. 156，以及David Chandler，“Maps for the Ancestors：Sacralized Topography and Echoes of Angkor in Two Cambodian Texts”，载*Facing the Cambodran Past*，pp. 25 - 42，特别注意28。

(Phnom Bakheng) 上，而当时此山称为干丹山 (*phnom kandal*，"中央山"的意思)，现在仍然矗立在靠近吴哥寺庙群中心的位置。

斯多加通碑文告诉我们，耶输跋摩"建造了王城室利·耶输陀罗补罗 (Sri Yasodharapura)，并将提婆罗阇从诃里诃罗洛耶带到这个城市。后来他建起一座中央山 (干丹山)"。[1]直到20世纪30年代，耶输跋摩山才被确认就是巴肯山。不论是从概念上还是操作上讲，耶输跋摩所建的山庙比他父王的任何纪念建筑都要宏伟得多。琼·菲约扎
46 (Jean Filliozat) 曾详细研究其象征意义，他指出，当分开和合起来数平台、雕像、塔和阶梯的数目，都会对应着各自不同的数字——特别是33和108——这些在印度教中是寓有超自然的意义。有时候，靠近它的朝拜者，通过数所见到的塔的数目，就能够领会到神的暗示。[2]

耶输跋摩在巴肯山东边建造一个约长6.5公里 (4英里)、宽3公里 (2英里) 的耶输陀罗塔塔卡水库。沿着南岸建立起分别供奉湿婆神、毗湿奴神和佛的寺庙。在王国的其他地方，他命令寺庙建在天然的山上，其中最有名的是柏威夏寺 (Preah Vihear)，位于一悬崖边缘，该悬崖现在成为柬泰边界的一部分。[3]

这些活动说明耶输跋摩比以前国王能够调到更大规模的人力。耶输跋摩的碑文表示他已经成为全世界的君主，他意识到印度文明的伟大和容忍不同的宗教信仰。不过，像通常那样，现有资料很少揭示他的政治活动、他的联盟以及他自己的思想体系。我们粗略地看到耶输跋摩的行政改革，包括耶输跋摩法典规定结合个人支付能力罚款，以及在全国有效征税 (实物形式) 的情况。我们必须承认他在很多方面

---

① 见 V. Goloubew, "Le Phnom Bakheng et la ville de Yasovarman", *BEFEO*, Vol. 33 (1933): 319-44，以及 V. Goloubew, "Nouvelles recherches autour de Phnom Bakheng", *BEFEO*, Vol. 34 (1934): 576-600。又见 Christophe Pottier, "A la recherche de Gouloupura", *BEFEO* 87 (2000): 79-107，该文认为耶输陀罗补罗与阇耶跋摩七世建立的同样名字的城市不同，前者是开放式的，没有城门和城墙，后面会讨论到。

② J. Filliozat, "Le Symbolisme du monument du Phnom Bakheng", *BEFEO*, Vol. 44, No. 2 (19 54): 527-54.

③ 见 John Black, *The Lofty Sanctuary of Khao Prah Vihar* (Bangkok, 1976)。

是伟大的，“他是一头雄狮，用自己的铁爪撕裂敌人，他的牙齿是武器，他的眼睛是吠陀（Veda）。他的成就响彻四面八方，他的美德构成自己名字。”[①]像梵文诗那样，这里的很多用词具有双重意义。例如“他的眼睛是吠陀”，既有动词“看”的意思，又有名词“圣训”的意思。如我们所见，这些双关意义不仅出现在吴哥的诗歌里，也出现在寺庙建筑中。

耶输跋摩死于公元910年左右。他的两个儿子依次继承王位。对他们所知很少，到公元921年的时候，耶输跋摩一个妻子的兄弟在戈格（Koh Ker）建立起一个敌对的城市，位于吴哥以北100公里（62英里）处的一块荒凉地方。这个对手立即开始像国王一样行事，例如建造水库和庙山。公元928年，当在位国王死在耶输陀罗补罗的时候， 47
这个竞争对手宣布自己是国王，称阇耶跋摩四世。他继续修建庙山，直到约930年才完工，即现在的普拉萨通寺（Prasat Thom）。这个寺庙实际上是吴哥寺以外柬埔寨最高的寺庙。[②]庙中供奉一巨型林加，估计高18米（59英尺）、直径约5米（16英尺）（可能以金属铸成，或者包以金属，现在已经不复存在）。阇耶跋摩四世的碑文扬言，该建筑高过以前历代国王的建筑。

我们不清楚阇耶跋摩四世这样大规模自我颂扬有何资本，都是什么人追随于他以及是什么促使他把首都从耶输陀罗补罗迁走。虽然在我们看来阇耶跋摩四世的吹嘘似乎是空洞和虚夸的，但很明显，通过武力和说教，他仍在戈格统治众多人口有20年之久。戈格城有超过40座寺庙，都是在这短短时期内建成的。他的影响力一直延伸到今天的泰国东北部，那里至今仍保存着几座戈格式的寺庙。公元942年阇耶跋摩四世去世之后，他的一个儿子短暂地继承了王位，公元944年，

---

① Bergaigne, *Inscriptions sanscrites*, p. 322，类似内容还有 pp. 227, 376。

② 见 G. Coedes, “Le Véritable fondateur du culte de la royauté divine au Cambodge”，载 H. B. Sarkar (ed.), *R. C. Majumdar Felicitation Volume* (Calcutta, 1970), pp. 56–66。又见 Sahai, *Institutions*, p. 46n。有关戈格的进一步讨论，见 Jacques and Lafond, *Khmer Empire*, pp. 107–33。

他的一个外甥回到耶输陀罗补罗登基为王，称罗贞陀罗跋摩二世（Rajendravarman Ⅱ）。后来的碑文记载，该国王“重建荒芜已久的圣城耶输陀罗补罗，重拾它的壮丽和魅力，那里房屋用黄金装饰，宫殿用宝石镶嵌，如同因陀罗在地上的宫殿”。[①]

我们对罗贞陀罗跋摩在位期间的情况所知很少，但通过他对耶输跋摩的模仿，如在湖心建造纪念祖先的寺庙，可以看出他希望恢复吴哥王权，而不是开创自己的朝代或将自己同戈格的阇耶跋摩四世的短暂王朝联系在一起。在罗贞陀罗跋摩的指挥下，建了梅邦（Mebon）和普雷鲁布（Pre Rup）两座精美的庙山，也建了其他很多寺庙，特别是在北方。除了一次成功的反对占婆的军事行动外，他统治期间基本是和平的，这开启了几乎持续一个世纪的吴哥繁荣时期。繁荣的一个方面表现在罗贞陀罗跋摩梵文碑铭的文学修养提高。有一块是普雷鲁
48 布石碑，几乎有三百节长，颂扬了罗贞陀罗跋摩的家世，他的学识和作为国王的功绩。[②] 他统治时期繁荣的另一方面表现在高棉王国的商业向西扩张到今天的泰国东北部；第三方面是他对佛教的公开包容。罗贞陀罗跋摩似乎自己也研究佛教，他统治期间，负责公共工程的大臣一直是一位显赫的佛教徒。

罗贞陀罗跋摩死于公元968年，由儿子阇耶跋摩五世继位，阇耶跋摩五世当时还是小孩，几年来似乎一直受到亲属和高官的严密监护。现在我们看到的他在位时期的碑文，都对这些监护者及其家庭成员大加颂扬。吴哥时期最可爱的寺庙之一，即现在的班迭斯雷寺（Banteay Srei，即女王宫），就是在阇耶跋摩五世即位初期由一名官员建立的，该名官员后来成为阇耶跋摩五世的老师。[③] 有证据表明，这座凿在粉

---

① G. Coedes, “Les Inscriptions de Bat Churu”, *JA*, Vol. 10, No. 8 (1908): 213 – 54. 又见 Michael Freeman, *A Guide to Khmer Temples in Tailand and Laos* (Bangkok, 1996), pp. 58 – 60。

② K. 806, Pre Rup stele, *IC*, Vol. 1, pp. 73 – 142. 关于两座罗贞陀罗跋摩寺庙的研究见 Alexandra Haendel, “The Divine in the Human World: Sculpture at Two Tenth – Century Temples at Angkor”, *Artibus Asiae*, Vol. LXV, No. 2 (2005): 213 – 52。

③ 见 L. Finot and V. Goloubew, *Le Temple d'Içvarapura* (Paris, 1926)。

红色砂岩上的小寺院，曾是一个重要的城区，位于吴哥寺北面大约16公里（10英里）处。1916年一支法国考察队发现了这座寺庙，当时这里被森林覆盖。

虽然阇耶跋摩五世像他父亲和宫廷中很多婆罗门一样信奉湿婆教，但他对佛教持宽容态度，佛教学说在他统治期间兴盛起来。位于磅湛省的锡多寺（Wat Sithor）有一块文辞优雅的碑铭就刻于这个时期，碑文展示了在柬埔寨内部佛教思想如何同湿婆教融合起来。这引起19世纪学者埃米尔·塞纳特（Emile Senart）的注意，他写道："到处都能感觉到尽可能少地扰乱百姓习惯的想法，在表面类似的情况下却藏着很深的区别。"[①]碑文贬低了阇耶跋摩五世作为庙山建立者的作用。他自己的塔基奥寺（Takeo temple）似乎没有建成。

阇耶跋摩五世死于公元1001年，柬埔寨进入一个动乱和破坏的时期，不过到1003年的时候，另一个出身不明的国王统治了吴哥，但王国的其余地方还没在他控制之下。在一些碑文中提到在北方有一个自称苏耶跋摩（Suryavarman）的王子，他即是后来的苏耶跋摩一世国王。[②]

一些学者认为，这些国王按血统没有一个是柬埔寨人。然而，如迈克尔·维克里最近所指出的，苏耶跋摩几乎肯定是一名柬埔寨贵族 49
家庭的一员，他的家族与王国东北部有联系。[③]有趣的是，在1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里苏耶跋摩攫取王位的手段与两个世纪前阇耶跋摩二世非常相似。这一过程包含零星的战争和通过武力、婚姻和欺骗结成的联盟，联盟能够帮助觊觎王位的人削弱或收买地方首领的权力。维克里认为，苏耶跋摩有很多强有力的宗教家族作同盟，这些家族主宰着吴哥的政府，这一时期的碑文显示，苏耶跋摩在数年时间里，缓慢向

① K. 111, stele from Wat Sithor, *IC*, Vol. 6, p. 196，戈岱斯在此引用的Senart的评论。

② G. Coedes, "L'Inscription de Toul Komnap Ta Kin（K. 125）", *BEFEO*, Vol. XXVIII（1928）：140－44.

③ Michael Vickery, "The Reign of Suryavarman I and Royal Factionalism at Angkor", *JSEAS*, Vol. 16, No. 2（1985）：226－44.

西移动，移向人口稀少的首都，期间还暴露出他结盟关系的复杂性。

一块碑文告诉我们，苏耶跋摩“冲破诸王的包围”，赢得最后战役的胜利。帮助提升他权力的一个新因素是他对佛教的保护和支持，虽然他自己显然不是一个佛教信徒。这在对其含有敌意的碑铭中可以找到证据，当他掌握大权后曾破坏宗教神像（*vrah*），[①] 但是我们对这一指控的含义并不清楚。如果苏耶跋摩是一个佛教徒，这种破坏或许单纯就是破坏圣像。更可能的原因是这一事件同某些宗教团体有关，他们不愿意同苏耶跋摩合作或者态度犹豫不决。其实，还有一块碑文暗示苏耶跋摩在位期间，故意削弱拥有大量财富的贵族精英的财力，他们是显而易见的政治威胁。

在抵达耶输陀罗补罗城后，苏耶跋摩最先采取的一个行动就是安排4000名官员（称为塔姆弗拉克，*tamvrac*）在新建的王宫里公开向他宣誓以示效忠。在一块很长的碑文中记载了这次宣誓，这是仅有的一块记载此类内容的碑文。碑文写到官员要忠于国王，并且说：

> 如果在场每个人不遵守对陛下（陛下会在位很长时间）的誓言，我们恳求国王施以各种惩罚。如果我们为了不实行誓言而躲藏起来……我们可能坠入三十二层地狱，与日月同存。[②]

50 誓言最后要求奖励那些遵守宣誓的人，让他们管理宗教团体并赐予维持家族生计的食物，作为“他们献身于主人的报偿”。也就是说，对国王的忠诚可以获得从塔姆弗拉克控制的地区抽取剩余产品的权利，这样塔姆弗拉克通过对国王尽忠而建立起联系。誓言标志着王权的加强和贵族阶层可以对所控制土地征税。

一段时期官僚机构同王权相对抗甚至超过王权，苏耶跋摩就从几

① M. De Coral Remusat, “La Date de Takev”, *BEFEO*, Vol. 34 (1934): 425.

② G. Coedes, “Le serment des fonctionnaires de Suryavarman I”, *BEFEO*, Vol. 13, No. 6 (1913): 11－17. 在19和20世纪，柬埔寨官员也有类似的宣誓，见 Chandler, “Maps for the Ancestors”, passim。

个方面加强王权，这是他在位期间的特色。苏耶跋摩扩大了吴哥控制的疆域，以新宗教为基础，向洞里萨湖西部地区殖民。更进一步，他在同一方向吞并其中心位于今日泰国中部华富里（Lopburi）的上座部佛教王国罗斛（Louvo）。他还扩建吴哥的水利工程，这表明他的其他政策导致了城市人口的增加。

在苏耶跋摩统治下，实践中僧侣和官僚职能不分已经制度化。官方兴办的宗教团体通过某些途径成为政府收入和赏赐的源泉，虽然我们对这些途径尚不清楚，但很可能与国王身边的僧侣官僚家族有关。

苏耶跋摩的行政举措就是城市化。法国学者亨利·梅斯特里尔·杜·布尔格（Henri Mestrier du Bourg）指出，碑文中出现之前三朝的大约 20 个地名以“补罗（*pura*）”（即“城”的意思，参看新加坡/Singapore，即“狮城”），在苏耶跋摩统治时期这类地名增加到 47 个，进一步证明了他权力的增长，能够把群众从管理较薄弱的农村地区聚集到一起。可能某些“补罗”仅仅是个名字而已，为的是提高当地统治阶层的威望，但是关于城市化的证据同我们所掌握的苏耶跋摩统治时期的其他情况恰好一致。[①]

还有证据说明苏耶跋摩在位期间从事国内和海外贸易的商人更加
活跃。在柬埔寨的整个历史上，从民族属性上看，大多数这样的商人 51
都是外面人——占人、中国人和越南人，不过商人作为一个团体，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碑文中，要追溯到苏耶跋摩时期。通常来说，对外贸易是用产自林区的野生产品交换文明发达地区的棉布、瓷器等，但正如肯尼思·霍尔（Kenneth Hall）所指出的，诸如土地、稻米、水牛和奴隶这样的商品在这一时期也被柬埔寨人拿来交换从外国制成品或土特产。有意思的是，这种经济活动是在没有任何统一的价值单位或

① H. de Mestrier du Bourg, “La première moitié du XIe siècle au Cambodge”, *JA*, Vol. 258 (1970): 281 – 314.

官方货币的情况下进行的，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柬埔寨中期。①

苏耶跋摩在位时期动员行政和强力机构官员把人口集中到耶输陀罗补罗，其动员程度是前所未有的，这些策略的成功向后来的国王表明通过强迫耕种者全年劳作能够组织和扩大王国。一年一次的粮食收成不能满足国家机构（僧侣、王族、官僚和军队）的食物需要，这在以前足以满足普通老百姓的生存需要。

在扩展权力方面，苏耶跋摩享有篡位者的优势。他可以随意选用和封赏他信任的追随者，而不会在即位之初就陷入前朝遗老遗少的包围。首先，利用新官吏治理国家可能意味着更加关注地方事务，因为新官吏对其乡村的支持者仍然负有责任，而他们的继任者可能忽视这一方面。

苏耶跋摩的继任者优陀耶迭多跋摩二世（Utyadityavarman Ⅱ，1050—1066 年在位）是湿婆神的信奉者。受在势力强大的印度僧侣的指导下，他重新燃起崇拜提伐罗阇的兴趣并恢复了建设大规模庙山的风俗。他兴建的庙山巴普翁（Bapuon）供奉着林加，同他的统治休戚相关。正如一块刻于他继任者统治时期的碑文告诉我们：

> 他看到在众神之乡南瞻部洲（Jambudvipa）的中部耸立着一座金山之后，就在自己的城市中心建了一座更胜一筹的金山。在山顶闪耀着神光的金庙里，他竖起一块金铸的湿婆林加。②

① Kenneth Hall, "Eleventh – Century Commercial Development in Angkor and Champa", *JSEAS*, Vol. 10, No. 2 (September 1979): 420 – 34, and Hall, "Khmer Commercial Development and Foreign Contacts Under Suryavarman I", *Journal of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 (*JESHO*), Vol. 18, No. 3 (1975): 318 – 33. 又见 Claude Jacques, "Sources on Economic Activities in Khmer and Cham Lands", 载 Marr and Milner, *Soutbeast Asia in the 9th to 14th Centruries*, pp. 327 – 34。Eileen Lustig 在悉尼大学将要发表的论文关于吴哥的价值衡量单位（有意思的是吴哥从未用过钱），会很大提高我们对吴哥经济的了解。

② A. Barth, *Inscriptions sanscrites du Cambodge* (Paris, 1885), p. 139.



公元9世纪波列科寺的守护神（图片提供：沃尔特·维特）

吴哥王权

有3个路径考察吴哥王朝极盛时期的柬埔寨王权。一是研究国王同 53
湿婆神的关系。保罗·穆斯在1933年所写的一篇非常有见解的论文中认为，在古代东南亚，湿婆神非常受欢迎，这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湿婆被当作土地和祖先的灵魂。这种灵魂先是以石头形式“偶然”在土地中出现（也就是来自祖先）；后来，人们把石头有意刻成林加的形式，

代表祖先；再后来，又作为某个特定地方的统治者和祖先。[1] 在这个意义上，湿婆是祖先灵魂的一种文学形式，负责所辖区域的降雨，保持土壤生产力。柬埔寨王权在这方面的含义（在东南亚其余地方特别是越南也能见到）在农村地区一直持续到20世纪60年代。湿婆和他的配偶乌马（Uma）被认为是存在于地下的神明，因此要用水牛和人来供奉。有趣的是，我们用这条路径考察柬埔寨王权的时候，发现柬埔寨国王在保护农业方面，更类似于中国的皇帝而不是传统印度的罗加（*raja*）。

现在柬埔寨国王的作用不仅仅是带来降雨或者让每个人的祖先安享晚年。用我们的眼睛考察柬埔寨王权的第二个路径，是借助国王在战争、性行为、诗歌、财产、仪式等方面不断表现出来的高贵和优越。据此看来，国王既不是土地之神也不是僧侣，而是印度史诗里的英雄。大部分柬埔寨梵文碑铭都持这种看法，赞美国王是美德的化身和高居芸芸众生之上的角色，柬埔寨国王同上天、太阳、因陀罗、毗湿奴和罗摩（Rama）同列，而不是与土地和祖先为伍。作为在世的伟大人物（每个国王都被看作"最伟大"的人物，而非其中之一），诗人常把国王比作诸如北极星之类，主宰着人间的变迁起伏，首先及于国王身边的种姓，而后及于自由人、村民
54 和奴隶。在现实意义中，国王就是不需要帮助的超人。国王是一个英雄，凭借自己的功绩和权力而占据社会最高的位置。

对于吴哥的精英阶层来说，强化这种威严至少有两个目的。第一是再现神一样的行为（例如模仿梅鲁山建造庙山，或者打败游牧敌人）可以获得神对国王和王国的保佑。第二，正确举行宗教仪式，特别是选择的时机，会影响到效果。在这一背景下，"象征"一词就显得非常空洞。国王相信宗教仪式，他的顾问也一样。典礼是表现国王威严（他也相信自己有这种威严）的手段。

第三种观察王权的路径是依据柬埔寨人的日常生活。这方面梵文碑铭远没有柬埔寨文碑铭有用。乍一看，吴哥社会似乎已经被机械地划分为很多阶层，但是碑铭仍然展现出社会中存在的关系、责任和期

---

① Paul Mus, *India Seen from the East*, passim.

望的网络，碑文中提到的每个人都被卷入网络之中。从这一路径看，国王作为一夫多妻者、保护者和赐予名字的人，或许同他们所有人都密切纠缠在一起。易安·马伯特（Ian Mabbett）对吴哥王权有富于见解的研究，揭示了一个国王预期会做的、批准的和了解的事务范畴。[①]这包括授予高级官员以称号和勋章，赐予各个宗教组织以土地和奴隶，建设和维护灌溉工程，建设、装饰寺庙并提供工作人员，处理对外关系，在这个时代特别是要处理同都城东边的占婆以及北边、西边诸纳贡国的关系。国王也是最后上诉的地方，碑文告诉我们，包括土地归属这样难解的争执如何经常通过司法系统上达到国王那里——王权的这一特色一直持续到 20 世纪 60 年代。[②]

与此同时，一个国王必须是一名权术运作高手才能生存，虽然关于这一点碑铭告诉我们的很少。正如马伯特所指出的，很多梵文碑铭赞扬历代国王的政治智慧，说他们类似罗摩或精通印度政治文献。这些富有学问的政治文稿自然会向柬埔寨国王提供了丰富权术谋略，但 55
恰恰在这一方面——日常的升迁、争吵和决策——碑文提供的帮助很小。我们很难得知宫廷生活的真实情况。

柬埔寨文碑铭非常有助于我们了解柬埔寨社会的其他阶层——自由人和奴隶——的状况，但只是当碑文描述、回忆或纪念他们时，才会起到这种作用。马伯特对吴哥奴隶的研究，是建立在较早的伊·博格特（Y. Bongert）和阿·查克拉瓦蒂（A. Chakravarti）研究的基础上，表明将我们所说的奴隶进行分类以及确定其数目是非常困难的。[③]如同第 2 章所指出的那样，不论从过去的语言或者碑文都不可能找到

① I. W. Mabbett, "Kingship at Angkor", *JSS*, Vol. 66, No. 2 (July 1978): 1 – 58. 又见 Mabbett and Chandler, *The Khmers*, pp. 34 – 106。

② 见 M. C. Ricklefs, "Land and the Law in the Epigraphy of Tenth Century Cambodia", *JAS* 26/3 (1967): 411 – 20。

③ I. W. Mabbett, "Some Remarks on the Present State of Knowledge About Slavery at Angkor", 载 Anthony Reid (ed.), *Slavery, Bondage, and Dependency in Southeast Asia* (St. Lucia, Australia, 1983); Y. Bongert, "Note sur l'esclavage en droit khmer ancien", 载 *Etudes d'histoire du droit privé offertes à Paul Pettrot* (Paris, 19 59), pp. 27 – 44。关于前吴哥时期情况的讨论见 Vickery, *Society, Economics and Politics*, pp. 239 ff。

有关资料。例如有这样的情况，奴隶拥有奴隶，奴隶同王室成员通婚，而自由民却像奴隶那样受别人摆布。研究到后期，可能会产生这样的印象，即吴哥的大多数居民都是主体（*reas*）而不是客体，即自由人。他们受保护人支配，保护人有权把他们卖给别人。在很多情况下，他们也支配“更低层”的人。在碑文中奴隶被作为商品登记。

这些被认为是吴哥城的建设者的人，体型高大。巴戎寺的浮雕向我们展示了他们的工具、衣服和房子，吴哥时期同法国保护时期没有多大变化。浮雕还描绘了他们的家畜、游戏、市场，以及小丑、巫医、苦行僧和小贩。然而，当我们设法确定他们的信仰和流传于他们之中的故事时，我们缺少资料。没有广为流传的文学著作可以追溯到吴哥时期。缺乏文字记载让我们很难了解吴哥普通人的生活，除了他们创造的东西——水库、寺庙、石像或铜像、工具、陶器等等。吴哥奴隶如何看待他们的主人？是模仿、仇恨、回避还是尊敬？印度的思想、神灵和词汇渗透到社会和人们言行中有多深？懂得高棉文的人要比懂得梵文的人多，但不知道他们通过哪种语言教识字。这个时期出现的画像是上层社
56 会熟悉印度文化（可能也是对偶然到来的印度旅客的了解）的表现之一。印度文化在社会的其他阶层乃至农村，仍然隐约存在，因为我们找到19世纪带有印度名字祖先神灵和享有祖先神灵待遇的印度雕像。

如我们所见，柬埔寨模仿印度差一点就引进印度的种姓制度。不过，正如马伯特在另一具有洞察力的文章中所指出的，在礼仪安排中使用种姓术语成为国王的一部分保留节目，因为有时国王会把种姓授予他的随从或与其关系密切的人的随从。[①] 除了王朝初期以外，柬埔寨国王跟很多中国皇帝一样，通过扩大保护网和宫廷外的相互约定进行统治，首先是通过关系密切的人和家庭成员，后来变得松散起来，在王国的边缘地区越来越依靠地方掌权者。远离吴哥的村民可能并不比20世纪早期的村民更熟识国王的名字，一位在南越柬埔寨人中进行

---

① I. W. Mabbett, “Varnas in Angkor and the Indian Caste System”, *JAS*, Vol. 36, No, 3 (May 1977): 429 – 42.

研究的法国人种学者曾在 20 世纪早期写下这样一段话：

以前那里没有运河，没有道路；那里仅有森林，森林里有老虎、象和野牛；没有人敢离开村庄。

因为这个原因，几乎没有人去过王都。如果有人撑小船到过那里，别人将问他："国王什么样？跟普通人一样吗？"对于这些一无所知的人问的问题，旅行者会这样回答："国王有尊贵、美丽的容貌，不沾灰尘和汗渍，没有伤疤……"但通常是他也没有见过国王。①

吴哥寺

11 世纪最后的年代里柬埔寨陷入分裂混乱。在不同的时期，总有两
个甚至 3 个君主争夺最高统治者的位子。然而，到 11 世纪末期，一个新
的王朝开始统治吴哥，持续了一百多年。我们对该王朝的最初两个国 57
王——阇耶跋摩六世和他的兄弟陀罗尼因陀罗跋摩一世（Dharanindra-
varman I）的情况了解甚少，但可以肯定他们的侄子苏耶跋摩二世也像
耶输跋摩二世和苏耶跋摩一世一样统一了柬埔寨，吴哥寺即是他在位期
间兴建的。如果记载他的碑铭可信，他年轻时候战胜了另一位竞争王位
的王子，取得大权："他领导军队像海水般冲向战场……直奔敌方国王
的坐象，杀死他，就像神鹰捕杀山坡上的蛇一样。"②

自从 11 世纪 60 年代优陀耶迭多跋摩二世（Utyadityavarman Ⅱ）死后，苏耶跋摩二世成为第一个统一柬埔寨的国王。他同苏耶跋摩一世有很多富有启发性的相似之处，不过二人可能没有亲属关系。二人

① Institut Bouddhique, Phnom Penh, Commission des Moeurs et Coutumes Cambodgiennes (CMCC), Archive number 94.004. 20 世纪 70 年代这一档案遗失，虽然 1950 年前搜集的部分以微缩胶卷的形式保存下来，但对学术界来说还是一次沉重打击。

② L. Finot, "L'Inscription de Ban Theat (K. 364)", *BEFEO*, Vol. 12 (1912): 1 – 27, stanzas 33 – 34.

都是在分裂混乱时期登上王位的。他们一控制耶输陀罗补罗城，就推行富有活力的治理举措，讲求务实的王权模式，并扩大他们治下的领土和人口。苏耶跋摩二世征讨东边的越南（可能得到中国支持）和占婆，对付越南使用的主要是从西边藩属招募的雇佣军和占人远征军。他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这是第一个这样做的吴哥国王。现在泰国东北一些著名的寺庙就是在他统治期间建成的，包括披迈寺（Pimai）和帕侬蓝寺（Phnom Rung）。像苏耶跋摩一世一样，苏耶跋摩二世也试着在宗教信仰方面同自己的前任区别开来。虽然苏耶跋摩一世崇奉佛教，但他选用的名字则表现了对毗湿奴的崇拜——这对一个柬埔寨国王来说是不寻常的。二人都采取一些创新举措或私人政策使自己的行为合法化，这些措施包括将国王同诸如沃特山这样的前吴哥朝拜圣地联系起来，同那些与先前国王有关系的印度教教师（*gurus*）联系起来、同已被推翻的前朝艺术风格联系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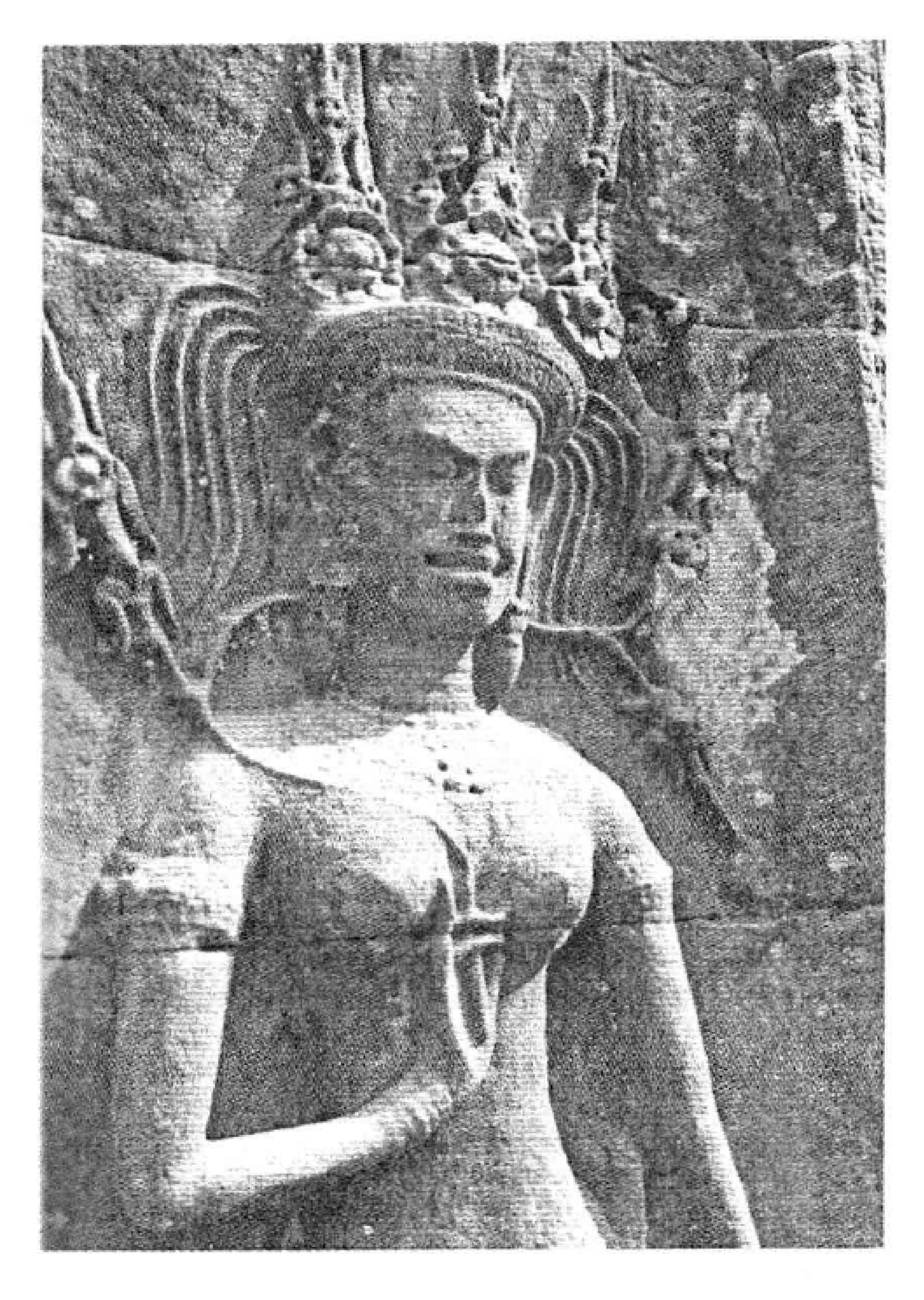
苏耶跋摩二世对毗湿奴的崇拜，促使他建起吴哥寺。吴哥寺包括寺院、陵墓和天文台，是所有吴哥遗迹中最大、可能也是最美丽和最神秘的建筑之一。① 吴哥寺占地 200 公顷（差不多 500 英亩）。他即位
58 之初就开始兴建，一直到大约公元 1150 年他死后才完成，差不多是在之前的庙山巴普农建成后一个世纪。新近发现的重要证据表明，消失已久的中心塑像毗湿奴神像，是在 1131 年 7 月供奉于此的，那时很可能是苏耶跋摩 33 岁生日，这个数字在印度教中具有重要的普世意义。

是什么让这个寺庙如此神秘？首先，它朝向西方，是耶输陀罗补罗城中唯一一座西向的主要建筑。另外，它的浅浮雕从西北区沿逆时针方向延伸，超过一英里的塑像围绕着寺院的边廊。观看浮雕或环寺绕行的习惯方式是按顺时针方向，让浮雕处于人右手边，梵文术语称为“*pradaksina*”。从天象学考虑，反方向通常与死亡有关，面向西方也有这样的寓意。（现代高棉语中“西方”也有“下沉”之意。）因此，一些法国学者认为，吴哥寺不同于吴哥的其他寺庙，它主要是一

① 见 Mannika, *Angkor Wat*, passim。

座陵墓。[①]

直到1940年学术刊物中还对此激烈争论，当时戈岱斯提出，吴哥寺同其他15个著名的柬埔寨遗迹一样，既是寺庙又是陵墓。他以寺中的石头容器为证，这些石头容器可能就是石棺，在其他寺庙中盛着部分财宝。至于吴哥寺不寻常的方向，戈岱斯认为可能是为了纪念苏耶跋摩的保护神毗湿奴，后者经常与西方有关。吴哥寺是我们所知的在吴哥境内唯一祭奉毗湿奴的寺庙。其实，在12世纪的印度次大陆，曾经出现结合流行宗教的毗湿奴教（Vaisnavism）的强劲复兴。这次复兴，似乎同较早时期的印度宗教一样，在吴哥也产生了影响。



建于公元11世纪托玛侬寺庙中的一座天神（*thevoda*）像（图片提供：作者）

从1940年到20世纪70年代，关于吴哥寺的研究很少。学者和旅行家只是满足于浮雕的艺术奇迹（很多浮雕与罗摩的勇武有关），浮雕是寺庙中引人入胜的精华所在，承载着普通柬埔寨人民的想象力。20世纪70年代中期埃莉诺·莫伦（Eleanor Moron）开始仔细研究寺

① 有关这次争论的总结，见 G. Coedes, *Angkor* (Oxford, 1963), pp. 34 – 38。

59 庙的规模，她相信这里面可能包含着寺庙设计专家构思的奥秘。[1]经过测定，吴哥的度量单位哈特（hat）大约等于0.4米（1.3英尺）。莫伦进一步探究寺庙重要地方有多少哈特，例如从西门（唯一砌有道路的门）到中央塔之间的距离为1728哈特，测得该轴线其他三部分的距离分别为1296、867和439哈特。莫伦认为这些数字同印度人思想中的4个时代，即“由迦”（*yuga*）有关。其中第一个时代，吉利多由迦（Krita Yuga），被认为是黄金时期，持续了172.8万年。其余3个时代分别持续129.6万年、86.4万年和43.2万年。最早时代持续时间是最晚时代的4倍，第二早时代是最晚时代的3倍，第三早时代是最晚时代的2倍。最晚的时代就是我们今天正生活着的迦利由迦（Kali Yuga）。人们相信，这个时代终结的时候，宇宙将要毁灭，由婆罗门按照相同的路线重建，开启另一个黄金时代。

这4个时代的长度与沿吴哥寺东西轴线的特定距离密切相关的事实，说明寺庙隐含着一种根据时间和空间能够译读的双关语密码。一个人进入寺庙走向位于中央塔的毗湿奴雕像的距离象征所经历的时代。径直往前走，远离代表死亡的西方，观访者就随时间倒流，接近印度人认为时间开始的时候。

莫伦在她的研究中还发现了吴哥寺10条最经常重复的路程与天文方面的联系。和她共事的天文学家们发现寺庙坐落的位置与这样的事实有关，即在太阳升起时西门与东北方的波克山连成一线。此外，夏至日“观测者……站在西门正前面，能够看见太阳直接从吴哥寺中央塔上空升起”。[2]根据印度天文学家观点，6月21日这一天标志着太阳年的开始，这一天对苏耶跋摩国王来说是神圣的日子，他的名字含意为“受太阳保护”，他还是毗湿奴的信奉者。

61 空间关系同宇宙时观的密切吻合以及吴哥所有度量的极端精确和对称，共同证实了这样的观点，即寺庙事实上是一部蕴含密码的宗教

---

① Eleanor Moron (later, Mannika), “Configuration of Time and Space at Angkor Wat”, *Studies in Indo-Asian Art and Culture*, Vol. 5 (1977): 217-67.

② 见Mannika, *Angkor Wat*, pp. 42-44。

书，专家沿着人行道从一个方位走向另一个方位就能译读其中的含义。那些决定吴哥寺大小的有学识的人早已意识到其中的丰富含义，并且沉醉于此。而对于社会的低层人民来说，也许没有多少意义。但是我们可以想象，高于地面60米（200英尺）的，矗立于由波光粼粼的护城河环绕的庙宇和建造者所住的茅屋之上的镀金宝塔，即便最穷的奴隶看到如此巨大的寺庙也会惊讶和兴奋。

虽然苏耶跋摩二世可能最迟在1150年还领导一场对越南的战争，但我们不知道他死亡的具体时间。实际上，在1145—1182年间几乎没有刻过碑文，这段历史一定是根据以后的资料重新创造的。苏耶跋摩的继承者，也许是他的表兄弟，是在神秘情况下登上王位的，可能是政变。这位新国王陀罗尼因陀罗跋摩二世似乎是一个热情的佛教徒，有可能他在耶输陀罗补罗就没有像国王一样执政过。1150年左右，耶输跋摩二世继承王位，一块阇耶跋摩七世的碑文中提到了耶输跋摩二世的统治。碑文记载，耶输跋摩是在镇压了西北部的一次情况不明的叛乱之后得到信任的。根据碑文记载，领导这次叛乱的人既不是外国人，也不是上层社会成员；在班迭奇马寺（Banteay Chhmar）的浮雕里，他们被刻画成长着兽头的人物。[①] 或许这次叛乱像20世纪70年代的共产党叛乱一样，被认为不可理解，是由被压迫阶层和“森林居

① Groslier, *Inscriptions du Bayon*, p. 50. 见 B. P. Groslier, “La Cité hydraulique angkorienne. Exploitation ou surexploitation du sol?” *BEFEO*, Vol. 66 (1979): 161 – 202。又见 Groslier, “Agriculture er religion dans lèmpire angkorien”, *Etudes rurales*, Nos. 53 – 56 (January – December 1974): 95 – 117，格罗斯利尔后来扩充了自己的观点，载 Jacques Dumarçay and Pascal Royère, *Cambodian Arcbitecture, Eighth to Thirteenth Century* (Leiden, 2001), pp. 17 – 19。相反的观点见 W. J. Van Liere, “Traditional Water Management in the Lower Mekong Basin”, *World Archaeology*, Vol. 11, No. 3 (Fall 1980): 265 – 80，Van Liere 认为吴哥的人工湖没有分配水源的功能，只是吴哥国王形而上世界观的附属品。当洞里萨湖水退却后，人们在湖边耕种，这里的农业非常发达，足可以供养建造寺庙的大量劳动人口和自己的生活。又见 Robert Acker, “New Geographical Tests of the Hydraulic Thesis at Angkor”, *Soutbeast Asia Research*, Vol. 6, No. 1 (March 1998): 5 – 47; Charles Higham, *The Civilization of Angkor* (Oxford, 2001) pp. 56ff; Greater Angkor Project, “Redefining Angkor: Structure and Environment in the Largest Low Density Urban Complex of the Pre – Industrial World”, *Udaya* 4 (2003), pp. 107 – 23，特别是 pp. 112 – 13，认为巴雷（*baray*，即水库）的象征意义不应该被低估，其实际用处也不应低估。吴哥的水利设施非常庞大而复杂，但应对生态压力的能力较差。

民”组织起来反抗据称是无懈可击的上层阶层。①

12 世纪 60 年代的政局继续动荡。耶输跋摩被他的一个部属杀害，随后这个凶手自己宣布为国王。这个时期，属国罗斛派朝贡使团前往中国，表明罗斛至少是部分脱离了吴哥的控制。碑文的缺乏和统治者的合法性受到质疑，进一步加深了我们对这一时期时局迅速变化的印象。



吴哥寺，建于 12 世纪，用于供奉毗湿奴。是世界上最大的宗教建筑，从 1953 年以来，它的图像连续 5 次出现在柬埔寨国旗中。（图片提供：罗杰·M. 史密斯）

63 可能正如 B. P. 格罗斯利尔（B. P. Groslier）最近所说的那样，王

① Briggs, *Ancient Khmer Empire*, p. 206.

国的水利机构在苏耶跋摩二世统治时期已经开始动摇。[1] 水库和水渠构成的水利体系可以保证在干旱年份有一次收成，在雨量充沛年份有两次收成。它是吴哥稻谷为主的农业经济的基础，并使人口形成较低密度的集中成为可能——大约有六十万之多。[2] 格罗斯利尔认为，在11世纪中期这个体系的效能达到顶峰，一百年以后，吴哥寺的水利工程比起早期庙山周围的水利工程小得多了。格罗斯利尔继续指出，苏耶跋摩二世统治时期，在柬埔寨历史上以水利为基础的城市首次可以建在远离吴哥的地方——奔格梅利亚（Beng Melea）和磅斯威（Kompong Svay）。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吴哥地区的水资源使用太久，已经到了极限，虽然根据最近的研究显示，很有可能在13世纪时水资源的使用达到顶峰。水源来自众多小溪，从北边的库伦山沿着延伸至洞里萨湖岸的缓坡向南流动。随着对水的需求增加，人们在越来越接近水源的位置改道溪流。这一过程减少了溪流滋沃吴哥平原的养分。

由于平原的坡度很小，干旱时水渠可能近乎断流，特别是如果发生政局不稳、战争或疫情，会减少日常维护水渠的劳力，情况更是这样。同其他学者的研究一样，格罗斯利尔也指出，水渠断流现象的增多同东南亚大陆疟疾出现的时间正好一致，加速水利系统衰落的过程。[3] 在这里，如同经常遇到的那样，我们缺乏关于吴哥概况的记载或者能够告诉我们特定时期人口规模和构成的可靠统计数据，缺乏特定时期的水利网络情况，以及国王与农业生产之间的关系。

水利管理、稻米生产、僧侣和寺庙机构之间的密切关系是吴哥王朝的一大特色，这一特色有点类似于古代埃及社会组织，在某些方面

---

① 对这些观点有价值的总结见 Olivier de Bernon，"Note sur l'hydraulique theocratique angkorienne"，*BEFEO* 84（1997）：340－8。

② 见 Leigh Dayton，"The Lost City"，*New Scientist*（January 13，2001），pp. 30－33. 从空中绘制吴哥地区地图有1000平方公里。

③ Groslier，"La Citè hydrquliaue angkorienne"，又见 Rhoads Murphey，"The Ruin of Ancient Ceylon"，*JAS*，Vol. 16，No. 1（February 1957）：181－200。

64 也与中古时代危地马拉的玛雅文明有相似之处。①在上述3个文明中，剩余粮食（小麦、稻米或玉米）被收集来用于国家的开支，以及供养那些有地位的思想家和僧侣，他们是寺院的保护者和国王的顾问。稻米和寺庙生产的其他产品构成吴哥经济的基础，而拿林产品和矿产品到其他国家交换，这也支持了吴哥经济。如迈克尔·科（Michael Coe）所写的，“似乎什么东西都要征税——土地、稻米、盐、蜡和蜂蜜……可以用各种形式的货物支付，包括……奴隶、水牛、大象，尤其是布匹”。②吴哥经济是新兴的研究领域。关心此领域的学者可以以维克里对之前时期的研究为基础，也可以利用以悉尼大学为中心开展的“大吴哥项目”所收集的资料。③

① Michael Coe, “The Khmer Settlement Pattern: A Possible Analogy with That of the Maya”, *American Antiquity*, Vol. 22 (1957): 409 - 10, and Coe, “Social Typology and Tropical Forest Civilizations”,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CSSH*), Vol. 4 (1961 - 62): 65 - 85, 他认为吴哥作为一个城市不仅仅是祭祀这么简单。又见 Victor Lieberman, *Strange Parallels: Soutbeast Asia in Global Context*, c. 800 - 1830 (Cambridge, 2003), 特别是 pp. 236 - 42, 本书提供了一个比较研究的视角。

② Coe, Angkor, p. 150.

③ 见 Greater Angkor Project, “Redefining Angkor: Structure and Environment in the Largest Low Density Urban Complex of the Pre - Industrial World”, *Udaya* 4 (2003): 107 - 23, passim, and Roland Fletcher, “Seeing Angkor: New Views on an Old City”, *Journal of Oriental Society of Australia*, Vol. 320 (2001): 1 - 27。

第4章　阇耶跋摩七世与13世纪危机

从约1150年苏耶跋摩二世去世到阇耶跋摩七世1182年即位，其 65
间只有一块标有明确日期的柬埔寨文碑铭留传下来。我们对这一时期的很多情况都是通过刻着阇耶跋摩训谕的碑铭了解的，这些训谕反映了他的世界观以及他想要人民相信的关于他早年生活的事迹。由于他显然不是一个完全正统的王位竞争者，像很多柬埔寨的开国君主那样，他的早年生活缺乏文件的记载。

乔治·戈岱斯将零散的材料综合成阇耶跋摩的传记，他认为阇耶跋摩是柬埔寨历史上最有成就的国王，而不是一个异类。[1] 阇耶跋摩碑文以及关于他观点的介绍，在很多方面和以前所说的有根本的不同。阇耶跋摩七世因其激进倾向和伟大功绩，在柬埔寨正史中占有崇高的地位，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戈岱斯的著作问世以后。如同我们将见到的，他的统治包含一些神秘和矛盾的地方。近期的学者对戈岱斯关于阇耶跋摩七世的圣徒传提出怀疑。

阇耶跋摩属于所谓的 *Mahiharapura* 王朝。阇耶跋摩好像是苏耶跋摩二世的第一个表兄弟，是陀罗尼因陀罗跋摩亲王的儿子。陀罗尼因
陀罗跋摩曾做过短期的国王，并且是一个热情的佛教徒。格罗斯利尔 66

---

① G. Coedes, *Angkoran Introduction* (Hong Kong, 1963), pp. 84 - 107.

最近对这些说法表示怀疑，因为它们缺乏文献的证明，还因为它们把阇耶跋摩置于直系继承的位置上，从而使我们所知的有关他的生平事迹变得更难理解。①

青年阇耶跋摩似乎曾在耶输跋摩的宫廷里担任某种职务。从1166年至1177年，阇耶跋摩似乎远离吴哥生活，可能是在现在磅斯威省的波列甘寺附近。克劳德·雅克认为阇耶迭多补罗（Jayadityapura）城就在此处，也就是在占婆。在磅斯威省波列甘寺发现的阇耶跋摩的一座塑像，明显早于他在位时的塑像。② 该城是附属于吴哥还是同吴哥竞争？阇耶跋摩同耶输跋摩之后的王位篡位者是怎样的关系？更为重要的是，他同东边的占婆又是什么关系？我们提出这些在一定程度上无法回答的问题，目的是为了将1178年阇耶跋摩即位之后的统治置于他早期生活的背景下和柬埔寨对外关系的格局中进行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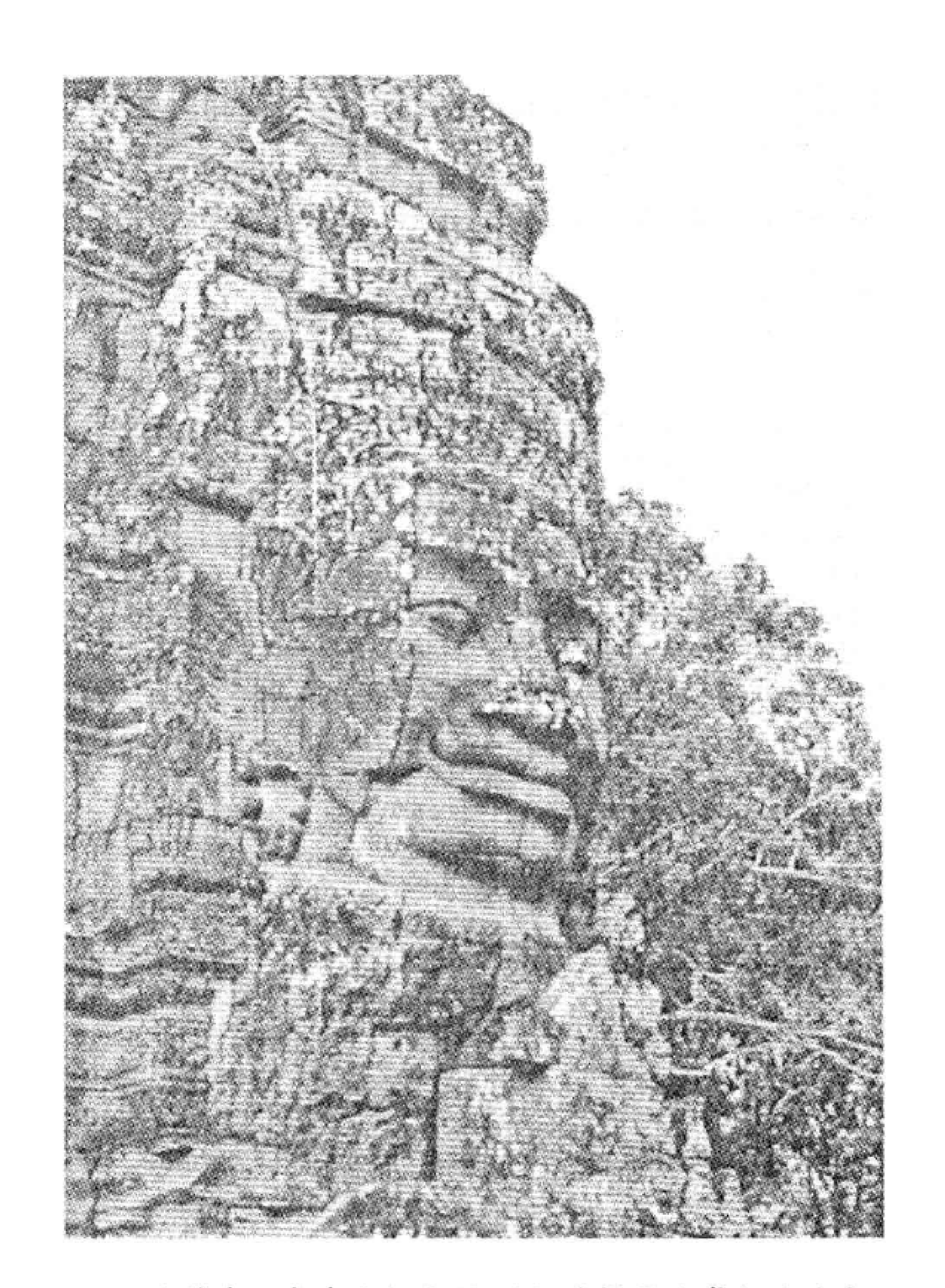
阇耶跋摩七世和佛教王国

阇耶跋摩似乎毕生都在学习大乘佛教教义——这种佛教的变种至今仍在亚洲北部流行。他比其他任何一个国王都更加致力于佛教教义和柬埔寨王权思想的结合。他所实行的佛教王权在一些方面不同于此前好几个世纪里吴哥所奉行的更加富于折中色彩的印度教模式，并且形成了柬埔寨王权的仪式基础，直到1970年这一制度才被暂时推翻。根据传统说法，一个国王，不管是活着的还是死了的，都被认为同某一个神有特别的关系——通常是湿婆，较少的是毗湿奴，偶尔还有二者合成的诃里诃罗——他的庙山最终要供奉该神。国王利用这种特殊关系来解释其崇高，而臣民认为这种关系能帮助提供充足的雨水。

---

① B. P. Groslier, *Inscriptions du Bayon* (Paris, 1973), p. 141.

② 这个塑像发现于1958年，见G. Coedes, "Le Portrait dans l'art khmer", *Arts Asiatrques* (AA), Vol. 7, No. 3 (1960): 179–88; Claude Jacques,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Khmer Culture from the Death of Suryavarman II to the XIVth Century", 载Joyce Clark and Michael Vickery (eds.), *The Bayon: New Perspectives* (Bangkok, 2007), 该文认为阇耶跋摩七世在阇耶迭多补罗成为佛教徒。



坐落在巴戎建于公元 12 世纪的阇耶跋摩七世的庙山（图片提供：沃尔特·维特）

由于柬埔寨社会是按等级组织起来的，又由于国王被认为是王国的集中体现，大部分柬埔寨人像中世纪同期的欧洲人一样，承认国王存在的必要性。一些罕见的碑文，以及建设水库这样的举动，表明国王偶尔也把臣民的福利放在心上。但照人民看来，国王几乎总是藏在威严的宫殿里，是遥远而神秘的人物。国王对人民尽责的观念似乎并不被人接受。在宫廷内部，在王权网络中，以及由此而衍生的官职升迁中，国王既是主人，又是这种制度的受害者；在此之中，臣民为各自的利益、头衔、奴隶所属权和大笔财产而争斗得乱成一团。 68

佛教王权虽然产生于印度传统（佛曾经是一位印度王子），但阇耶跋摩在位时期这些观念从几个方面进行了改变。阇耶跋摩不再被看作是神的信徒，或死时升为神。相反，阇耶跋摩通过宣扬佛教教义，通过做有功德的事情，寻求救赎自己和王国。[①]

简单地说，佛教徒国王和印度教徒国王的差别正像没有人偷听的自言自语和在观众或宾客面前公开上演的戏剧独白的差别一样。印度教国王的统治集合了各种显示方式——仪式、寺院、诗歌、婚礼、碑铭等等，充分显示他的崇高、睿智与神圣。佛教徒国王也做类似的活动，但主要是做给他的臣民观众看的。百姓与其说是国王庄严华丽仪式的参与者（如成千追随者那样），不如说是国王怜悯的对象，是目
69 睹国王做出功绩的观众，也是国王向神赎罪的参与者。这至少是阇耶跋摩七世碑铭和寺庙所提供的信息。

阇耶跋摩七世为什么选择脱离过去？学者们已经作了多种解释。这些解释包括他同吴哥宫廷的疏远，再加上对1167年篡位者自行宣布为王的愤怒，还包括他的“宏伟规划”，该规划涉及建筑、意识形态和王权，经过多年的学习以及很可能受他那位博学而富有野心的妻子的影响，他在脑海中形成自己的规划。这些解释很有帮助，但没有点出阇耶跋摩统治时期的真正关键——1177年占婆对吴哥的入侵。保罗·穆斯和琼·博伊塞利尔（Jean Boisselier）认为我们可以把阇耶跋摩整个统治期间看作是对这次灾难事件的反应。[②]

阇耶跋摩同占婆的关系紧密。12世纪60年代他可能在那里生活了好几年。他离开吴哥可能同在宫廷内失宠有关，因为他只是在耶输跋摩二世被废黜之后才回来。阇耶跋摩碑文提供的资料并不清楚，这

---

① 见 J. Boisselier, “Réflexions sur l'art du Jayavarman VII”, *BSEI*, Vol. 27, No. 3 (1952): 261 – 73; Paul Mus, “Angkor at the Time of Jayavarman VII”, *Indian Arts and Letters*, Vol. 11 (1937): 65 – 75; Mus, “Angkor vu du Japon”, *France Asie* (FA), Nos. 175 – 76 (1962): 521 – 38。又见 Philippe Stern, *Les monuments khmers du style du Bayon et Jayavarman VII* (Paris, 1965), pp. 177 – 98。

② 见 Mus, “Angkor at the Time of Jayavarman VII”; Mus, “Angkor vu du Japon”; and Boisselier, “Réflexions”。

一切说明关于 1177 年占人入侵之前发生的事（实际上就是阇耶跋摩的早期经历），阇耶跋摩认为没有什么可以夸耀的，其中有些年他可能是在他母亲的家乡——吴哥东边的阇耶迭多补罗度过的。[1]

由于碑文倾向于将战争原因归咎于王位野心、背叛和复仇——也就是《罗摩衍那》（*Ramayana*）所说的世界，因此要准确判定为什么占婆在 1177 年从陆上并可能在 1178 年从水上入侵柬埔寨是困难的。[2]夺取战利品和俘虏当然是占婆发动战争的一部分动机，对于过去被吴哥打败耿耿于怀也是缘由之一。远征舰队沿大湖和暹粒河而行，占领耶输陀罗补罗城，有人惊叹道："占婆国王率领强大的舰队，拒绝任何和平建议，大肆掠夺并杀死国王。"[3]

1177 年占婆入侵的时候阇耶跋摩好像还在占婆。在第二年，他集结一支由高棉人和占人支持者组成的军队，在吴哥发起一次反对占婆的新军事行动，并取得战斗的胜利，不过一块碑文认为是一名柬埔寨王子而不是阇耶跋摩本人，"用一亿支箭"射死占婆国王。占人入侵 70
后阇耶跋摩回到吴哥，发现都城"陷入苦海"，城里"罪恶横行"。在他思想中，把其中有些苦难归咎于先前国王治理不善；另外一些则是王国内部权力分化造成的，这在他妻子写的一块碑文上有所暗示："先前朝代，大地虽有很多遮阳伞遮阴，仍受酷热煎熬；现在（在阇耶跋摩统治下）只保留一把遮阳伞，大地却明显地摆脱了苦难。"[4]

阇耶跋摩七世在 1182—1183 年间加冕登基，因而，如他的碑文所告诉我们的那样，他从前任那儿并没有得到多少帮助，更多的要归功于他的睿智、他的佛教信仰和他的战功。不过，显然从打败占婆到掌握大权这段期间，一定还充斥着政治谈判，或许还有同其他"遮阳伞"之间的冲突。在随后大约三十年的时间里（我们不知道他去世的准确日期），他的个性和思想深深印在这个王国之中，在 20 世纪 60 年

---

① Groslier, *Les inscriptions du Bayon*, p. 152.

② G. Maspero, *Le Royaume de Champa* (Paris, 1928), p. 164.

③ K. 485, stele from Phimeanakas, *IC*, Vol. 2, p. 171.

④ 同上，p. 175。

代的西哈努克和此后的波尔布特之前，没有哪个统治者能够做到这一点。像后面这两位一样，阇耶跋摩想改造柬埔寨，并把自己视为这一改造的工具。

从“佛”和“国王”这两个词所固有的紧张关系中，产生出阇耶跋摩统治时期很多有趣的东西。在使用印度教化的王权机构和随之而生的巨大物质投入的同时，阇耶跋摩也谦恭地——如果他的碑铭是可信的话——设法使自己和人民脱离苦难。他作为国王，修建了遍布全国的道路，这或许是为了提高应对反叛或入侵的军事能力，但也便利于出入资源富庶的地区，经占城海港（现在臣服吴哥）向中国出口货品。阇耶跋摩七世被公认为柬埔寨历届国王中最为超俗的一个，他将王权国家化，这让他的统治具有截然相反的两面。后人很快就用“一方面”和“另一方面”这种模式对他进行评论。

例如，巴戎寺的很多浮雕，就包含有描写对占人作战的逼真的残酷场景。相似的，一些阇耶跋摩的碑文则赞颂了他在对占人作战中的
71 复仇之心和聪明才智。一方面，很多流传至今的雕像，把他描绘成冥思的苦行者。[①] 我们从他那时所谓医院的碑文中获悉，“他的臣民生病给他带来的痛苦要比自己生病还要痛苦；百姓身体上的疼痛也是他精神上的疼痛，而且更厉害”。[②] 另一方面，从他 1182—1183 年间登位到 13 世纪的第二个 10 年期间，道路、寺庙、“火房”（houses of fire）、水库和医院以异常快的速度兴建起来，有一些是在他死后完成的。事实上，很多建筑物工艺很粗糙，他在位末期吴哥的砂岩和石灰岩已经

① Coedes, “Le Portrait”。不过，格罗斯利尔认为戈岱斯的雕像目录不完善。见 Groslier, *Inscriptions du Bayon*, p. 194。又见 Son Soubert, “Head of Jayavarman VII”, 载 Helen Ibbetson Jessup and Thierry Zephir (eds.), *Sculpture of Angkor and Ancient Cambodia: Millennium of Glory* (New York, 1997), pp. 300 - 1; Ashley Thompson, “The Suffering of Kings: Substitute Bodies, Healing, and Justice in Cambodia”, 载 John Marston and Elizabeth Guthrie (eds,) *History, Buddhism, and New Religious Movements in Cambodia* (Honolulu, 2004), pp. 91 - 112。

② L. Finot, “L'Inscription sanscrite de Say - Fong”, *BEFEO*, Vol. 3, No. 2 (1903): 18 - 33. 还见 G. Coedes, “Les Hôpitaux de Jayavarman VII”, *BEFEO*, Vol. 40 (1940): 344 - 47。克劳德·雅克提供了这段话的译文，对 Finot 的内容进行了修正。又见 Kieth Rethy Chhem, “Bhaisajyaguru and Tantric Medicine in Jayavarman VII Hospitals”, *Siksacak* 7 (2005), pp. 9 - 17。

开始用光了。[1] 碑文告诉我们，成千上万普通百姓从事建筑和维护这些工程的劳动，目的是从心灵上解脱痛苦。以 21 世纪的眼光看，这似乎有些讽刺，但是我们应该记住，从佛教的意义来说，受苦不应仅被视为纯粹的身体感受，而是同生活的目的有关，同经受某些苦难就是遵从佛的教义这种思维有关。

为什么阇耶跋摩的工程项目执行得如此之快？他即位时可能年已六十，建设这项工程要与时间赛跑。这个计划可能是阇耶跋摩七世个人赎罪过程的一部分，然而他的碑铭没有说明他正在赎何种罪。我们对他统治初期的了解来自较晚时期所写的碑文。他在这些年挫败了占人的另一次进攻、镇压了西北方的叛乱并重建耶输陀罗补罗城，首次在城市周围建起城墙。像以往一样，伴随这些军事行动之后，出现人口大规模变迁，如刻于 1191 年的波列甘碑文所暗示的："对众多战士，他奉献拥有辉煌宫殿的敌方国王的都城；对森林里徘徊的野兽，他奉献敌人的森林；对战俘，他奉献自己的森林，以此来显示他的慷慨和宽容。"

像对待其他柬埔寨国王一样，在阇耶跋摩的政策和他的宗教之间，在世俗和精神力量之间，以及在他关于自己的思想和关于王国的思想之间，做出明显的区别是不妥的。在排除他作为一个狂妄自大者之前，
值得回想一下，如果以前没有人赞同他的眼光，没有人相信他的优点， 72
他决不能成为国王，特别是他开始争夺王位时所处的位置并不有利，当了国王肯定也不可能维持住权力。很多高官、婆罗门、佛教僧侣及军人可能看到王国进行扩张的优势，部分借助于王室资助的宗教团体的力量，部分则将以前的敌人或漠视的人为自己所用。到 13 世纪初，吴哥已经从今天的泰国和老挝南部及从占有越南中部海岸地区的占婆征收贡赋。举世闻名的阇耶跋摩庙山上有很多半微笑的面孔和他的雕像，都显示出仁慈并且强有力的形象。

与此同时，如迈克尔·维克里和其他学者所暗示的，在阇耶跋摩

① Boisselier，"Réflexions"，p. 263.

统治期间一定也积聚了很多对他的憎恨，这些憎恨来自于不满的贵族成员，来自于以前具有很高地位的印度教徒，他们憎恨国王转变信仰。高棉社会中的这些仇恨因素，可能在后来国王（但不知道是哪位国王）的煽动下，在阇耶跋摩死后出现了一场反佛教的毁寺运动，阇耶跋摩兴建的很多寺庙受到影响。[①]

艺术史家菲利普·斯特恩详细研究了阇耶跋摩在位期间的历史，将他的雕像和建筑划分为3个发展阶段。[②] 这恰好同斯特恩注意到的早期柬埔寨国王建筑的3个阶段相吻合，即公共工程、纪念父母的寺庙和国王自己的庙山。

早期国王的公共工程，如同我们所看到的那样，通常以水库（巴雷/*baray*）的形式出现，也会修建诸如道路、桥梁等其他工程，但在碑文中很少能看到它们。阇耶跋摩的建设项目不同于过去。根据塔布茏寺（Ta Prohm）的碑文记载，医院（可能在他即位初期建立）是一次重要革新。其中4个位于吴哥城（Angkor Thom）入口附近。其他的建在吴哥西边，一直到现在的泰国东北处，向北远至老挝中部。大约
73 有20个医院遗址目前已经确定。塔布茏寺碑文记载，这些医院可以要求838个村庄共约8万名成年人为其服务。服务的内容是给每个医院的职员提供劳动和稻米，或者提供接近100名劳动力，其中包括奴婢。[③] 医院的碑文提供了有关医院行政机构以及分配给医院的粮食和人员的详情。

阇耶跋摩七世的第二套公共工程是沿柬埔寨主要道路大约每隔16公里（10英里）建造一家的“火房”。在吴哥和占婆首都之间有57家，在吴哥和泰国东北比迈的佛教寺庙之间还有17家。这些建筑的具

① Michael Vickery, “Introduction” to Clark and Vickery, *The Bayon* (2007).

② J. Auboyer, “Aspects de l'art bouddhique au pays khmer au temps de Jayavarman VII”, 载W. Watson (ed.), *Mahayanist Art After A. D. 900* (London, 1977), pp. 66-74。

③ K. 273, Ta Prohm inscription, *BEFEO*, Vol. 6, No. 2 (1906): 44-81.

体目的尚不清楚。[1]

最后，阇耶跋摩还修建自己的水库，即现在的北巴雷，他在位时称为阇耶塔塔卡，位于耶输陀罗补罗的东北面。

这些革新措施源于阇耶跋摩认为拯救臣民于苦难是他的使命，正如医院碑铭所说：

> 倾注着对世间美德的深深同情，国王发出这样的誓言："愿我能够借助这种善行，把所有深陷苦海的人拯救出来。愿我以后的历代柬埔寨国王，也将追求这些美德……同自己的妻子、臣僚和朋友一起，到达不再是疾病横行的彼岸。"[2]

阇耶跋摩七世的寺庙

在阇耶跋摩统治的第二个阶段，他建立了一些纪念其父母的寺庙。其中第一个寺庙即现在的塔布茏寺（"梵天祖先"），建于 1186 年。该寺庙把阇耶跋摩的母亲当作智慧女神般若（Prajnaparamita）来供奉，意为众佛之母。寺庙里也放置有阇耶跋摩佛教老师或称古鲁（Kru 在现代高棉语中意为"教师"）的雕像，雕像周围是六百多位从属神和菩萨。在寺庙广场上，湿婆派和毗湿奴派修行者同佛教僧侣和学者的小 74
房间并排而立，这个事实显示了柬埔寨的宗教调和。今天的塔布茏寺外表保留了初期的粗朴风貌，因为它与吴哥其他主要寺庙不同，它一直被遗弃在丛林里，从未修葺过。

阇耶跋摩七世建造的第二个寺庙群就是现在的波列甘寺（Preah Khan）（"圣剑"）。碑文说，它建立在柬埔寨对占婆一次重大胜利的地

---

① G. Coedes, "Les gîtes d'étape à la fin du XIIIe siècle", *BEFEO*, Vol. 40 (1940): 347 – 49。克劳德·雅克将这些建筑重新定义为"fire shrines"，见 Jacques and Lafond, *The Khmer Empire*, pp. 263 – 64。

② 见 G. Coedes, "Le Stele de Preah Khan", *BEFEO*, Vol. 41 (1941): 256 – 301，这段引文出现在 p. 287。

址上，12 世纪时它的名字为“胜利和王冠”（Jayasri），或许印证了这一事实。没有其他的碑文提到这次战斗。由于这次战斗发生在接近耶输陀罗补罗的地方，所以可能是占婆对这座城市的第二次入侵。格罗斯利尔认为战斗确实发生过，且在巴戎寺的浮雕中有所描绘。[①]

波列甘寺建于 1191 年，内有阇耶跋摩父亲陀罗尼因陀罗跋摩的雕像，雕像貌似观世音菩萨（Lokesvara），展示出佛的慈悲。这里明显地运用象征手法，因为按照大乘佛教的说法，智慧（*prajna*）和慈悲（*karuna*）的结合产生启蒙，也就是说产生佛自己，即启蒙者。[②] 在阇耶跋摩艺术发展的这个阶段，观世音菩萨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他在位的整个时期里，般若（智慧）、佛（启蒙）和观音菩萨（慈悲）三位一体，是国王宗教思想的中心。两个寺庙分别建于耶输陀罗补罗新中心（后来巴戎寺建在这个位置）东南和西南，说明三个寺庙合在一起解读的含义是，同情和智慧的结合产生启蒙，也就是立在巴荣寺中央也是阇耶跋摩庙山中心的佛陀雕像。



巴戎寺中 12 世纪的浮雕，描绘了占人和高棉人之间的战斗（图片提供：沃尔特·维特）

这两座“父母”寺庙的碑文向我们显示了柬埔寨官

① Groslier, *Inscriptions du Bayon*, p. 167.

② 这段文字很大部分摘自 Hiram Woodward 在私人通信中提出的观点，还见他给克拉克和维克里主编的《巴戎寺》一书写的“前言”。

僚机构的高度发展，特别是从它能控制百姓的住所和义务这一点上能看出来，还能从在政府中担任职务人的数目看出来，这些人有资格在寺庙里安置神像。按照碑文的记载，在塔布笼寺住着好几千人：

> 这里有 400 名兵士，18 位高僧，2740 位一般和尚，2232 名 75
> 助手，包括 615 名舞女，包括所有有资格住在这里的人共计 12640 人。除此之外，还有 66625 名男女为神效劳，使总数达到 79265 人，其中包括缅甸人、占人等。①

与此类似，附属于波列甘寺的人，即那些有义务提供稻米和其他服务的人，总数接近 10 万，他们来自超过 5300 个的村子。碑文继续列举那些依靠先前寺庙资助生活的人。人数超过 30 万，来自 1.35 万个村子。为了便于向寺庙提供食品和衣物——碑文只点到这两种供应——基础设施必须要高效而严密。

碑文有三点内容非常有意思。一是对外来人——“缅甸人、占人等”——用与本地人不同的方法统计，可能因为他们是战俘，同贵族、僧人和宗教机构没有持久的联系。另一点是碑文提到的包括附属民在内的村庄人口规模，平均大约是两百人，相当于 20 世纪 60 年代柬埔寨一个中等规模的种稻村庄。最后一点是，碑文指出，这些寺庙虽然供奉着佛并且作为数千佛教僧侣的住地，但也容纳着同各种印度教派有关的雕像和圣职人员。阇耶跋摩七世显然批准了这种安排，因为我们知道他在宫廷里也保留着印度教的思想家和官员。其实，在阇耶跋摩七世的寺庙里印度教同佛教共存要比将二者合为一体可能更为有利，或许阇耶跋摩七世心里也是这样认为的。

被称为内克庞（Neak Po’n，“双蛇寺”）的宝石般的寺庙，在阇耶塔塔卡形成了一座岛，可能建成于 1191 年，因为波列甘寺碑文这样记载：

---

① 见 Ta Prohm inscription。

> 国王像安置一面吉祥的镜子一样安置阇耶塔塔卡，用石头、黄金和鲜花装扮。中间有一岛，四面绿水环抱，魅力无穷。它为来访者洗涤罪恶的尘泥，被看作能搭载人们渡过人生海洋的航船。①

岛屿被城墙环绕，建成荷花形状，象征着喜马拉雅神湖，在佛教徒思想中具有神圣地位。位于湖中的寺院，其周围有 4 条喷水的赤色鱼，从较大的湖吸水喷向较小的湖。建立在水中层层阶梯之上的寺庙，可能跟波列甘寺一样，供奉观世音菩萨，他的形象不断出现在墙上的浮雕中。

77 寺庙四壁还安置着雕像群。不幸的是，其中只有观音菩萨的一个侧面能够清晰可辨，象征着巴拉哈马神（the horse Balaha）；其余两个可能是湿婆和毗湿奴的雕像。琼·博伊塞利尔认为，寺内这些神可以看作一种政治宣示，表明吴哥以前供奉的神现在已经从属于佛。但是他们为什么这样做？博伊塞利尔赞同穆斯的看法，1177 年占婆占领吴哥的时候，柬埔寨人已经对湿婆教和毗湿奴教失望。另外，阿纳瓦塔普塔湖（Lake Anavatapta）不仅对所有佛教徒，而且尤其对佛教徒的统治者转轮王都是神圣的，这要从阿育王（the Emperor Asoka）的传说说起，他能够神奇地从此湖中抽水，以提升自己的纯洁和权力。②

从阇耶跋摩七世第二阶段的画像中可以看出，他或许资助扩建了很多早期建筑——著名的有泰国西北披迈的寺庙和柬埔寨磅斯威的波列甘寺。③

这些建筑的规模暗示阇耶跋摩七世时期的城市化趋势，或者至少说明有一种趋势把边缘地区的大量居民集中起来以便为国家效力。阇

---

① 见 L. Finot and V. Goloubew, "Le Symbolisme de Nak Pean", *BEFEO*, Vol. 23 (1923): 401－5; V. Goloubew, "Le Cheval Balaha", *BEFEO*, Vol. 27 (1927): 223－38。

② J. Boisselier, "Pouvoir royal et symbolisme architectural: Neak Pean et son importance pour la royauté angkorienne", *AA*, Vol. 21 (1970): 91－107.

③ 见 G. Groslier, *A l'ombre d'Angkor* (Paris, 1916), pp. 148－82。

耶跋摩七世，像在他之前的苏耶跋摩二世一样，似乎热衷加强中央集权和官僚控制国家的理念。这些理念或许构成了他促使臣民改信佛教这一使命的部分内容，或者是将人民组织起来便于对付外国威胁。

第二阶段的建筑有一些标志性的风格创新。这包括使用多面塔这一建筑基调，这在帕拉塞波列斯通（Prasat Preah Stung）的小寺庙和吴哥城大门中都有所运用；另一创新性的风格是围绕整个城市的石墙，这在吴哥历史上显然是第一次出现，从巴戎寺往下看有数百面之多；还有城门外的大道。

这些建筑要从政治和宗教两方面去理解。在穆斯之后，博伊塞利尔将吴哥的城墙比作马其诺防线，认为这大概是针对占人入侵的防御工事。同时，这些墙也可以看作围绕梅鲁山或阇耶跋摩庙山——巴戎 78
寺的环山。

1191年攻占占人首都之后，阇耶跋摩可能在耶输陀罗补罗度过最后的统治岁月。这个时期的建筑有急于完成、工艺粗糙的迹象，并流露出意识形态的转变。例如，12世纪90年代，巴荣寺在很多方面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可能12世纪的时候也是如此。[①]

一块阇耶跋摩末期的碑文将这座城市比作他的新娘："经过粉刷并以宝石装饰的耶输陀罗补罗城燃烧着欲望，作为善良人家的女儿……在万物俱全的节日里同国王结婚，受到国王的保护。"[②]碑文继续说，结婚对象是"环宇之中幸福的产儿"。

城市中心是巴戎寺（19世纪吴哥民间对纪念建筑统称为Bayon，

---

① 见 Jacques Dumarçay, *Le Bayon, histoire arcbitectural du temple* (Paris, 1973)，特别是 pp. 57－64。有关巴戎寺形象变化的有趣解释见 Hiram W. Woodward Jr.，"Tantric Buddhism at Angkor Thom", *Ars Orientalis*, Vol. 12 (1981): 57－68; J. Boisselier, "The Meaning of Angkor Thom"，载 Jessup and Zephir, *Sculpture of Angkor and Ancient Cambodia*, pp. 117－121; Claude Jacques, "Les Derniers siècles d'Angkor"，载 *Comptes Rerukrs de l'Academie* (Paris, 1999), pp. 367－90; Clark and Vickery 的 *The Bayon* 中 Claude Jacques and Olivier Cunin 写的章节。

② K. 287, stele from Prasat Chrung, *IC*, Vol. 4, p. 2. 50.

法国人使用此名命名此处寺庙）[①]，拥有好几百尊四面巨人雕像，以及动人心魄的浮雕，描绘了日常生活、同占人的战争和印度神的举止。这座寺庙曾经容纳过几千雕像。20 世纪 30 年代发现的中心雕像是一尊由一条巨大的蛇神或称“纳加”（*naga*）缠绕的佛像。雕像已经被破坏分子搬离原来的重要位置，扔进一个通风井中，这可能发生在阇耶跋摩七世死后。

寺庙雕有巨人（*asura*）和神灵（*devata*）抓着两条巨蛇蛇身，看起来像是在拔河。关于寺庙和通往寺庙的砌道有何象征意义，有很多争论。一些人认为这些砌道表现一著名的印度神话——搅动乳海的神话。另外一些人赞同穆斯的观点，将之看作引导人民脱离俗世进入神界的彩虹桥梁。从另一个层面看，阿修罗代表占人，天使代表柬埔寨人。这对从辩证角度认识这座城市、认识阇耶跋摩所进行的工程是有
79 吸引力的。例如，像我们上面所讲的，菩萨（慈悲/父亲）和般若（智慧/母亲）生下了佛（即被看作智慧和慈悲结合生下的启蒙），也就是阇耶跋摩七世自己。以前我们从对诃里诃罗的崇拜中、从分别代表水/月/黑暗之神与土地/太阳/光明之神的对立或合成之中，见过这种思想转变。同样的，在巴戎寺和班迭奇马寺砌道和浮雕所反映的柬埔寨人同占族人的斗争里，能见到转变后新柬埔寨的降生，在那里佛教已经赢得对占婆的印度教诸神的胜利。这一辩证法是巴戎寺的“讯息”，博伊塞利尔将巴戎寺看作“众神之城的集会之所”。[②]这种讯息和那些半带笑脸的庙中神像，还可以从人世政事的角度去理解。正如在吴哥艺术上经常看到的那样，把这些经常出现的面孔仅仅看作某个神灵正在执行某种使命，这是狭隘的和肤浅的。例如，从一个角度看，他们

① 有关这一名字的含义见维克里给 Clark and Vickery 主编的 *The Bayon* 写的导论。维克里注意到19 世纪当地人把很多吴哥时期的寺庙都称为 Bayon，引自 Etienne Aymonier, *Le Cambodge*, Vol. 3（Paris, 1904）, pp. 143 – 44，又见 Saveros Pou，“From Old Khmer Epigraphy to Popular Tradition: A Study of the Names of Cambodian Monuments”，载 S. Pou, *Selected Papers in Khmerology*（Phnom Penh, 2003）, p. 30。

② 见 Jean Boisselier and David Snellgrove（eds.）, *The Image of the Buddha*（Paris, 1978）, p. 410。

作为佛及其教义的守护者；从另一个角度看，他们环视四方，监视天下，或许代表着当时的民政和军事官员。博伊塞利尔主张他们是婆罗门的庄严表现，也注意到他们的冠冕类似刻在入口砌道上的占人阿修罗的穿戴。到目前还没有哪种解释具有完全的说服力。①

巴戎寺的另外一大特色在班迭奇马寺中也能找到，那就是浮雕与其说是描绘的《罗摩衍那》或某些其他文学作品中的情节同历史事件巧合或相似，倒不如说就是描绘的柬埔寨历史事件。② 在巴戎寺和班迭奇马寺中所描绘的战斗场面使用的是 12 世纪的兵器，而其他浮雕则描绘普通人买卖、进食、赌博、抱小孩、摘果、治病以及步行或坐两轮牛车的情景。浮雕上所描绘的几乎所有风俗、人工制品和服装，直到殖民时代末期在柬埔寨乡村中仍能看到。尽管阇耶跋摩的碑文没有这些普通人的记载，他们仍然自由地出现在他的浮雕上，点缀着国王的寺庙，这在以前从未出现过。

除非有更多阇耶跋摩时期的碑文提供信息，他对我们来说仍然富 80
有神秘感，因为关于他的个性、统治和思想存在着这么多的含糊不清之处。这种神秘部分产生于十三四世纪柬埔寨特征鲜明的广泛的社会和思想变迁，还部分归咎于阇耶跋摩及其周围的人发动的战事。

认识模糊的另一个原因是阇耶跋摩寺庙和碑文中存在的不协调之处：一方面大肆渲染同情，另一方面又大肆渲染毅力；一方面流露出对尘世的超脱（以内克庞寺的巴拉哈马神为象征），另一方面是改变在阇耶跋摩七世眼中因占人入侵而破坏的吴哥面貌的详细计划；第三个神秘处是沉默，无论是建筑还是碑文在阇耶跋摩之后而且似乎从他晚年就开始保持沉默。我们无法确认在某种意义上阇耶跋摩是否应对此异常的沉默负责，因为在后来的碑文里他很少被提及。早期的碑文经常强调延续性，而这一传统在他在位期间似乎中断或被严重破坏。

---

① 见 Michael Vickery, "Introduction" to Clark and Vickery, *The Bayon*。

② 有关班迭奇马寺见 Christophe Pottier, "A propos du temple de Banteay Chhmar", *Aséanie* 13 (June 2004): 132 - 49。

上座部佛教与13世纪危机

13世纪柬埔寨影响最大的变化是大多数人民改信上座部佛教，下面讨论的就是这个问题。[①] 阇耶跋摩七世在这个转变中扮演了什么角色或者他对此的反应是什么，已经很难判断。从个人角度看，他统治的历史是一部将个人的意志强加到人民、土地和亚洲部分地区的历史，表面上是服务于理想化的大乘佛教。这里宣扬的“解放”同民主柬埔寨的意识形态巧合地类似，后者也是自上而下强加给人民。阇耶跋摩七世是不是像波尔布特那样把柬埔寨精英阶层视为阶级敌人，或者像他那样宁要“森林居民”，也不要那些住在耶输陀罗补罗的居民，这
81 是非常值得怀疑的，但是在有选择的跟过去决裂，讨伐邻国、实施宏伟建筑项目和扶持新的宗教方面，阇耶跋摩七世同20世纪70年代非常类似。有趣的是，唯一受到民主柬埔寨颂扬的吴哥历史，正是除了阇耶跋摩七世以外很少有其他国王能够做到的大规模动员群众的能力。

一些作者将柬埔寨改信上座部佛教同紧随蒙古人入侵中国之后影响到东南亚的动乱联系起来；另一些学者则认为这是已经信奉上座部佛教的孟族人和泰族人对吴哥居民影响日益增长的证据。我们知道，来自暹罗孟语地区、缅甸和锡兰（今称斯里兰卡）的传教者在这个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柬埔寨朝圣者曾到锡兰学习上座部佛教和获取僧证。我们了解变化的一些原因，但要说明为什么变化这么迅速、这么广泛很困难。一些学者认为上座部佛教和婆罗门教或大乘佛教不同，它所倾向的是普通人。L. P. 布里格斯提出了一个更为可能的解释，[②] 那就是高棉人和泰国中部平原已经信仰上座部佛教的孟语居民之间的相互影响，在半个世纪左右的时间里，逐渐导致东边的高棉人改变信

① 有关这次宗教转变的详细讨论见 G. Coedes, “Documents sur l'histoire politique et religieuse du Laos occidental”, *BEFEO*, Vol. 25 (1925): 1 - 202。又见 A. Leclère, *Le Bouddhisme au Cambodge* (Paris, 1989), pp. 1 - 34; Daniel M. Veidlinger, *Speaking the Dharma: Writing Orality and Textual Transmission in Buddhist Northern Thailand* (Honolulu, 2006); David K. Wyatt, “Relics, Oaths and Politics in Thirteenth Century Siam”, *JSEAS* 34 (2003): 21 - 39。

② Briggs, *The Ancient Khmer Empire*, pp. 242, 259.

仰。我们无法说出谁比谁更具吸引力，或者社会中哪些人更快接受上座部佛教。无论如何，这种变化决不包括全体社会成员，因为中国使者周达观（1296—1297 年出访吴哥）注意到婆罗门教和湿婆教同上座部佛教一样，在吴哥的地位仍然获得认可。①

换言之，13 世纪的吴哥——吴哥历史上有年份可据的碑文中记载最少的时期之一——很可能经历了一次严重的宗教动乱或一系列动乱，既是政治造成的，也影响了政治。

阇耶跋摩七世统治的末期及其继位者因陀罗跋摩二世（1200—1270）在位期间的情况都不清楚，我们只知道因陀罗跋摩跟阇耶跋摩七世一样是著名佛教徒，延续了其前任的一些工作。在巴戎寺发现的 82
碑铭很少谈到阇耶跋摩生命最后阶段的事情。位于其都城四角、显然刻于他去世时候的那些碑铭，为我们了解阇耶跋摩对占婆和越南的战争提供了有益的参考。戈岱斯认为，这些碑铭是用令人生厌的梵文写的。其中好几块（像巴荣寺的一些浮雕那样）还没有完成，很像是因为正在劳动的工人听到国王死讯后突然放下手中的凿子。②

阿什利·汤普森（Ashley Thompson）从另一个视角研究了后吴哥时代的艺术：

> 肖像画作中糅合了植物、动物和人，宣布圣坛之上的神灵已经退出。奇异的生灵和强大的神灵这些形象在作品中不再存在……神灵的感知和威严实际上已经消失。③

这一文字记载缺乏的时期恰好是柬埔寨和东南亚历史上的关键时期。13 世纪是整个东南亚地区的危机时期——急剧变迁，人口迁徙，

① Zhou Daguan, *Cambodia: The Land and Its People* (ed. and tr. Peter Harris) (Chiangmai, 2007)，从中文翻译过来，补充 P. Pelliot (ed.), *Mémoires sur les coutumes du Cambodge de Tcheou Ta Kuan* (Paris, 1951)。

② K. 287, stele from Prasat Chrung, *IC*, Vol. 4, p. 208.

③ Ashley Thompson, "Changing Perspectives: Cambodia After Angkor"，载 Jessup and Zephir, *Sculpture of Angkor and Ancient Cambodia*, pp. 22 – 32 at 23。

外部入侵，贸易方式改变，新宗教出现以及权力均衡更替。[①] 就东南亚大陆而言，一个主要变化就是曾经受到国家资助并有种姓制度所支撑的印度教崇拜被广泛传播的上座部佛教所替代。从长期来看，这次变化产生了几个分支。在柬埔寨和泰国，婆罗门派保住了他们在宫廷仪礼中的地位，但其他方面的重要性已经降低。印度文学作品和肖像中丰富的神话和文学基础（到现在在浮雕、雕塑、建筑和碑铭中仍有体现）在柬埔寨明显缩小，以满足上座部佛教美学和柬埔寨文学更严格的要求，如《罗摩衍那》的当地译本，弥漫着佛教价值观。

在对外关系方面，这个时期影响柬埔寨最重要的两个变化，一是对居住在今天泰国境内居民控制的减弱，二是在元朝和明朝前期中国
83 人在东南亚商业活动的扩展。尽管柬埔寨文化对中部平原（14 世纪泰国都城阿瑜陀耶/Ayudhya 就建在此）仍然保持着强有力的影响，但柬埔寨对其他地方的政治控制力减弱。像素可泰（Sukot'ai）和罗斛那样以前向吴哥进贡的侯国，现在都宣布独立，改向中国朝廷进贡。吴哥再次陷于易受来自除东边外各个方向入侵的境地，因为东边的占婆已不再是一个强国。事实上，泰国的大举入侵就发生在 13 世纪末期，这在周达观的《真腊风土记》中有所记载。

周达观关于吴哥的记载（1296—1297 年）

公元 1296—1297 年，中国使节周达观访问柬埔寨，他的记录［即《真腊风土记》——译者）］是我们所见到的关于吴哥面貌和日常生活的最详细的记载。[②] 周达观不受像印度文学中不反应普通人传统的束缚，对当时吴哥的情况作了丰富而详细的实录。例如，在他的记载中，我们看到柬埔寨人民的沐浴、售货和列队行进等。照我们的观点来看，周达观在其简短的书稿中花大篇幅记载异国“野蛮人”的生活风情，未免有些难于启齿。尽管周达观给我们提供了他停留吴哥期间相当于

① G. Coedes, "Une période critique dans l'Asie du Sud Est: Le XIIIe siècle", *BSEI*, Vol. 33 (1958): 387 - 400.

② Daguan, *Cambodia: The Land and Its People*, *passim*.

现在新闻影片（或者说是家庭纪录片）的资料，但如果他还能将他所知道（或关心）的这段历史上的空白之处也记录下来，那将更会吊起我们对他这部特色影片的胃口。

《真腊风土记》的翻译本只有35页，分为40节。这些章节的长度从一短段至数页不等，其内容包括宗教、司法、王权和农业（仅列4种），以及飞鸟、蔬菜、沐浴习惯和奴隶等。周达观记述了13世纪柬埔寨生活的很多方面，诸如衣着、工具、耕畜和乡村商业，今天仍能看到；还有诸如奴隶制、禁止奢侈的法律以及神裁诉讼，这些当时的法律制度以不同的形式至少一直到19世纪还有。

《真腊风土记》有5个部分值得详加注意，这五部分分别记载宗教、奴隶、节日、农业和国王的出行。周氏发现有3种宗教在吴哥享有官方地位，似乎是婆罗门教、上座部佛教和湿婆教。周氏记载说，84
婆罗门教徒经常获得与高官一样的地位，但除此以外他就几乎找不出关于他们的其他情况。《真腊风土记》这样记载：“班诘不知其所祖，亦无所谓学舍讲习之处，亦难究其所读何书。”上座部佛教僧侣，按泰语俗话叫“苎姑”（*chao ku*），同今天上座部佛教的东南亚国家和尚很相似：“（他们）削发穿黄，偏袒右臂，其下则系黄布裙，跣足。”

周达观告诉我们，佛寺像宫殿和高官的住宅一样，可以建瓦顶，但普通人只能住茅房。周氏对上座部佛教寺庙的简单朴素印象深刻，他注意到这里的寺庙（不像中国大乘佛教寺庙），“无钟鼓铙钹与幢幡宝盖之类”，屋子里仅有一尊贴着金箔的泥塑佛像。最后，周氏记载了用棕榈树叶书写的方法，这种方法一直很好地沿用到20世纪，特别是在宗教和历史书籍中。

周达观将湿婆教徒称为“道教教徒”，他们的寺院没有佛寺那么兴隆。“他们不供奉神像，只供奉一块石头，像中国供奉土地神的祭坛”。尽管吴哥城荒弃后湿婆教的重要性已经下降并且最终完全消失，但包括林加崇拜在内的印度化崇拜，却一直延续到现代，自称婆罗门的官员继续在宫廷里工作，主持王家典礼以及从事天象观察。

《真腊风土记》清楚地告诉我们居住在吴哥的很多居民在某种意

义上说是奴隶，因为周氏告诉我们，人们多则拥有超过一百名奴隶，少则拥有十到二十个奴隶，只是很穷的人才一个也没有。他还说，奴隶一般作为俘虏从山区部落捉来，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殖民时期。实
85 际上，这很可能是柬埔寨社会长期自我构筑的发展之路，逐渐将“野蛮人”吸收和同化，这些“野蛮人”的形象曾大量出现在吴哥碑文中。《真腊风土记》记载，一些禁令将奴隶同其他人分开，他们只能在房屋底层坐卧。工作时虽然能够上楼，但必须下跪，双手合十拜倒，然后才能向前移动。奴隶不能享受公民权利，他们的婚姻甚至不能得到国家承认。他们被迫称呼主人为“父亲”，称呼女主人为“母亲”；他们经常试图逃跑，若被抓回，就被黥面，断手足，上镣铐。[①]

尽管周达观了解宫廷人员和奴隶的情况，但他对13世纪90年代既不属被奴役者、也不属上层分子的社会阶层，并不清楚。很显然，拥有“几个”奴隶的人就属于这一阶层；还有小土地所有者——M. C. 里克莱夫斯（M. C. Ricklefs）在一篇早期文章中对此曾有所探讨[②]），以及从事当地及国际贸易的具有中国血统的柬埔寨人也属于这一阶层。上层分子和宗教阶层享有特权，奴隶则受到各种禁令的限制，而处于两者之间那些人——实际上是他们创造了王国繁荣景象——我们所知道的要比想要知道的少很多。

当周达观进行详细记载时，《真腊风土记》就写得非常明了。他关于发生在11月底的称之为新年节日的记载，就是他记述技巧的一个很好例子：

当国宫之前缚一大棚，上可容千余人，尽挂灯球花朵之属。其对岸远离二十丈地，则以木接续，缚成高棚，如造塔扑竿之状，

① 有意思的是，尽管柬埔寨古典文学作品几乎都没有提到奴隶，但是一个流行的民间故事却叙述了一个机智勇敢的奴隶——Thmenh Chey 的故事，他的智慧超过他遇见的每一个人，包括中国皇帝。见 Pierre Bitard（tr.），*La Mervedleuse bistoire de Tbmenb Cbey l'astucieux*（Saigon，19.56）。

② M. C. Ricklefs，“Land and Law in the Epigraphy of Tenth Century Cambodia”，*JAS*，Vol. 26，No. 3（May 1967）：411－20.

> 可高二十余丈，每夜设三四座或五六座，装烟火爆仗于其上，此皆诸属郡及诸府第认直。遇夜则请国主出观，点放烟火爆仗，烟火虽百里之外皆见之，爆仗其大如炮，声震一城。[《真腊风土 86
> 记·正朔时序》——译者]

周达观可能目睹过的这一庆典，似乎是在雨季的末期举行，当时洞里萨湖水位开始下降，农事活动开始了。15世纪首都迁到金边以后，节日庆典变成著名的水节，同样有放烟火、扎浮筏和王室参加（直到1970年君主制被推翻）等内容。1993年，这一节日随着君主制一起复兴。

在农业方面，周达观注意到稻子一年收获三次甚至四次——民主柬埔寨据此统计致力于生产革命化。一年收获这么多次在全国是不可能的，吴哥地区之所以能收获几次可能是由于该地区人力资源集中、土地肥沃以及历经几百年而日臻完善的水利储蓄体系。另外的因素是洞里萨湖的特殊帮助。《真腊风土记》关于农业周期同降水之间的关系是这样记载的：

> 其地半年有雨，半年绝无。自四月至九月，每日下雨，午后方下。淡水洋中（即洞里萨湖——译者），水痕高可七八丈，巨树尽没，仅留一杪耳。人家滨水而居者，皆移入山。后十月至三月，点雨绝无，洋中仅可通小舟，深处不过三五尺。[《真腊风土记·耕种》——译者]

洞里萨湖的“奇迹”使很多后来到吴哥的旅行者惊异。由于洪水消退以后留下的淤泥含有丰富的养分，因此这个地区能养活大量人口。甚至在吴哥被放弃以后，洞里萨湖仍然是世界上最丰富的鱼库，给世世代代的柬埔寨人民提供丰富的蛋白质。

我们很高兴能从周达观这里搞清楚这个时期农业耕作的情况。例 87
如，盈余的稻米如何处理？耕作者大部分是自由人还是奴隶？吴哥地

区的农业明显地与王国其他地区不同吗？王室成员有多少土地，寺庙控制多少土地？这种控制暗示着什么？

由于我们没有这些问题的答案，我们必须感谢周达观给我们提供的材料。例如，他关于农村市场的记载，仍然在今天的柬埔寨容易见到：

> 国人交易，皆妇人能之。……每日一圩，自卯至午即罢。无居铺，但以蓬席之类铺于地间，各有处。闻亦有纳官司赁地钱。[《真腊风土记·贸易》——译者]

关于柬埔寨同中国的贸易，当时似乎已经有很多中国人住在柬埔寨经营商业。根据周达观的记载，13 世纪柬埔寨出口商品是那些从扶南时代起即开始出口的东西，像犀牛角、象牙、蜂蜡、真漆、胡椒和豆蔻等这样价值高产量低的产品，直到 20 世纪它们仍是柬埔寨出口的大宗货物。进口物品包括纸张、金属制品、瓷器、丝绸和柳条编制品。《真腊风土记》没有告诉我们商品如何付款，但似乎不可能有政府发行流通的货币。周达观对他造访时的吴哥国王（因陀罗跋摩三世，1296—1308 年在位）印象深刻。周达观以奇妙的笔法记述了国王如何登上王位：

> 新主乃故国主之婿，原以典兵为职，其妇翁爱女。女密窃金
> 88 剑，以往其夫，以故亲子不得承袭。……新主身嵌圣铁，纵使刀箭之属着体，不能为害，因恃此遂敢出户。[《<真腊风土记·国主出入》——译者]

这些事发生在中国使团达到之前，因陀罗跋摩在位时期的一些碑文对此有所提及。其中一块提到阇耶跋摩八世的“旧时代”和王国内部的“一群敌人”。另一块碑文提到因陀罗跋摩要用自己这一把伞为国家遮风挡雨（借用阇耶跋摩七世一块碑文中的说法），而以前虽然

有“一群（这样的）伞”，却得不到任何保护。[①]

实际上，王位从阇耶跋摩八世向因陀罗跋摩三世的转移在柬埔寨历史上可能是一次急剧的变化，尽管我们从《真腊风土记》中没有得到什么信息。在阇耶跋摩八世统治的1285年，修建了吴哥时期最后一座石寺——孟加拉得寺（Mangalartha）。该寺是由一名高官修建，用于献祭湿婆；上面碑文中提到的“这一把伞”或许就指阇耶跋摩不容印度教。我们知道因陀罗跋摩三世非常小心，既支持婆罗门教，也支持上座部佛教，试图在他非暴力的政变中利用各种宗教的力量。

像《真腊风土记》中其他内容的记载一样，把有关国王出行队列的记载同殖民时代的记载相比较，会非常有趣。[②] 将当时的出行队列同西哈努克的加冕礼队列或20世纪还有记载的其他各种队列仪式加以比较，我们很清楚地看到，从吴哥时代到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柬埔寨人在这样隆重仪式中的礼仪和等级安排没有多少变化。《真腊风土记》是这样记载的：

> 凡出时诸军马拥其前，旗帜鼓乐踵其后。宫女三五百，花布花髻，手执巨烛，自成一队，虽白日亦照烛。又有宫女，皆执内中金银器皿及文饰之具……又有宫女，执标枪标牌为内兵……又 89
> 有羊车、马车，皆以金为饰。其诸臣僚国戚，皆骑象在前。远望红凉伞，不计其数。……其后则是国主，立于象上，手持宝剑。象之牙亦以金套之。打销金白凉伞，凡二十余柄，其伞柄皆金为之。[《〈真腊风土记·国主出入》——译者]

周达观描绘了因陀罗跋摩在白天举行的接见仪式，并傲慢地以下面的话来结束自己的记载：“以此观之，则虽蛮貊之邦，未尝不知有君也。”

---

① L. Finot and V. Goloubew, *Le Temple d'Içvarapura* (Paris, 1926), p. 83.

② L. Finot, “Temple de Mangalatha à Angkor Thom”, *BEFEO*, Vol. 25 (1925): 393 – 406; C. Jacques, “Les Derniers siècles d'Angkor”; Jacques,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Khmer Culture”, 载 Clark and Vickery (eds.), *The Bayon*。

第 5 章　吴哥之后的柬埔寨

91 从周达观访问吴哥到 16 世纪五六十年代安赞国王（Chan）修复一些吴哥寺庙，可能是柬埔寨历史上记载最少的时期。这期间的几个世纪见证了柬埔寨在经济、对外关系、语言，可能还有（尽管这些更难证实）社会结构、价值和行为方面重要的永久性的变化。有关这些转变的证据可以追溯到那个时期本身，不过，非常有限。大约 1550 年前后，证据材料才不断增多且更加可信，但很多变化早已发生了。

这段历史的早期证据资料主要来自中国人的文献，因为从 14 世纪中期到 16 世纪初期柬埔寨王国几乎没有碑铭留下来。实际上，超过 1000 块碑文是在 1300 年之前的年份里编录的，而另外不到 100 块碑文刻于此后的几个世纪。其他资料包括一块占文碑铭和一些来自泰国的碑铭，而写于 17 世纪的泰国编年史（其中一本还有些支离破碎）记载了这个时期柬埔寨政治和社会事件的一些确切信息。记载这段历史的柬埔寨编年史似乎是吸收的民间传说和泰国的编年史传统，无法从其他资料中得到证实。[①]

① 关于这一时期泰国和柬埔寨编年史的讨论参见 Michael Vickery, *Cambodia and Its Neighbors in the 15th Century*，以及 M. Vickery, "The Composition and Transmission of Ayudhya and Cambodian Chronicles"，载 Anthony Reid and David Marr (eds.), *Perceptions of the Past in Southeast Asia* (Singapore, 1979), pp. 130 - 54。

从吴哥到金边的迁移

中国人提供的证据是重要的，正如迈克尔·维克里和奥利弗·沃 92
尔特斯令人信服地指出，十四五世纪柬埔寨地理和行政重心向南转移，可能跟元朝和明朝初期中国同东南亚的海上贸易迅速扩张有关。从1371年到1432年，有21个朝贡使团被柬埔寨派往中国明朝——似乎比整个吴哥时期还要多——尽管其中一些纯粹是礼仪性的访问，但他们似乎主要是为贸易或安排贸易或许还有请求中国支持反抗泰人的掠夺而来。使团的数量和受到中国的敬重程度，不仅表明这个时期的柬埔寨仍然充满活力和强大，而且表明柬埔寨上层已很少受宗教机构和婆罗门官僚礼仪上的严格约束，他们热切开拓同中国的商业往来。我们无法弄清思想上和行动上如何及为什么发生这种转变，但一些学者坚持认为这一转变不应该跟“衰落”相联系，用沃尔特斯的话说，“或许是我们变得太乐于把十四五世纪吴哥的衰落看作一场大灾难”。[①]其实，这一时期柬埔寨的统治者，还是有能力同新兴和繁荣的西方邻国阿瑜陀耶争夺资源和贸易的。最近的研究显示，吴哥地区仍然人口密集，一些建筑也是在这些年得以修复。柬埔寨人让中国人相信他们仍然有重要价值，并在17世纪偶尔能够攻击阿瑜陀耶或在战争中打败泰国。

在柬埔寨重心转移的过程中没有伴随出现预料中的“吴哥式”举
动（例如建筑石寺、雕刻碑文以及扩建灌溉工程），因而有些作者经 93
常认为这些地方“衰落”或“崩溃”，或许用“变化”或“转型”更为合适。“衰落”一词一则不能解释柬埔寨的持续强大；二则，这个词暗示，举例来说，阇耶跋摩七世是一位在某些方面比周达观所观察

---

① O. W. Wolters, “The Khmer King at Basan”, *Asia Major*, Vol. 12, No. 1 (1966): 86. 关于同中国人的关系见 Wang Gungwu,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1402 - 1424”, 载其著作 *Community and Nation* (Singapore, 1981), pp. 58 - 80。14世纪同中国之间的贸易额很大，例如，1387年，柬埔寨向中国出口59头大象和6万斤熏香。还见 Michael Vickery, *Cambodia and its Neighbors in the 15th Century* (Singapore, 2004), 特别是 pp. 9 - 10, 25 - 16, 42 - 50。

到的那位上座部佛教君主更加真实的柬埔寨国王。某些作者把王室放弃吴哥城——这一历史事件可能在16世纪60年代之前不曾发生——同国家中枢的失败和人口的严重流失联系起来。这一观点认为，这些损失使得维持吴哥的灌溉体系成为不可能，而成为死水的水源又滋生蚊子传播疟疾，在这种恶性循环中人口进一步减少。仍然有其他人认为上座部佛教在振兴阿瑜陀耶和缅甸蒲甘（Pagan）政治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却破坏了吴哥的凝聚力；他们把柬埔寨的战败归咎于这一新宗教的“和平”天性，而无法解释柬埔寨人的胜利，也不能解释泰国人的胜利，他们也持相同的信仰。

证据表明，在完全放弃吴哥之前，柬埔寨正进入阿什利·汤姆森称之为的中期阶段。吴哥的制度——碑铭、石寺、以印度教为指导的王室家族以及大规模水利灌溉，且说这4种传统——似乎在柬埔寨上层和广大群众改信上座部佛教后不久就停止、消失，或者改头换面，此事可能发生在阇耶跋摩七世死后不久。如果认为这些社会变化只是或主要源于新宗教的思想内容，这是一种不成熟的看法。很可能的是，这些变化同西边上座部佛教王国阿瑜陀耶的崛起以及一直持续到19世纪60年代的暹罗同柬埔寨朝廷之间的纠纷有关。人口、思想、典籍和制度都从吴哥向阿瑜陀耶西移，在那里经过改造，然后重新输入到柬埔寨，一直延存到18世纪以后真正衰落。移民中有战俘，包括整个家族成员，在泰人接连入侵吴哥后被掳到西边，其中最重要的一次入侵
94 可能发生在1431年。与此同时，其他人和制度机构也向南面迁移至金边邻近地区，此后六百年金边一直是柬埔寨首都。[1]

金边之所以适宜作为柬埔寨都城，主要是因为它位于湄公河和洞里萨湖的汇合处。在此位置上建立起的要塞城市——“四面”城——

① Michael Vickery, “The 2/k 125 Fragment: A Lost Chronicle of Ayudhya”, *JSS*, Vol. 65, No. 1 (January 1977): 1 – 80. 又见 Vickery, *Cambodia After Angkor: The Chronicular Evidence for the Fourteenth to Sixteenth Centuries* (Ann Arbor, Mich., 1977), pp. 500ff; A. Thompson, “Changing Perspectives: Cambodia After Angkor”, 载 Helen Ibbetson Jessup and Thierry Zephir (eds.), *Sculpture of Angkor and Ancient Cambodia: Millennium of Glory* (New York, 1997), passim。又见 Victor Lieberman, *Strange Parallels* (Cambridge, 2003), 特别是 pp. 236 – 42。

能够控制从老挝来的河上贸易，也能控制从洞里萨湖来的陶器、干鱼、鱼酱贸易，更不用说主要原产自中国的货物经仍有大量高棉人居住的湄公河三角洲运到柬埔寨。一旦做出成为贸易王国的选择——很难说出这是在什么时候、如何和为何发生的——定都金边具有经济意义。

迁都也可能象征着地区利益和某一霸主利益的暂时胜利，后来又被合法化和长期化，它是以逗留在吴哥附近的居民的利益为代价，或者是从西面湄南河盆地积聚力量。这些柬埔寨东南部的上层人士——他们代表的是地区首领及其追随者的利益，而不是单个或整体稻农的利益——他们的考虑可能是利用远离阿瑜陀耶的优势以便于同中国进行贸易。他们也可能依靠长期以来盘踞这个地区的领主的支持，这里是扶南的心脏地带，而在吴哥的文书里可能是经常被忽略了的一个地方。

然而这些都是推测。似乎更能确定的是一则关于金边建立的神话（说一位老妇人发现一尊佛像奇迹般地顺流而下）是在金边建立之后编造的。现代高棉语中保留着对金边的另一称呼 Chatomuk（“四面”城），名字中暗示它的位置在两河交叉处，这是对巴戎寺图像有趣的呼应。[①]

那些精于贸易的外国人在这个新城市里发挥着什么作用，我们很难评价，但有影响的人物当中可能包括来自占婆和印尼群岛的说马来语的人，他们给柬埔寨语言留下了诸如“磅”（*kompong*，意为“登陆 95
地”）和“菩萨”（*psar*，意为“市场”）这样的词汇，还有若干官职名称和行政术语。马来人的遗产影响远比这深远，需要进一步探索，因为17世纪欧洲人对处在河流两岸的柬埔寨及其政治组织方式的描

---

① G. Coedes, “La Fondation du Phnom Penh”, *BEFEO*, Vol. 13, No. 3 (1913): 6 – 11. 这一具有重要商业价值的地区，很早就有人定居。见 Olivier de Bernon, “Le plus ancien edifice subsistant du Phnom Penh: une tour angkorienne sise dans l’enceinte du Vatt Unalom”, *BEFEO* 88 (2001): 249 – 60。有关金边附近发现的吴哥前的碑铭，见 Vickery, *Society*, *Economics and Politics*, pp. 153, 295, 360。还见 Ashley Thompson, “Lost and Found: The Four Faced Buddha, and the Seat of Power in Middle Cambodia”, *Southeast Asian Archaeology* 1998 (Hull, 2000), pp. 245 – 64。

述，与对同时代及以后的处于河流两岸的马来亚的描述十分相似。[①] 此时活跃于金边的其余外国人就是中国人，他们早在13世纪就在吴哥从事贸易；在16世纪40年代，有3000中国人在金边。似乎很可能，中国和马来商人以及他们的后代同柬埔寨上层社会通婚，正如他们此后继续做的那样，加强了国王及其近臣同商业利益之间的关系。

吴哥时期建立在沉重赋税、强制劳役和祭祀种姓优越地位之上的社会组织、官僚机构和经济上的优先考虑，似乎到15世纪后期，变得不再强大或相关。新的组织形式、新的处理问题的模式和一定程度上基于对外贸易的新的优先考虑内容，变得可行并有吸引力。

我们已经点出这一时期柬埔寨经历变化的一些原因。另一个导致变化的因素或许可以称为效仿，它既影响到金边（以及附近的其他都城），也影响阿瑜陀耶。这些都是新建的贸易王国，它们尊重吴哥的观念，但可能也有些警惕。到15世纪初，阿瑜陀耶和这些柬埔寨城市从彼此身上、而不是从昔日婆罗门那里寻找榜样。况且，直到16世纪末，金边（或者罗斛或者乌东）和阿瑜陀耶都认为他们不是分立的政治实体，而是一种混合文化的一员。这种混合文化包括源于吴哥的印度教王权元素和可能源于孟族（Mon）建立的陀罗钵地王国（Dvaravati，信奉上座部佛教有近一千年的历史）的上座部佛教君主制，以及包括源于泰人先民和中国南部山地部族的村落家长式领导遗风。在整个14世纪和15世纪大部分时间里，两个王国可能都把高棉语作为官
96 方语言。在两个社会里，佛教僧伽或僧院教规至少可以影响到较低层的普通人民那里。通过战争、移民、共同宗教信仰进行交流接触，新建立的泰人和高棉人王国互相融合，并且从各自祖先开始向不同方向发展。

这种交汇融合很少是和平进行的。两个王国都根据控制的人力而不是领土或资源来评估政治实力，都把这种实力（和纳贡支出）视为

① 见 M. M. Gullick, *Indigenous Political Systems of Western Malaya* (London, 1958), 特别是 pp. 125–43。

国王功绩和威严的证据。泰人在很大程度上会通过高棉背叛者和战俘向高棉人学习，反之亦然。14 世纪至 15 世纪之间，柬埔寨人和泰人之间频繁爆发战争，基本是在湄公河西边开战。经过军队的反复入侵和撤退，这个地区饱受战争蹂躏。侵略通常发生在被侵略地区变弱的时候。例如，在 16 世纪 70 年代，一支缅甸军队洗劫阿瑜陀耶后，一些柬埔寨远征军也发起对暹罗的进攻。入侵路线沿洞里萨湖边缘进行，很可能就是这一情况造成耶输陀罗补罗不再适合大量平民居住。

十五六世纪的柬埔寨

我们掌握的 15 世纪和 16 世纪的柬埔寨史料很少，所以只能简单地介绍这一时期的历史。接近 15 世纪中期的时候，泰国操纵的吴哥地区政府似乎被忠于金边的军队所推翻。此事可能发生在泰国最后一次攻占这一旧都城 20 年之后。在这段时期有好几任国王在金边执政，编年史中记载的他们的名字和在位时间可能是虚构的。

编年史暗示，到 15 世纪末，当新的统治者们恢复和建立他们同阿瑜陀耶以及那些势力扎根于东南省份的官僚或首领之间关系的时候，爆发了冲突。编年史记载，其中部分军队是由一名以前的奴隶领导， 97
而在此后的欧洲人的著作中，这个新国王实际上是被他废黜的前国王的亲戚。[①] 对后来发生的事情更为重要的是，被废黜的安赞国王在带兵回国推翻篡位者之前，曾到阿瑜陀耶避难。他在泰国人的拥护下复位，为后来很多柬埔寨国王开了先例。

安赞是被来自柬埔寨东部地区的军队所推翻的。从 17 世纪 20 年代以后，这些持不同政见的地区经常倚重越南人的支持。据高棉编年史记载，17 世纪 30 年代一名柬埔寨国王娶了一位越南公主，并允许越南政府在湄公河三角洲设立关卡，后来大批高棉人在此定居，但是

① Vickery, "The 2/k 125 Fragment", pp. 60 - 62.

该地已经不受柬埔寨行政管辖。[①] 在此后200年里，越南移民涌入这一地区，也就是现在很多高棉人所称的低柬埔寨或南柬埔寨（Kampuchea Krom）。1953年柬埔寨获得独立的时候，大约40万柬埔寨人仍然居住在南越，周围是他们十倍之多的越南人。高棉居民形成一种独特文化，20世纪的很多柬埔寨政治领导人都是在此出生长大的，包括宋先（Son Sen）、宋双（Son Sann）、英萨利（Ieng Sary）和山玉成（Son Ngoc Thanh）。在柬埔寨西边和东边出现两个敌对的保护势力，开启了泰人和越南人对柬埔寨朝廷影响力的拉锯，在地方各省中也形成亲泰和亲越两派。这种派系主义从17世纪80年代起就很严重，[②] 一直持续到19世纪60年代，在民主柬埔寨时期再次复活，当时波尔布特及其同伙指责东部大区的干部有着“柬埔寨人的身体但是越南人的思想”。[③]

第一个提到柬埔寨的欧洲人可能是托姆·皮雷斯（Tome Pires），他的著作《东方的苏玛》（*Suma Oriental*）写于1512—1515年间。他把柬埔寨描写成一个好战的王国，其统治者“不服从任何人”。皮雷斯暗示该国物产富饶。[④] 然而，他只是依靠传闻写成此书。第一个亲眼所见的记述是葡萄牙传教士加斯帕·达·克鲁兹（Gaspar da Cruz）。他在1556年安赞国王在位末期访问洛韦（Lovek），大约一年后就离开了，他对自己不能转变当地人的信仰非常失望，他把自己的失败归咎
98 为当地人的迷信和对佛教僧侣的忠诚。其实，柬埔寨人的团结一致给克鲁兹留下深刻的印象，他用很有趣的一节文字记载他们：

---

① 维克里怀疑这一故事（已经被收入高棉民俗学中）是一个传说。见他对 Mak Phoeun 的 *Histoire du Cambodge de la fin du XVIe siècle au debut de XVIIIe* 一书的评论，载 *BEFEO* 83（1996）：405－15。

② 见 Yoneo Ishii（ed. and tr.），*The Junk Trade from Southeast Asia：Translations from the Tosen Fusetsu－gaki* 1674－1723（Singapore，1998），pp. 153－93，特别是 P. 166。Ishii 的资料表明19世纪之前的柬埔寨是一只“双头鸟”，既向现在的泰国也向越南献敬意，而“双头鸟”这个词出现在现代文档中。

③ 见本书第12章。

④ 见 B. P. Groslier，*Le Cambodge au XVIe siècle*（Paris，1958），pp. 142－44。

> 没有国王的认可他们不敢做任何事情，也不敢接受任何新东西，这就是为什么没有国王的批准任何人都不敢皈依基督教的原因。如果我们某些读者说人们可以瞒着国王改变自己的信仰，对此我要说该国人民的本性就是不做国王所不知道的事；任何能跟国王讲话的人都不是等闲之辈，他们都设法寻找讯息送给国王，以便得到机会同他说话；没有国王的良好愿望则将一事无成。

他认为，在健全的柬埔寨人中，僧伽占1/3以上（据他估计，有数十万人之多），这是具有明显政治和经济意义的事实。这些僧侣获得百姓的很高忠诚。克鲁兹发现他们是：

> 极度的傲慢和自负……他们终生崇拜众神，地位卑下者将地位显赫者像神那样崇拜，向他们祷告并拜倒在他们面前；普通人非常信赖他们，对他们报以极大的尊敬和崇拜；这样，没有人敢于违抗他们……有时当我布道的时候，很多人围在我身边专心听讲，对我所讲的很满意，如果有僧人走来说："你所讲的很好，但我们的比你的更好。"他们就会全部离开，只剩下我自己。①

克鲁兹记载的不存在财富继承的事情是一个王权干涉日常生活的生动例子。克鲁兹写道，当一座房屋的所有者死去的时候，"屋内所有财产归还国王，原主人的妻子和孩子藏下他们所能藏的，并且开始寻找新的生活。"换句话说，人民在国王高兴的时候才会掌握财产、等级、土地和社会地位。这个残余的绝对权力似乎赋予摇摇欲坠的君 99
主制度强大力量，以面对精英阶层。克鲁兹所记载的这种安排的一个后果是，至少在理论上，富裕家庭不可能组成长久的反君主联盟；国王的反应（在某时剥夺一代人的财产）说明国王不信任精英阶层。

---

① 本段和前面一段引自 C. R. Boxer (ed.), *South Chin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London, 1953), p. 63。中国贸易引自 Ishii, *The Junk Trade*, p. 32，该书引用17世纪80年代一名中国商人的笔记："这个地方物产并不丰富，百姓并不安分，能够获得的产品有限。"

克鲁兹没有提及吴哥，尽管后来一位葡萄牙作者迪哥·多·库托（Diego do Couto）于1599年报告说，大约40年前（1550年或1551年）柬埔寨一位国王骑象打猎，经过一个废墟时被绊倒。这个故事没有得到其他资料的证实，但是16世纪60年代几块标有日期的碑铭在吴哥出现，说明重新发现的日期也许是准确的，尽管也许是在一次军事行动而不是打猎的时候发现的，因为吴哥地区是准备入侵暹罗的柬埔寨军队合乎逻辑的集结地。

库托写道，当国王得知废墟存在的时候：

> 他来到那个地方，看见了外墙的范围和高度，也想考察内墙，当即命令人们砍去和烧掉灌木丛。其间他仍然待在那里，住在一条美丽的河流旁边，当时有五六千人，劳动了好几天才完成……当一切都小心收拾干净以后，国王走进去……他对这些建筑的巨大规模惊羡不已。[1]

他补充说，国王随后决定将其宫廷迁往吴哥。吴哥寺的两块碑铭显示，1577—1578年间在王室的资助下，寺庙得到了部分修复。这两块碑铭，加上1583年刻在巴肯山的另外两块，歌颂国王的小儿子，国王为了博得这个儿子的好感而在1584年退位，此事可能延迟了他那野心勃勃且更受支持的兄弟发动的政变。[2] 事实上，这些言词相同的记载战争的巴肯山碑铭，也许通过描述国王希望不再受"王室敌人"侵
100 扰来暗指这次内部争斗。不过，它同样有可能是指在16世纪70年代

---

① Groslier, *Le Cambodge au XVIe siècle*, p. 69. 又见 J. Dumarçay, "Le Prasat prei près d'Angkor Wat", *BEFEO*, Vol. 59 (1970): 189 – 92; G. Coedes, "La Date d'exécution des deux bas – reliefs tardifs d'Angkor Wat", *JA*, Vol. 250 (1962): 235 – 43。还见 Saveros Lewitz, "Les inscriptions modernes d'Angkor Vat", *JA* (1972): 107 – 29。又见 Jacques Dumarcay, *The Site of Angkor* (Oxford, 1995), p. 64, 认为吴哥其他三个寺庙——Angkor – Bakheng, the Bapuon, and Banteai Kdei——也在这一时期出现根本的改变

② Khin Sok, "Deux inscriptions tardifs du Phnom Bakheng", *BEFEO*, Vol. 65, No. 1 (1978): 271 – 80. 还见 S. Pou, "Inscription du Phnom Bakheng", 载 Pou (ed.), *Nouvelles inscriptions du Cambodge* (Paris, 1989), pp. 20 – 27。

柬埔寨上层阶级一直与泰国王室的争斗。

确实，尽管如克鲁兹所注意到的，这一时期在思想上高度的一致，而且几块碑文也反映出此时佛教进入全盛时期，但 1560—1590 年间柬埔寨仍然处于一个混乱时期，在这期间柬埔寨军队乘泰国虚弱（部分是由于 1569 年缅甸人洗劫阿瑜陀耶造成的），多次进攻泰国领土。照欧洲人看来，柬埔寨国王被国内和国外双重威胁所困扰，改变了他对天主教传教士的态度。他们允许天主教传教士传教并赠送大米给新殖民的中心马六甲和马尼拉，以换取军事帮助的承诺（实际上从没得到）。早些时候，国王显然曾试图寻求同泰国人的联盟，或至少签订互不侵犯条约。

在对外关系方面一连串前后矛盾的做法说明朝廷的不稳定性，这表现在国王经常搬迁、过早退位以及他不愿意或者无力去维持同泰人的和平。1587 年泰人对洛韦的围攻并不成功，柬埔寨东南部出土的一块碑文确定了此事的日期。[①] 如果将随后柬埔寨的外交策略作为参照，那么 16 世纪的迁移很可能是国王面对来自阿瑜陀耶和北面意外崛起的老挝的威胁，试图维持权力的一种策略，尽管当时还有装备精良、更孚众望的亲属支持。

1593 年，泰人准备发动对洛韦的新的军事行动，这迫使柬埔寨国王向海外求援。他请求西班牙驻菲律宾总督给予援助，甚至许诺如果能得到足够的援助可以皈依基督教。然而，在这封信生效之前，国王和他的小儿子已经向北逃往老挝南部，另一个儿子负责洛韦防御。1594 年洛韦陷落。

虽然 17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柬埔寨军事力量经常像泰国一样强大，此时的欧洲商人对柬埔寨的兴趣也几乎像他们对阿瑜陀耶的兴趣那么强烈，但泰国和柬埔寨史书和柬埔寨传说仍然全都把泰国占领洛韦解释为柬埔寨历史的转折点，开始了柬埔寨走向衰弱和泰国间隙性

---

① Khin Sok, "L'Inscription de Vatta Romlock", *BEFEO*, Vol. 67 (1980): 125 – 31, and Saveros Pou, "Inscription du Vat Romlok", *BEFEO*, Vol. 70 (1981): 126 – 30.

101 霸权的几个世纪。欧洲资料记载的情况与之相比有些细微差别，但也坚定相信在界限模糊的边境地区曾发生过一场使柬埔寨遭受创伤的事件。

广为流传的波列科波列卡埃弗（*preah ko preah kaev*）传说曾在19世纪60年代由一位法国学者第一次零散公开。该传说对了解这一点很有帮助，并且值得详细研究。[①] 根据传说，洛韦城寨非常大，以至于没有马能够环绕跑一周。里面有两座雕像：波列科（神牛）和波列卡埃弗（神宝石）。在这些雕像的肚子里依次“有金制的可供人学习各种规则的圣书，还有供人们学习世界其他事物的书籍……现在暹罗国王想得到这些雕像，因此动用军队前去讨伐柬埔寨国王”。

该传说提到的事件在编年史之中也有记载。泰国大炮将银币而不是炮弹，射进用竹栏作城墙的洛韦城。当泰人撤退的时候，柬埔寨人砍倒竹栏获取银币，因此，当第二年泰人再回来攻打洛韦的时候，洛韦已经没有防御工事。泰人获胜后把雕像运回暹罗。传说告诉我们，打开雕像肚子之后：

> 他们拿到藏在肚子里的书并学习其内容。正因为此［再次强调］他们在知识上已经超过柬埔寨人，也正因为此柬埔寨人则变得无知，并且与其他国家不同，柬埔寨缺乏去做必须要做的事的人才。

虽然传说主要是说洛韦的攻陷，但事实上与吴哥长期的崩溃有关，

---

① 见 G. Janneau, *Manuel pratique pour le cambodgien* (Saigon, 1876), pp. 87 – 88; Eveline Poree – Maspero, *Etude sur les rites agraires des cambodgiens*, 3 vols., (Paris, 1962 – 69), p. 111。1971 年，柬埔寨国家领导人朗诺向美国大使讲述这一传说，以此解释柬埔寨同其虚弱不堪的邻国相比具有的优越性。见 David Chandler, *The Tragedy of Cambodian History: Politics, War, and Revolution Since* 1945 (New Haven, 1991), p. 213。有关这一传说更为生动的讲述，见 Ang Choulean, “Nandin and His Avatars”, 载 Jessup and Zephir, *Sculpture of Angkor and Ancient Cambodia*, pp. 62 – 70。2005 年这一神话重新兴起。见 Alexandra Kent 与 David Chandler 主编的 *People of Virtue: Reconfiguring Religion, Power and Moral Order in Cambodia Today* (Copenhagen, 2007) 一书中 Alexandra Kent 写的章节。

可能也与19世纪暹罗与柬埔寨之间的关系演变有关，该传说正是在此时期的历史记载中出现的。学者更倾向于认为吴哥早期的崩溃是该传说的渊源，这种看法可能是因为传说中的隐喻与我们所知的史实不谋而合，也就是从阇耶跋摩七世去世到15世纪泰人入侵这段时期，柬埔 102
寨王权的象征之物、文件、习俗以及博学的人从吴哥转移到阿瑜陀耶。波列科雕像隐喻为柬埔寨继承的印度遗产，显然是象征着难丁（Nandin），也就是湿婆神山。而描述得没那么准确的波列卡埃弗雕像是佛教正统性的隐喻，包含着一尊佛像，像是19世纪20年代泰国人从万象带来供奉于曼谷同名寺庙中的那尊佛像；一个复制品现在供奉于金边的Silver Pagoda。文学技巧从柬埔寨向暹罗的渗透和17世纪以后泰国势力的增强，都是传说的组成部分，就像第4章所讨论的患有麻风病的国王的传说一样，可能包含着对真正所发生的事的群体性记忆，这些记忆在隐喻的暗示中若隐若现。柬埔寨学者安周林（Ang Choulean）在谈到这个传说时，称它为“一部分是历史，大部分是传说，重要的是总体上这个传说是连贯的”。[①]

换句话说，很多柬埔寨人可能用这个神话来解释柬埔寨相对于泰国的衰落，也就是传说中柬埔寨人不值得称道的行为（贪图银币）以及以前的力量源泉被泰人抢走。

16世纪最后几年的历史，也就是洛韦城被攻陷的时候，欧洲文献中有详细的记载。这几年发生的一个重要事件就是西班牙帝国主义分子在菲律宾指挥向柬埔寨扩张，这次扩张很大程度上是由布拉斯·鲁伊斯（Blas Ruiz）和迪戈·迪·维洛索（Diego de Veloso）两个冒险家策划的。[②] 他们的开拓经历在柬埔寨历史中具有三方面的重要意义。第一，国王倾向于讨好仿佛是来自外太空的西方造访者，对其封官许愿。这两个西班牙人都被柬埔寨政府授予官衔和一省的管理权，并且

---

① Ang Choulean, “Nandin and His Avatars”.

② 见A. Cabaton (ed. and tr.), *Brève et véridique relation des évènements du Cambodge par Gabriel Quiroga de San Antonio* (Paris, 1941)。还见L. P. Briggs, “Spanish Intervention in Cambodia”, *T'oung Pao* (1949), pp. 132-60。

赐公主为妻。第二，火器的引入，特别是后来在历次柬埔寨战争中发挥主要作用的海战炮，带来了战争的革命。因为掌握新技术，鲁伊斯和维洛索可以像他们的同时代人在西班牙的美洲殖民地所做的那样，恐吓当地居民，而当时他们的随从还不到 100 人。

第三个意义是到 16 世纪末，柬埔寨国王及其朝臣已经卷入外部世
103 界，其标志是在洛韦和金边有大量外国商人居民。欧洲作者强调这些外国商人及洛韦的外国人居住区的重要性。这些居住区包括各自聚居的中国人区、日本人区、阿拉伯人区、西班牙人区、葡萄牙人区以及来自印尼群岛的商人住区，17 世纪荷兰和英国的商人曾短暂加入这一行列。[①] 商人们通过国王的近臣、王室成员及其同胞做生意。根据荷兰的资料，17 世纪柬埔寨政府要求外国商人住在新都城乌东的特定区域里，这些地区是专门为他们而留的，并规定只能通过指定的代表（shabandar）同柬埔寨政府打交道。这样的模式或许源于中国，暹罗也曾使用。这种情况出现在柬埔寨深度衰落时期的洛韦，与其他历史迹象一样，说明柬埔寨王国并没有灭亡。

西班牙传教士圣·安东尼奥（San Antonio）也留有关于 16 世纪最后几年的记载，其中谈及鲁伊斯和维洛索这两个冒险家。他的记述经常有启发性，偶尔还有些滑稽，如他认为吴哥的寺庙是犹太人建的，说明他不相信柬埔寨人有如此高超的技术。[②] 他还确信出于宗教和商业考虑西班牙应对柬埔寨实行殖民统治，这可能促使他夸大柬埔寨资源的价值，如同 19 世纪 60 年代到访的法国人所做的那样。他对柬埔寨繁华的印象基于这样的事实，即陆上交通工具的缺乏限制了外国访问者对柬埔寨的观察，他们只能到金边以北、湄公河沿岸比较富庶和

---

① 见 W. J. M. Buch, "La Compagnie des Indes et l'Indochine", *BEFEO*, Vol. 36 (1936): 97 – 196, Vol. 37 (1937): 121 – 237; D. K. Basset, "The Trade of the English East India Company in Cambodia, 1651 – 1656", *JRAS* (1962): 35 – 62。又见 Jean – Claude Lejosne, "Historiographie du Cambodge aux XVIe et XVIIe siècles: Les Sources portugaises et hollondaises", 载 Pierre L. Lamant (ed.), *Bilan et Perspectives des Etudes Khmeres* (*Langue et Culture*) (Paris, 1997), pp. 179 – 208。

② Cabaton, *Brève et véridique relation*, p. 100.

人口比较稠密的地区。400年后，让·德尔维特（Jean Delvert）研究发现，该地区仍然是柬埔寨最繁荣的地区之一。① 圣·安东尼奥见过的商品包括金、银、宝石、丝绸和棉布、香料、漆、象牙、稻米、水果、象、水牛和犀牛。犀牛之所以名贵，是因为它的角、皮、血和牙是“多种疾病特别是心脏病的慢性解药”，而根据中国人的观点，犀牛的副产品是有效的壮阳药。圣·安东尼奥强调柬埔寨是繁荣的，因为它是进入老挝的门户。当时欧洲人几乎不知道老挝，认为是同南美洲黄金国埃尔多拉多（El Dorado）类似的地方。圣·安东尼奥以一段 104
似乎摘自《汉斯和格里特》（*Hansel and Gretel*）的话来结束他关于柬埔寨繁荣的讨论，这也印证了波列科波列卡埃弗（*preah ko preah Keo*）神话，不过神话中的反面人物发生了改变：“柬埔寨宝物丰富，当［新近］国王逃往老挝的时候，一连好多天沿路撒下金币和银币，造成暹罗人争相捡拾，他才得以逃走。”②

圣·安东尼奥还说到柬埔寨只存在富人和穷人两个阶级：

> 柬埔寨只承认一个国王。在他们当中有贵族和平民……所有的贵族都有好几个妻子，妻子数量取决于其富有的程度。地位高的妇女白皙而美丽，普通妇女肤色棕褐。妇女耕种土地，而丈夫外出打仗……贵族穿丝绸、细棉布或薄纱。贵族出门坐轿，由人肩抬。而普通人出门乘车、骑牛或骑马。他们把从海中和陆上收获所有货物价值的十分之一献给主要官员和国王。

13世纪周达观所记载的拥有奴隶的、不从事商业的“中间”阶级，此时似乎重要性下降，尽管在法典和至少一部编年史中仍然有他

① Jean Delvert, *Le Paysan cambodgien* (The Hague, 1961), 特别是 pp. 371ff, 载 *Cambodia After Angkor*, pp. 513－20。维克里认为吴哥时期的贸易和交流主要靠强征劳役修路、养路。另一方面，在政府迁到柬埔寨南部之后，个人（既有外国人也有当地商人）运营的河道交通把全国联系在一起，也把柬埔寨同外部世界连接起来。维克里在 *Cambodia and its Neighbors* 一书中扩充了这些观点。

② Cabaton, *Brève et véridique relation*, p. 208.

们继续存在的证据。[①] 他们在柬埔寨社会中的地位可能被外国商人及其半城市化的食客所取代，而土著高棉人仍主要是稻农、官吏、僧伽成员和初级产品的收购者。圣·安东尼奥对僧伽的蔑视超过他的好奇。

但是正如柬埔寨历史中经常发生的那样，外国访客的记载中也忽略了稻农。我们只能见到访问者曾经见过的人——国王、精英阶层、外国商人和他们的奴隶。远到磅湛的内陆乡村通过经济关系、税收以及由僧伽的社会活动能力同贸易资本联系起来，而村民仍过着自己的生活。至少这是我们必须想到的，因为如果没有这些人，柬埔寨的王
105 权及其他制度将会枯竭。正如亚原子物理学中的粒子一样，正是这些粒子使原子发生作用，而这些主要角色却是看不到、听不见的。

在17世纪早期，柬埔寨成为一个海洋国家，上层阶级的繁荣仰仗于海上贸易，其中大部分是由欧洲商人、中国人以及来自苏门答腊与苏拉威西的土著马来人从事的。日本人和欧洲访问者（荷兰人、英格兰人和葡萄牙人）留下的有关这一时期的记载非常有价值，因为它们证实和弥补了柬埔寨编年史。上述这些人既卷入柬埔寨朝廷中的派系斗争，他们彼此之间也是尔虞我诈。

17世纪40年代，这段历史差不多达到高潮。当时一位柬埔寨国王娶了一名马来人，并改信伊斯兰教。[②] 这名“选择［不同］宗教的国王”在柬埔寨编年史中非常有名。1642年荷兰海军袭击金边，以为都城内被谋杀的荷兰居民报仇为名，但是被击退。17世纪50年代，争夺王位的王子寻求越南派兵帮助他们推翻这位穆斯林君主，越军在柬埔寨东部地区招兵买马，赶到金边时，实力进一步增强。19世纪和20世纪70年代越南入侵时也效仿了这一模式。经过长期作战，柬埔寨国王被俘，并被用笼子押解到越南。有资料认为他在越南被杀，还

① 见19世纪散文编年史P. 6，载巴黎法国远东学院金边文库。在吴哥发现的一些后吴哥时期的碑文证明上层阶级的持续存在。有关这一时期的进一步讨论，见May Ebihara，“Societal Organization in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y Cambodia”，*JSEAS* 15（1）(September 1984)：280－95。

② 见Carool Kersten，“Cambodia's Muslim King：Khmer and Dutch Sources on the Conversion of Reameathipdei I（1642－1658）”，*JSEAS* 37（1）(February 2006)：1－22。

有资料认为他很快死于疾病。

17世纪剩下的时间见证了柬埔寨国际贸易的衰落。因为越南人和由中国商人（随着清军的到来很多人从中国南方逃至此地）控制的沿海居民扼住了柬埔寨的出海口，新来者便把西贡（今越南胡志明市，下同）变成一个重要的便于贸易的中心，从而使金边成为落后地区，到18世纪时柬埔寨成为欧洲地图上一块黑色的无人区。17世纪90年代，跟日本做贸易的中国商人报道说，柬埔寨已急剧衰落。一名商人这样写道：

> 柬埔寨是一个贫穷的国家，政府和军队都很差。基本上没有富人。他们不生产生丝。他们的主要产品是鹿皮、质量低下的褐糖、漆器……产量都很小。[1]

17世纪柬埔寨的价值观念

认为17世纪的柬埔寨社会与其他时期没有什么区别是错误的。在 106
很多方面，17世纪的柬埔寨社会和19世纪的情况不同。例如，19世纪的柬埔寨已经屈服于外国列强，而17世纪的柬埔寨在大部分时间里仍然有理由说是独立的。19世纪的柬埔寨被两个强国——暹罗和越南孤立于外部世界，它们主宰着柬埔寨的内政；而17世纪的柬埔寨直到80年代还能同很多国家自由贸易。如我们下面将会看到的，柬埔寨版的《罗摩衍那》——《罗摩传》（*Reamker*）以及吴哥寺中的碑文和其他作品中所显露出的精英阶层的文学传统，在17世纪比19世纪更具有活力。

萨弗罗斯·波（Saveros Pou）将这些变化部分归因于泰国的影响，但更深刻的原因是他所说的“从17世纪开始的价值观的缓慢堕落”。[2]在同时阅读《罗摩传》和19世纪80年代编写的拙劣诗体小说之后，

---

① Ishii, *Junk Trade*, p. 123.

② S. Pou, *Etudes sur le Ramakerti* (Paris, 1977), pp. 48-49.

或者将阿代马·勒克累和格雷戈里·米凯利安（Gregory Mikaelian）翻译的17世纪法典同19世纪国王留下的散乱而充满胆怯的文件相比较之后，我们很容易产生同波一样的印象。虽然波所指的价值观念源自精英阶层，她仍将这一衰落看作柬埔寨对传统价值观念集体认可的改变。她反过来将这些价值观念视作同佛教宇宙观（包含在称为“*Trai Phum*”或“三界”的说教性诗篇里）相联系，特别是认为这些价值观念渗入到佛教的口头说教，这些说教含在“法律”（*chbab*）格言集中，直到最近柬埔寨学童仍然要背诵这些格言。换句话说，她把17世纪的柬埔寨看作要遵守诸多法规的国家，这些法规后来被冲淡、滥用或者遗忘。

这些价值观念给人民提供了适宜的行为准则。这个准则很大一部分同某个人的社会地位和同其他人的关系方式有关。当然，每个人兼
107 有好几种地位，比一些人年老同时又比其他人年轻，比一些人富有又比其他人贫穷，比一些人聪明又比其他人愚笨，等等。例如，一位年老的“下等人”也会受到尊敬；年轻僧侣和农民出身的和尚，至少在理论上受到国王的尊敬。况且，在很多情况下，一个人的保护者又受别人的保护。

法律（*chbab*）强调指出几种这类规范化的关系，其中最重要的可能是同父母和同老师的关系。法律规定，这些有权威的人（父母、老师）传达的内容要铭记在心，没有商量余地。老师同学生的关系像柬埔寨传统社会中的很多关系一样，是不平等的。①

教师如同父母，赠予、传教和命令。学生如同小孩，接受、认可和服从。可能除了学生的无知减少以外，在传教过程中没有任何变化；知识从老师（他以前也是学生）一代代传下去。如果其中有很少或者没有进步，我们应该想到殖民化之前的东南亚进步的观念并没有广泛

① 见 Saveros Pou and K. Haksrea, “Liste d'ouvrages de Cpap”, *JA*, Vol. 269 (1981): 467 -83; David Chandler, “Narrative Poems (Chbap) and Pre-Colonial Cambodian Society”, *Facing the Cambodian Past*, pp. 45-60。关于这些诗歌的柬埔寨原文和法文翻译，见 Saveros Pou, *Guirlande de cpap*, 2 vols., (Paris, 1988)。

传播和广为人知。柬埔寨人认为，保持社会的连贯性的应该是合适的人际关系规则以及共同认可的佛教思想。首先是合适的语言和适宜的习惯。高棉语像东南亚很多其他语言一样（爪哇语可能是最好的例子），展示了日常谈话和赞颂发言（例如描述王室或僧侣）中代词运用的不同，很多动词和名词也是如此。除了亲密朋友之间的谈话以外（亲戚之间通常用家庭代词），在传统高棉语中没有可直译为“你”或“我”的代词。用词强调了说话人对听话人的身份和地位。因此，“你”可以表示“升格”或“降格”，像“我”和其他人称代词一样。①

柬埔寨思想家认为宇宙有等级之分，人住在“中间土地”。在很多文化中有这一类似的观念，其必然的结果是，我们在地球上的行为已经在一定程度上由出现在我们“上面”或“下面”的英雄规定好了。对于我们当中习惯于扩展（或分解）指示意义的人来说，这个世界图景让我们感到束缚或者神秘莫测。然而，在像萨弗罗斯·波这样的学者以及写作《罗摩传》（“拉玛的光荣”）这样的诗人看来，这个 108
图景无论是从道德还是从美学角度看，都没有什么可抱怨的。② 也许现世社会人们遇到的危险和思想家们相信来世或者另一完美世界的信仰力量存在着某种关系。《罗摩传》从本质上来说是逃避社会的一个工具，其作者和很多读者还认为这部史诗是了解社会的一个很好工具。

平均主义思想和阶级斗争观念可能侵蚀我们对等级社会的同情，用21世纪的视角（当然它们自身转瞬即逝）看，这似乎毫无意义。我们认为社会或者处于战争或和平的状态，或者同具有不同利益的社

① Clifford Geertz, *The Religion of Java* (New York, 1960), pp. 248－60. 革命时期曾发生消除代词等级的运动；见 John Marston, “Language Reform in Democratic Kampuchea” (M. A. thes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1985)。到2006年，其实在此之前，1970年前的语言等级已经瓦解，尤其是在城市高棉人中。

② 萨弗罗斯·波主编的三卷本的关于 *Ramakerti* 的评论，于1977—1979年在巴黎由法国巴黎远东学院（*BEFEO*）出版。包括一卷柬埔寨原文、一卷法文翻译和一卷评论，即 *Etudes sur le Ramakerti*。又见 Judith Jacob (tr.), *The Reamker* (London, 1987)。在19世纪20年代早期，南越说马来语的人称洞里萨湖为“Lake of Sri Rama”。见 John Crawfurd, *Journal of an Embassy to the Courts of Siam and Cochin－China* (London, 1828, repr. Oxford 1967), p. 466。

会发生碰撞，等等。17 世纪的柬埔寨人全然没有“社会”这个词；“社会”（*sangkum*）一词似乎是在 20 世纪 30 年代通过巴利语（Pali）传入柬埔寨语言和泰国。他们更喜欢从国王和臣民的角度看待自己；从功绩的大小看待自己；或者将自己视为分散在不同时空、享有共同认可的理想（这种理想依次来自农民、普通人、佛教徒）和会说高棉语的人。

进入 17 世纪柬埔寨的思想世界的最佳途径就是阅读史诗《罗摩传》。保留下来的版本仅包括印度原著中的一些事件，其中很多为适应上座部佛教和高棉语做出改动。尽管其人物生活在熟悉的印度婆罗门世界（也是一个半神话王国，距离东南亚似乎很遥远），但他们的行为、语言和理想都和那些聚集起来听这首诗歌或观看舞蹈家、诗人和音乐家表演这首诗的柬埔寨人极为相似。这些很像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画家将古希腊神话以及《圣经》中的人物描画成穿着欧洲人服装的形象。

《罗摩传》的情节很容易概括。王子罗摩（Ream 或 Rama）在即将继承王位的时候被贬黜出走，他在妻子悉多（Sita）和弟弟罗刹曼（Leak /Laksmana）陪伴下进入森林并遇到很多危险，一直到悉多被统治罗刹城（Langka）的邪恶王子罗波耶（Reab/Ravana）带走。在猴
109 王子哈奴曼（Hanuman）的帮助下，罗摩进攻罗刹城，希望夺回自己的妻子，他取得了一系列战斗的胜利。高棉语版的讲述到这里就中断了。只根据故事情节，很难理解《罗摩传》在柬埔寨人中保持那么久的吸引力。语言通常是简练的，而情节的发展偶尔是模糊不清的。其部分原因是流传给我们的只是史诗的一些片断，每个片断适合于模拟演出（带有可以朗诵的段落），还适合于舞蹈家或皮影戏演出。

110 现在，宫廷舞蹈演员经常演出该诗中的情节，而在农村，直到最近还作为村里节日必演的节目。[1] 1969 年在暹粒省记录下一份完全口

① Porée - Maspero, *Etude sur les rites*, Vol. 3, p. 528.

头流传下来的版本，它与印刷版本有点不同。①



1966 年，在马德望省重新演出《罗摩衍那》（图片提供：雅克·内波特）

高雅和通俗的结合，可能是《罗摩传》吸引那么多柬埔寨人的原因。它的主题——善与恶的斗争——是很多史诗文学的主题。一个层面，诗篇是上座部佛教价值观的表述；另一层面，它是保卫等级制度和现状；第三个层面，它体现了野蛮（*prei*）和文明的对比。在某种意义上，这部史诗是一种文明的表现，正如爪哇语中的“编年史”

① F. Bizot (ed.), *Histoire de Reamker* (Phnom Penh, 1973). 根据 Thong Thel 的观点（个人通信），这种高棉语文本比 17 世纪的文本更接近泰语版本。

（*babad*）一词是从“清理森林”这个意义而来。① 诗篇所表现的善都体现在三个英雄形象的高尚之举和优雅仪态上。恶人则是不可预测、狂躁和混乱的。② 当然，这种对比绝不是机械呆板的，而是在诗中经过巧妙构思写出来的。例如野蛮的森林统治者 *Kukham*，其行为是丑恶的和出于本能的，但最终服从罗摩实现自己的救赎。又如，*Langka* 王子 *Reab*，急躁易怒，并成为情绪的奴隶，但他时常跟罗摩和 Sita 一样尊贵和高雅。

在革命前的柬埔寨，《罗摩传》所起的作用类似于瓦扬戏（*wayang*）或者皮影戏在爪哇和巴厘所起的作用。很多柬埔寨人，在他们偶然读到该诗的时候，从中发现可能在日常生活中失去的完美和平衡。像我们总能见到的那样，善与恶总处于斗争中，而恶经常获胜。而在诗里面，善和恶两方面总是维持均势，占据适当的位置，装饰句的数量也相等。在保留下来的歌舞中，主要角色决不能死去，可能是因为恶与善必须要幸存下来，才能相互界定。在《罗摩传》中，像在瓦扬戏中的很多诗篇一样，“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也就是说没有任何变化或者说又回到原点。③ 作为革命的教科书这一诗篇是没有价值的。从狭义方面，如果把它作为一部历史文献，由于我们无法确定其故事发生的时间和地点，因而也没有什么价值。然而，其言辞的典雅和简练，使我们能够瞥见 17 世纪柬埔寨精英分子的价值范畴和很高的艺术光
111 泽，这很难同这一时期知识的衰落联系起来。

放到我们所知的 17 世纪的历史背景中，诗篇所表现的理想和现实之间隔着深广的鸿沟。编年史和欧洲的文献揭示这个国家的首都孤立

① 见 David Chandler，“Songs at the Edge of the Forest：Perceptions of Order in Three Cambodian Texts”，载 *Facing the Cambodian Past*，pp. 76－99；Peter Carey，*The Cultural Ecology of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 Java*（Singapore，1974），p. 4。又见 Penny Edwards，“Between a Song and a Priy：Tracking Cambodian Cosmologies and Histories through the Forest”，载 Anne Hansen and Judy Ledgerwood（eds.），*At the Edge of the Forest：Essays in Honor of David Chandler*（Ithaca，N. Y.，2007）。

② 见 F. Martini，“Quelques notes sur le Reamker”，*Artrbr. rs Asiae*（AA），Vol. 24，Nos. 3－4（1961）：351－62；Martini，*La Gloire de Rama*（Paris，1978），pp. 19－30。

③ 我非常感谢 Barbara Hatley 对瓦扬戏的见解。

于内陆地区；其王室成员互相残杀，相互算计，动乱不已；大部分时间国家处于上层的不同宗派控制之下，频受灾难和外敌入侵。然而，柬埔寨精英阶层的持续存在和海外贸易的延续不断，说明当时确实存在的这些危机只是周期性的而不是永久的，受影响的地方是军队所经过的地区，而未及军队未到的地方。

可能这个时期最能披露现实的文献是一本收集50个故事的集子，据传这些故事是一位老年王室女成员在17世纪90年代提供的，当时刚好有一部新的柬埔寨法典颁布。[①] 这些故事反映了冒犯君主和柬埔寨社会中王室的下场，也揭露这个时期柬埔寨王权的力量和弱点。国王最大的力量似乎源自他能任命和废除官衔，这就使他的臣属不至于太肆无忌惮地剥削人民。反对国王者将立即被剥夺财产；犯叛逆罪，即使离此罪名还有段距离，也会受到严厉处罚。例如，一个故事叙述一个公主如何命令她的顾问为她寻找某种鱼。官吏遇到一个渔夫，渔夫说不给钱他们没有权利把鱼拿走。官吏拿走鱼并向公主报告了渔夫的话，渔夫因不敬而遭到罚款。另一个故事说国王出去打猎，离开其随从并遇见一个看牛人，看牛人用普通的语言向他致意。国王没有惩罚这个人，回到其随从人员那里宣布他积累了功德，因为国王遵守在皇宫外不能惩罚失敬者的法律。"如果我打死这个人，"他说，"我就干了一件违禁的事情，死后将落入地狱，因为这个人毕竟不知道我是国王。"其他故事揭示君主经常成为普通市民最后求助的地方，正如 112
13世纪周达观所记载的那样。

这些故事提供了关于国王的日常信息，它和编年史不同，也和《罗摩传》不同。它们提供了一幅丰富多彩的、守旧的和按等级组织的社会图景，这个社会由几千名有特权的男女组成，稻农构成的一堵几乎无形的墙支持着这一特权阶层，在这个社会中特别强调地位、特权以及与个人身份相符的行为。这些故事也揭示在17世纪的柬埔寨享有权力是多么危险。国王总是害怕被推翻，通过不断变换恩宠和关系

① A. Leclère, *Les Codes cambodgiens*, 2 vols. (Paris, 1898), Vol. 1, pp. 123 – 75.

网络进行统治，在很多情况下，国王凭个人意气统治。官员今天受宠，第二天可能又遭贬。例如，这个时期的编年史记载了一位王室驯象师，在打猎中拯救了国王的生命，被任命为战争大臣（*chakri*）。尽管社会等级长期固定，但变化也是可能的，而且很难预测。

越南人和泰人在柬埔寨的活动

日益增加的外国干涉加深了我们对此时期柬埔寨局势不稳的印象，特别是越南人的干涉，奉行“南进”（*nam tien*）政策，即从 17 世纪 20 年代开始，曾经臣服的占国向湄公河三角洲殖民。1626 年，南方的阮氏封建主断绝了同北方黎王朝的关系，开始自己割据南方。[①] 尽管这个地区人烟稀少，但阮氏统治还是对封锁柬埔寨东南边界产生影响。越南人的入侵产生三方面的长期影响。第一，越南人接管西贡（直到今日柬埔寨人仍称之为波雷诺科（Prey Nokor），意味着在很大程度上切断了柬埔寨通向外部世界的出海口，特别是暹罗湾沿岸的较小港口在 18 世纪早期被中国人和中越混血的开拓者以及越南军队占据后，这一情况尤为明显。[②] 柬埔寨人与世隔绝的状况持续了近两百年，除了
113 老挝以外，它是殖民化之前东南亚唯一这样的国家。第二，阮氏王朝通过制度化的统治（这一过程持续了 200 多年）最终从柬埔寨的管辖权中攫取很大一部分领土和数万高棉人。这一过程埋下了柬埔寨境内柬埔寨人仇越反越情绪的种子。这种感情加速了民主柬埔寨的垮台，直到今天在很多柬埔寨精英和移民者中仍然存在。最后，阮氏王朝控制三角洲并将实际控制权扩大到暹罗湾（这种状况贯穿整个 18 世

---

① 关于越南的“南进”及其早期同柬埔寨的关系，见 Michael Cotter，“Toward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Vietnamese Southward Movement”，*JSEAH*，Vol. 9，No. 1（March 1968）：12 – 24；Mak Phoeun and Po Dharma，“La Deuxieme intervention rrulitaire vietnamienne au Cambodge”，*BEFEO*，Vol. 77（1988）：229 – 62。

② E. Gaspardone，“Un chinois des mers du sud”，*JA*，Vol. 240，No. 3（1952）：361 – 85. 关于这一时期柬埔寨同暹罗关系的论述，见 Dhiravat na Pembejra，“Seventeenth Century Ayutthaya：A Shift to Isolation?”载 Anthony Reid（ed.），*Southeast Asia in the Early Modern Era：Trade，Power and Belief*（New Haven，1997）。还见 Ishii，*The Junk Trade*，pp. 153 – 93。

纪），把柬埔寨夹在两个强邻之间，而且从西贡进入柬埔寨的首都要比从阿瑜陀耶或曼谷进入容易得多。

越南势力的进入产生的一个副作用是柬埔寨王室家族及其精英阶层的支持者分成亲泰国和亲越南两大派。当政者依靠一方支持，其对手就从另一方寻求支持以推翻他。18 世纪和 19 世纪的柬埔寨历史就是一部越南和泰国不断入侵的历史，通常入侵前后则是毁灭性的内战。不稳定状态从中枢延伸到地方行省中。忠于国王的代价是高而危险的，躲避王权则比较容易，因为到 18 世纪末王国的广大地区只是名义上在乌东的控制之下，这种状况削弱了国王抵抗外敌入侵的能力。王位的频繁更替，交通的困难，以及需要抵抗外敌入侵，这些使得国王奖同罚异的权力受到削弱。

同时，在都城的官僚精英阶层当中，似乎存在着某种延续性，这些人同佛教僧伽都是柬埔寨文学传统的监护人。17 世纪末期和 18 世纪初期的几块吴哥碑铭记录了重要官员的经历，他们体面地升迁，这与编年史中记载的残缺事件形成鲜明对比。[①] 况且，越南和泰国的记述在有些方面也认可 18 世纪（通常容易断定柬埔寨当时已经积弱不堪）柬埔寨军队成功抵制入侵军队。这表明，至少某些地方领导者，名义上还是国王的官员，在危机时刻能动员足够的支持者袭扰和打败 114
外国远征军，这些卫国者尤其善于运用游击战方式。

尽管如此，还是有编年史证据表明，18 世纪的最后几十年是柬埔寨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之一。朝廷的动荡，外国的入侵，内战，这些情况虽然早已如此，但这个时期的规模特别大。

18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柬埔寨相对平静，对遭泰国和越南入侵的担忧还不强烈，但王室内部通过暗杀和报复进行的政变与反政变并不鲜见。1767 年，阿瑜陀耶落入缅甸军队手中。当时一个泰国王子及其随从到柬埔寨寻求避难并威胁在那里建立一个合法的王国，而一个

① 见 Saveros Pou, "Les Inscriptions modernes d'Angkor", *JA*, Vol. 260, No. 242 (1972): 107 - 29; David Chandler, "An Eighteenth Century Inscription from Angkor Wat", 载 *Facing the Cambodian Past*, pp. 15 - 24。

名叫达信（Taksin）的泰国封建主夺取了暹罗的王权，发动了一系列的侵略柬埔寨的远征。[①] 达信的目标是重新确立泰国的地区霸权以及继而让自诩的功绩能够与过去相媲美。他也企图向柬埔寨国王报仇，根据编年史记载，柬埔寨国王拒绝向他敬献礼物，因为他是“中国商人的儿子并且是一个平民”，这一指控似乎是真的。有证据说他还想把自己的儿子推上柬埔寨王位。

泰国对柬埔寨王国的压力持续到 18 世纪 70 年代，当时越南西山兄弟（Tay Son brothers）领导的起义（他们威胁推翻整个越南的统治机构）分散了阮氏王朝的精力。觉察到北越正处于虚弱时刻，泰国军队经由吴哥从陆路进攻，其海军则摧毁了暹罗湾的一些小港，之所以这么做，部分原因是为了迫使中国商人从这些地区转移到曼谷附近，还有部分原因是为了报复早些时候由中国商人资助的从这些沿海飞地发动的一次远征，这次远征几乎攻占了泰人的新都城吞武里（Thonburi）。1772 年，泰人烧毁金边。7 年以后，泰国所操纵的年仅 7 岁的安英（Eng）王子，在乌东登基柬埔寨王位，由亲泰官僚摄政。1782
115 年，达信国王被废黜，由当时正在柬埔寨作战的战争大臣取代。他就是后来被西方国家所知的拉玛一世（Rama I），他所建立的王朝直到今天还在泰国掌权。

18 世纪 80 年代，阮氏王朝王位继承人从西山起义中逃出，到曼谷避难，如果这位王位继承人能统治整个越南的话，将为两个国家的和解奠定基础。1802 年，他确实统一了越南。

1790 年年幼的安英王子出走曼谷，他在那里被选定为国王，4 年之后返回柬埔寨。他的即位开始了 19 世纪历史的一次周期，这将在第 6 章中讨论到，他在曼谷加冕的事实则是他依附泰人象征。

---

① 关于达信的统治，见 C. J. Reynolds，“Religious Historical Writing and the Legitimation of the First Bangkok Reign”，载 Anthony Reid and David Marr（eds.），*Perceptions of the Past in Southeast Asia*（Singapore，1979），pp. 90－107，以及 Lorraine Gesick，“The Rise and Fall of King Taksin：A Drama of Buddhist Kingship”，载 Lorraine Gesick（ed.），*Centers，Symbols，and Hierarchies：Essays on the Classical States of Southeast Asia*（New Haven，1983），pp. 90－105。

结论

后吴哥时代有两个主要特点，一方面是首都从柬埔寨西北内陆稻作地区向金边附近的河岸贸易地区转移，另一方面是外国势力在柬埔寨内部事务中地位的增强。吴哥的自给自足既和缺乏军事敌手有关，也和吴哥制度的凝聚力或灵活性有关，这一点似乎比较明显。其实，很多制度一直存续到柬埔寨和泰国历史中期，面对内外压力，这些制度反而阻碍了柬埔寨官僚机构迅速做出应对（估计这种反应是心理上的也可能是文化上的）。

由于缺乏资料，我们不能进入柬埔寨村民的思想世界或者将他们的反应同他们在柬埔寨不同历史阶段的经历做出比对。例如，变成上座部佛教徒对于他们来说有何不同？精英阶层的商业化和1500年后的经济对柬埔寨日常生活是何影响——还有本章中提到的其他变化？他们见到的欧洲人对他们有影响吗？除了语言方面是柬埔寨语而不是泰语外，他们还见到什么区别？

从14世纪至19世纪初柬埔寨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其中最重要的变化也许是祭祀阶层地位的衰落，几百年来他们一直同掌握土地、 116
控制奴隶、宗教活动、教育以及王位密切联系一起。另一个变化是王室家族对事件影响力的下降，即便是吴哥王朝相对虚弱的时期（肯定出现过），王室的权力也很难受到削弱。也许同等重要但更难确认的泰人在柬埔寨人生活中发挥着广泛而明显日益增强的影响力。萨弗罗斯·波认为这个过程有损于柬埔寨人的认同，特别是从文学风格方面而言，但是她承认此事在这一时期的历史中有重要意义。

后期发生了另一个重要变化——越南人入侵柬埔寨人生活的官方层面，这种入侵在19世纪和20世纪达到顶峰。然而，早在18世纪，越南人的活动就切断了柬埔寨同外部世界的联系，而就在此时其他东南亚国家，特别是暹罗，正向世界敞开大门。

最后一个变化是王权威望的衰落。后吴哥时代的历届国王中，似乎只有安东（1848—1860年在位）和诺罗敦·西哈努克得到民众持续

不变的支持。王宫和民众之间的隔阂在17世纪90年代合法的秘闻中显而易见，可能在下个世纪进一步扩大。但是所谓的“衰落”，如同关于柬埔寨历史中提出的很多观点一样，很难得到证实。毕竟，在吴哥的全盛时期，我们也只有国王自己的话来支持他们享有众望的观点。像《罗摩衍那》所描述的那样，虽然国王及其近臣能够影响民众的思维，但他们也能决定自己的思维。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所说的“戏剧之国”最初用于殖民化以前的爪哇，后来用于19世纪的巴厘，现在也可以谨慎地描述这一时期柬埔寨的宫廷生活，但是大多数柬埔寨人可能不像一些学者那样了解、关心这些戏剧，这些学者也许被戏剧中的异国情调所陶醉。当然，柬埔寨人在国家稳定的时期要比战争、饥荒、痛苦时期有更多的时间和余钱用于各种庆典。[①]

117 然而，从1750年到1850年间，由于接连几任国王都失去保护臣民和维持稳定的能力，这削弱了君主在农村百姓眼中的形象。但留下来的文档内容含糊不清，而且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当像安东和诺罗敦·西哈努克这样深孚众望的君主登位时，他们比此前任何国王都更受尊敬。不管谁当国王，乡村穷人都期待有一套不变的政治或保护制度安排，不会出现大的叛乱，能够为他们耕种、收获和生存提供保护。

---

① 见 Clifford Geertz, *Negara: The Theater State in Nineteenth Century Bali* (Princeton, N. J., 1980), 特别是 pp. 110-27; Tony Day, *Fluid Iron: State Formation in Southeast Asia* (Honolulu, 2002), pp. 7-8, 175。

第6章　1794—1848年柬埔寨国家、社会和对外关系

法国人于1863年确立对柬埔寨的保护体制，在他们到来之前的大 119
约半个世纪里，柬埔寨人关于政治地理的认知中并没有地图上用线条圈起的国家这个概念。① 人们几乎不用地图，也没有19世纪早期当地绘制的地图留存下来。② 相反，对生活在这里的居民来说，“柬埔寨”可能意味着讲柬埔寨语的人居住的省（*sruk*），更狭义地说，是那些首领（太守/*chaovay sruk*）获得柬埔寨国王赐予官衔和官印的地方。

柬埔寨人还以为他们的国家就是一座有城墙的城市，附有几个想象出来的城门。有编年史说这些城门安置在湄公河上游的三波（Sam-

① 关于亚洲地图的讨论，见 David P. Chandler，“Maps for the Ancestors：Sacralized Topography and Echoes of Angkor in Two Cambodian Texts”，载 *Facing the Cambodian Past*（Chiangmai，1996），pp. 25 - 42；E. R. Leach，“The Frontiers of ‘Burma’”，*CSSH*，Vol. 3（1960 - 61）：49 - 68。又见 Thongchai Winichakul，*Siam Mapped：A History of the Geo - Body of a Nation*（Honolulu，1989）。Adhémard Leclère，*Recherches sur le droit publique des cambodgiens*（Paris，1894），p. 221，认为传统柬埔寨“省”（sruk）的边界是“属于它的稻作区的边界”，界线每年都在变化。Dawn Rooney，*Angkor*（Bangkok，2006），p. 454，指出一张18世纪的欧洲地图几乎没有完全画出柬埔寨的区域。

② National Library，Bangkok，*Chotmai Het*（*CMH*［Official correspondence］）1203/1 *kho* 41 提到泰国绘制的柬埔寨地图。Democratic Republic of Vietnam，Bureau of Historical Research（comp.），*Dai nam thuc luc chinh bien*［Primary compilation of the veritable records of imperial Vietnam］（*DNTL*），Vol. 19，p. 240，提到一幅越南绘制的柬埔寨地图，但都没有流传下来。

bor)，洞里萨湖北岸的磅斯威（Kompong Svay），西北部的菩萨（Pursat），滨海的贡布（Kampot），以及需要越过边界位于越南境内湄公河三角洲的朱笃（Chaudoc）。[①] 这些城门是外国军队入侵柬埔寨的传统通道。城门将领土以巨大的“C”形包围起来（没有东门，因为军队不能跨越安南山脉），大体覆盖今日柬埔寨的一半地区。

在这堵假想城墙里，省的面积和重要性各不相同。尽管一般来说
120 边界不很确定，但是有些省，如菩萨和磅斯威，仍有好几百平方公里；另一些省，如戈查（Koh Chan）和洛维恩（Lovea Em），则是湄公河中的岛屿或者沿河延伸很短的几块耕地。

社会与经济

有关这个时期柬埔寨人口的规模和构成的资料几乎没有留存下来。19 世纪 30 年代在越南人的宗主统治下，曾经进行过一次人口普查，但是越南人认为这一数字不实而没有保留。[②] 19 世纪 60 年代法国行政当局从粗略的税收清册中估算柬埔寨人口略少于 100 万。[③] 因此，19 世纪 40 年代在柬埔寨人想象的门里的区域内，大约生活着 75 万人口，但也可能更少些，因为有关因饥荒、逃亡和敌军入侵造成各个地区人口减少的记载充斥着史料。

大部分人口生活在乡村。最大的城镇金边，人口也从未超过 2.5 万。[④] 19 世纪 50 年代末期，王都乌东及其周围农村有人口 1 万左右。由泰人在 19 世纪 30 年代末期重建的马德望市是一个说高棉语的城市，1839 年有 3000 居民。[⑤] 在 19 世纪 60 年代以前，柬埔寨人口比较稠密的部分是位于金边南部和东部的地区，如巴普农和巴迪（Bati），以及川龙（Chhlong）南边沿湄公河的北部地区。值得注意的是，相对富庶

---

① Eng Sut, *Akkasar mahaboros khmaer* [Documents about Khmer heroes], (Phnom Penh, 1969), p. 1148.

② *DNTL*, Vol. 15, p. 115, and Vol. 22, p. 157.

③ E. Aymonier, *Géograpbie du Cambodge* (Paris, 1876), pp. 31 -59.

④ 同上，p. 49。

⑤ *CMH* 3/1192/4/1, *and* 3/1204/1 *ko* /2.

的省份通常不在泰国和越南所选择的入侵和撤退路线上。

柬埔寨几乎所有的居民都是高棉族，他们从事种稻、僧侣或当官。少数族群从事工商业。例如销售、园艺和对外贸易掌握在华人或华裔手里。[①] 牲畜贸易、编织和商业捕鱼，由少数穆斯林控制，他们部分是来自马来群岛的移民——在高棉语中称为 *chvea*（即爪哇人）——而大部分是来自占婆即占国的移民。柬埔寨北部的库依人（Kui）开采当地的小铁矿炼铁（至少从吴哥时期他们就这样做了）。都城有少数 121
葡萄牙居民后裔，其祖辈在 16—17 世纪来到柬埔寨，担任国王的翻译和负责国王的军火。[②] 在 19 世纪 30 年代以前柬埔寨很少有越南居民，实际上，尽管没有准确的统计，似乎在法国来到之前柬埔寨境内的这些少数族群所占比例较小。在法国殖民时期，中国和越南居民数量大幅增加。[③]

在柬埔寨人想象的几个门附近，桔井、菩萨和磅斯威这几个省份人口稀少，那里有诸如普尔（Porr）、斯丁（Stieng）和桑雷（Samre）这样的少数部落居住在孤立的村落里，靠采集森林产品为生，这些产品构成国王收入的主要来源和柬埔寨海外出口的大宗商品。

以此时东南亚其余国家的标准来衡量，柬埔寨是贫穷的。跟缅甸、老挝不同，柬埔寨地下的宝石和贵金属资源很少。跟暹罗也不同，柬埔寨的加工业、贸易和商业都未发展起来，所需的制成品如黄铜器皿、瓷器和火器都是从国外进口。跟越南也不同，柬埔寨的交通很差，国内市场欠发展。农业剩余产品很少，百姓储蓄很低，钱都掌握在宫廷和少数族群手中。农村中的贸易都是以货易货，跟吴哥时期没有变化，

① 见 W. E. Willmott, "History and Sociology of the Chinese in Cambodia Prior to the French Protectorate", *JSEAH*, Vol. 7, No. 1 (March 1966): 15 - 38。

② C. E. Bouillevaux, *Voyage en Indochine* (Paris, 1858), p. 168. 又见 Alexander Hamilton, *A New Account of the East Indies* (London, 1727, repr. 1930), p. 106, "大约有 200 *Topasses*，或者印度的葡萄牙人在柬埔寨定居结婚，他们之中有些人在政府中有很好的职位，并按照那个国家的生活方式生活。"

③ 关于 19 世纪柬埔寨种族问题，见 Wolfgang Vollman, "Notes sur les relations inter - ethniques au Cambodge du XIXe siècle", *Asie du Sud - Est et Monde Insulindien*, Vol. 4, No. 2 (1973): 172 - 207。

大部分都是妇女从事。柬埔寨还是自给自足的经济，大多数人的主要时间用来种植水稻，男男女女并排耕种。土地经营规模很小（即便是高官也很少拥有超过几公顷的土地），产量很低，便于增加产量的灌溉工程稀缺。

按 1834 年记载的越南明命皇帝（Minh Mang）的话说，柬埔寨是真正“未开化”的国家，因为“人民不知道种植粮食的适当方法。他们用锄头锄地，而不用牛犁地。他们只种植供一天两餐量的稻米，而不知道如何储存大米以备急需”。[①] 乡村通常有一个公用的池塘，称 *trapeang*，用来灌溉稻子，至少从真腊时期以来就已经这样做，而代表 122 吴哥文明特征的水坝和水渠已经不再存在。部分原因是现在需要养活的人口不多，还有部分原因是国家机制的控制力非常弱。农民缺乏积极性和技术来丰富水稻种植或销售余粮或增加土地。各省之间的交通很不方便，19 世纪 30 年代之前可说是没有道路，盗贼、侵略军和地方官吏的随从，抢走他们所能发现的所有余粮。

由于这个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南越当局切断了金边同外部世界的联系，作为有很大潜力的重要转口港不能发挥作用，因此限制了柬埔寨的对外贸易。实际上，从 1808 年以后，到金边旅游访问需要得到越南人的许可。像贡布这样的从事沿海和半岛贸易的暹罗湾港口，在经济上同越南和泰国的联系比对柬埔寨本身还要密切。[②]

每年会有一些船到柬埔寨中部贸易。现在还保留着大约 1810 年时分别发往中国和日本的船货清单。[③] 这些货物都是些数量较少的几种不同产品——例如，在输往日本的货品中有 300 磅象牙和 200 磅胡椒，在输往中国的货品中包括小豆蔻、兽皮、龟甲以及香木。19 世纪 20 年代出口到越南——跟越南之间的贸易一部分属于朝贡物品——的货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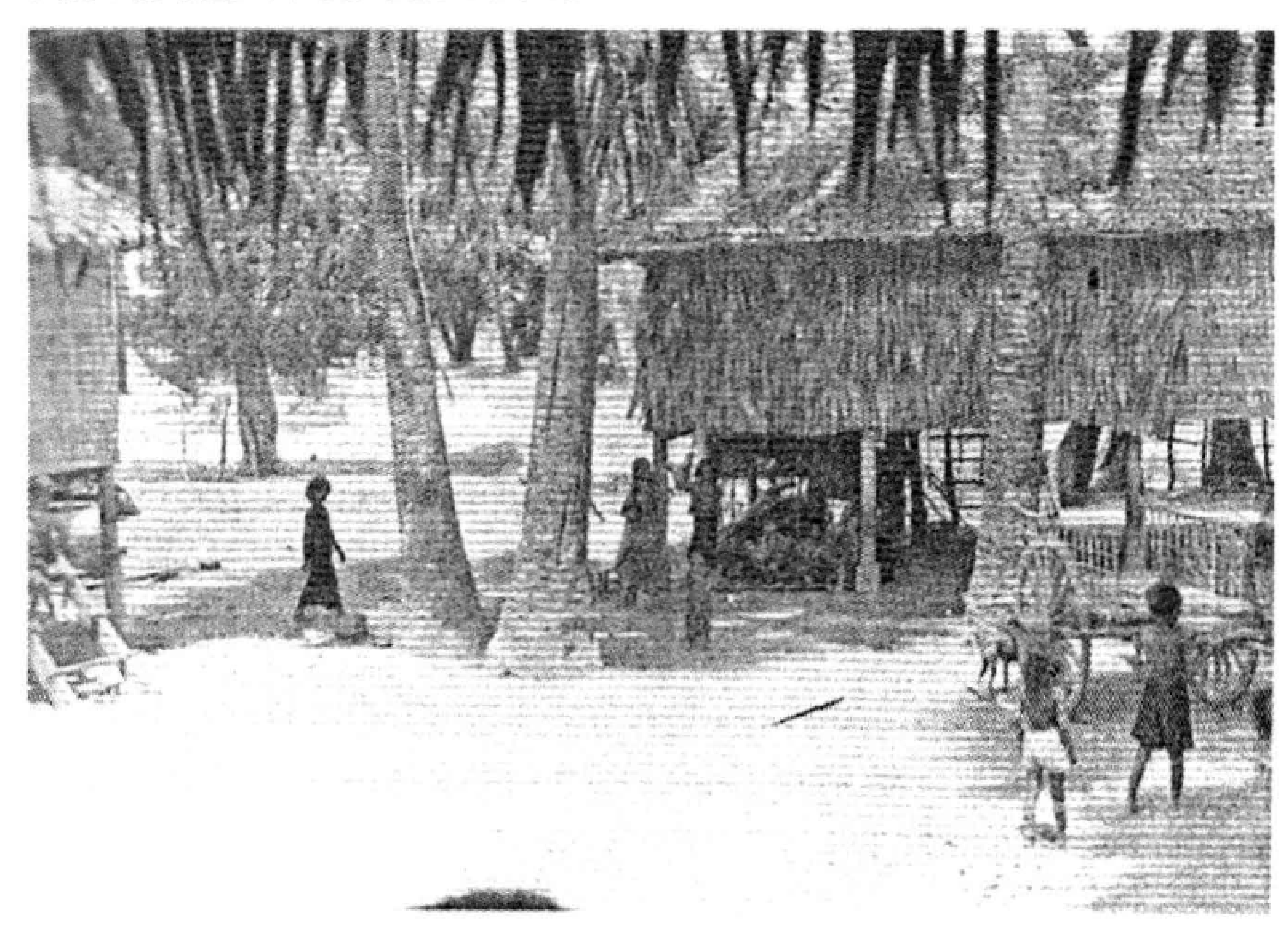
① *DNTL*, Vol. 15, p. 171.

② *DNTL*, Vol. 3, p. 385. 还见 C. Flood (tr.), *The Dynastic Chronicles*, *Bangkok Era*, *the Fourth Reign*, 3 vols. (Tokyo, 1965 – 67), Vol. 1, p. 171, 引用了 1858 年柬埔寨安东国王写给法国人信中的话：“柬埔寨想要造船，用来同其他国家贸易，但越南不允许柬埔寨船出入。”

③ William Milburn, *Oriental Commerce* (London, 1813), pp. 449 – 50.

物包括象牙、树胶、小豆蔻、干鱼和象皮。

以上说到的都是传统的出口货物。这些货物清单同 17 世纪和 18 世纪初期流传下来的货物清单很相似，特别是关于同日本之间的舢板船贸易，而据中国史料记载，甚至从吴哥时期就是交易这样的货物。[1] 外部贸易，包括我们将要看到的朝贡在内，是国王财政收入的一项重要来源，对金边的华人群体和有特权的国王近臣可能也很重要。但对国家的其他人来说则意义不大。



1961 年磅士卑省一个稻作村落（图片提供：作者）

大多数柬埔寨人住在村庄。至少在 19 世纪早期，这些村庄可分成
三类。第一类称为“磅”（*Kompong*），马来语意为“登陆的地方”， 123
通常是地名的组成部分，如磅斯威和磅逊（Kompong Som）。[2] 这样的村庄位于通航河流的岸边，有数百人口。他们通常包括一个太守及其

① 见 Ishii, *The Junk Trade from Southeast Asia*, pp. 153 - 93。

② Saveros Lewitz, “La Toponymie khmère”, *BEFEO* 53/2, No. 2 (1967): 467 - 500.

助手；“磅”通常以栅栏环绕。一些居民可能是中国人或中国—高棉混血人、马来人和占人，不过少数族群倾向于聚居在各自的一块小村落，它们成为“磅”的组成部分。“磅”通过同一条河流同其他“磅”联系，同它周围的稻作村落联系，并且间接地同首都和朝廷联系。通过贸易、旅游、道听途说和外国入侵，“磅”的居民知道了发生在其他地方的消息。

第二类是围绕着“磅”的种稻的村落，呈不规则的弧形。稻作村落比“磅”要小要穷，数量很多，很可能全都是高棉族人。房子环绕
124 分散着，没有规则，经常是在佛寺附近，也会在供给村庄用水的水池或河流附近。稻作乡村通过多渠道同“磅”和远方世界联系——通过前来征兵和征谷的官员；通过寺院，寺院鼓励僧侣在旱季时出门云游；通过新年和其他节日举办的节庆活动；通过同“磅”的贸易，用稻米和森林产品交换金属、布和盐。

稻作村落是不稳定的，因为它们缺乏防御的手段。和越南的稻作村落不同，这里没有制度性的祖先崇拜把居民长期固定在此地而不能到别处。编年史中有很多关于危机时期村民跑进森林的记载。和平时期，他们的生活受农业季节变换和各种庆典——佛教、各种神灵崇拜、印度教残余——所支配，这些仪式标志着稻作周期中一个阶段的结束和下一个阶段的开始。①

《罗摩传》第5章记载的“野蛮”与“文明”的对立，在19世纪文学中继续存在。在柬埔寨中北部巴雷寺发现的一部编年史诗中，重复涉及这一主题，同时按时间顺序记述了19世纪的历史事件。史诗叙述了在越南占领和内战的动荡时期中，一位被抓捕的官僚家族的命运。他们被赶进森林，失去了自己的身份，这种身份只有当男性家族成员先由泰国国王、随后由柬埔寨国王授予新的头衔时才可以恢复。这部史诗是为庆贺1856年巴雷寺修复而写的，大多数读者认为其中所记载

---

① 有关20世纪50年代柬埔寨稻作村庄的描述，见 Jean Delvert, *Le Paysan cambodgien* (Paris, 1962), pp. 322 - 70。

的事件大部分是真实的。其中人物的命运模式赋予了这部史诗的文学价值，这种模式正是《罗摩传》以及佛教思想所制定的。随着国王的复位，他们也恢复了自己的地位；他们在某些方面也有过错，考虑到当时是在森林避难，又失去官衔，且不良行为无法追究，也有情可原。①

类似的，在19世纪初有一个广为人知的辛酸的柬埔寨民间故事，3个女孩被母亲抛弃后变成了3只野鸟，它们快乐地在森林和田野之间飞行，这也是人们为什么在这种地方最频繁见到这种鸟群的原因。② 125
现在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物，对19世纪的柬埔寨人来说是非常不易的——取决于外国人和领主们是否有善良意愿，取决于降水的多少，取决于在热带雨林气候中是否保持健康——这也就能理解为什么诗人和观众把“文明”或者森林之外的艺术看得如此重要的原因。③

第三类村庄隐藏在“旷野”（*prei*）之中，这个时期柬埔寨大多数村庄都是这样的村庄。这里的居民不识字并且通常也不是佛教徒；他们讲的语言同高棉语有关系，但他们并不忠于“磅”或者王都，除非出于被迫。村庄经常遭袭击，村民被掠为奴隶，这些村庄在经济上很重要，因为村民能够开采森林资源，这些在首都和国外非常珍贵。然而，他们政治上忠于旷野里说同样方言和举行相似宗教仪式的其他村庄。

---

① 见 Khin Sok, *L'annexation du Cambodge par les Vietnamiens au XIXe Siecle*（Paris 2002），pp. 281－359，提供了下面要讨论的一部19世纪生动史诗的柬埔寨原文和法文翻译（见本页注③）。

② 见 David Chandler（tr.），“The Origin of the Kounlok Bird”，载 Frank Stewart and Sharon May（eds.），*In the Shadow of Angkor：Contemporary Writing from Cambodia*（Honolulu，2004），pp. 36－41。

③ 关于这两个故事在下文中有详细介绍，见 Chandler，“Songs at the Edgeof the Forest”，载 *Facing the Cambodian Past*，pp. 76－99。关于森林意义的讨论见 Charles Malamoud，“Village et foret dans l'ideologie de l'Inde brahmanique”，*Archives europeen. es de sociologie* XVI（1976）：3－20。还见 Penny Edwards，“Between a Song and a Priy：Tracking Cambodian Cosmologies and Histories Through the Forest”，载 Anne Hansen and Judy Legerwood（eds.），*At the Edge of the Forest：Essays in Honor of David Chandler*（Ithaca，N. Y.，2007）。

保护制度和政府

19 世纪早期柬埔寨村庄是如何管理的？有些法国学者认为柬埔寨农村在这一时期完全没有政府，[1] 大多数村庄同外界和国家发生联系是非常零星的，而且并不友好。村庄内部和邻村之间的纷争是通过调解而不是通过法律来解决，问题往往需要积压多年。出于庆典或同高层权威打交道的考虑，村庄通常由村民选出的年长者进行管理，选举的参考因素包括农业技艺、识字水平、好的言行和公正理念。以稻谷和劳役形式的税收似乎是根据需求不定期交纳。在“磅”内的村庄政府或许更为明显，那里官员和随从更多，但没有证据证明柬埔寨的有哪个村庄像 19 世纪的越南那样由正式组成的长老会议管理。[2]

稻作区村庄和旷野里的村庄相互之间以及离最近的政府代表，都有好几天的路程。在这种孤立状态中，村民们在村庄内部共同生活，
126 具有共同传统。他们根据一代代传下来的地方宗教传统来认同自己和看待自己的历史。在村庄外面，多数情况下穿过田地就是旷野，那里聚集着野兽、传染疟疾的蚊子和死者幽魂。村民们很少冒险去旷野，在此之外是磅、都城和宫廷的世界。

19 世纪的法国作者经常贬低柬埔寨社会（其中有一个把它的制度称为“虫蛀的碎片”）[3]，并拿它不适当地跟法国人自己“理性”的中央集权制度或者越南人的制度作比较。这种倾向在一些关注泰国的人

---

① France, Archives l'outremer, Aix - en - Provence (hereafter cited as AOM), Fonds Inciochinois A - 30 (22), "Rapport confidentiel sur le Cambodge," August 1874.

② Truong Buu Lam, "L'Autorité dans les villages vietnamiens ciu XIXe siècle", 载 G. Xrijawardene (ed.), *Leadersbip and Autbority* (Singapore 1968), pp. 65 - 74。

③ G. Janneau, "Le Cambodge d´autrefois", *Revue Indochinoise* (*RI*), Vol. 17, No. 3 (Ivl. arch 1914): 266. 这篇文章吸收了 Janneau 在 19 世纪 60 年代也就是法国保护统治之初时期的考察资料。

类学家中仍然存在，他们称泰国农民社会是“松散的结构”。① 不管说这种话的人是不是对“紧密的结构”有价值倾向，这一表述至少对 19 世纪泰国和柬埔寨村庄的状况还是很有用处的，除了家庭和佛教团体（即“僧伽”）外，这里没有“持久的发挥功能的重要团体”或自愿联合的组织。有时为了应对特殊需要，村庄也会短期内自我组织，例如防御或者佛教节日。

尽管这些安排明显是非正式的，但每个柬埔寨村庄和家庭都很大程度上保持着结构的持续性。这样说是基于这样的事实，即柬埔寨人总是根据自己对于说话对象的地位来确认自己的身份。这种身份的认同暂时把他们置于一个特定位置上，但不会固定在一点上。这是一套灵活的双重关系，从国王和僧伽向下延伸，通过首都和“磅”的等级官僚到达村庄，经过村庄传到村民和没有地、又负债的奴隶以及生活在边境的少数民族。如在大多数成体系的社会安排中，对于体系内的人来说关键是他们在其中占据的位置。如果某个人在所处的位置相对安全的话，那么处于弱势地位的人就会找到他，向他表示敬意，以换取他的庇护。在某种意义上说，社会是在保护和服务的交换中运转的，他们所说的“不对称友谊”就暗示了这种交换。② 在农村环境中，人们可能从家族中的长者和幸运者、地方寺院和尚、匪帮首领、政府官员或者是不时出现的神职人员（他们允诺其追随者不会受到伤害并且 127
变得富有）得到保护。

在“磅”和首都，那里的居民不再种植粮食作物，附庸关系变得

① 见 H. D. Evers (ed.), *Loosely Structured Social Systems: Thailand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New Haven, 1969); Robert Textor, “The ‘Loose Structure’ of Thai Society: A Paradigm Under Pressure”, *PA*, Vol. 50, No. 3 (Fall 1977): 467 – 73。见 May Ebihara, “Societal Organization in Sixteenth – and Seventeenth – Century Cambodia”, *JSEAS*, 15 (1) (September 1984): 280 – 95, at 295, “过去关于东南亚社会性质的各种讨论（如关于“松散结构”的争论）……都是假定一个社会必然只有一种属性。而显然，社会是包含多种属性，它们并不总是完美地融合在一起或相互一致。”

② 见 Eric Wolf, “Kinship, Friendship, and Patron – Client Relations”, 载 M. Banton (ed.), *The Social Anthropology of Complex Societies* (London, 1966), pp. 1 – 22; Wolf, *Europe and the People Without History* (Berkeley, 1982), pp. 79 – 88。

更加重要和复杂。是需要一个保护者还是有自己的附庸者与这个人的生存机会有关。有权势者会尽可能多地接纳追随者和奴隶。在很多情况下，这些人对他们的保护者负有债务，他们以自己的一生来偿还债务。19 世纪奴隶制在柬埔寨的广泛存在，在一定程度上给被保护者在有多种选择机会的情况下自愿接受“不对称友谊”的说法蒙上了一层阴影。但是很多居民确实想让自己成为保护者或者 *me*（这个词也表示“母亲”的意思）的奴隶，以保护自己免受他人的侵害。

从出生之日起每个人就被灌输这种关系的正确性和持久性。柬埔寨谚语和说教文学充满着个体的孤苦无助和每个人接受权力关系重要性的阐述。至少从理论上来说，主仆双方都把他们的关系看作天然的，甚至是义务使然。一则柬埔寨谚语说：“富人必须保护穷人，就像衣服保护身体一样。”①

实际上，这种保护与被保护关系很少是温文尔雅的。整个东南亚，像国王这样的保护者，常说要“消费”自己控制的土地和居民。在柬埔寨的民间传说中很少有正直的官员，通常把官吏比作老虎、鳄鱼和毒蛇。农村政府被看作与民为敌的程序。至少在某一个省份，当新的首领就职时，要举行斗鸡比赛。一只鸡代表新上任的官员，另一只代表地区居民。比赛结果暗示比赛举办者双方存在着人们所期望的某种力量平衡。②

为什么居民接受这种贬低自己的制度安排呢？部分是由于存在着不可抗拒的力量。个人出逃或者组织抵抗都是不可能的。更何况，一个人没有保护者会成为被攻击的目标；一个人们不了解的保护者，如
128 外国人，往往比生活在身边的保护者更具威胁。虽然太守经常“侵

---

① Louis Finot, “Proverbes cambodgiens,” *RI*, Vol. 7, No. 2 (January 1904): 74.

② Thiounn, “Cérémonial cambodgien concernant la prise des fonctions des mandarins nouveaux promus”, *RI*, Vol. 10, No. 1 (January 190 7): 75. 还见 P. Bitard, “Les songes et leurs interpretations chez les cambodgiens”, 载 *Sources orientales II*: *Les songes et leur interprétations* (Paris, 1959), p. 258，该文报道如果有人梦见生吃人肉或将人的脑袋砍下来那么这个人将成为地方长官。直到 2004 年，还有一位农村高棉人告诉一名美国人类学家，官员“什么东西也吃——土地、人，任何东西！”(Eve Zucker，私人通信)。

吞”手中控制的少量物质财富，但他和“磅”内其他人之间的社会距离并不特别大。例如，他的妻子是本地妇女，他住在简陋的房子里，嚼槟榔，在寺院里举行节日活动和敬奉纳塔（*nak ta*）的庆典。这些官员分享被保护者提供的食物，和被保护者有共同的巫术信仰、荒诞观念以及不信任其他官员和外人。可能因为他们生活在他们控制的居民中间，太守比都城里的权威对当地问题更有责任心。这种“不对称友谊”在紧张时期很可能会重新商定，这一情况增加了体系的不稳定性，或许也增加了它在村民和奴隶眼中的吸引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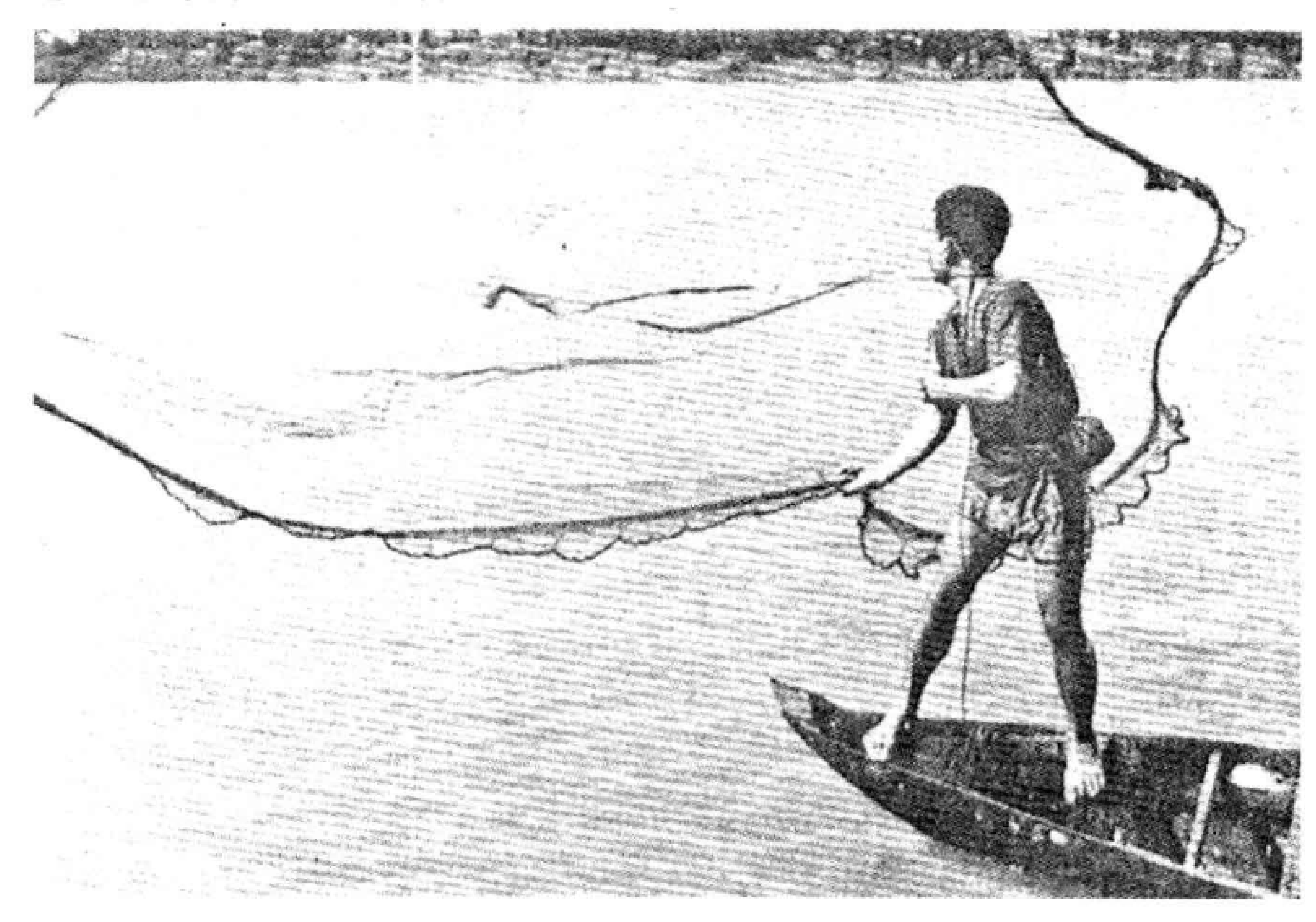
对大多数柬埔寨人来说，这种从属关系网的改变，无论是出于自愿还是强迫，出于善意还是恶意，都说明了他们的经验和社会期望的局限性。另一方面，他们对国王和佛教僧伽的看法采取不同的形式，用不同的语言表达。他们想象中有条地方权威和精神权威的链条，通过官吏延伸到百姓中去，尽管国王和僧伽被置于链条的末端，但百姓认为两者的地位和作用并不相同。我们对19世纪柬埔寨僧伽的情况了解不多，如果断言柬埔寨情况同暹罗和缅甸一样，可能具有误导性。例如还没有证据说明僧伽起着和王室相同的政治作用，尽管僧侣和还俗的人在1821年的反越南起义中曾有积极表现。[①] 总的说来，僧侣作为学识渊博者，作为精神保护者，作为文化保护和传授者，受到广泛的尊敬。他们之所以在柬埔寨生活中占有独特的神秘的地位，是因为他们放弃了——至少是暂时的——农事、政事和婚姻。

百姓对国王的认识与其说来自他们自身的经历，不如说来自神话。国王同他的大部分臣民的关系不容商量，很少强迫，很少面对面。在19世纪早期的大部分时间里，或出于选择或由于环境所迫，国王要么被限制在王宫里面，要么流亡到暹罗和越南。鉴于传统文学和流行文 129
学关于国王的描述，又因为从未见过国王，村民们对国王的认识比他们相互之间、比他们对保护者或者甚至对纳塔的认识要模糊，并且更

---

① 见本书第7章和 Ian Harris, *Cambodian Buddhism: History and Practice* (Honolulu, 2005)，第4章。

加得到认可。国王像佛祖一样真实或虚幻。百姓接受《罗摩衍那》关于国王责任的叙述：国王“必须要神圣对待，必须接受奉献，必须保护人民”。[1]很多人相信国王能够影响天气。和法官（*sauphea*）不同，国王能够带来真正的正义，他是农民希望的唯一政治源泉。这样的观念一直持续到殖民时期及以后。



1988 年，一柬埔寨人在湄公河上撒渔网，这种捕鱼方法几百年来保持未变（图片提供：克里斯汀·德拉蒙德）

当然，国王并不总是甚至经常处于百姓心中，但当他在多年流亡之后重新出现在首都时，像 1794 年安英（Eng）、近半个世纪之后的安东，或者 1991 年诺罗敦·西哈努克，立即点燃了人民大众的欢乐气氛。

柬埔寨社会还有一些其他阶层的人，影响到农村百姓的生活和整
130 个柬埔寨的政治结果。这包括小省的官员和侍臣，在有些情况下他们

① J. Gonda, *Ancient Indian Kingship from a Religious Point of View* (Leiden, 1966), p. 91.

由王都任命，其余情况下由太守任命；包括出家还俗者（称为 *achar*），他们扮演着宗教代言人和盛世领袖的角色，经常反对太守；包括流动商人、演员和演唱艺人；还包括富人的穷亲戚，他们能起到中间人的作用。不幸的是，以上层阶级为中心的编年史，很少有篇幅谈及这几类人，所以除了用间接的方法外，很难评估他们的力量。例如，一个稻作村庄起义反抗越南人——在 1820 年和 1841 年发生过很多这样的事情——是不可能仅通过高官鼓动就会发生的。

高层官吏

另一方面，史料很好地记载了柬埔寨的高层官吏（勋爵/*okya*）的情况。[①] 其中包括地方太守和国王周围的官员。要说出某一时期有多少高层官吏是不可能的。法国 19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所汇集的官员名单有很多空白并且充满着矛盾。这些名单中很多称号似乎没有使用过，而其他资料中存在的称号又没有出现在这些名单中。粗略估计，19 世纪在首都和乡村大约有 200 名高层官吏。高层官吏的数目可能在 19 世纪 30 年代安东出走泰国之后减少而在他 1848 年返回登位后扩大。这 200 人大约使用了 700 种头衔。其中一些人，像国王的高级顾问和大部分太守，总是挂满各种头衔。当权力被一个或几个任职者掌握之后，其他人似乎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丧失了自己的头衔。

除了由国王授予这一事实外，一切关于头衔和相关工作的事情都会经常调整。有时头衔表示地位，有时和职业相关，诸如为国王饲养象群，保管王室宝物，或者为国王征税。某种称号预留给某一省，当称号里含有“*sauphea*”这个词的时候，通常意指法官职务。但是这些规则没有一个被严格遵守。受宠者会被给予工作，失宠者则会基于特殊原因被革职，所以人们升得（或降得）快。例如，1819 年一个负责 131
国王王位房间的官员（这是一个很轻松地职业）被任命为前往曼谷的

① A. Rabibhadana, *Organization of Thai Society in the Early Bangkok Period* (Ithaca, N. Y., 1969), pp. 98 - 104, 对泰国的制度有所讨论。

外交使团的负责人。另一个例子，1818 年一位在王室仓库检测稻米的官员，被任命指挥军队在马德望同泰国军队作战。

高层官吏的头衔通常由两个或三个表示尊敬的词组成，例如从巴利语或梵语中引来的“宝石”（*ratna*）或“辉煌”（*verocana*）。高层官吏在刻意渲染庄严氛围的仪式上进行忠诚宣誓，从国王手里接受头衔连同官印和等级标识（包括等级伞、槟榔箱、宫服之类的东西），大体相同形式的宣誓至少已实行了 800 年。当时及以后每隔一段时间，高层官吏要向国王敬献礼物。法国学者将官衔和礼物的交换等同于柬埔寨政府的腐败行为，因为只有献礼最多的人才能得到官职。在某种程度上考虑，这是对的，但忽略了交易中的伦理道德因素。毕竟，出价高者也正是有权有势者，而他们是不容忽视的。高层官吏一年两次在王宫附近的王家寺院集聚，在那里喝“忠诚的水”——理论上，这些水是从全国的江河取来送到首都——并且重新向国王作忠诚宣誓。不参加这个仪式等于不忠。

一旦就职，高层官吏就成为某一力量（*komlang*）的成员，也就是某一要人的得力助手，即随从。这位要人可能是国王的一名顾问，王室的一名成员，甚至是国王自己。暹罗也实行类似的制度。我们不清楚这种联盟意在抑制还是增强还受怀疑的高层官吏的权力。可能两者兼而有之。这个时期，某些地区、某些官职、某些家庭关系、特别是一些特殊官职之间的相互关系还很模糊。一部 19 世纪初期的编年史的手稿，认为某些地区高层官吏的土地所有权代代相传，甚至当其头衔不再传给儿子的情况下还是这样。[①] 在柬埔寨，任何情况下头衔是不能世袭的。甚至国王死后，王位继承人还要从几个合格的候选人中挑
132 选。类似的流动性也影响到高层官吏的家族，尽管特别的家族似乎仍能保持高的地位，可以接近国王。

尽管有这些持续性，但柬埔寨政治生活中仍然缺少稳定。从理论

① 见编年史手稿 P－6，Fonds Phnom Penh collection，E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 Orient，pp. 11－12。

上说，高层官吏的生存依靠国王。埃金·拉比哈达纳（Akin Rabibhadana）引用一则1740年的泰国法令："国王能将一个高贵者变成一个卑贱者，或者反过来，将一个卑贱者变成高贵者。他的命令，像一把天降神斧。"[1]实际上，国王的权力依赖于他近期如何维持，他有多少未偿的债务。首都和省之间糟糕的交通总是让国王的权力大打折扣。

一个新国王在王朝初期，或者在经过流亡时期之后，他的举动像一把"天降神斧"，把高层官吏称号授予那些在他爬向权力巅峰过程中对他表现忠诚的人。19世纪40年代安东国王就是这样赏赐他的追随者，就像泰国却克里（Chakri）王朝的第一个国王（1782—？）和越南阮氏王朝（1802—1945）赏赐其随从一样。另一方面，当国王软弱无力，或者陷入长期的束缚，可能是受年长者的束缚，高层官吏就趁机在各自省里扎根。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多少取得些独立地位。

柬埔寨人生活的一个先天性风险就是不确定性。人与人之间存着戒心。一个高层官吏对国王、对自己家族以及对自己主子的义务，有时重叠，有时则产生冲突。其他高层官吏或者是他潜在的盟友或者是他潜在的敌人；利用手中的权力或与人结盟，或背叛原来的盟友，诸如此类事情，占去高层官吏很多时间。

19世纪初的柬埔寨不是一个像中国和越南那样的官僚社会，和平时期高层官吏的责任很轻。他必须侍奉他的保护者；文书工作很少；有很多诸如为皇宫提供补给或招募军队防卫（柬埔寨没有常备军）这样的任务，在若干高层官吏之间相互承包。这么做可能是为了防止个别官员权力太大，因为没有制度机制防止怀有野心的高层官吏互相勾结谋利。

上述评论暗示出来的判断也许过于武断。有些高层官吏是有所成
就的诗人和音乐家，其他人是佛教和艺术的慷慨赞助者。编年史记载 133
了一些高层官吏富有能力、创新精神和勇气，但是他们的恩惠并不稳定，对手无处不在，追随者很不可靠，这些情况对高层官吏的积极行

① Rabibhadana, *Organization of Thai Society*, p. 44.

为或吸引上级官员的注意带来不利影响。高层官吏和百姓在共同文化的框架中，被恐惧、好感、义务和鄙视等纽带紧紧拴在一起。就柬埔寨人而言，这个制度运作有成效，但当19世纪三四十年代，越南试图利用高层官吏作为他们的代言人的时候，他们发现高层官吏没有能力按照越南方式治理国家——也就是所负责的行政辖区内土地测量、征税和制作详细报告。

除了国王的5个最亲近的顾问（他们组成一种类似内阁的机构）外，最活跃和最引人注目的高层官吏是地方太守。这些人享有很多自由和很大的权力。他们得到授权在自己的省内征税，这意味着他们可以将剩余谷物掌握在自己手中；他们还有权动员人力从事战争和公共工程。实际中他们维持着少量的私人军队，跟他们的同行、19世纪马来亚沿河地带首领所做的一样。在人口多的省份，这些军队有时有几千人；其余省份他们似乎只起到太守私人保镖的作用。掌握人力和稻谷意味着太守实际控制着王国的平衡力量。事实上，太守更多的是单独行动而不是集体行动，应对地方利益和协调双边安排。这个情况意味着国王能够依靠某些太守的支持，其余则靠不住；还意味着入侵军队可能会找到某些对他们友好的太守，另外一些则会反对对他们。

某些太守比其他太守更加重要。他们当中的5个人，叫作诸侯（*sdac tran*，即地方割剧势力的统治者），是最高级别的官吏。他们以一种不确定的方式同时对几个省的管理负责，[1] 这几个省合起来称为“土地”（*dei*）。很遗憾，19世纪关于“*sdac tran*/诸侯”一词的注释只出现在法文书本中，“*tran*”的意思并不清楚。每年在5个“土地”举行的敬奉纳塔的仪式中，官员们似乎扮演总督，或充当代理国王的角
134 色。他们有权执行死刑，而其他地方太守没有。从功能上说，他们相当于国王身边的5个高级大臣。

在都城的5个大臣由第一大臣领导，有时把他们叫作塔拉哈（*ta*

---

① 见A. Leclère，“Sdach tranh”，*RI*，Vol. 7（1905）：1378－84；Chandler，“Royally Sponsored Human Sacrifices in Nineteenth Century Cambodia”，载Chandler，*Facing the Cambodian Past*（Chiangmai，1996），pp. 119－35。还见Vickery，*Society*，*Economics and Politics*，p. 154。

-la-ha），其中包括司法大臣（*yomraj*）、陆军大臣（*chakrei*）、海军和贸易大臣（*kralahom*）以及宫廷大臣（*veang*）。每一个大臣都有自己的“力量/*komlang*”并且可能同某个省有经济或财产上的联系。这 5 个人的地域责任界定不清，同“诸侯/*sdac tran*”和太守的责任交错重叠，也同某些王室成员的责任发生重叠，他们也有“享用”特定地区的权利。根据一些编年史揭示，在形势紧张的时候，高层官吏撤回到他们的村子，他们在那里有亲属和土地。尽管高级别的高层官吏有自己的领地，他们仍要花费时间同国王在一起，除了战争时期他们之中一些人被派去征募军队并指挥军队作战。他们的生涯同国王的命运绑在一起。他们对乡村生活的影响是不清楚的。宫廷编订的编年史可能夸大这些人的重要性，也是如此，当 19 世纪 30 年代越南人找人帮助他们集中和整顿柬埔寨政府的时候，他们也是夸大高层官吏的作用。

王室其他成员组成了村民和国王之间柬埔寨社会的最后一部分人群。在理论上这些人可能有好几百之多，因为历代国王实行传统的多妻制，但在 19 世纪由于一系列死亡和变故，他们的数目急剧减少。安英国王二十多岁就死去，自己没有兄弟，仅仅留下 5 个孩子。最大的安赞（Chan）亲王，登位时年仅 6 岁。在 30 多年后安赞去世，留下 4 个女儿，没有儿子。他的 3 个兄弟（第 4 个兄弟少年夭折）于 1812 年去到曼谷，几乎大部分时间都在那里，直到 1835 年安赞死后才回来。这意味着安赞在位的大部分时间，他是生活在柬埔寨的唯一王室男性成员。拉帮结派，尔虞我诈，历来是柬埔寨宫廷生活的传统特色，也在柬埔寨政治舞台之外——暹罗上演，19 世纪 30 年代后期，在泰国控制的柬埔寨省份里更是如此。

处于社会顶端的柬埔寨国王，远离臣民。学者们认为这种距离对 135
于一个亚洲国王是很正常的。他以一种无形的榜样力量统治他的王国，像阳光普照大地；国王扮演着功德和权力（这些被视为是可消耗的商品）监护人的角色，而功德和权力是他在通向王位的征途中积累起来的。有时候东南亚王权中纯粹的宗教或象征意义（像印度化文本中所传递出来的）被过分强调了。政治同宗教活动和宗教机构之间的界线

既没有严格划分也没有特别的重要性。在日常生活中，柬埔寨国王关心的不仅是自身的生存，还关注自己的宗教和仪式角色。用某个国王的软弱或错误为证据——这种证据很容易收集——来抹杀国王在宗教方面的重要地位是不正确的。国王是不可或缺的。根据《罗摩衍那》记载，没有国王的国“既不下雨又不播种，既没有财富也没有妻子，既不祭祀也没有节日”，[①]1840—1841 年间柬埔寨曾暂时没有国王，高层官吏非常担心，这显示出这些观念渗透的多么深。唯有国王有权授予官衔、官印和象征柬埔寨官僚阶级的标示。一部柬埔寨法律甚至规定，人们可以不服从一个没有官印的官员。[②]

除了开启柬埔寨官僚阶级外（这样的举动对农村生活不会产生持续的影响），柬埔寨君主也像东南亚其他地方的国王一样，主持部分婆罗门教、部分佛教和部分神灵崇拜的一系列仪式，在农村人看来，这些行为能界定国王的功绩和农业年的年景，并与能否丰收密切相关。仪式包括敬奉国王祖先和纳塔，开始和结束稻作周期，还有划分佛历和太阳历各个阶段。很多仪式中，通常有叫作巴库（***Baku***）的所谓宫廷婆罗门协助国王主持仪式，巴库还充当王室神器——神剑、神箭以及国王一生只能使用一次也就是在登基大典中使用的其他器物——的
136 守护者。很难断定这些神器是政治性的还是宗教性的。如果没有王室神器，即使国王可以统治——授予头衔，召集军队，等等——但他不能登位。他不能被授予国王称号，就像 19 世纪 40 年代的安东亲王，当时越南扣住神器，直到同泰人签订有利的和平条约后才将神器归还柬埔寨。

君主的权力尽管在文字记载中过分夸大，但在高层官吏和普通人的眼中国王的权力确实非同小可。感觉很多时候国王缺位时比在位时社会形势更为严峻。

---

① Gonda, *Ancient Indian. Kingship*, p. 36.

② A. Leclère, *Les Codes cambodgiens* (Paris, 1898), Vol. 1, p. 216.

柬埔寨与越南、暹罗的关系

正如我们讲到的，后吴哥时期的柬埔寨有两个最重要的特点，一是国家重心从吴哥向金边的转移，意味着商业和人口的移动；二是泰国和越南在柬埔寨历史中扮演角色。因此，研究 19 世纪的柬埔寨必须在一定程度上看到其对外关系背景。

柬埔寨同越南和泰国两个国家的关系，发生在两个大国相互竞争的框架之下。这种竞争源于任何一方都不愿承认对方在柬埔寨具有平等或优势地位。反之，双方的不情愿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追溯到朝贡外交的传统观念，朝贡外交强调朝贡者与受贡者之间的不平等地位。

确实，19 世纪东南亚外交的主要目的是通过正式礼品交换将国家之间的不同地位仪式化地表现出来。朝贡交换的规则源于它所发生的具体制度背景。例如，泰国和越南各有自己不同的规则，而在柬埔寨内部两种规则交错在一起。

泰国和越南的朝贡制度都学自中国，[①] 从公元前 3 世纪中国就实
行这种朝贡制度，直到 19 世纪初仍然在运行。从柬埔寨的观点看，泰 137
国朝贡制度的变体比较宽容，特性更加明显，因为泰国接受当地风俗习惯和产品，而越南则不然。越南人严格模仿中国样式。例如，1806 年，越南嘉隆（Gia Long）皇帝选择送给柬埔寨国王的礼物，就是仿造的他登位时中国皇帝赐予的礼物。其中，诸如“皇帝诰命金龙纸”和中国官服，对高棉人毫无意义。从顺化（Hué）送到乌东（Udong）的官印跟柬埔寨人毫无关系，因为上面刻的是骆驼，跟中国朝廷赐给中亚朝贡国的官印图案相同，偶尔也赠给越南。一位不解其为何物的柬埔寨编年史作者称这个动物为“中国狮子”。[②]

按照越南人的观点，越南“高于”柬埔寨，正如中国“高于”越

① 有关中国朝贡体制的分析，见 John K. Fairbank (ed.),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Cambridge, Mass., 1968)，特别是 pp. 1 - 19 and 63 - 89。

② 见 P. Boudet and A. Masson (eds.), *Iconographie historique de l'Indochine française* (Paris, 1931), plates 128 - 29。

南一样。与此同时，柬埔寨自然“低于”越南，越南又“低于”中国。换一句话说，越南在这组关系中是主人，在另一组关系中是仆人。作为这种双重身份的副产物，从顺化送往乌东的文明礼品是北京赐给顺化礼品的复制品，而从乌东送给顺化的礼品同顺化送给北京的礼品都属于野蛮礼品。①

就朝贡礼品而言，泰人比越南人更灵活。却克里王朝国王送给19世纪柬埔寨国王的礼物，都得到接受者的认可并且具有实用价值。作为交换，泰人无论得到什么贡品似乎都不计较。柬埔寨有时送胡椒，有时送漆器和小豆蔻。不过，还没有证据表明柬埔寨曾送过金、银饰树（*banga mas*），而这是其他附属国送给曼谷贡品的特点。②

同样的，安赞国王（1797—1835年在位）派到曼谷和顺化的使节会奉行不同的规则，派往曼谷的使节规模更大、更为频繁和更加非正式。两种外交制度的不同反映了泰人和越南人对待自己、对待对方和对待高棉人官方态度的差异。19世纪30年代，这些差异给高棉人带来严峻困难的局面，当时越南皇帝谋求按越南方式直接管辖柬埔寨。
138 然而，从柬埔寨的角度看，他们不在乎泰国和越南的朝贡制度及其对柬埔寨的态度是不同的还是提出不同的要求，他们在乎的是这些都是屈辱性的、重复的和耗费巨大的。

泰国和越南之间的官方关系，直到19世纪20年代恶化之前，在很大程度上是非正式的。③ 这某种程度上源于泰国和越南互相都不愿接受或施加权威，因为他们都享有大体相同的势力和声望。霸权问题并不是在他们同高棉人的关系中产生的，自己国家应当在柬埔寨中扮演什么角色，两国观念却是非常一致。例如，他们都认为柬埔寨人民是野蛮的和其国王应该顺从他们，由此推出，优越国家在柬埔寨要承

---

① 见 D. G. Deveria, *Histoire des relations de la Chine avec Annam du XVIe au XIXe siècles* (Paris, 1880), pp. 52－54。

② 见 W. Vella, *Siam Under Rama III* (Locust Valley, N. Y., 1957), p. 60。

③ Crawfurd, *Journal of an Embassy to the Courts of Siam and Cochin－China* (London, 1828), p. 146, “驻交趾支那大使昨天已经觐见国王。他们受到接见，据说没有很多礼仪，交往是友好和亲切的，并不拘泥于过多的形式。”

担一种文明使命。统治者在他们的官方信件中，认为自己是注定来监管高棉人的。如一封泰国外交信件所写的，“大国照顾小国，理应如此”。其他信件则把安赞称作一个“任性的小孩”，把泰国和越南政策在柬埔寨的汇聚看作“果实和种子孕育成一个单体”。

这些言辞只不过是现实政治的面具，但所描绘的景象却充满寓意。像东南亚的日常语言那样，外交书信中用的代词具有等级和家族导向，国家之间的关系经常被描述成“父母抚养孩子”的图景。在这些图景中，泰人和越南人分别成为高棉人的“父亲”和“母亲”，高棉的国王被看作他们的“孩子”或“仆人”。19世纪60年代，一个法国官员认为暹罗是柬埔寨的父亲，因为其国王给柬埔寨国王赐名，而越南被看作母亲，因为其君主赐给高棉人官印。[①] 不管是什么理由，像后来法国的宣言那样，泰国和越南的宣言等同于单方面宣布柬埔寨对他们的从属关系。比成这样的家庭图景并不合理，也很牵强，但给我们一种有效的方法来观察这一时期——日益不合的父母为争夺一个弱小而又经常不听话的孩子的监护权而持续斗争。

尽管泰人的政治思想经常用佛教术语来表述，而越南人的政治思 139
想则体现了越南式的儒家传统，但是泰国和越南都很少公开阐明它们对柬埔寨的目的，这一点两国倒很相似。像越南阮氏王朝一样，泰人王朝也热衷于沿边界扩展自己的威望，把自己的形象变成众望所归的国王。作为佛教保护者，泰人统治者还想将自己与转轮王（*chakravartin*）联系起来，他们已在阿瑜陀耶统治了好几个世纪。这些野心驱使泰越两国统治者扩大各自控制的土地和人口。

1810年以后，安赞国王及其顾问卷入了一场既无取胜希望、就连变革机会也微乎其微的权力政治斗争。他们没有选择。在越南人看来，柬埔寨是一堵围墙、一个缓冲国和一个殖民者的倾泻地。对于泰人来说，柬埔寨人是信佛的孩童，沐浴在却克里王朝的功德之下，他们要向却克里宫廷进贡小豆蔻，为却克里王朝的战争提供人力。泰人想要

① AOM, Fonds Indochinois A-30 (6), Carton 10.

柬埔寨人对他忠诚，而越南人想要进入柬埔寨的土地，并要柬埔寨国王承认越南的优越地位。泰人要求柬埔寨人的服侍和友谊，但鉴于自己组建军队的方式以及曼谷与金边之间的距离，他们不能向柬埔寨提供保护。另一方面，越南人倒是提供保护，但是他们的行动导致柬埔寨作为一个独立国家一度消失。虽然途径不同，但泰国和越南却经常干同样的事情：控制某一省，把柬埔寨国王及其亲属留作人质，以及削弱高层官吏的独立性。

对安赞和他的顾问来说，这场斗争的结果在开始时并不明显。在即位初期，他同越南的联盟可能只是为应对泰国的某种压力而采取的政策偏向。曼谷、乌东和顺化之间的信件往来时间很长，足够让安赞有时间多次对泰国人说一套，而对越南人说的又是另一套。另外，在他在位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通过向双方派遣使节的办法同两个首都保持公开的联系。安赞可能乐观地认为，在位初期的平衡态势是他所创
140 造的，而且他在两个保护者中间有很大的讨价还价的能力，而现实当中他这样的能力要小得多。从这方面说，他有些像自己弟弟的曾孙——诺罗敦·西哈努克——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统治柬埔寨的时候。

尽管泰国和越南的力量均势和不干预反映了他们基于自己国家利益认知所做的选择，尽管柬埔寨的独立暂时反映了泰越双方的野心有限而不是柬埔寨人自己的本领，安赞仍然有条件模糊他的忠诚路线。有一部编年史引用嘉隆皇帝的话，把这点说得很清楚：

> “柬埔寨是一个小国”，皇帝说，“我们应当像对待小孩一样支持他。我们愿意做他的母亲，暹罗愿意做他的父亲。当小孩受到父亲的虐待时，他可以拥抱母亲来摆脱痛苦。当母亲给小孩带来不幸时，他可以跑向父亲寻求支持。”①

---

① Institut Bouddhique, manuscript chronicle from Wat Srolauv, p. 23.

安赞并不是唯一会玩这种游戏的人。他在柬埔寨王室中的竞争对手也是这么做的，他们经常变动的忠诚使暹罗拉玛三世（Rama Ⅲ）国王在19世纪40年代早期写道：柬埔寨人总是为王位继承的事情相互争斗。失败者就出走向邻国求助；胜利者随后也向另一个邻国求援。"①

安赞的行动自由是一种错觉。他作为国王得以幸存，只是由于其中一个保护国和他所有的对手没有采取行动，而相对活跃的保护国向他提供军事援助。当不管哪一个保护国将注意力全部集中到柬埔寨的时候，安赞面对即将发生的垮台无能为力。像20世纪60年代西哈努克亲王、或者晚10年的波尔布特，只有大国允许他这样做，安赞才能保持中立。而安赞的不幸是没有世界性领袖或世界性的论坛让他投靠——没有毛泽东，没有东南亚联盟，也没有联合国。

---

① Rama III, *Collected Writings* (Bangkok, 1967), p. 140.

第 7 章　19 世纪危机

141 19 世纪的前 60 年是 20 世纪 70 年代大浩劫之前柬埔寨历史记载中最为黑暗的一段时期。柬埔寨多次遭泰国和越南军队的侵略和占领，经受了王朝危机和人口流离失所。19 世纪 40 年代，柬埔寨曾经一度不被承认为一个国家。如同阇耶跋摩七世整体思想在某种程度上可与民主柬埔寨的思想相比较一样，在外国入侵、局势混乱、柬埔寨人民遭受苦难方面，19 世纪上半期的柬埔寨同 20 世纪 70 年代的柬埔寨也有某些相似之处。

对历史学家来说幸运的是，很多泰文、柬文和越文资料保留下来。当然，这些资料也是不很完善。例如，在留存的资料中很少找到这个时期柬埔寨统治者安赞国王的言辞；他的手稿也没有留传下来；也就是说，一个关键性的演员没有台词。与此类似，当我们希望了解这个时期泰国对外政策的更多信息时，泰文资料也很少。

这个时期的开始和结束都以泰国主持的加冕礼为标志。两次加冕之间，特别在 1810 年之后，越南和暹罗的入侵同内部叛乱以及朝廷组织的抵抗入侵者的行动交织在一起，当时柬埔寨朝廷为了保持独立
142 （或者仅仅是为了生存下去），挑拨泰越之间互相争斗。尽管这个时期的政治史逻辑清楚，但是导致这些事件的政治内幕以及群众的动机却很难弄清楚。柬埔寨先是摆脱泰国的控制、后又落入越南人的手中、

最后又回到泰国的保护之下，这是这一时期的基本脉络。到 19 世纪 40 年代初期，柬埔寨的很多领土，特别是其首都地区，成为越南的一部分而受其管辖。在柬埔寨命运变迁中有 3 个显著事件值得研究。这些事件分别是：18 世纪 90 年代泰国以吞并柬埔寨西北部支持安英登位；1820 年在柬埔寨东南部爆发反越的宗教起义；1835 年紧随泰国灾难性军事远征之后的危机。上述每个事件都标志着柬埔寨控制本国事务的能力逐步削弱。

越南控制柬埔寨

1794 年安英复位在柬埔寨编年史中被当作一个奇迹般的事件。编年史这样记载，当安英离开曼谷时，"既不阴天，也不下雨，但雷声响彻天空，声音像是一场暴风雨来临"。① 安英的复位确实富有戏剧性，因为在此之前的 15 年间，柬埔寨全然处于无人统治的状态。在这期间，泰国将一个名叫巴恩（Baen）的前官员安置到乌东，并赐予塔拉哈即第一大臣的头衔，而巴恩一直忙于招募军队，征讨柬埔寨和越南境内的西山（Tay Son）越南人政权。在为泰国效劳这么多年之后，1794 年泰国君主拉玛一世（Rama I）似乎感到有必要以某种方式给他赏赐。

然而，他想要的赏赐几乎不可能给他，因为他要的是包括马德望（Battambang）和马哈诺科（Mahanokor）两省（即"大城市"的意思，包括吴哥遗址在内）的一大片繁华之地。早在 18 世纪 80 年代的部分时间里，巴恩实际上已经掌握这个地区的统治权并在那里拥有自己的追随者。为了将两省赏赐给巴恩，拉玛一世将这两个地区从安英的管辖中分割出来，但没有并入暹罗。在 18 世纪 90 年代和 19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泰国对此地区的宗主权似乎只体现在巴恩及其继承者无需 143
向安英提供劳役以及必须经常向曼谷进贡，一般是送野生的小豆蔻。

---

① Eng Sut, *Akkasar mahaboros khmaer* [Documents about Khmer heroes] (Phnom Penh, 1969), p. 1013.

现在不可能找到关于转送土地的细节，或许根本就没有有关文件留下来。其实，19 世纪 60 年代，一名在柬埔寨搜集有关泰国领土主张情报的法国官员，在向上级的报告中写道："暹罗不可能拿出任何关于领土割让的文件。包括柬埔寨现任国王——安英的孙子诺罗敦、他的官员、已经成为顾问的老人、安英仍在世的妻子，所有人都认为不存在这方面的任何文件。"①

20 世纪柬埔寨丧失这两个省，当然损害了泰—柬关系。1907 年在法国的压力下，暹罗放弃了这两省，但在 1941 年至 1946 年又恢复对两省大部分领土的控制。然而，根据 18 世纪 90 年代的情景，拉玛一世不大可能实行一项长远计划，他的孙子拉玛四世，将事情说得很简单："泰王国之所以［在这个时期］能够实现扩张，是因为它实力更为强大。"②

1796 年安英在乌东建起王宫并且率领朝贡使团访问曼谷，次年初便去世了。他在位期间似乎一直平静无事，他对柬埔寨历史的重要贡献几乎都被忽视了。乌东已经很久没有国王了，他的回归给柬埔寨带来了复苏。作为四个儿子的父亲，他建立的王朝先后在乌东和金边定都，一直延续到 1970 年，并且在 1992 年复兴。可能正是这两项贡献，而不是其他具体的措施，才使其在自己后代编纂的编年史中受到尊敬。

有关随后 10 年（一直到 1806 年他的儿子安赞加冕）的文献资料很少。我们仍不清楚这位年轻王子为什么在某些情况下疏远泰国朝廷而似乎开始奉行亲越南的对外政策。无论是什么原因——泰国的资料暗示年轻王子和拉玛一世之间一直不和——安赞的反泰倾向是贯穿其

---

① AOM, Fonds Indochinois A - 30 (12), Carton 11. Doudart de Lagrée 致交趾支那总督函, January 8, 1866。

② 引自 C. Wilson, *State and Society in the Reign of Mongkut, 1851 - 1867* (Ann Arbor, Mich., 1971), p. 983。类似的，1945 年，Charles de Gaulle 告诉法国学者 Paul Mus，"我们将回到印度支那，因为我们是强大的"。"*Nous rentrons en Indochine parce que nous sommes les plus forts*"，见 Chandler and Goscha (eds.), *L'espace d'un regard: Paul Mus 1902 - 1969* (Paris, 2006), p. 33。

漫长统治时期的主题。①

例如，安赞刚加冕，就急于加强对越南的朝贡关系，同时维持对泰国的顺从，用越南皇帝的话说是“为两个国家当奴隶的独立国家”。144
②这一过程甚至更加复杂，因为安赞对泰国日益加深的憎恶也疏远了柬埔寨一些地区首领，特别是西北部，并且大约在这个时期他向越南皇帝请求允许他招募柬埔寨的越南侨民组成他个人的卫队，这件事表明他人身安全很难保障。1809年拉玛一世逝世以后，安赞加快了疏远曼谷的步伐。安赞拒绝出席拉玛一世的葬礼，而且有两个参加葬礼的官员表露出亲泰国的迹象后，安赞将他们处死。

1811—1812年，在柬埔寨境内发生了泰国军队和越南军队的冲突。泰国支持安赞一个持异见的兄弟；越南则应安赞的请求给予帮助。虽然1811—1812年战役并没有决定性意义，但安赞的3个兄弟此时都逃往曼谷，使他得以自由地奉行亲越政策。随着对越南的依赖日益加深，程度大大超过了以前对曼谷不情愿的忠诚，造成的主要影响是安赞的行动自由受到削弱。柬埔寨国王及其随从必须每月两次穿着顺化赐给的官服去朝拜金边附近的越南寺庙——1812年首都迁往金边——向刻有越南皇帝名字的牌位鞠躬。随后20年，安赞一直争取一定程度的独立，但很少成功。

早期越南的控制相对松弛，柬埔寨发生了3件引人注目的事情。它们分别是：1816年柬埔寨对西北省份不成功的进攻；1820年前后，利用柬埔寨劳动力开凿越南南部的永济运河（Vinh Te Canal）；随后在柬埔寨东南部和越南高棉人聚居区爆发的反越起义。

1816年的军事行动是20世纪70年代以前由柬埔寨正规军发起的最后一次反抗外国军队的尝试，但是这次行动失败了。或许是为了安抚泰国人，或者仅仅是因为军事行动失败，越南驻金边当局要求安赞

① 泰国方面的证据见 David Chandler, *Cambodia Before the French: Politics in a Tributary Kingdom 1794 - 1847* (Ann Arbor, Mich., 1974), pp. 83 - 84。还见 Khin Sok, *Le Cambodge entre le Siam et le Vietnam* (Paris, 1991)。

② *CMH* 2/1173/19 ko. 还见 *DNTL*, Vol. 3, pp. 146 - 47。

惩治指挥这次军事行动的高层官员。这个官员随后逃往西贡，在那里
145 受到斥责和罚款。这一系列事件本身意义不大，但却是安赞在越南压力面前孤立无助的缩影。

永济运河后来成为越南人奴役高棉人的象征，运河开挖之后爆发的起义反映出地方人民反越情绪之深、对幸福未来坚持不懈的追求以及安赞臣属越南的态度并不明朗。① 1817 年，西贡的越南官员征集数千越南人和一千柬埔寨人来开挖——或者也许仅仅是为了修复——永济运河，这条运河连接暹罗湾和朱笃（Chaudoc）城寨，长约 40 公里（25 英里）。根据 19 世纪 50 年代柬埔寨编年史的记载，开挖运河的工作极其艰苦："劳工被分成许多组。一个越南人走在每个组的前头，另外一个在后面，第三个在中间。越南人从后面抽打柬埔寨人，让他们赶快干活……每一个柬埔寨劳工都筋疲力尽，满身泥泞。"②

在编年史记载中，紧随开挖运河之后就记述了其他资料所记载的 1820—1821 年反越起义。这表明两件事情存在着一种因果关系，而起义就发生在靠近运河的地方，这一事实进一步支持了上述观点。这个地方就是巴普农，一座位于柬埔寨东南部的小山，18 世纪后期被确认为是阇耶跋摩二世执掌大权的地方。19 世纪巴普农是一个重要的人口中心，也是宗教圣地。③ 巴普农起义由一个名叫凯（Kai）的还俗僧人领导，他自称是能够预言未来的圣者。他将许多据称刀枪不入的支持者聚集在自己周围，发起一场政治运动。他的追随者从巴普农附近向北和向西行动，袭击越南的军事要塞。安赞派出一支由高棉人和越南人混编的军队前往镇压，但遭到失败，有资料显示，失败的原因是负责这支军队的大臣临阵脱逃背叛越南人。然而，西贡派来一支完全由

---

① 有关这次起义的讨论见 David P. Chandler, "An Anti - Vietnamese Rebellion in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 Cambodia", 载 *Facing the Cambodian Past: Selected Essays, 1971 - 1994* (Sydney and Chiangmai, 1996), pp. 61 - 75。又见 *DNTL*, Vol. 5, pp. 85ff. , *DNTL*, Vol. 6, p. 107; L. Malleret, *Archéologie du delta de Mekong*, 4 vols. (Paris, 1959 - 63), Vol. 1, pp. 27 - 33。

② Institut Bouddhique, manuscript chronicle from Wat Prek Kuy (1874), p. 27.

③ 见 David P. Chandler, "Royally Sponsored Human Sacrifices in Nineteenth Century Cambodia"。

越南人组成的军队，最终在磅湛省附近打败了义军。领导者在西贡被处死，一些追随者在金边被杀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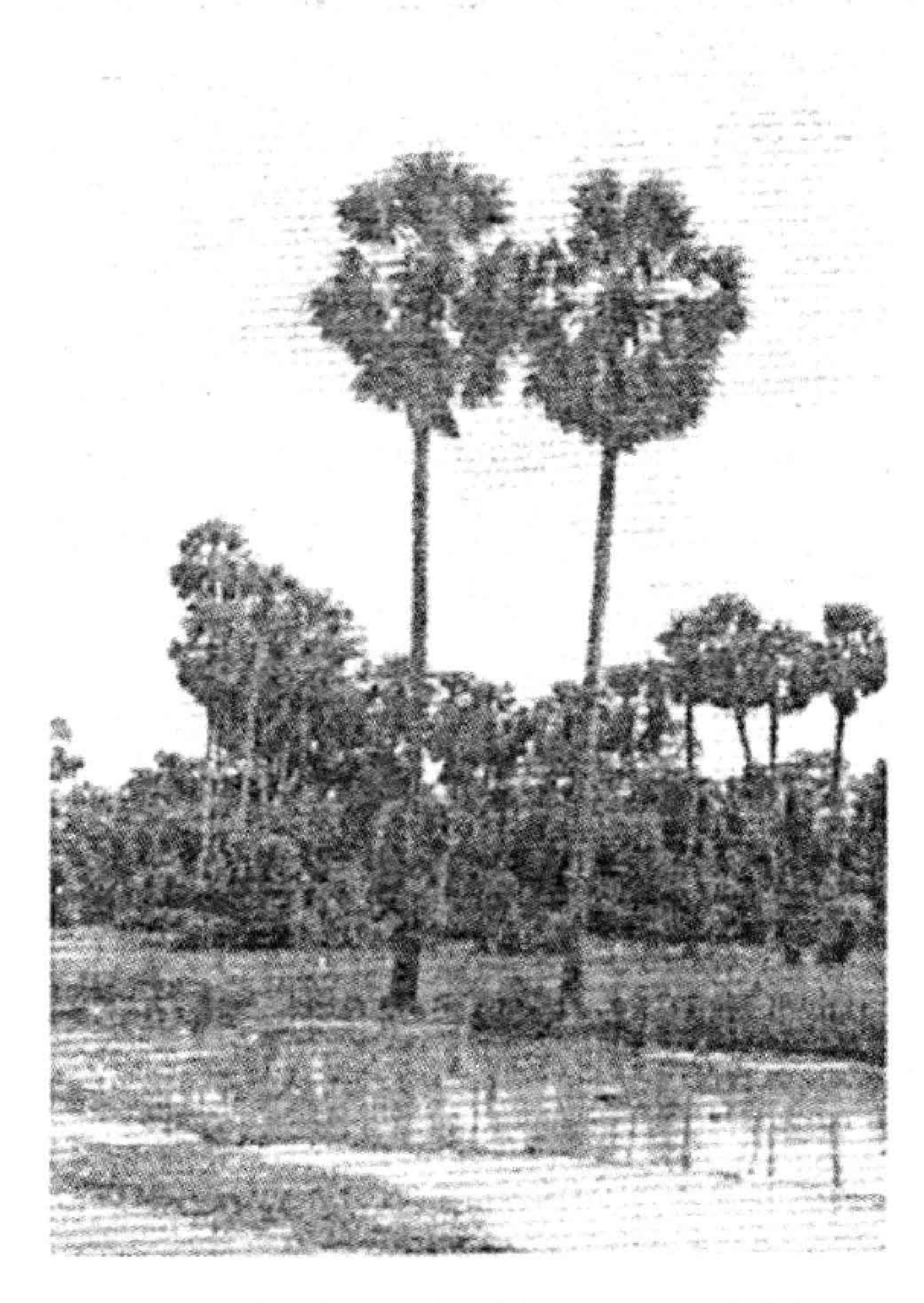
柬埔寨和越南对于起义的不同记载引出几个有趣的问题，如安赞忠于谁。凯在金边当和尚的时候安赞应该认识他，无论如何安赞国王都不可能坚决反对一名被认为是具有超自然能力的高棉人，在他统治末期越南人认为他是“极端迷信”。无论安赞持什么观点，他对这场起义的反应是慎重和有节制的。这和1884年他的侄子诺罗敦国王面临的情势相似，当时在农村地区爆发了由高层官吏领导的反法起义，而诺罗敦在金边正处于法国人保护之下。继而，他的曾孙诺罗敦·西哈努克在20世纪50年代也面临类似问题，继任政权在1970—1975年间也是如此。[①] 146

我们不清楚起义有多大规模以及在军事和领土方面构成多大威胁；除了暗杀越南人以外，关于起义目标我们知之甚少。越南的记载贬低这次起义的意义是可以理解的；而当地的地方志（*bangsavatar*）则可能夸大其规模、力量和成就。不管怎样，所有的记载都认为起义反对的是越南人而不是安赞及其高层官吏，也都认为僧侣、还俗的僧侣和地方官员在起义队伍中很活跃。

19世纪50年代编写的编年史往往想证实读者关于他们自己、越南人和这段历史的看法。所有的越南人被描述成残忍的，而“有功德的人”（*nak sel*）是强大的，高棉人不能（或至少不应该）自相残杀。编年史记载“有功德的人”的信徒借助祈祷和护身符是无敌的，但是如果因杀自己人而违背佛教教规就失去无敌的能力，我们从这可以看出书中充斥着佛教思想倾向。起义者，包括以前的僧侣，没有因非暴力而带给自己特殊的能力，他们全被杀害。当他们被杀的时候，“大雨下了七天，日夜不停。普通百姓和当权者都被迫跑去避雨。每个人都在寒风中晃动。不知道太阳何时落下何时升起。国家陷入悲伤”。[②]

① 见本书第9章。

② Manuscript chronicle from Wat Prek Kuy, p. 58.



2006年的柬埔寨风景（图片提供：汤姆·钱德勒）

威胁的氛围、实实在在的危险和随意的暴力行为弥漫在诸如此类
147 的原始资料和19世纪柬埔寨的日常生活中，我们很难再有所夸大。资料中充斥着有关拷打、处决、伏击、屠杀、焚村和强迫百姓迁移方面的记载。当时发生的战争是局部的而不是全国规模的，入侵军队通常只有几千人，按20世纪的标准看规模很小。入侵者和防卫者所到之处，都同样摧毁村庄，杀死或驱逐他们所碰到的人，毁灭他们经过的景色。几乎没有俘虏能够活下来。由阿代马·勒克累翻译的一部17世

纪柬埔寨法律，记载一支远征军仅仅需要三天的食物供应，因为他们认为不友好的居民（可能是洗劫对象）不会超过三天就得离开。[①] 20世纪70年代给柬埔寨带来巨大破坏的内战及战争双方的行径，同这次非常相似。

这个时期的一个历史之谜是安赞其人。除了他的胆小以外，我们对他所知很少。1822年的一本越文书籍说他长期多病深居简出。[②] 148
1834年，就在他死前，越南皇帝曾说他已是“风声鹤唳”。[③]与此同时，安赞保持着相当程度的行动自由。整个19世纪20年代他保持着同曼谷的公开联系。安赞每年都向曼谷派朝贡使团，并可能利用使团向泰国官员提供情报、试探泰国的政策以及保持同兄弟们的接触。

由于越南支持1824—1825年在万象周围爆发的反泰起义，越泰两国关系在19世纪20年代破裂。两国关系的破裂还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19世纪30年代顺化和曼谷统治者——明命皇帝和拉玛三世——与他们的父辈不同，之间互不亏欠，可以毫无顾忌地推行雄心勃勃的对外政策，其中一项政策是提高对柬埔寨的影响力，从而导致柬埔寨宫廷冲突。明命帝也对越南驻柬埔寨总督黎文震（Le Van Duyet）产生怀疑，认为他同越南南部的分离倾向有联系——后来事实证明这种怀疑是正确的。[④]

泰国于1830—1831年在柬埔寨西部进行了一些试探性的军事行动，但直到1832年黎文震死后拉玛三世才看到成功的机会。当时明命帝试图以忠于顺化的官员替换总督身边的随从官员，这一举措引发了由黎文震养子领导的、针对西贡的大规模叛乱。

当叛乱的消息传到拉玛三世那里，他决定派遣一支远征军。他认为这样做会带来许多好处。他可以借此羞辱明命帝，明命帝的兵力此

① A. Leclère, *Recherches sur le droit publique des cambodgiens* (Paris 1894), p. 151.

② *DNTL*, Vol. 7, p. 79.

③ *DNTL*, Vol. 14, p: 123.

④ 见 Choi Byung Wook, *Southern Vietnam Under the Reign of Minh Mang (1820 - 1841): Central Policies and Local Response* (Irhaca, N. Y., 2004), p. 95。

时正忙于应付万象的叛乱和泰国朝贡国老挝其他的地方。另外，拉玛三世还打算通过在越南南部扶持一个朝贡国，来扩大泰人和泰国华人的商业利益，能从西贡/堤岸（Saigon/Cholon）同中国南方的贸易中获利，因为越南的中国商人已经支持叛乱并通知了他们在曼谷的伙伴。最后，从柬埔寨送给拉玛三世的报告说，很多高层官吏欢迎安赞的两个兄弟安恩（Im）和安东（Duang）回国（第三个兄弟已在1825年死
149 于曼谷）。拉玛三世对此印象深刻，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恢复柬埔寨王国和惩罚越南傲慢”的时机已经成熟。①

短期内军事行动取得了成功。越南人很快放弃金边并挟持安赞流亡到越南。泰国指挥官昭披拉耶（Chaophraya，大概相当于“领主”）博丁（Bodin）占领了都城，但由于同协助远征军的海军缺少联系（海军本打算进攻越南海岸），再加上越南人的反攻，很快迫使他在1834年初撤出。②

泰国将安恩和安东扶上王位的政治战略也遭到失败，因为这二人得不到支持。一部编年史记载战争初期当博丁的军队进入柬埔寨时所见到的人们的疑惑情景：

> 百姓惊讶地看到这么多的军队，吓得发抖。军队的头目朝他们喊道：“不要怕！国王陛下已经来统治你们。”百姓对此窃窃私语，他们派信使到金边禀告国王［即安赞］。③

博丁从金边撤退时，掳走了大约4000名当地居民。当负担过重的泰国军队到达乌东时，大约已有1000名居民成功逃走。这些人“惊恐地逃进深林”。④当泰国军队退到北部和西部时，已经溃不成军，大约

---

① Rama III, *Collected Writings* (Bangkok, 1967), p. 142.

② Chandler的 *Cambodia Before the French* (pp. 113 - 18)，对此军事行动有讨论。

③ Chronicle from Wat Prek Kuy, p. 61.

④ *DNTL*, Vol. 14, pp. 53 - 54. 绑架城镇居民是殖民前时期东南亚战争中普遍存在的一个特色。1975年4月，这一手法有点报复性的再现，当时柬埔寨共产党将超过200万城镇居民驱赶进农村。见本书第12章。

与此同时，西贡的叛乱最终被镇压下去。

1835—1840 年柬埔寨越南化

在 1834 年早期，安赞回到在战乱中荒废的都城后，发现自己处于越南人更严厉的控制之下。泰国陆上战事的胜利让明命帝明白他不能依靠金边为越南南部和西部边界提供保护，在镇压了南部叛乱后，他着手加强和巩固对柬埔寨的控制。明命帝任命大将张明讲（Truong 150
Minh Giang）在柬埔寨推行同化政策，正是他粉碎了西贡的叛乱。

张明讲要求安赞国王及其官员向越南提供劳役、大米和兵源。安赞似乎不太需要越南人的物质条件，但很可能要依赖他们提供保护，防止自己遭到刺杀和国内爆发起义。像以后的侵略者在柬埔寨所推行的一样，张明讲可能对国王和高层官吏的期望值太高。在 1834 年底之前，他悲观地向顺化报告说：

> 我们试着根据柬埔寨官员的功绩和过失给予惩罚和奖励。我们要求国王给予帮助，他却推三阻四。经过对局势的研究，我们认为柬埔寨官员只知道怎样去行贿和受贿。卖官鬻爵，违命不从，自私自利。当我们要招募士兵时，国王非常愿意，但官员却刻意隐瞒人口数字。我们想要编写一份有功官员名单时，［官员非常愿意，但］国王不愿意，嫉妒此事。在过去的四个月里，一事无成。①

张明讲的失去耐心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个时期（如我们所见，或许柬埔寨历史多数时期都是这样）的柬埔寨政治呈现以下特征：权力分散，缺乏资源，官职可以商量——这样能有效防止有人长期掌权。柬埔寨人总是对于越南人交给的任务犹犹豫豫，张明讲认为这是对他的侮辱甚至是背叛，但是明命帝劝他尽量用手中的资源安抚他们。

① *DNTL*, Vol. 15, p. 113.

同时，博丁在暹罗人统治的西北部驻扎大量军队。19 世纪 30 年代，泰国增强了其在马德望和暹粒的军事存在，这两地名义上置于安恩和安东执政管辖，以吸引当地人的支持，抵制越南人。越南人则在南部和东部地区进行激烈的越南化政策，这影响到柬埔寨人生活的方
151 方面面。该政策于 1834 年启动，但在 30 年代后期，也就是明命帝在位的最后几年里，该政策在泰国入侵的威胁下最终破产。

越南化政策的早期的受害者是安赞国王自己。根据越南史料记载，1834 年安赞在一些“巫师”的影响下走向灭亡，这些巫师公然鼓动他接受贿赂“释放囚犯”。[①]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所谓的巫师仅是希望安赞表现得更像一个传统君主，但是他们对安赞的影响让张明讲非常不悦，随即逮捕并处死了他们。对安赞来说，他为自己和百姓争取生存和独立的斗争也走向了尽头。1835 年早期，患病一个月之后，安赞死在自己的皇家用船上，而他的船恰巧停靠在金边被毁的皇宫对岸。安赞终年 44 岁，通过多种方式统治柬埔寨近四十年。

安赞的去世给越南人带来了难题，他没有子嗣，他的大女儿安贝（Baen）公主被怀疑有亲泰国倾向。安赞死后没多久，高级官僚同意越南人的建议，由安赞的二女儿安眉（Mei）公主即位国王。明命帝从西贡派来一名越南官员主持安眉的登基仪式，在特意为此而建的大殿中，安眉和她的姊妹面向北方，对着明命帝授予她王位的敕书，而越南使者和其他官员则面向南方，如同越南皇帝在顺化皇宫一样。[②]

仪式跟柬埔寨传统加冕仪式完全不同，但在柬埔寨人看来，能够授予女王头衔和印玺（以及能够主持皇家仪式）意味着安眉是他们的女王。[③] 对于越南人来说，他们只把女王视为受保护国象征性领导人，相比于这些仪式问题，张明讲根据明命帝要求而准备推行的行政改革更为重要。以前越南人在金边的要塞称为“安南”（Annam），现在则

---

① 同上，p. 232。

② *DNTL*, Vol. 16, pp. 21 - 22, 106.

③ 有关安眉女王的讨论见 Trudy Jacobsen, *Lost Goddesses: The Denial of Female Power in Cambodian History* (Copenhagen, 2007)，第 5 章。

将金边及其周围地区改名为“镇西”（Tran Tay），柬埔寨所有省份都改用中—越名字。日常的行政决定，包括人事任命、薪水、军事和大米供应，都掌握在越南人的手中，越南还将 16 名官员、70 名秘书和 152
10 名学者派到金边组成行政机构的核心。不过，直到 1839—1840 年期间，各省的行政权力，包括事关重大的劳役动员，仍然掌握在高层官吏手中，他们仍然认可柬埔寨皇室公章，即使他们的任命经过越南人的批准。

明命帝的越南化政策包括多个方面。迁移和武装高棉人，移民越南人到此殖民，改革柬埔寨人的生活习惯。明命帝还以军事需要为目的，统一测量、移民和食物供应的标准。其中最核心的政策是控制成年男性的人口数量和组建一支可以抵制泰国入侵的常备军。因为很多高层官吏不愿意放松对追随者的控制，这给越南军人招募带来困难。实际上，越南人很快意识到占族雇佣兵是唯一他们能够招募的兵源。

鉴于高棉人的民族性在行政管理上带来很多麻烦，明命帝寻求用越南人殖民该地区。他为这一政策辩解说：“军囚和一般犯人，如果关在监狱里，将证明是无用的，因此，把他们送到柬埔寨与当地人生活在一起会更好，当地人会从他们的传教中受益。”这种越南罪犯优于清白高棉人的观点反映出越南在柬埔寨推行“同化使命”的另一方面。①

19 世纪 30 年代越南对柬埔寨的政策预示法国殖民时期的“教化使命”（*mission civilisatrice*）实际上是在削弱和拆除越南人留下的制度。在给张明讲的一份冗长的敕令中，明命帝概述了他的政策：

> 现在，野蛮人［在柬埔寨］已经成为我的孩子，你应该帮助他们，教他们我们的风俗习惯……例如，我听说这块土地是美丽富饶的，那里有大批的牛群［可用于耕地］……但是当地人不掌

---

① *DNTL*, Vol. 18, pp. 249 – 50. 还见 *DNTL*, Vol. 19, p. 55，书中讨论了这一制度的某些缺点。Choi Byung Wook 的 *Southern Vietnam*,（p. 96），称 1835 年是“柬埔寨变成越南一部分的一年”。

> 握［先进］农业知识，使用镐和锄而不是牛耕地。他们生产足够一日两餐的大米，但不会储存盈余粮食。像衣服、丝织品、鸭子和猪肉等日常必需品非常昂贵……现在所有的这些缺点都源于柬埔寨人的懒惰……我敕令你做下面的事：教他们使用牛，教他们
> 153 生产更多的大米，教他们种植桑树，养猪和鸭子……至于语言，则应教他们说越南话。还要学［我们的习俗］穿着和用餐方式。如果有过时或野蛮的风俗，能简化的简化，能压制的压制。[①]

明命皇帝最后建议张明讲要谨慎进行社会改革。敕令中写道："让好的思想渗入进去，把野蛮人变成文明人。"[②] 速度并不重要，"只要能够赢得他们的心，能够教化他们，我们宁可慢慢地推行。"[③] 在随后的一份记录中，明命帝意识到即使是缓慢推行也难以成功，因为"野蛮人的风俗同我们是如此的不同，即便我们占领柬埔寨全境，也不一定能够改变他们。"[④]

并没有记录说明越南人成功改变柬埔寨人的农业技术，尽管在19世纪30年代的信函中这是一个被多次提到的话题。同样的，越南人量化和系统化土地、税收和灌溉工程的努力同样收效甚微。越南人留给高棉人印象最深的似乎是他们持续不断地强征劳役和文化改革，企图从观念深处动摇高棉人的自我特性。其中一项措施是要求高棉人穿裤子代替以前的裙子，留长发而不是剪短发。根据一名越南作家的记载，柬埔寨其他"野蛮"风俗还包括，穿边上没有裂口的长袍，缠腰布，用手指抓着吃饭，跪着问候而不是直着身子问候。[⑤] 两个民族生活在一条文化分界线的两侧，这或许是一条最清楚反映19世纪东南亚的分界线之一。到20世纪70年代，这种分界先是被朗诺后是被波尔布特

① *DNTL*, Vol. 17, p. 30.
② 同上，p. 230。
③ *DNTL*, Vol. 19, p. 238.
④ 同上，p. 329。
⑤ G. Aubaret (tr.), *Gia Dinh Thung Chi* [History and description of lower Cochin China] (Paris, 1867), p. 131.

给硬生生地取消了。①

明命帝在他的思想框架中，努力试着去了解柬埔寨，公平对待柬埔寨人民，改善他们的生活方式。这在几次给柬埔寨有功官员的奖赏 154
命令中有所体现。有一次，他要求臣下送他一份有关柬埔寨历史的材料，因为，除了其他方面，高棉“是一个超过1200年历史的民族，但是从越南人和中国人的统治朝代看，我们并不知道它是从确切的哪一年开始的”。②此前，明命帝曾叫张明讲呈送一份详细资料（有关柬埔寨的）：

> 风俗、民族和农业生产。我想知道这个民族是否繁荣，柬埔寨军队是否经过训练。我还想了解这些野蛮人是否学会越南人的生活方式，他们是否幸福。③

在另一份记载中，明命帝计划用越南官衔替代柬埔寨官衔太守，先从靠近金边的省开始实行。1839年他听说柬埔寨高级官僚继续用柬埔寨而不是越南的头衔，非常生气：

> 在镇西，[皇帝说] 柬埔寨官员都是由吾朝授予官衔，然而，我获悉在通信和谈话中他们仍然使用柬埔寨的官衔……必须告诉柬埔寨人，朝廷赐予他们的官衔称号是一种荣誉，因此，在谈话中，他们应当用我们的官衔而不是他们的。④

① 见 David Chandler, *The Tragedy of Cambodian History: Politics, War, and Revolution Since 1945* (New Haven, 1991), pp. 203－4。虽然在20世纪90年代时反越种族主义有所减弱，但1998年选举中有政客指责柬埔寨执政党是越南的傀儡，再次激起反越情绪。2003年1月在金边爆发了反泰骚乱，这次骚乱得到政府的支持。见本书第13章。

② *DNTL*, Vol. 19, p. 310.

③ *DNTL*, Vol. 18, p. 225. 1839年明命帝曾命令对柬埔寨的原材料进行过调查，见 *DNTL*, Vol. 21, pp. 239－40。

④ *DNTL*, Vol. 21, pp. 173, 235.

在泰国的保护下安赞的兄弟安东在马德望生活了多年，1837 年一系列令人费解的事件最终导致他被泰国人逮捕，用锁链押解回曼谷。有资料表明，来自金边的越南密使试着诱骗他回到都城，许诺扶立他为国王。安东的答复非常含糊，以至于让泰国人和越南人都相信他有背叛之意，怀疑他企图利用在都城地区的高层官吏来召集支持者，重新恢复安赞时期多少有点的独立。[①]

155 此时，越南人对泰国军队调动日益担忧，而他们在柬埔寨的改革进展缓慢，导致越南强化在柬埔寨的统治机器。1837—1939 年不断涌起的反越起义，既是越南人改革的原因，也是改革的一个后果。根据越南史料记载，他们的战略调整有四部分。最重要的改革是重新调整柬埔寨省份，用越南人替代当地人做各地的太守。在为这些岗位选人的过程中（似乎从未填补过人选），越南各部门找了“大约二十名”低级官员，他们的受教育水平远不及他们的农业经验和军事领导才能重要。第二项政策是开垦更多耕地，训练更多当地士兵，储存更多稻米，目的是解放越南军队和依靠南越的雇佣军。第三，教柬埔寨人说越语以“提高沟通能力”。最后，越南继续鼓励中国移民和越南罪犯殖民柬埔寨，虽然记载中张明讲曾在这年早些时候最大程度地向明命帝指出该政策的危险性。

这些改革措施致使泰国编年史记载明命帝称高棉人为“新越南人”。[②]越南人认为改变称谓与之前改变柬埔寨人的度量衡、服饰和头饰一样不会带来什么危害。在改革措施中，其中旨在替代各省太守的政策是导致 1840—1841 年反越起义爆发的主要原因。显然，当越南人以这种方式削弱柬埔寨地方统治时，高层官吏可以很容易召集追随者捍卫现状，而不愿接受越南人可能可能更为平衡和富有远见的管辖。这与 20 世纪 80 年代反对柬埔寨人民共和国管辖有着非常有趣的相

---

① *DNTL*, Vol. 19, pp. 88 - 89. 还见 DNTL, Vol. 16, p. 109。

② Thipakarawong, *Phraratchapongsawadan Chaophraya* [Royal chronicle] (Bangkok, repr. 1961), Vol. 2, p. 9. 1838 年明命帝的一名顾问建议“允许柬埔寨当地人自我统治和征税”，这样能够节省越南的支出。而明命帝警告他不要再提这样的建议。

似性。[1]

1839年12月，受泰国支持的安恩王子在其兄被囚禁后，在几千人的追随下逃回金边，他错误地相信越南人会扶持他登上柬埔寨王位。他一赶到都城，就被张明讲逮捕，先后被押解到西贡和顺化，从而清 156
除了另一位王位继承者。[2]

1840年初，当听说此事后，泰国旋即在马德望加强驻军作为应对。昭披拉耶博丁来此调查安恩的叛变，他发现在300名在省里担任某种官职的柬埔寨人中有近二百人已经逃走。由于很难确定能否得到当地人的支持，博丁推迟全面入侵柬埔寨的计划。[3]

爆发于1840年9、10月的抗越起义在5月份已进入计划阶段。实际上，自从1836年以来，每年都断断续续爆发起义。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柬埔寨持续恶化的状况迫使明命帝强化越南人的统治。其中一项措施是加强赋税征收。传统上，赋税都是通过高层官吏征收；然而，用大米和布匹支付的税款并不足以支持驻柬越南军队和官员的开销。1840年，明命皇帝颁布法令，重新丈量柬埔寨可耕土地，包括降雨量、谷仓和灌溉工程都记录在册，这样就可以保障越南在柬埔寨的经营。明命帝补充称，在此后6年会一直提出类似要求，但实际上却很少能实现。[4]

到1840年6月，明命帝已失去耐心。他将安眉女王和她的两个姊妹降职，让她们担任低级别的越南文职官员。随后，包括塔拉哈在内的六名最高级别的官员遭逮捕，并被押解到西贡，指控他们伪造人口统计记录，“隐匿”约15000名需要服兵役和劳役的人。[5] 逮捕是秘密进行的，追随者认为他们的首领已经死了。这些官员的失踪是导致起义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

① 例如，见 Nguyen Khac Vien and Françoise Corrèze, *Kampchea* 1981: *Témoignages* (Hanoi, 1981)。

② *DNTL*, Vol. 21, pp. 269 - 72.

③ Chandler, *Cambodia Before the French*, pp. 140 - 41.

④ *DNTL*, Vol. 20, p. 263.

⑤ *DNTL*, Vol. 22, p. 157.

实际上，越南人在柬埔寨设置的行政管辖模式是可行的，之所以失败与他们在殖民早期倾向于借助高层官吏有关，高层官吏对越南的忠诚时有时无，他们的统治模式——建立在畏惧、傲慢、附庸、地方裙带以及忠于亲属与其他官员的基础之上——既不同情也无益于越南
157 人的管理。大多数高层官吏偶尔得到越南人的奖励似乎就足以让他们兴奋。他们没有表现出成为儒教文官的迫切愿望。与他们合作，越南人虽然没有达到什么目标，但如果是采取一种放任自由的政策，大多数高级官僚没有理由拿起武器反抗。

然而，当1840年越南人自己接管柬埔寨各省的行政管辖时，他们可以更进一步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柬埔寨人，同时也不可避免的激起反抗。随着泰国入侵的日益迫近，再加上没能让高级官僚认识到越南在柬埔寨的经济军事利益与他们自身利益一致，越南人别无选举，只有放弃柬埔寨。明命帝政策的失败归因于他没能看到“未开化人”在面对家长式管理变革面前所表现出的不妥协态度和忘恩负义。在1838年给柬埔寨人的敕令中，他斥责这种忘恩负义行为的不可理喻：

> 幸亏……我的宽宏大量，将帝国军队派到柬埔寨，耗费了千万钱财，消灭了泰国人的入侵，带给你们安全。越南军队驻扎［在你们中间］是带来和平。这一越南人的行为就像是把柬埔寨人民带出泥泞，躺在温暖的羽绒床上一样，这是人所共知的……任何能够自我思考的人都应该感恩于朝廷；为什么还有人憎恨我们，相信叛军？①

1840年9月，形势更为严峻，大规模起义爆发。这场集中在东部和南部省份的起义，是革命前时期柬埔寨少有的一次具有持续性和协调性的政治运动；闪入人们脑海中的其他类似运动只有1885—1886年的反法斗争和所谓的1916年事件（见第8章和第9章）。饱受越南归

---

① *DNTL*, Vol. 20, p. 7.

化政策煎熬的高层官吏，已有数月在私下讨论起义事宜，今天我们从一些信件的日期、地址和大体内容中可以获悉这一情况；这些信件本 158
身似乎并没有保存下来。[①] 越南人一系列激化措施，再加上柬埔寨人预期泰国人会发动入侵并会支持起义，这些促使起义爆发。1841 年早些时候，起义运动遭到瓦解，当时越南新君登基，起义队伍所期盼的泰国入侵恰逢越南人刚取得军事胜利，而起义队伍缺乏补给。19 世纪 40 年代前期的时间里，泰越之间一直谈谈打打，柬埔寨国内的力量平衡逐渐向有利于泰国一方变化。

从高层官吏的立场看，起义直接导火索是越南采取的一系列似乎针对他们的改革措施，旨在铲除柬埔寨的王权根基、佛教和官僚阶层。改革以降职柬埔寨公主和重组在金边的越南官员开始。1840 年 6 月，明命帝接着制定一套越南式的征税制度。该制度要求对地方首领的像水果、蔬菜这样多余产出进行征税，还要求开展一次新的人口普查、土地清查和水资源报告。

另一项改革举措是至少在部分行省收集柬埔寨官印，代之以没有品级指示的越南官印。此时有一农村官员因为腐败被罢黜，随即有关所有官员很快都会遭到越南人逮捕的流言在高级官僚中传播开来。

8 月，当越南人在金边逮捕安眉和她的姐妹后，局势激化到顶点。越南人用美酒和越南歌剧演出迷惑贴身侍从后，将公主及其姐妹诱骗至一艘游船上；据一位目击者陈述，当时“他们有说有笑，每个人都很高兴”。公主们被带到越南，柬埔寨的象征王权的神器——安眉公主从其父王继承而来——一并被带走。此时，金边和各省的高层官吏，依据流言和以前越南人对待柬埔寨人的记录，推测塔拉哈 Lung 及其助手和 4 位公主已经被杀害，越南人接下来将会杀害他们。

对于很多柬埔寨人来说，没有了君主，也就没有了国家，尽管安 159
眉本应有的权威和魅力早已受限。神器的失去使得形势更加恶化，它可以让其他人合法的继承王位。对于高层官吏来说，他们失去在朝廷

① 见 Chandler, *Cambodia Before the French*, p. 25, note 37。

中的靠山、新改革的税收制度、官印的贬值以及越南人对他们行动自由的攻击，促使他们揭竿而起。越南人"理性的"措施，本以为能让高棉人受益，却打击了地方首领的身份根基和他们观念中的完整社会。越南人蔑视上座部佛教，蔑视柬埔寨的语言、文化和制度，也促使高层官吏举行起义的决心。

起义最初集中在沿湄公河东岸地区，但很快蔓延到越南人沿岸定居区，像罗摩（Ream）和贡布（Kampot）等地，并延伸到高棉人居住的越南南部地区，以及内陆一些有防御工事的村落。公主失踪的消息似乎触发了起义运动，这一阶段义军的目标是恢复到以前由安眉公主和流亡官员主政的状况。另一很明显的目标仅仅就是杀越南人。正如一名义军写到的，"杀死越南人让我们非常兴奋。我们不再惧怕他们；在战斗中我们只关心三宝：佛、法、僧。"①

越南人对起义中高级官僚之间的协调程度感到惊奇，并将此归咎于泰国人的影响，泰国方面没有予以证实。越南人也很困惑在这场大规模起义中不存在一个单独的领导者。他们估计义军力量达到 3 万人，以数百个小战斗队的形式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斗争，偶尔也有大规模的军团，通常在他们熟悉的地域范围内，由他们信任的人指挥。1841 年一份越南报告中总结了反游击战的困难：

> 义军沿河岸的战略要点设岗。他们随意出没。如果我们的军队向东看，他们就逃向西边……他们把部队集中度丛林密集和沼
> 160 泽地区，我们的军队难以机动展开。其他地方则杂草丛生，高能没眼，并且又热又脏。行军一天找不到可饮用的水。而且，我们没有关于敌人的情报，没有向导。②

在当时的年代里，越南人要想把军队和补给调入布满河流的地区

① Thailand, Royal Institute, *Chotmaihet ruang thap yuan khrang ratchakan thi* 3 [Correspondence about the Vietnamese army in the third reign] (Bangkok, 1933), p. 17.

② *DNTL*, Vol. 23, p. 112.

也是困难重重。上述报告承认，尽管越南朝廷采取“宽大”政策，并且记录中满是描述高棉人如何像“老鼠一样”逃窜或者越南人像碾死“蚊子一样”攻击义军，“也没有一名义军”投降。叛乱伊始，明命帝非常恼火，自称是“怒发冲冠”。[1]他（明命帝在 1841 年初的一次事故中意外死亡）本以为调动足够的军队，再加上对忠于自己的当地军队和官员的赏赐，足以镇压叛军。他命令塔拉哈 Lung 和其他人给自己的亲属和在柬埔寨的代理人写信，要求他们投降，但他高估了柬埔寨人对已经失去自由和价值的旧主的忠诚，他还批准派“僧侣和巫师”到金边去削弱叛军的斗志。明命帝在位的最后几个月里，要求每周报告前线情况，并建议烧毁柬埔寨人的庄稼和果树，作为先发制人的措施。他称“柬埔寨人是非常愚蠢的，我们必须要吓住他们。普通的道德劝诫不起作用。”[2]

我们不知道如果明命帝再活七年他会采取什么政策，但有一点很清楚，即在他去世之前义军已经开始失势，而他的继任者绍治帝（Thieu Tri），并不像他一样致力于在柬埔寨获得胜利。[3] 新国王继任后寻找一种既能让越南朝廷接受也能让柬埔寨人接受（不一定要让泰国人接受）的途径；一段时期他排除直接同泰国人谈判的建议，认为这是“错误和愚蠢的”。距离因素、缺乏信任和战场形势，再加上绍治帝目标不清，致使冲突持续到 1847 年。

柬埔寨军队补给很差。1840 年底，一位起义的高层官吏向泰人抱怨“我们无法继续同越南人战斗了。我们缺乏兵源、步枪、军火和后勤补给。我们只能用刀、弩、棍棒作为武器；我们不能继续战斗。”[4] 161

暹罗和柬埔寨恢复独立

正当越南朝廷和驻柬官员寻求解决方案时（这被他们视为是越南

---

① *DNTL*, Vol. 22, p. 228.

② *DNTL*, Vol. 23, p. 155.

③ 同上，p. 114。

④ Thailand, Royal Institute, *Chotmaibet*, p. 38.

自己的内部问题），由昭披拉耶博丁率领的3.5万名远征军在马德望附近集结，接着发起攻击，击败在菩萨的越南驻军。博丁准备进攻首都，但因补给短缺再加上对自己军队的作战能力缺乏信心，一直犹豫不前。博丁继而撤回马德望，企图巩固自己在此地的政治地位。在攻击菩萨期间，18名起义的高层官吏写信给他，请求泰国予以支持，并允许在曼谷的安东王子回国。[①] 高层官吏在信中发誓效忠拉玛三世，并抱怨物资短缺，声称柬埔寨人只有回到19世纪初越南统治之前的政治状况才会高兴。

博丁将此信转送曼谷，并建议释放处于监禁中得安东，交还其政治权力。1841年1月，安东在泰国和柬埔寨顾问的陪伴下抵达马德望，携带支持者奉送的礼物，包括拉玛三世提供的等级佩章和王室衣服。[②] 根据一资料，博丁之所以劝说泰王释放安东是因为“如果没有一个至高地位的人看管这个国家，普通百姓没有安全感”。[③]资料暗示博丁的动机还有以允诺安东统治柬埔寨来赢取高层官吏的支持（他迫切希望当地高棉人而非缺乏经验的自己的军队同越南人打仗）。在此后的几年里，安东一直受博丁的监控和操纵。安东的回国和拉玛三世对其热情关怀开始了泰—柬关系中的新时代，这种关系一直持续到1863年法国入侵。

正当安东与未来的朝臣议政、博丁抱怨新来者消耗掉泰国军队的
162 补给时，绍治帝正试图了解和控制越南的对柬政策，以击败泰国的入侵，平息越南南部省份的暴乱，维持越南人的威望。1841年后期，张明讲试图恢复安恩王位，但以他的名义发出布告并没吸引支持。或许，正是在这个时候，张明讲意识到已经没有机会在柬埔寨恢复到有利于自己的政治平衡。他携安恩、几位公主和大约六千名城市百姓撤回越南。回到越南后，他写信给顺化，承担“丢失”柬埔寨的责任，他将

① Thailand, Royal Institute, *Chotmaibet*, p. 33, and *CMH*, 3/1202/40.

② Chandler, *Cambodia Before the French*, pp. 156–58.

③ K. S. R. Kulap (pseud.), *Sayam Anam yut* [Siam's wars with Vietnam] (Bangkok, 1906, repr. 1971), p. 916.

柬埔寨称为越南皇帝“理所当然的财产”。张明讲随后被捕入狱，死在狱中。[①]

然而，越南人的失败并不意味着泰国人的成功，到1843年，柬埔寨已经成为昭披拉耶博丁的沼泽。正如他写给曼谷的信中所说，“我们在柬埔寨三年什么事也没做。我们缺乏补给；百姓跑进树林寻找叶子和树根为食；军队中近一千士兵饿死。”[②] 1844年博丁不得不放弃金边，越南人很快便在此地扶持安眉公主作为柬埔寨的“正统女皇”，而泰国军队则聚集在乌东附近。越南的手段激怒了博丁，他看到很多柬埔寨高层官吏可能现在不愿意支持泰国人。他向曼谷抱怨道：“所有的高棉领导人和贵族，所有地方首领和普通老百姓都是无知、愚蠢、鲁莽和容易上当受骗。他们不清楚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③]

尽管泰人面临很多困难，1845年越南人企图驱逐乌东附近的泰国军队的努力还是无果而终。到年底，泰国人和越南人开启停火谈判。基于绍治帝有意放弃越南在柬埔寨军事地位并暗示放弃其父的政策，谈判得以向前推进。然而这种推进非常缓慢，泰国虽有政治优势，而在军事上双方一直陷入僵局。泰国人扶持的安东王子是一名富有经验、深受爱戴的统治者，他忠于曼谷，能够在地方中建立起一套效忠自己的政府网络。但越南人手中仍然有讨价还价的筹码，特别是他们持有 163
象征柬埔寨王权的神器，没有神器安东不能合法地继承王位。

越南采取一种保留面子的姿态，要求由一名柬埔寨官员率领的朝贡使团于1846年3月来到顺化，宣布柬埔寨在形式上归顺越南。[④] 1847年6月，越南大使回到金边，归还柬埔寨神器，释放数名高棉王室家族成员，他们此前一直受越南人监禁，一些人已经被禁数年。此后很快，越南从柬埔寨撤军。这是1811年以来第一次没有越南官员在柬埔寨土地上。

---

① *DNTL*, Vol. 23, p. 3 51. 50.

② Chandler, *Cambodia Before the French*, p. 155.

③ *CMH*, 3/1206/6.

④ Chandler, *Cambodia Before the French*, pp. 179 – 81.

在接下来的数月里，安东做出一系列象征式姿态，显示已经式微多年的泰人扶持的王权在柬埔寨重新恢复。不要错误地认为这些象征式举动只是外交礼仪而不予重视，因为像当时大多数东南亚统治者一样，安东也没有摆脱我们称之为的政治和宗教绳索，这些绳索限制着他的思维、责任和行为。换句话说，君主的行为被认为是会产生政治后果的，政治行为被认为能够提高或降低一个君主的功德。①

其中很多仪式都与恢复作为国教的上座部佛教有关。有一段相关的论述称：

> ［安东］夷平［越南］在金边的防御工事，把砖拉走去修建乌东附近的［7座］寺院。重铸破损的佛像，雕刻新的佛像。鼓励僧侣重新住进寺院，鼓励百姓敬佛敬僧。②

在国民看来，安东回国与恢复佛教证明了其作为君主的威严、合法性和功德。1851年一段碑文这样描述19世纪40年代恢复佛教的鲜明效果：

> 有一位强大的统治者，他叫安东。他从王城［曼谷］来到柬
> 164 埔寨，住在戒备森严的乌东城。国王富有功德、技能和无穷的智慧，他让敌人恐惧；很快，三个相互战争的国家再次成为朋友。③

1848年4月的一个吉日，安东在乌东由泰国和柬埔寨的婆罗门施以涂油礼，正式登基柬埔寨王位。他52岁登基，在位12年，他统治

① 见 David Chandler, "Going Through the Motions: Ritual Aspects of the Reign of King Duang of Cambodia", 载 *Facing the Cambodian Past*, pp. 100-8; Ian Harris, *Cambodian Buddhism: History and Practice* (Honolulu, 2005), pp. 45-47。

② Eng Sut, *Akkasar mababoros*, p. 1027. Jacobsen 的 *Lost Goddesses*, 第5章引用安东的著作，令人信服地指出安东患有厌女症。

③ Inscription K. 142, from Wat Baray, E. Aymonier, *Le Cambodge* (Paris, 1904), pp. 349-51 有该碑文的译文。

时期可以认为是柬埔寨文化复兴时期。在大多数年份里，王国保持和平，虽然也有泰国政治顾问和一些泰国军队在乌东出现，安东还是能够相对自由地做出政治决策，如一些与向高层官吏授予头衔有关的事情。这时期的编年史强调国家的恢复，涉及大范围的制度和关系。编年史谈及语言改革、公共服务、禁奢法律、王室头衔新规。我们从其他资料获悉，安东还是一名富有成就的诗人，主持新法典的颁布，编辑新的编年史。[①]

19世纪80年代和20世纪30年代的编年史官回顾法国殖民前柬埔寨独立的那几年，似乎觉得安东统治时期是黄金时期。国王在曼谷被半囚禁了数年后变得相对谨慎小心。从与拉玛三世和拉玛四世的通信中看出，他同两位君主保持着恭敬顺从的关系。[②] 他没有试着去提升同越南的关系，以期望获得一定程度的行动自由，或许是因为他被19世纪30年代的前例吓怕了，而且任何关系的改善只会强化自己对越南人的依附。相反，1853年安东有些傻乎乎地寻求法国人的保护，他通过法国驻新加坡公使向当时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送上礼物和“谦卑的敬意”。很可能是活跃在乌东附近的法国天主教传教士向安东建议此事。他的礼物包括四支象牙、两支犀牛角以及大量的糖和白椒。一支法国外交使团带着草拟的友好条约（见第8章）赶赴柬埔寨，但是泰国禁止使团进入乌东，想迫使他们立的这位附庸君主就范。

安东寻求法国人帮助似乎更是为了对抗越南人，而不在于摆脱泰 165
人的保护，他也不可能摆脱泰人。在给法国的一封信中，安东如同20世纪70年代的波尔布特一样，把越南人称为柬埔寨“传统的敌人”。

① 有关这些编年史的讨论见 Chandler, “Going Through the Motions”, passim。关于安东统治时期的政治史见 Bun Srun Theam, “Cambodia in the Mid - Nineteenth Century: A Quest for Survival, 1840 - 1863” (M. A. thesis, Asian Studies,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1981), 特别是 pp. 104 - 68。欧洲人对安东朝廷深刻的描述见 L. V Helms, “Overland Journey from Kampot to the Royal Residence”, 1851 年第一次发表，在 *Aséanie* 16 (December 2005): 157 - 62 中重印。

② 其中多封信保留在泰国总理办公室，*Thai sathapana kasat khamen* [The Thai establish the Khmer kingdom] (Bangkok, 1971), 特别是 pp. 49 - 65。我在此感谢 David Wyatt 为此提供的注解。

具有讽刺性的是，19 世纪 60 年代法国接管越南对柬埔寨的保护国地位，消除了越南人的影响力，随后推行鼓励越南人向柬埔寨移民的政策。安东试图同法国交友的政策失败后，他向一名法国传教士解释说，“你让我怎么做？我有两个主人，他们都在盯着我。他们是我的近邻，而法国离这儿很远。”① 显然，柬埔寨想摆脱这种双重依附状态的很多条件还未到来，这种状态断断续续持续了五十多年。

① Charles Meyniard, *Le Second empire en Indochine* (Paris, 1891), p. 461. 1822 年明命帝已经注意到“柬埔寨夹在强邻中间，遭受侵略的恐惧非常强烈”。Bun Srun Theam, “Cambodia in the Mid – Nineteenth Century”, pp. 138 –67，详细讨论了柬埔寨君主的这种使命。

第 8 章　法国保护早期阶段

有好几个角度考察法国统治柬埔寨的这段历史。一个角度是将这 167
段历史分为不同的阶段，追踪法国控制力的延续与衰落。另一个角度是从法国的角度考察这段历史的意识与实践——政治、经济、教育等等。第三个角度可以把这一时期视为柬埔寨历史的一部分，与法国保护前后相连接。现在法国人已经离去，第三种角度似乎最为吸引人。虽然在资料方面有很多空白，除了王室编年史外主要有价值的高棉语资料非常缺乏，但我还是在此章中试图尽可能从柬埔寨的角度考察法国统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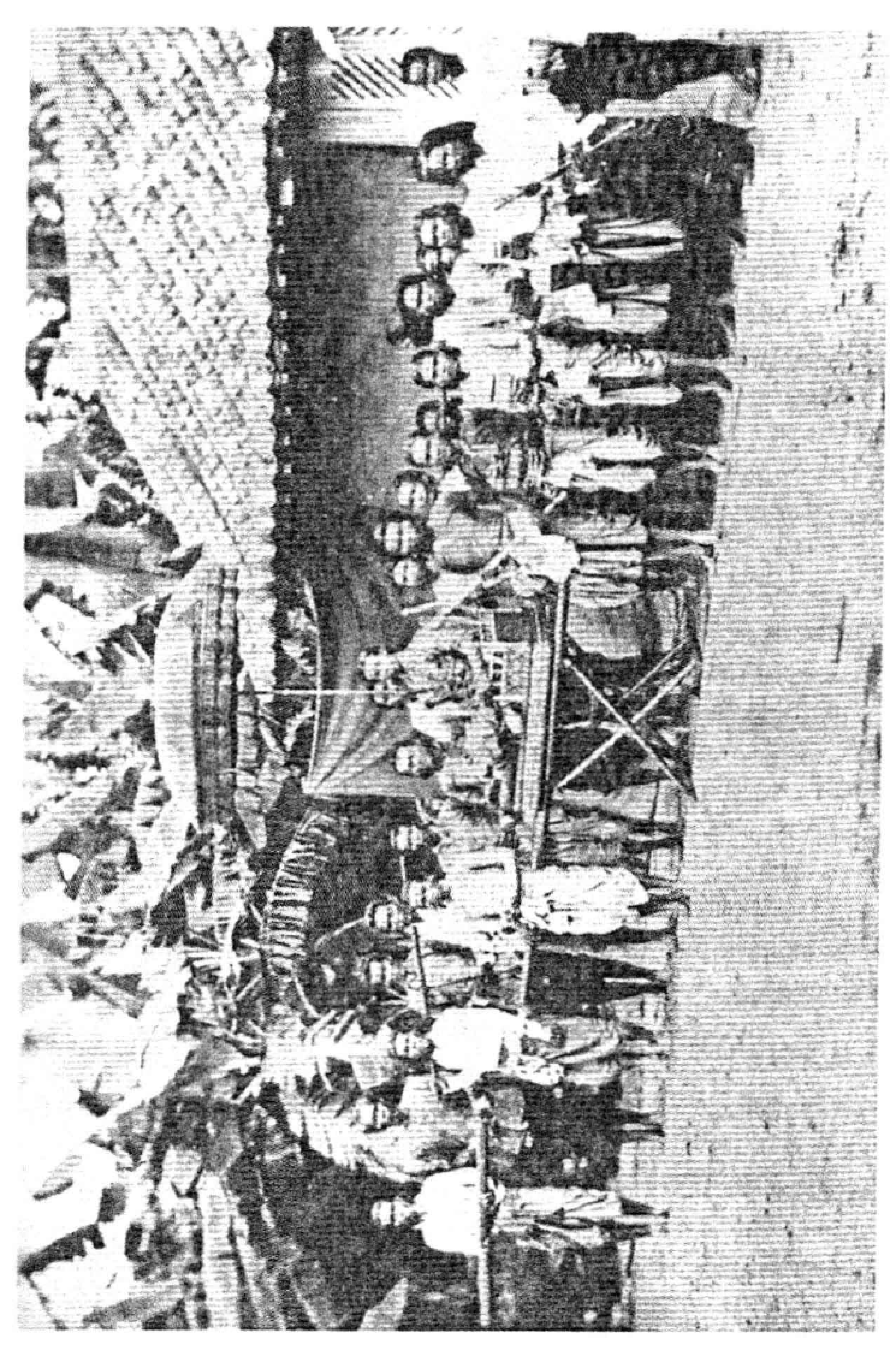
同时，如果我们从法国统治兴衰的角度（上述第一个角度）来考察殖民时期，一般分为几个阶段。第一阶段从 1863 年法国保护体制建立持续到 1884 年全国起义爆发。第二阶段从 1886 年起义被镇压持续到 1904 年诺罗敦国王去世，一个更具合作性的君主，诺罗敦同父异母的兄弟西索瓦继任王位。第三阶段一直持续到 1941 年诺罗敦・西哈努克加冕，跨越西索瓦（Sisowath，1904—1927 年在位）和其长子莫尼
旺（Monivong，1927—1941 年在位）统治时期。这一时期可能有些争 168
论，它是柬埔寨历史上唯一有组织进行殖民统治的时期，而在殖民统治的最后时段（1941—1953），相比于有组织地进行控制来说，法国更关注移交权力。

从柬埔寨的角度看，可以把殖民统治分为两个时期而不是4个时期，以1906年西索瓦加冕礼为分界点。从那时起，柬埔寨人不再自我管理，生活方式西化，特别是在城镇，这种情况日趋严重。对于一个19世纪40年代的柬埔寨官员来说，直到1904年行省内都还没有什么变化，而到1920年则已经面目全非了，当时作为法国在整个印度支那政策的一部分，在柬埔寨组建法国式政府，尤其是在地方政府层面。

我猜想，直到20世纪40年代后期，还很少有柬埔寨人会认为这些机械的变化和法国全方位的存在会对他们的生活和长期形成的制度安排（自足式农业、家族生活、佛教信仰和王权政体）产生有害影响。在殖民统治的大多数时间里，政治稳定是一个特征，这部分是由于法国扶持国王、国王扶持僧伽，两种制度与法国的目标趋于一致（至少在政治上是这样）——部分是因为国王、僧侣和官员没有革新的传统，还有部分原因是异端邪教与暴动起义（质疑权威最流行的方式）自19世纪80年代以来都被法国人有效的平复了。在经济转型方面，柬埔寨西北地区水稻种植技术显著提高，大面积种植水稻成为现实。而在其他地区，正如让·德尔维特（Jean Delvert）所指出的，人口的扩张使之更趋向于进行小规模的家庭作业式水稻栽培，如同他们在真腊时期以来形成的种植方式。[①]

可能是因为这种稳定性，很多法国作家对柬埔寨人比对越南人更有浪漫情怀和好感。同时，在法国人看来这里没有事情发生，他们也常常鄙视柬埔寨人“懒惰”或是“顺从”。模棱两可的浪漫主义手法
169 充斥着很多有关殖民统治的法文资料，特别是有关20世纪的，那时关于这个民族的一些陈词滥调像传家宝一样从一个官员（或者报纸上的某一件事）传给下一个。同样，在20世纪40年代早期之前，也没有柬埔寨语的资料质疑法国统治或者柬埔寨传统制度的功效。

① Jean Delvert, *Le Paysan cambodgien* (The Hague, 1961), pp. 425 -28.



1866年，西索瓦亲王及其随从（图片提供：法国国家图书馆）

正是这些原因诱使研究者加入到法国作者的行列，略过这段“无事发生”的时期。但是这样做将是一个错误，因为这一时期的历史，特别是在20世纪20年代经济大繁荣之后，正是独立的革命前柬埔寨

（带有很多缺点）建立或者是准备建立的历史，尽管还有很多地区部分保留着如很多法国作者所称的“不受时间影响的”和“神秘的”吴哥柬埔寨。

这些原因还诱使着学者将法国人在柬埔寨的活动分类为政治的、经济的和社会的，这种分类给人错误的印象，把历史事实分成不同碎片。在殖民语境中，法语所表达的意思通常具有特殊含义。例如，政治学意味着异议和操控，而没有在开放政治过程中的参与之意。最理想的是，在殖民地内应该完全没有政治。经济学意味着预算、征税和财政收入——换句话说，就是官僚控制的经济学。偶尔有少数法国学者宁可把柬埔寨经济与印度支那地区其他国家相联系，特别是有关农作物出口和类似公共工程这样的殖民当局实施的项目，也不与柬埔寨人民的需求和生产能力相联系。到 20 世纪 20 年代，在法国官员眼中，柬埔寨已变成一个稻米生产机器，用财政收入交换法国的“指导”。这意味着政府的本质——*rajakar*，即“王室工作”——一直保持没变，即从农民手中获得财政收入。至于“社会”这个词，法语用这个词并不指人们之间的团结或者是能够增强政治凝聚的各种关系。相反，“社会”的意思是很多家庭的聚集物，是顺从地运转。

编年体的视角和上面提到的分析或许有助于研究考察殖民时期，因为用柬埔寨历史话语观察这段历史意味着用持续和变化的观点来观察这段历史。从这个角度说，柬埔寨社会和统治阶层思维的转变跟农村中生活方式相对的僵化不变同样重要，而后者同样也是在变化的。

法国保护制度的建立

171 法国人开始进入柬埔寨是在 18 世纪，当时天主教传教士开始到柬埔寨定居，特别是乌东附近。不过，在 19 世纪 50 年代之前，法国人进入柬埔寨并不带政治色彩，在同一时期法国人也进入越南。50 年代中期，安东国王企图在泰、越争斗中寻求法国支持。1856 年一支法国外交使团携带合作条约草案来到柬埔寨，但是柬埔寨朝廷慑于泰国政治顾问的威吓对他们避而不见。顺便提一下，该条约草案中的很多条

款也是 1863 年正式条约的内容。例如，法国获取柚木用于造船、在柬埔寨境内迁移的自由、改信罗马天主教的自由。①

随着法国卷入越南事务，其在柬埔寨的利益也逐步深化，这也与法国博物学家亨利·穆奥（Henri Mouhot，1826—1861）的发现有关。穆奥到访安东朝廷后深入暹粒，在那里发现了吴哥遗迹。穆奥死后有关他在柬埔寨旅行的书出版，书中暗示柬埔寨无比富有，而柬埔寨统治者却对祖宗遗产视而不见。② 安东对穆奥和同时期其他欧洲旅行者的开放在一定程度上源于他同法国传教士让·克劳德·米希（Monseigneur Jean Claude Miche）的友谊。米希的传教中心就位于乌东附近，他积极支持 1856 年法国派出的外交使团，并让安东相信摆脱泰国的控制和越南的威胁会对柬埔寨大有裨益。安东在位的最后两年，视法国在越南的扩张为恢复被越南控制了二百多年的领土和高棉人的机会。③

由于深陷越南游击战泥沼，并且难以确定是否会得到巴黎的支持，法国在西贡的殖民当局对柬埔寨的示好迟迟未予回应。1860 年安东去世，柬埔寨陷入内战，同法国结好之事被搁置起来。安东指定的继任
者诺罗敦，在东部省份和占族反对者中间并不受支持，而且占族人在 172
安东还在世的时候几乎占领了乌东。诺罗敦青年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都是作为人质在泰国度过的。1861 年，诺罗敦无法进行统治，不得不逃离柬埔寨，并在次年底在泰国人的支持下回国。他的回归是建立在试用条件上的，因为象征王权的神器留在曼谷。泰国人的干涉让诺罗敦非常恼火，同时受到法国人所承诺的礼物诱惑，他重启同法国人的谈判。根据一位同时代的人所说，负责南部越南的法国海军上将“没有立即开战，而是想和平征服，开始对柬埔寨有所企图”。④

---

① Charles Meyniard, *Le Second empire en Indochine* (Paris, 1891), pp. 403 – 8.

② Henri Mouhot, *Voyage dans les royaumes de Siam, du Cambodge, et de Laos* (Paris, 1972), pp. 174 – 76.

③ 见 G. Taboulet (ed.), *La Geste françarse en Indochine*, 2 vols. (Paris, 1955), p. 334; Milton Osborne, *The French Presence in Cochinchina and Cambodia: Rule and Response* (1859 – 1905) (Ithaca, N. Y., 1969), p. 27。

④ F. Julien, *Lettres d'un précurseur* (Paris, 1885), p. 46.

没开一枪一弹，殖民统治就尝试性地开始了。1863 年 8 月，一支法国海军军官代表团同诺罗敦在乌东签署条约，条约规定法国定居者向诺罗敦提供保护，换取在木材贸易上的让步和采矿的权利。诺罗敦把签署条约之事向泰国顾问瞒了数月。当顾问们获悉此事并通知曼谷后，诺罗敦立刻重申他对泰国国王的归顺，他对泰国顾问宣称：“我非常愿意终身为泰国国王的荣耀而服务。我的忠心永远不会变。”泰国人一直将诺罗敦变心一事瞒着法国人，直到 1864 年早期，巴黎批准早前诺罗敦同法国签署的条约时法国人才觉察此事。①

我们不清楚诺罗敦想从法国同泰国的对峙中达到什么目的。似乎是在为争取时间采取的拖延策略，他选择与法国打交道的手法类似他的叔叔安赞国王同越南人打交道的方式。他也想得到正式加冕，1864 年中期，泰国与法国同意共同举办他的加冕礼。几份法国资料记载了这场滑稽的加冕礼。泰、法两国官员为加冕惯例、签署的协议和象征王权的神器争吵不休，而诺罗敦则一副孝子形象表达他对两国的忠心。这是最后一次柬埔寨国王的头衔由曼谷选择和赐予，也是最后一次柬埔寨国王正统性从两个外国政权那里获得认可。这也是第一次一名柬埔寨国王从欧洲人手中接过王冠，此后的三位国王都遵从此礼。从此
173 之后，泰国在柬埔寨的影响力开始减弱，1867 年马古（Mongkut）国王去世后，泰国影响力急剧衰退，乃至永远退出柬埔寨。②

法国保护制度的确立并没有终结柬埔寨国内的起义斗争，诺罗敦自统治之初起就饱受这些起义之苦。1867 年后法国军队帮助镇压这些叛乱。其中最重要的一支义军由波贡博（Pou Kombo）率领，他原是一位僧人，自称比诺罗敦更有资格继承王位。1866 年诺罗敦将王宫迁至金边。法国人劝其迁都，同世纪初越南人鼓动安赞迁都一样出于类似的战术考虑。此外，法国人还有商业目的的考虑，从西贡到金边比

① 见 Taboulet, *La Geste*, pp. 621 – 29; R. S. Thomson, “Establishment of the French Prorecrorate over Cambodia”, *Far Eastern Quarterly* (*FEQ*), Vol. 4 (1945): 313 – 40。

② Taboulet, *La Geste*, pp. 630 – 35. 还见 Eng Sut, *Akkasar mahaboros khmaer* [Documents about Khmer heroes] (Phnom Penh, 1969), p. 1113。

到一个深入内陆的首都更为容易。在法国驻扎官 E. 达尔·德·拉格里（E. Doudart de Lagrée，1823—1868）的指挥下，法国人开发湄公河，搜集北段河流的数据，这正好解释了想把金边打造成重要商城的梦想。①

对法国人来说，19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是英雄主义盛行的时期，一部分原因是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掌握在少壮派海军军官手中，他们渴望荣耀，急于获得提拔，沉迷于异国风情之中。总体来说，法国殖民主义的全权代表——拉格里、弗朗西斯·安邺（Francis Garnier），让·穆拉（Jean Moura）和艾提奈·爱莫尼尔（Etienne Aymonier），以及其他人——都精力旺盛，知识完备，对高棉百姓还有些同情心。他们开发湄公河，翻译柬埔寨编年史，译解碑文，组织将数吨重的柬埔寨雕刻船运到巴黎、西贡和金边的博物馆。在他们的思想中，与轰轰烈烈的殖民事业和柬埔寨久远的过去相比，柬埔寨朝廷的腐朽和人民的无助具有明显落差。同时，如格里格尔·穆勒（Gregor Muller）所指出的，在保护体制建立后的早些年里，一些法国冒险家装扮成商人，急于利用柬埔寨王廷的贪婪和法国控制的模糊之处肆无忌惮地牟利。②

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的柬埔寨管理方式同一千年前吴哥时期的管理方式可能没什么不同。在这两个王朝中，以及二者之间的多数 174
时间里，政府意味着一套基于地位和义务的关系网络，在这一网络中农民付出稻米、林产品和劳役来支持他们的官员，以换取官员的保护。继而，官员用他们获得的部分稻米、林产品和农民劳役再向国王支付报酬。商人——通常是中国人，偶尔也有法国人——要为获得在此销售和出口商品的权利向国王付出代价。通过这种途径，一个人能够剥削多少农民取决于国王授予他的地位，这种地位本身就是待价而沽的。官员在这一体系中日益成为统治阶级成员，他们手中有足够的钱或货物来购买和保护自己的地位。

① 关于这次激动人心的探险见 Milton Osborne, *River Road to China*（London, 1975）。

② Gregor Muller, *Cambodia's "Bad Frenchmen": The Rise of Colonial Rule and the Life of Thomas Caraman*, 1840 - 1887（New York and London, 2006）.

法国加强控制

诺罗敦在王宫内治理柬埔寨的方式在法国人看来是一种独裁专制的方式。然而，法国人并没有让他改变治理风格。在其统治期间，相比于建立一套健全行政体制的思想，诺罗敦更希望自己成为决定个人生死的主宰者。1866—1867 年和 19 世纪 70 年代，反对他统治（暗含反对他对法国殖民统治的默许）的暴动接连发生。两次起义都吸引了众多支持者，法国费尽周折才予以平息。法国人不愿意追究自己导致起义的责任，而是归咎于诺罗敦，并开始支持他同父异母的兄弟西索瓦。在平息两次起义的战斗中，西索瓦曾率军与法国人并肩作战。

迫于法国的压力，同时适逢另一个同父异母弟弟西伏塔（Si-wotha）起兵造反，诺罗敦在 1877 年公布了一系列改革措施。虽然这些措施从未得到实施，但是作为法国进行更广泛控制的预兆和关注领域的指向，这些措施还是值得关注的。改革措施包括解除王室土地所有权，削减高层官吏数目，合理制定税收，取缔奴隶制度。一旦这些措施实施，会极大削弱柬埔寨统治阶层的权力基础。同 19 世纪 30 年代的越南明命帝一样，法国人也不喜欢柬埔寨人的做事方式，用他们
175 自己理性的中央控制理念进行干预。更何况，法国第三共和国的官员越来越不接受像奴隶制和绝对君主制这样的制度，他们也不像拿破仑三世及其随从那样着迷于柬埔寨浪漫的小歌剧。

19 世纪 80 年代早期，当法国人强化对越南的控制时，解决柬埔寨的问题并控制柬埔寨朝廷也只是时间问题。金边上演的闹剧已经够长的了，耗费了法国太多的投入。柬埔寨人没有认识到给予法国所提供的保护回报的重要性。六七十年代柬埔寨社会中那些具有异国特色的离奇景象，在 80 年代新生代的市民官员眼中就是一种压制，把保护体制转为直接控制的时机已经成熟。

1884 年法国成功迫使诺罗敦同意抽取关税（主要是出口关税）用于支付法国人的行政费用。诺罗敦给法国总统发去一份电报抗议法国的施压，此举遭到交趾支那总督查尔斯·汤姆森（Charles Thomson）

的责备，后者一直秘密与西索瓦谈判，如果证实诺罗敦对这些改革举措持抵制态度，就安排西索瓦承接权力。①

几个月后，汤普森从西贡乘船来到金边，呈交给诺罗敦一份条约。该条约内含一套全面的改革举措，要比之前的文件更为苛刻，法国取得法理上的控制权。一天晚上10时，汤普森未经通知就来到王宫，他所乘的炮舰就在王宫所视范围内抛锚。在诺罗敦浏览文件的时候，汤普森的卫兵就在附近站着。在翻译官宋狄（Son Diep，诺罗敦死后他被提拔到高官位置）的殷勤帮助下，国王签署了文件，他看得出这是保留王位的唯一途径；毫无疑问他也清楚西索瓦的诡计。或许他寄希望于文件中的条款会遭到柬埔寨统治阶层的反对而会解除。实际上，这确实发生过一次，但不管怎样，条约第二款标志着法国实质性地加强了对柬埔寨的控制。该款规定，“将来在法国政府认为是有助于法 176
国保护的所有行政、司法、金融和商业改革措施，柬埔寨国王陛下将接受。”②

柬埔寨的上层阶级此时可能视诺罗敦为法国的傀儡，然而，并不是上述条款让他们愤怒。上层阶级视之为革他们命的政策（而在法国人看来这些政策是他们改革的关键内容）是在省会城市安置法国居民，消除奴隶制和土地所有权制度化。这些条款击中了柬埔寨传统政治的心脏，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侍从、劳役剥削和农业丰收税让柬埔寨上层阶级从中受益，而现在，上层阶级变成受雇于法国人的公务员，在法国人的控制下管理人民，而不是坐享人民的劳动果实。

虽然很少有法国官员愿意费力去研究他们所称的柬埔寨奴隶制，而且他们取消奴隶制的动机包含一些现实考虑，即借此打消法国国内对其他改革措施的反对，但在柬埔寨人看来，奴役使用的去制度化是

① Osborne, *French Presence*, pp. 211 - 14, and Eng Sut, *Akkasar mahaboras*, p. 1172.

② 关于条约全文见 Taboulet, *La Geste*, pp. 67 - 72。又见 Khing Hoc Dy, “Santhor MOK, poète et chroniqueur du XIXe siècle”, *Seksa Khmer*, Vol. 3, Nos. 3 - 4 (December 1981): 142。一位名叫 Mok 的内臣试图阻止汤姆森进入诺罗敦的寝宫，汤姆森一脚将其踢开，后来 Mok 就此事编了一首诗，诗开头一句是：“啊，法国人，你这可恶的强盗，竟敢抬起脚踢国王的近臣。”

比在乡村安置一些法国官员来监督柬埔寨官员行为更为重要的一项改革举措，这一点非常明显。没有此项改革，法国人不能自称代表普通百姓行事。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没有什么办法约束长期充满敌意的柬埔寨上层阶级手中的权力，而这些人正是那些具有人身控制权的富人。而且，如果不取消奴隶制度，法国人就不能解放柬埔寨的自耕农，从而使后者能够理性地回应市场压力和法国保护体制带来的好处——尽管这种想法可能有些误导。

通过切断主仆依附关系的纽带——或者更准确地说，宣称迎合柬埔寨百姓的愿望——法国人可以堂而皇之地干涉柬埔寨人生活的各个层面。法国人的建议有效地使国王摆脱了侍臣，继而，侍臣摆脱了他的随从。法国人想让柬埔寨变成越南的翻版，公社官员直接对法国人负责，然而对柬埔寨人来说，这样的政府在这一层次上还是舶来品，19 世纪的柬埔寨没有公社的传统——曾经存在过。

177 柬埔寨人对该条约的短期反应非常激烈，给法国人带来很大损失。1885 年早期，在一些人的领导下，一场全国范围的起义在不同地点爆发。① 起义持续了一年半，一度束缚了大约四千法国和越南军队，当时法军在印度支那的兵力非常薄弱。法国人怀疑诺罗敦支持起义活动，不愿意再同他合作，转而仰仗西索瓦，允许他在各省中自由任命亲法官员，进而削弱诺罗敦的权威。似乎西索瓦期望在诺罗敦还在世的时候就能得到王位，但随着起义的持续，法国人意识到他们还要依靠诺罗敦来平息起义。1886 年 7 月，国王宣称如果义军放下武器法国人会继续尊重柬埔寨的关税和法律——换句话说，就是恢复以前的混合体制。起义给法国人以万事谨慎的教训，但他们的目标未变——让柬埔寨政府变得更加理性以及控制这个王国的经济。在此阶段，法国人开始在诺罗敦周围安置忠于自己而非国王的柬埔寨顾问。这些人中很大一部分是从 19 世纪 70 年代法国培训的翻译人员中选出的。他们中最

① 有关这次起义的讨论见 Osborne, *French Presence*, pp. 206 –28, and John Tully, *France on the Mekong* (Lanham, Md., 2002), pp. 8 3 –110。

著名的是一名叫秀（Thiounn）的有华裔血统的高棉人，在 20 世纪 40 年代之前他一直在柬埔寨政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正如诺罗敦时的编年史所指出的，起义的结果是“柬埔寨人喜欢他们的领袖”，特别是因为他们的替代人选并不明朗。20 世纪 30 年代一名法国学者批评法国人鲁莽地把“公平、私有财产和选举权”①强加给柬埔寨人，以期望柬埔寨百姓能够根据条约规定自己选择村庄领导。实际上，他承认“主人想要保留奴仆，奴仆也离不开主人”；数个世纪以来，柬埔寨人民一直离不开这种庇护制度。

面对陷入持久战的可能性，法国人从此前的改革主张中做出让步。虽然条约在 1886 年签署，但是大部分条款一直到诺罗敦去世后的 20 多年里也没有实施。

同时也要看到，夸大柬埔寨人这次起义中取得的胜利也是错误的，20 世纪 70 年代早期，一些柬埔寨学者将这次起义视为柬埔寨民族主义的分水岭，而把诺罗敦视为巧妙反对法国统治的勇敢爱国者，同意 178
这种观点也是不可取的。支持这些主张的证据并不明确。毕竟，诺罗敦在总体上是接受法国保护的，只是当他认为个人利益特别是经济利益受到威胁时才进行反击。他只是把国民视作供自己消费使用的物品，1886 年之后，法国人比以前对他更加不信任。在他统治的剩下时间里，法国人努力削弱他的威望和独立性。但认为诺罗敦或者参加起义的高层官吏具有为柬埔寨民族大局考虑的想法是不正确的（他们这么做只是反对那些涉及他们个人利益的具体措施）。

我们事后总结出这场起义的两条重要教训。一是，尽管有法国的插手，地方的统治阶层仍然能够组织起呈规模的、有战斗力的游击部队，就像 1834 年反对泰国人和 1841 年反对越南人时做的那样；在相对平和的 1916 年事件中他们再次这么做，这将在第 9 章中谈到。第二个教训是，游击武装能够将殖民军队逼得走投无路，尤其是当得到多

---

① Luc Durtain, *Dieux blancs*, *hommes jaunes* (Paris, 1930), p. 261. 还见 Paul Collard, *Cambodge et Cambodgiens* (Paris, 1926), p. 115, 有这样的评论：“人们对自由有不同的态度，这让我们意想不到。”

数人民支持的时候。

诺罗敦统治的下一个10年是法国控制无情加剧的10年，法国的政策“从富有感情转向更加自私的殖民扩张政策”。[①]对法国加强控制构成阻碍的是，诺罗敦仍然可以制定法律，任命官员，通过财政来源进行权力寻租（例如垄断鸦片贸易，允许发展赌博业）、要求官员进贡和拒绝支付自己花销等方式控制国家经济。然而到1892年，直接税的征缴落到法国人控制之下；两年之后，在地方行省中已有10个法国人居住区。实际上，整个19世纪90年代法国在整个印支地区都在强化统治，在总督保罗·杜美（Paul Doumer，1897—1902）统治时期达到顶峰。

法国在柬埔寨加强控制的措施包括完善财政程序和支持西索瓦而
179 不是诺罗敦的子女作为王位继承人。法国官员企图让诺罗敦放弃国家控制权，但又惧于他那些具有独立倾向的儿子们，其中一个儿子因受反殖民思想的影响，在1893年流亡到阿尔及利亚。国王的健康状况本来就很差，又加上吸食鸦片成瘾，身体更加糟糕。这些鸦片是法国人用盒装好后免费提供给他的。随着法国官员的日益不满和自己身体状况变差，诺罗敦开始滥用鸦片。毕竟，法国殖民者还要在柬埔寨赚取财富，他们也是这么打算的，而诺罗敦挡住了他们的发财之路。法国人的不满在1897年达到顶点。当时的法国驻柬埔寨总驻扎官（*résident supérieur*）Huynh de Verneville，给巴黎电报称国王已经不能治理这个国家。Verneville要求授予他行政权力，得到巴黎同意。现在法国驻扎官可以自由发布王室法令，任命官员，征收间接税。正如米尔顿·奥斯本（Milton Osborne）指出的，柬埔寨的高级官员过去都需要依靠诺罗敦的批准，现在很快就能体会到权力平衡发生了转移。[②] 到该年底，国王的建议——即便有他的印章，但如果Verneville不同意——也只是流于形式；新任的法国总驻扎官只听从西贡、巴黎和河内当局。诺罗

---

① L. Henry, *Promenade au Cambodge et au Laos* (Paris, 1894), p. 64n.

② Osborne, *French Presence*, p. 237.

敦和法国人明争暗斗了 30 年后，法国人现在要保护的不是柬埔寨和柬埔寨的王位，也不是柬埔寨的人民，而是法国的殖民利益。

与此同时，一些国王法令持续有效，如允许法国居民购买土地，导致金边地产业繁荣发展。而在地方中推行的一些改革，据我们所知，影响就没那么深远了。在整个 90 年代，法国驻扎官们都公开抱怨当地柬埔寨官员迟钝、腐败和胆怯，不过，有一位柬埔寨官员知道该用什么样的口径向他的法国上级报告："我省内的所有村民都很幸福；百姓对于政府采取的措施没有一丝抱怨。"[1] 很多法国官员抱怨，他们对柬埔寨农村知之甚少。没有人知道柬埔寨乡村有多少人，他们是怎么想的，谁拥有这些土地。虽然奴隶制取消了，但用劳役还债——通常一生有效——的情况还很普遍。偶尔有新思想的领导人聚集起一些追
随者，领导他们反抗；到了干旱季节，成群的匪徒在农村地区任意横 180
行。实际上，农村地区的安全状况并不比以前好。

然而，很多法国高官仍然将自己的任务界定为文明教化和理顺同柬埔寨王廷的关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农村地区，西索瓦比诺罗敦更受欢迎，部分原因是在大型仪式场合中百姓更经常看到西索瓦，还有部分原因是在大部分人看来，诺罗敦的统治是贪婪、不公正的。实际上，西索瓦是认可 90 年代的发展成就的。大约从 1897 年开始，法国官员已经正式承诺让西索瓦接任王位。

又过了 7 年诺罗敦去世。在这最后几年里，一桩涉及他最喜爱的儿子友坎朵（Yukanthor）王子的丑闻闹得沸沸扬扬。友坎朵试图公开法国在柬埔寨的不公正统治，他在巴黎雇了一名法国记者报道此事，以向法国官场施压。法国官方对此除了生气外并没有其他反应。友坎朵对法国人民公开表示，"你们在柬埔寨创造了财富，也创造了贫穷"，他的指责

---

① *AOM* 3E 3（i）, report from Kandal, May 1898.

大部分是属实的，或许当时情绪过于激动，内容过于宽泛。[1]

巴黎的官员发电报给诺罗敦，劝他命令自己的儿子为此道歉。友坎朵宁可过海外流亡的生活，也不道歉。1934 年友坎朵死于曼谷，直到那时法国官员对他还多少有些不必要的担忧。

诺罗敦交给法国人最后两个特权，一个是为自己选择亲密顾问的权利，另一个是在金边向中国人出让赌博经营权的权利。法国人一点点地剥夺诺罗敦的行动自由。奥斯本记录了诺罗敦一次次斗争失败，而在王室编年史（20 世纪 30 年代，在西索瓦的儿子莫尼旺统治期间编订）的最后几页，几乎没有谈及双方的冲突，给人的印象是，诺罗敦的统治是和平而体面结束的。

西索瓦统治前期

像同时代的很多人一样，诺罗敦生于农村，死于半现代化的城市。
181 他死的时候城市开始使用电和自来水。然而，这个王国的现代化进度非常慢。柬埔寨国内的交通设施非常糟糕；僧侣、皇室人员和官员——这些最受人民尊敬的人——抵制制度的变革；社会中所谓的现代化成分都是由法国人主宰，再加上中国和越南移民的辅助。有意思的是，接受现代化的人开始用印度支那式或者是资本主义式的思维思考，而那些传统的上层阶级却看不到需要扩大自己视野或者是完善自己信仰的动力。

不管怎么说，诺罗敦的去世既是法国管理柬埔寨事务的一道分水岭，也是柬埔寨王权作为一种制度的分水岭，此后的三任国王都是由法国人挑选的。柬埔寨高级官员只是发挥一种附属性的、仪式性的作用，而那些在低级行政部门任职的官员也只是拿着低薪水的侍奉殖民当局的仆人，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 1953 年，中间仅 1945 年夏天的几

---

① Jean Hess, *L'Affaire Yukanthor* (Paris, 1900), p. 77. 有关这次危机的讨论见 P. Doumer, *L'Indochine française* (Paris, 1905), pp. 230 - 31; Osborne, *French Presence*, pp. 243 - 46; Alain Forest, *Le Cambodge et la colonisation française: Histoire d'une colonisation sans heurts* (Paris, 1980), pp. 59 - 78。还见 Pierre Lamant, *L'A ffaire Yukhanthor* (Paris, 1985)。

个月有所例外。在这种管理体系中没有柬埔寨官员会得到法国人的主动奖励。诺罗敦在世的时候，法国人推行自己的计划阻力重重。1904年后，除了个别例外，柬埔寨变成一个相对高效的财政收入生产机器。

长期发生的变化，从我们的角度能够很容易看到，而在当时地方上却并不能立即感觉到，法国官员觉得那里的旧习惯——庇护、依附、暴力、宿命论和腐败——仍然根深蒂固。卖官鬻爵，税率混乱，低估稻米收成的情况仍然存在。人们仍然容易轻信一些江湖术士。1923 年后期，一个还俗的僧侣在上丁（Stung Treng）宣称拥有“一只能说话的金青蛙”[①]，聚集了众多追随者。盗贼横行，饥荒、瘟疫（疟疾、霍乱）时有发生。因此，在 20 世纪早期，首都和地方行省的状况对比鲜明，然而，虽然农民长期以来都在用自己的劳役和收成为金边的进步和法国官员的高薪买单，但地方的落后并没有明显招致人们的怨恨，要知道这种落差激发了 50 年代早期的反法游击队和此后共产党干部的怨恨。

1904 年西索瓦继任王位的时候已经 64 岁。从 19 世纪 70 年代开始，他就勤勤勉勉地同法国人合作。他比诺罗敦更加崇信佛教，更受 182
人们爱戴，很多人都跟他参加过由他主办的佛教仪式（也有的是别人资助的），不像他的兄长或法国人那样总是征税。据一名法国学者记载，西索瓦非常害怕他的兄长，即使是诺罗敦去世，他也拒绝出席葬礼。据编年史记载，在执政的前两年，他把主要精力放在庆祝仪式和官僚革新（例如为王宫任命一名电工，命令官员穿着西式的长筒袜和鞋子）。[②] 另一方面，西索瓦严厉训斥那些觐见的地方官员保留奴隶制度——很可能是法国人授意他这么做。[③] 跟很多柬埔寨官员一样，一年到头他主持多场仪式祈求风调雨顺和农业丰收。从他执政第三年开

---

① *AOM*, 3 E – 10 (2), second trimester report from Stung Treng, 1923.

② 西索瓦统治时期的编年史手稿，以前存柬埔寨王宫的图书馆中，后来日本东京的东亚研究中心制作成微缩胶卷，本处内容见 p. 1025，还见 John Tully, *Cambodia Under the Tri – colour: The Sisowath Years, 1904 – 1927* (Clayton, Australia, 1996)。

③ 同上，pp. 103 – 4。

始，法国人每年都会提供给他高品质的鸦片使用（跟诺罗敦一样），每年的总额达到113公斤（249磅）。[1]

1906年，诺罗敦的葬礼举行，紧接着举行了西索瓦的加冕仪式，西索瓦前期统治达到顶峰。柬埔寨编年史详细描述了这场仪式（法国资料也有记载），这在柬埔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仪式持续数日。一个有趣的特色是，法国印支联邦总督受托授予西索瓦头衔，交给他神器。另一特色是，由临时召到宫的行省太守庄严向西索瓦宣誓国王拥有"所有稻田、菜地、水源、土地、森林、山脉，城市和柬埔寨王国的边界神圣不可侵犯"。[2]

西索瓦刚一加冕，就在皇家芭蕾舞团的陪同下到访法国马赛参加殖民地展览。柬埔寨编年史对他的这次出行记载非常细腻，听上去像是一首柬埔寨诗歌，内容里还有一名陪同国王的宫廷官员。[3] 史书用两段文字虔诚地记录下西索瓦在新加坡、锡兰（今斯里兰卡）和印度洋的旅行，以及对更远地方景观的评论（意大利的三层楼阁，只有
183 "沙子和岩石"构成的红海海岸线）。在赛得港，人们急于向这位"南方的人主和大师"表达敬意。当国王在马赛发表演讲后，"当场所有法国人民——不管男人还是女人——都为他鼓掌"。编年史和官员的记述给人产生一种印象，国王自己决定访问法国；而实际上，他的访问是主办方提出作为柬埔寨皇家芭蕾舞团在殖民地展览会演出的先决条件而强加给他的。[4] 从法国人的角度看，至少私下这么认为，通过

---

① 见 Harry Franck, *East of Siam* (New York, 1926), pp. 24 - 25; A. Pannetier, *Notes cambodgiennes* (Paris, 1921), p. 140，称吸食鸦片在柬埔寨军队中非常普遍。还见 Roland Meyer, *Saramani* (Paris, 1922), pp. 122 - 23; Collard, *Cambodge et cambodgiens*, p. 277，提到西索瓦吸食鸦片，但补充说毒品"对亚洲人无害"。

② A. Leclère, *Cambodge: Fêtes civiles* (Paris, 1916), pp. 30 - 31. 还见 Sisowath chronicle, pp. 1068 - 74.

③ 见 Meyer, *Saramani*, pp. 132 - 51; Jean Ajalbert, *Ces phénomènes, artisans de l'Empire* (Paris, 1941), pp. 189 - 92; Forest, *Le Cambodge*, pp. v - vii; and Okna Veang Thiounn, *Voyage en France du roi Sisowath* (ed. and tr. Olivier de Bernon) (Paris, 2006)，这是陪同国王的一名宫廷官员对这次旅行的记述，以前未曾出版过。

④ 西索瓦编年史，pp. 1077 - 86。还见 Jean Ajalber, *L'Indocbrne en péril* (Paris, 1906), pp. 87 - 111; Thiounn, *Voyage en France*, pp. 101 - 1477。

这位年老的掌权者及其妻妾的访问，法国人进一步了解了他们所热爱的、异国情调的、还有些滑稽的小国家。①

西索瓦在巴黎与法国总统互相拜访，并共进晚餐，又来到南希“以欧洲人的方式庆祝法国国庆日（7 月 14 日）”，之后回到柬埔寨。尽管无论是在编年史还是随行王室官员的叙述中，都没有提及有关重大事务的讨论，但西索瓦的巴黎之行恰逢法国与泰国进行谈判，几个月之后，最终暹罗人答应归还柬埔寨的马德望和暹粒两省。② 柬埔寨国内几乎没怎么公开这次出行，只是在地方法语报道中提及相关谣言，即西索瓦已经去法国请求法国人准许赌博在柬埔寨合法化。



金边皇宫入口（图片提供：罗杰·史密斯）

西索瓦时期的编年史用数页关注了马德望和暹粒的回归，这表明

① 柬埔寨舞蹈员参加了 1931 年的殖民地展览，还在 1939—1940 年纽约世界博览会举行过表演。见 Bruno Dagens, *Angkor: La Forêt de prerre* (Paris, 1989), pp. 110ff。

② 有关这次泰国的让步，见 L. P. Briggs, "The Treaty of March 23, 1907, Between France and Siam", *FEQ*, Vol. 5 (1946): 439 - 54。

编纂者同法国人一样，都把此事看作西索瓦统治时期最重要的事件，尽管除了在1906年他向法国总驻扎官提供泰国占领的历史外，西索瓦与此事没有什么关系。两地归还的重要性很可能与吴哥特别是吴哥寺有关，这里保存了数个世纪的柬埔寨王朝。[①] 1909年一份翻译成柬埔寨文的佛教经典——《大藏经》（*Tripitaka*）存放到吴哥寺的一座寺庙中，此后60年，柬埔寨君主经常到访此地，在此举办仪式。

如前所述，柬埔寨西北诸省于1794年置于泰国控制之下，作为交换，泰国承认西索瓦的祖父安英在乌东执政。此后一百多年里，除了19世纪30年代有短暂时期外，泰国人很少亲自经营此地（或者是减少当地人口），而是在各级政府中用当地的高棉人管理。虽然他们不
184 曾修复吴哥的寺庙，但还是完整保留了这些寺庙。两省的财政收入——主要依靠豆蔻和其他林产品的数量——并不高，而且从金边通过水路要比从曼谷经过陆路更容易防御此地。[②]

出于这些原因，主要是避免边界再发生摩擦，泰国在1906年决定将两省让给法国。1907年4月，法、泰签署最后协议，当年底法国正式控制两省。然而，直到1909年，西索瓦都没有访问过该地，至于什么原因，编年史没有说清。

国王和他的臣民还是对收回吴哥大肆庆祝。在1907年10月的
185 *tang tok* 节日期间（按传统官员要在此时要向国王进献礼物），全国上下广泛举办庆祝活动为收回两省“向神灵（*thevoda*）致谢”，到地方任命的地方官回到金边向国王致敬。

接下来的半个世纪，法国学者和柬埔寨工人一直在修复吴哥寺庙。这可能是法国长期统治留给柬埔寨最有价值的遗产了。20世纪20年代，马德望发展成为柬埔寨最繁荣的省，柬埔寨出口大米很多都是此

---

① 西索瓦编年史，pp. 1107 – 10。

② 见 C. Wilson, “The Nai Kong of Battambang, 1824 – 1868”, 载 C. Wilson et al.（eds.）, *Royalty and Commoners*, *Contributions to Asian Studies*, Vol. 15（Leiden, 1980）, pp. 66 – 72，以及 *Phongsawadan muang phratabong* [Chronicle of the region of Battambang] No. 16 of series, *Prachum Phongsawadan* [Collected chronicles]（Bangkok, 1969）, pp. 94 – 106。

地生产的，大量地主隐没在此，该省还吸引了最多的柬埔寨其他地方的移民和来自交趾支那（即越南南部——编者注）柬语地区的移民。[1]

1909 年，很多法国驻扎官配备了打字机；同时，汽车也在全国范围内都有使用。法国殖民当局的这两个进步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后果。一是，法国驻扎官向他们在金边、西贡、河内和巴黎的上级提供其所需要的报告数量剧增。他们不得不比以前更长时间困在办公室，忙于编写文件。他们很少同当地百姓进行交际或业务上的接触，要知道他们拿着薪水来此的目的本是教化和保护当地百姓的。汽车的出现使得殖民官员的出差视察更加迅速，也更加肤浅，他们只能限于道路畅通的地方。实际上，在 20 世纪 20 年代及以后一段时间，法国都在强化对柬埔寨的经济政治控制，但讽刺的是，伴随这一强化过程的是法国官员逐渐脱离柬埔寨人生活的很多领域。在这些年里，柬埔寨农民所经历的政府可能是由少数柬埔寨人和大量越南人组成，他们能进入法国保护体制是因为他们能够用法语书写报告，这种柬埔寨人和越南人的交互影响对柬埔寨民族主义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这在二战之后尤为明显。

---

① 地主土地私有制、佃农耕作和外来移民在这两个地区不寻常地频繁出现，20 世纪 70 年代的种族理论家将此扩展为整个国家农村社会的特征。根据波尔布特的说法，地主土地私有制（其实全国范围并不多见）是革命前柬埔寨的“主要问题”。共产党能够吸引到无地农民的拥护，就是源于这一并不全面的分析以及部分源于对中国经久考验的社会阶级分类的模仿。见 William Willmott，“Analytical Errors of the Kampuchean Communist Party”，*PA*，Vol. 54，No. 2（Summer 1981）：209 –27。

第 9 章　1916—1945 年柬埔寨对法国殖民统治的反应

187 在西索瓦统治的最后 10 年发生了两件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事情。这就是所谓的 1916 年事件和 1925 年法国驻扎官费利克斯·路易斯·巴尔代（Félix Louis Bardez）在磅清扬省乡村被杀事件。前一事件揭示出法国人控制柬埔寨 50 年后仍然对柬埔寨人的交流和社会组织知之甚少；而后一事件是殖民统治时期唯一一次这样的事件，震动了柬埔寨朝廷，乃至在殖民统治结束后柬埔寨民族主义学者还大肆渲染。

1916 年事件

要理解 1916 年事件，我们必须先要清楚法国人在柬埔寨的所有活动经费包括公共工程和法国官员的薪水，都来源于对盐、酒、鸦片、稻米及其他农作物和进出口货物的繁重税收，还有政府工作征收的一些额外费用。当然，对于那些拿不出钱替代劳役任务的穷人，法国人要求他们干 90 天的苦役。只有当农户卖出收获的粮食或者在农闲季节
188 靠打工挣出足够钱才能交付大米税费。收税中有一定的自由额度，因为地方领导人害怕税收任务完不成，都愿意少报自己管理的人口数量，这样就把税负更为均匀地分摊给百姓，同时自己还能有从百姓中渔利的机会。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人在整个印度支那地区发放战争债券，特别是强迫那些富裕阶级（大概主要是中国商人）认购；开征额外税收；招募志愿者到海外服兵役。这些都加重了人民负担。1915年11月下旬，大约三百名金边东北地区的农民来到都城向国王西索瓦请愿，希望国王削减法国人开征的但由柬埔寨官员收缴的税费。国王接见了农民代表，命令他们回家，含糊地承诺会做出调整。[1]

国王接见的消息传到金边东边的行省——长期以来这里一直都是孕育反朝廷情绪的温床，越来越多的农民代表（有时候能有三千人之多）徒步来到都城，在王宫外面聚集，将自己的委屈呈到国王面前。法国驻扎官报告这些请愿活动时，不仅代表人数之多让他们惊讶，而且，正如有人所写到的，柬埔寨人"以如此令人惊讶的速度动员起来"也让他们诧异。另有报告指出，虽然此事件波及全国，但却没有人在事前有所察觉。法国警察估计在1916年前几个月，也就是国王发布请愿民众回村命令之前，大约有四万农民穿越金边城。下半年地方行省发生的零星事件造成了六人死亡；与此同时，西索瓦乘车出游到东部省份，劝诫农民待在家里不要闹事，并取消1916年所有劳役。

从长期看，1916年事件对法国经营柬埔寨的方式和柬埔寨人民的反应没有产生多大影响。实际上，我们并不清楚这次游行是不是反对法国保护制度；请愿者绕开法国殖民当局，直接向国王寻求公正待遇。各省领导人参与组织了这次游行活动，他们的具体身份和动机尚不清楚，但他们组织之快、效率之高非同寻常。这次事件冲击了法国人此 189
前的认识——柬埔寨人懒惰、个人主义，对领导阶层和意识形态漠不关心。一些法国官员震惊于请愿队伍的规模，将此次事件归咎为"德国代理人"的阴谋。也有人看到深藏于民众内心的反君主政体情绪有显现的迹象，用1915年前期流传的一本宣言的话说，"多年来法国人

---

① 西索瓦编年史，pp. 1166－67。还见 John Tully, *Cambodia Under the Tricolour: The Sisowath Years, 1904－1927* (Clayton, Australia, 1996)。有关1916年事件见 Milton Osborne, "Peasant Politics in Cambodia: The 1916 Affair", *Modern Asian Studies* (*MAS*) 12 (1978): 217－43。

让坏人当国王和官员，而恶待好人，这让我们很不高兴”。[①]

有意思的是，1916 年事件恰巧与交趾支那（即越南南部——编者注）严重的反法游行同时发生。二者存在联系的可能性引起了一些法国官员的注意，但柬埔寨人不满情绪的消退速度表明，他们的游行是为了宣泄对地方政府劣迹的不满。

在法国驻扎官巴尔代遇刺发生前的 9 年里，法国人对柬埔寨的控制日益加紧和更富理性化——特别是在财政收入和日常行政的组织方面——以致一些“年老的”柬埔寨官员抱怨“变化太多”。例如，1920 年法国安排当地官员而不是由金边派往各省的官员负责征收稻谷税。一年后，法国人尝试在靠近越南边界的地方重新组建“公社”，但在大约一年后，就放弃了该想法。法国人在 1923 年把他们的监督作用延伸到司法领域，从 1924 年开始扩大佛寺教育，使用劳役建设一系列大型公共工程，特别是用囚犯在国王喜欢的波哥（Bokor）建设道路和山景（很多人过劳而死），该景点于 1925 年正式开放。1917 年柬埔寨第一个稻米压榨机运转——此前一直是把未去壳的大米运到西贡——1916—1925 年期间（1918—1919 年例外，那一年农业歉收，很多省份发生饥荒）是柬埔寨日益繁荣的一个时期，特别是在此的中国商人和法国人受益很大。[②]

法国人与柬埔寨人（除了极少数受宠的官员和王室家族）之间的
190 收入差距很大。一名法国官员一年能挣 1.2 万皮亚斯，由于妻子和两个子女免税，只需交 30 皮亚斯的税。同样的工作柬埔寨人得到的报酬要少很多，20 世纪 30 年代大萧条时期，他们的工资又被削减。另一方面，柬埔寨农民没有固定薪水，只有自己打工挣的（一天 30 分，或一年 90 皮亚斯）或者是卖庄稼的收入（很少有一年超过 40 皮亚斯的时候），而承担的税负在 20 世纪 20 年代是一年 12 皮亚斯。农民按人

① AOM 3 E12（2），柴桢省 1915 年报告。

② 有关柬埔寨在 20 世纪 20 年代发展的讨论见 F. Baudouin, *Le Cambodge pendant et après la grande guerre*（Paris, 1927）, and A. Silvestre, *Le Cambodge administratif*（Phnom Penh, 1924）。还见 Réné Morizon, *Monographie sur le Cambodge*（Paris, 1930）。

头交税，用现金代替劳役，按固定比例交稻谷税，还要花高价购买盐、鸦片和酒，如果家畜送去宰杀还要交屠宰税。

农民能得到什么样的回馈呢？不管法国人怎么样花言巧语，农民得到的很少。法国驻扎官的每月报告显示，农村地区充斥着暴力和混乱，它们并不对法国统治构成直接挑战，也很少出现在报告的政治部分中。不过，对于广大村民来说，显然土匪的长年骚扰（尤其是在旱季）要远比法国人带给他们的好处更为真实。①

在20世纪30年代之前，法国几乎没对柬埔寨的教育给予多少投入。1922年一名法国官员把教育上的付出仅看作一种掩饰。医疗服务水平同样令人可笑，对于金边以外的人来说，很少有人知道电和自来水。换句话说，柬埔寨的钱资助了法国官员和他们想要建的工程。作为回报，柬埔寨避免被法国以外的人控制，也避免其要求独立的危险。法国人成功避免19世纪的事情重演，同时又让20世纪远离柬埔寨。虽然法国人在其他语境中自视为向高棉人输送现代化的传播者，但他们对现代化的恐惧也充斥于大量法国关于柬埔寨的著作中。因为法国人不允许柬埔寨人跟随现代化行事，就以柬埔寨人的先天特征为借口，称这些特征让柬埔寨人天生就对现代观念具有免疫性。

这些观念以缺乏同柬埔寨人直接接触的经验为基础。这个时期对法国殖民主义明确持批判态度的医疗官员安德烈·帕内捷（André
Pannetier）称，进入20世纪后法国人掌握高棉语的能力逐步减弱。② 191
具有讽刺性的是，随着在柬埔寨工作的冒险和浪漫气氛淡薄，法国官

① 见A. Souyris-Rolland, "Les Pirates au Cambodge", *BSEI*, Vol. 25, No. 4 (1950): 307-13。在驻扎官每月的法文报告中，称海盗行径总是随政治形势而来，土匪也被视作安全问题而不是意识形态异议问题。AOM 3 E12（2），柴桢省1921年报告称："柬埔寨人的生活就是袭击他人，充满着不期而遇的陷阱、追逐和埋伏，不过不会造成严重的身体伤害，这就是柬埔寨人嗜好的一种运动方式。"还见Alain Forest, *Le Cambodge et la colonisation française: Histoire d'une colonisation sans heurts* (Paris, 1980), pp. 373-412; David Johnston, "Bandit, Nakleng, and Peasant in Rural Thai Society", 载C. Wilson et al. (eds.), *Royalty and Commoners*, *Contributions to Asian Studies*, Vol. 15 (Leiden, 1980), pp. 90-101，该文提供了一个可作比较的泰国视角。

② A. Pannetier, *Notes cambodgiennes* (Paris, 1921, repr. 1986), p. 75.

方描绘柬埔寨人的用词反而日益模糊和浪漫。1927 年这种变化达到顶点，当时的法国总督保罗·杜美，后来成为法国总统，为在楼梯上的一组雕像揭幕，该楼梯从马赛火车站通向地下。其中一座雕像命名为“我们在亚洲的财产”，描绘了一个半裸的少女用吴哥服饰装扮起来，躺在一个长凳上，正由两个更小的半裸女孩（这两个女孩分别代表老挝和越南）服侍。考虑到是法国在印度支那得到的最容易也是时间最久的保护国，柬埔寨被描绘成大孩子，接受另外两个同样地位国家的服侍，也是对柬埔寨的褒奖。当然，少女周围的柬埔寨人是何寓意或许只有雕塑家的潜意识知道。①

法国驻扎官巴尔代遇刺事件

1923 年后期，法国在波罗勉省的代理驻扎官费利克斯·路易斯·巴尔代，是一个精力充沛又有野心的法国官员。他在一份报告中陈述了他所认为的收税之慢的 3 个原因：“柬埔寨官员缺乏活力，缺乏（对收税官员的）监督和收缴程序的缺陷。”② 在 1924 年的征税过程中，巴尔代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他所在省的征税程序，所有 18 种税目的税款远多于 1923 年。他通过自己的努力表明现有的税收体制能够带来更多的利益。实际上是，这位驻扎官急于揭露当地官员的一味妥协、编造假账和虚报税收，当即提高在财政收入中占据最大比重的两种税目——稻谷税和华人的人头税。

巴尔代在波罗勉省的成功引起他上司的注意。1924 年后期，他越

① 这座雕塑是由 Louis Bottinelly 雕刻的。有关印度支那对法国作家影响的研究见 L. Malleret, *L'Exotisme indochinois dans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depuis* 1860 (Paris, 1934), 特别是 pp. 183 -92, 216 - 44。这个时期有关柬埔寨的小说包括 Charles Bellan, *Fleur de lotus* (Paris, 1924); Pierre Benoit, *Le Roi lépreux* (Paris, 1927); Jean Dorsenne, *Sous le soleil des bonzes* (Paris, 1934); George Groslier, *La route du plus fort* (Paris, 1935); André Malraux, *La Voie royale* (Paris, 1930); and Marguerite Duras, *Un barrage contre la Pacifique* (Paris, 1952)。还见 Penny Edwards, *Cambodge: The Cultivation of a Nation* (1963 - 1945) (Honolulu, 2007), Edwards 认为柬埔寨（1954 年后独立）是一个合作性国家，只是到了殖民时期法国人和柬埔寨精英阶层才部分意识到国家的建设。

② AOM 3E 8 (3), 1924 年波罗勉省的报告。Felix Louis Bardez, 1882 年生于巴黎，曾在印度支那工作过，1908 年后主要是在柬埔寨。

过很多高级官员被调去做磅清扬省的驻扎官，该省长期受土匪和低缴税率所困扰。巴尔代的到任正赶上为建波哥的山间避暑胜地而宣布额 192 外征税，但正如巴尔代向朋友承认的那样，很难收到税款，柬埔寨官员的收据要等很长时间才能收到。1925 年早期，一位官员试着征收这一新税，遭到村民暴打。

4 月 18 日，巴尔代听到报告说又有一个叫 Krang Laav 的村庄的税款征不上来，非常生气，在一名翻译官和一名柬埔寨军人的陪同下亲自来此村庄。① 他把没缴税的人召集到村里礼堂（sala），其中一些人还被手铐锁着，他威胁要将他们送进监狱，而实际上即使欠缴三个月税款连罚款都构不成。他不让这些人吃午饭，而自己却在吃饭，这激怒了围观的村民，他们平时都是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在混乱中，巴尔代和随行人员遭到二三十人的攻击。不到半个小时，巴尔代、翻译和那名军人就被村民用椅子、栅栏、斧柄和枪托殴打致死。尸体被肢解；据一些见证者称，凶手围着尸体跳舞欢呼。后来不久，在当地领袖（这几个人未被审判）的煽动下，700 名柬埔寨人——也就是那些聆听巴尔代讲话的围观村民——开始向省会磅清扬游行，要求免除他们的赋税。然而，几个小时后，他们的热情就消退下去，还没有抵达目的地，游行队伍或自身瓦解，或被武装军人驱散。

巴尔代被杀的消息传来后震动了金边的法国侨民社会，主要是因为这是第一起村民杀死现任高级法国官员的事件。曾经有法国官员被匪徒或他们的仆人杀死的事情，但还没有官员在征税的时候被杀。这次事件显然更为严重。法国人迅速通过他们操作的王室成员采取行动，在他们的叮嘱下，西索瓦派自己的大儿子莫尼旺协同一名法国政治顾问来到该地区传达国王对此事的不满。用国王训令的形式把村名 Krang

① 有关这一事件的详细记述，见 David P. Chandler, "The Assassination of Résident Bardez (1925)", *JSS*, Vol. 72, No. 2 (1982): 35 – 49。又见 Walter Langlois, *André Malraux: The Indo – China Adventure* (New York, 1966), pp. 185 – 88, and Durtain, *Dieux blancs, hommes jaunes* (Paris, 1930), pp. 264 – 65。

Laav 改为 Direchhan（“兽性”的意思）。① 训令强迫村民在此后 10 年内每逢巴尔代祭日都要举行赎罪活动。这一训令的特别之处在于认为
193 这一事件是一次集体犯罪。18 名参与此事的被捕人士在审判中也以此说辞为自己辩护，但是检方排除了这一观点，他们看到把这次杀人事件同任何政治不满联系起来都是非常危险的。有意思的是，其中一名被捕者在 1980 年仍然在世，他告诉采访者“村里的每一个人”都参与了殴打巴尔代和他的同伴。②

1925 年 12 月，对行凶者的公开审判在金边进行，媒体广泛予以报道，这一案件正好迎合了印支其他地区日益高涨的反殖民情绪。在庭审过程中，检方极力证明被告是来自村外的海盗，抢劫财物是他们的行凶动机。实际上，虽然巴尔代的税款在殴打中遗失，但是他自己的皮夹却没人动过。更重要的一点，巴尔代的日记被检方没收，以涉及“政治”材料为理由列为机密保存。巴尔代一些朋友的证言暗示日记中可能记录着他对额外征税的悲观情绪。他死之前曾对一位朋友简短表示，在这个省中根本没有足够的钱缴付新征税费。法国高官采取措施阻碍为被告开脱的证人证言。有一次，被告律师的茶水明显被人投毒，被告方雇的一名速记员迫于以前雇主的压力回到西贡工作。法国人似乎不想宣扬审判过程中暴露出的一个事实——在印支地区柬埔寨农民按人均计算承付最高税负，这是对柬埔寨人顺从性格的标价。

巴尔代事件类似于 1916 年事件和 1942 年僧侣游行事件（下面会讨论），不同于殖民时期以前发生的事情。它暴露出殖民统治机制和法国人关于柬埔寨人性格不切实际的神话。巴尔代在柬埔寨尽职尽责工作了 15 年，却仍然不会说高棉语，这一事实是法国人与柬埔寨人距离感扩大的一方面体现。不懂当地语言，他怎么能够准确评价普通老百姓的想法？似乎殖民时期柬埔寨人的大部分生活都是在一个屏风后

---

① 关于这道训令的法文版，见 Dik Keam, *Phum Direchan* [Bestiality Village] (Phnom Penh, 1971), pp. 154 – 59。

② Ben Kiernan 非常好心地将他对一名参与者 Sok Bith 的采访记录借给我看，这次采访是在 1980 年 9 月进行的。Bith 因为参与这次攻击事件被判处 15 年徒刑。

面进行的，法国人既看不到也听不到。另一名法国驻扎官在记录这一时期的柬埔寨时，曾这样评价："我们不仅要疑问柬埔寨人民持续展 194
现出来的长久平静是否仅仅是一种外在表现，它背后还掩藏着一些难以说清的感情……我们没有认识到他们的真实天性。"①

驻扎官或许会为自己辩解道，他们被雇来管理这些人而不是了解他们。他们每个月都要按要求完成冗长的文字工作，像调解人处理未决的案子一样，一坐就是数天，还要监督很多公共工程项目，主要是公路修建。法国人借助这些公共工程长期强征劳役，促使柬埔寨现代化，并为他们的存在提供借口。

民族主义觉醒

巴尔代事件也为我们提供了窥察历史记载中柬埔寨农民的机会。实际上在 1927 年之前，没有高棉语出版的报纸和刊物，印刷的柬埔寨文学几乎完全是佛经或 19 世纪的史诗。1938 年，也就是第一份高棉语报纸——《吴哥寺》（*Nagara Vata*）②——出现两年之后，第一本用高棉语写成的小说《洞里萨》（*Tonle Sap*）出版。考虑到法国人并不怎么关注柬埔寨的教育，高棉语与在印支地区印刷的越南语材料数量相比有很大差距，这样的现实并不让人惊奇。从吴哥时期，柬埔寨的识字教育就与研究和传播宗教文献有关。在殖民时期，高棉语的识字教育几乎完全由佛教寺庙掌管。而在 1936 年之前，唯一的一份高棉语杂志——《柬埔寨太阳》（*Kambuja Surya*）——一直是在法国人资助的佛学院（Institute Bouddhique）的支持下每月出版的。除了极个别外，期刊都仅限于刊载民间传说、佛法经文，以及与王室有关的材料，

① AOM 3E 7（6），桔井省 1925—1926 年度报告。

② 这份报纸最终受到学术界应有的关注，载 Edwards，"Cambodge"。又见 Bunchhan Muul, *Kuk Niyobay* [Political prison]（Phnom Penh, 1971），pp. 8 - 14。

即便是用高棉语编写的柬埔寨编年史也没有印刷版。[1]

由于这些限制条件，我们关于20世纪30年代柬埔寨的历史画面并不平衡。通过阅读法国小说、官方报告和新闻报纸建构起来的柬埔
195 寨历史，滤去了柬埔寨百姓的很多内容，或者仅仅按事件记载。关于西索瓦国王和他儿子西索瓦·莫尼旺国王（1927—1941年在位）的编年史手稿也不能提供很大帮助，因为这些史书只是用公式式的语言记录了国王参与的事件，当然，关于莫尼旺的编年史也有一点涉及1932年的西贡政变、意大利－埃塞俄比亚战争和1940年法国向德国投降这样的事件。这一类史书要求尽量少用个人语言，即便是国王的话也很少引用。[2] 各省关于殖民时期的档案材料也不能用来研究，这样就很难衡量社会和思想变化的模式与程度，比如这些变化在多大程度上是由法国人主动进行的，柬埔寨人在二战前这段时期又有什么样的反应。据材料显示，柬埔寨现代化变革在50年代之前并没有渗透到农村；然而30年代柬埔寨的面貌与法国人刚来此地时甚至与本世纪初相比已有很大不同。

内陆交通出现很大变化。从1900年到1930年，通过在全国范围内征用劳役，建成了大约9000公里（5400英里）的公路。而且在1928—1932年之间，在金边和马德望之间铺设了500公里（200英里）的铁路，后来又延伸到泰国边界。这些变化意味着成千上万的农村地区人口可以乘车在全国内快速迁移，他们到金边和地方首府也更加容易和频繁。交通的发展同样有利于法国人的渗透和中国人对农村经济的开发。柬埔寨的商业发展——特别是大米出口和橡胶种植——让法

---

① 殖民刊物《柬埔寨太阳》第一次发表柬埔寨语文学作品，它同《那加拉哇塔》报一样，都应要详细研究。见 Jacques Népote and Khing Hoc Dy, "Literature and Society in Modern Cambodia", 载 Tham Seong Che (ed.), *Essays on Literature and Society in Southeast Asia* (Singapore, 1981), pp. 56－81。

② 关于这两本编年史文本的讨论，见 David Chandler, "Cambodian Royal Chronicles (Rajabangsavatar), 1927－1949: Kingship and Historiography in the Colonial Era", 载 *Facing the Cambodian Past*, pp. 189－205, and Chandler, "Instructions for the Corps of Royal Scribes: An Undated Cambodian Manuscript from the Colonial Era", 同上, pp. 159－64。

国人、垄断出口贸易的中国企业主以及在橡胶种植园工作的越南劳动力都多少从中受益。威廉姆·E. 威尔莫特（William E. Willmott）指出直到20世纪20年代，中国人向柬埔寨的移民规模每年保持在2000人左右，在繁荣的年份里能达到一年5000人。[①] 柬埔寨境内的华人人数相应增加——从1905年大约17万人增加到二战开始时的30万人。基本不变的是，这些移民都从事小规模的商业活动，华人和有华人血 196
统的柬埔寨人已经控制了柬埔寨的商业领域。再加上很多越南移民来到柬埔寨，除了受雇于种植园外，他们更愿意到城市中谋生，这样柬埔寨的很多城市成为被外国官僚、移民和企业主主宰的飞地，这样的情况在殖民时期的东南亚经常出现。柬埔寨精英阶层对这一事实非常清楚，但他们却不能或不愿意为此有所行动。

柬埔寨精英阶层虽然规模相对较小，但地位越来越重要。1930年出现一次有趣的巧合。当时柬埔寨第一条铁路投入使用，也是在这一年，第一批柬埔寨学生从法国设在西贡的公立中学毕业，这些学生中有两人是王子，有四人在40年代和50年代担任部长职务。柬埔寨直到1936年才有自己的公立中学，学校以西索瓦的名字命名，建在他以前王宫的遗址上。小学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掌握在僧伽手中，法国人向现存约5000所寺庙学校提供资助的很少，学生在此沿用由来已久的方式学习传统科目。[②]

这些进步出现在经济繁荣期，20世纪20年代的繁荣景象对印度

① William E. Willmott, *The Chinese in Cambodia* (Vancouver, 1967), and Willmott, "History and Sociology of the Chinese in Cambodia Before the French Protectorate", *JSEAH*, Vol. 7, No. 1 (March 1966): 1. 5 – 38.

② 有关这时期的教育，见 Forest, *Le Cambodge*, pp. 143 – 65; Jacques Nepote, "Education et développement dans le Cambodge moderne", *Mondes et développement*, No. 28 (1974): 767 – 92。关于柬埔寨殖民时期妇女研究，见 Jacobsen, *Lost Goddesses*, Chapter 7: Penny Edwards, "Womanizing Indochina: Fiction, Nation and Co – Habitation in Colonial Cambodia, 1890 – 1930", 载 Judith Clancy – Smith and Frances Gouda (eds.), *Domesticating the Empire: Race, Gender and Family Life in French and Dutch Colonialism* (Charlottesville, Va., 1998), pp. 108 – 30; P. Edwards, "Propa – Gender: Marianne, Joan of Arc, and the Export of French Gender Ideology to Cambodia", 载 T. Chafer and Amanda Sakur (eds.), *Promoting the Colonial Idea: Propaganda and Visions of Empire in France* (New York, 2002), pp. 116 – 32。

支那多数地方都产生影响。在柬埔寨，最大的受益者是在磅湛省从事大米出口和经营橡胶种植园的公司。种植园对柬埔寨乡村经济影响有限，而为满足国际需求大米产量急剧增加，由此税收扩大带来的充裕资金广泛用于一些公共工程，包括美化金边，省内城镇通电，上面提到的公路修建，以及海边旅游胜地和山中酒店的建设（法国人从中受益，并培育了旅游产业）。在这种环境下，巴尔代事件几乎没有影响到法国人的自满现状。

然而，30年代的世界大萧条逆转或终止了这种势头，大米地方价从一担（大约68公斤或150磅）3皮亚斯直线降到1皮亚斯。根据法国驻扎官的报告，柬埔寨农民的反应是减少大米种植面积（从1928年
197 到1933年全国减少了1/3），要求推迟或免除缴税，更有某些地方农民只能从宗教仪式中寻求安慰，例如在交趾支那附近兴起的糅合各种宗教的高台教（Cao Dai）仪式。[①]

在这一时期，印支联邦越南境内发生多次反法起义，不过柬埔寨保持稳定。在法国驻扎官的报告中，多次称赞柬埔寨农民的“斯多葛”式的人生哲学，能够坦然面对印支联邦内额度最高、种类最多的赋税。他们中有人把这种顺从归功于柬埔寨人对“权威的崇敬”。尽管如此，农村暴力事件——高棉人侵犯高棉人——还是有所上升，只是在30年代中期经济危机过去之后才有所下降。1931年农村地区税款拖欠率达到45%，接下来一年，一些免除税款的请求获得法国总驻扎官批准后，税款拖欠率更是超过60%。当时很多柬埔寨人回到农村种地谋生，金边人口出现缓慢增长也就不奇怪了——从1931年的9万6千人到1936年仅增长到10万人。整个这一时期，直到70年代，金边被非正式地划分为3个居民带，越南人和占族人聚居在北边，中国

① 大萧条时期关于柬埔寨的报告，见AOM 3E 15（8），贡布省的年度报告；AOM 3（5），甘丹省的年度报告；以及AOM 3E 10（4），上丁省的年度报告。要对积极的变化有所警惕，1933年一名法国行政官员报告称在茶胶省使用现金致使的私人财富崩溃，还补充说“共同的贫穷状况催生了强有力的民众联合形式，加剧了自古以来的阶级敌对甚至种族敌对”；AOM 3E 7（6），茶胶省报告。

人和法国人生活在中心商业区，柬埔寨人在王宫的南边和西边，濒临湄公河。

为了增加税收财政，法国人于 1931 年鼓动莫尼旺国王（5 年前继任王位）到地方行省巡游，他劝诫围观群众（实际上是地方官员组织的）以节俭和勤奋为美德。而国王自己继续过着富足的生活，他的孙子诺罗敦・西哈努克后来回忆莫尼旺很少花时间参与官方事务，更愿意与成群妻妾混在一起。[①] 其中最宠爱的一个是桑洛沙（Saloth Sar），也就是 70 年代柬埔寨共产党书记波尔布特的大姐。在大萧条期间，法国人为莫尼旺修建了一些新宫殿。1932 年，莫尼旺热情款待法国殖民部长保罗・雷诺（Paul Reynaud），他来印度支那调查去年越南人起义造成的影响。在柬埔寨的访问完全由最有权势的柬埔寨官员秀（Thio-
unn）负责接待，直到此时秀还担任着负责财政、王室事务和艺术的 198
大臣职务。从西索瓦统治之初，他就在法国的支持下或多或少地管理国家事务。具有讽刺性的是，他 3 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孙子都是柬埔寨共产党中的重要成员。

30 年代中期，印度支那经济缓慢恢复，大米出口量（特别是马德望省）达到一年 10 万吨，用于出口的新粮食作物——尤其是玉米——得到大面积种植。从行政角度看，30 年代的后期见证越来越多的柬埔寨人参与到政治管理中，特别是在地方行省事务中，很多在柬埔寨独立后担任高官的人从这开始他们的政治生涯，包括涅刁龙（Nhek Tioulong）、朗诺（Lon Nol）和西索瓦・施里玛达（Sisowath Sirik Matak）。政治上让法国人感到欣慰的是，交趾支那的混乱（部分源于法国人民阵线政府中托洛茨基和共产党支持者之间的斗争）并没有在柬埔寨产生影响。就在 1935 年法国总督到访的时候，一本倾向法国的小册子在柬埔寨出版，它的出现有点晚但却起来一个好听的名字——“觉醒”。[②] 法国人所说的“觉醒”用高棉语解释就是指经济发展和政治参

---

① Norodom Sihanouk, *L'Indocbine vue de Pékin* (Paris, 1972), pp. 27 - 28.

② 见 H. de Grauclade, *Le Réveil du peuple khmer* (Hanoi, 1935)；不是很乐观的观点，见 G. de Pourtales, *Nous, à qui rien n'appartient* (Paris, 1931), pp. 115ff。

与，而不是提高自治或对殖民统治幡然醒悟。尽管如此，战后柬埔寨民族主义的根源在20世纪30年代已有体现，当时民族主义以合作友好的方式第一次出现，而法国人在此寻找他们在越南所遇到的那种革命政治和暴力根本是徒劳。在这一时期的法国秘密政治报告中，都把柬埔寨划为不存在革命活动的国家，而且现代柬埔寨历史学家也没有在这一时期找到柬埔寨共产主义运动的根芽。[①]

然而，另一种觉醒正在金边精英阶层中发生，特别是那些在柬埔寨第一所高中——西索瓦学院（1936年后改为西索瓦公立中学）接受过教育的人，该校完全用法语授课。30年代早期，学院中一些学生就
199 呼吁国王不要偏袒有越南传统背景的学生。到1937年，该校毕业生联合会有超过500名成员。

该联合会是柬埔寨第一个类似组织。在柬埔寨，那种根据行业形成的自愿性社团一直发展缓慢，法国人也不鼓励柬埔寨人建立类似组织。这些年来，法国人一直为柬埔寨人不够团结而悲哀，同时又反对他们组建联合组织的任何想法——如一战老兵和高台教信众曾试图建立这样的组织。实际上，从对巴尔代事件的反应中，我们能够看出法国人害怕柬埔寨人团结起来。从行政管理的目的看，法国人更愿意同一个垂直型社会而不是水平式社会打交道，至少在理论上是这样。同样如果柬埔寨人关于官僚政治的想法有所转变，或许让很多法国官员怀疑农村中会出现这种进步——不管是由新教传教士、高台教还是其他外来人员发起的——要知道柬埔寨农村很少努力改变自身普遍贫穷、缺乏医疗和现代教育的现状。

20世纪30年代推动柬埔寨自我觉醒实际上有3个主要渠道，西瓦索中学、佛学院和《那加拉哇塔》（*Nagara Vatta*）报纸，该报纸是由巴真（Pach Chhoeun）和辛瓦（Sim Var）于1936年创办。二人在30岁的时候结识了一名年轻的柬埔寨法官——山玉成（Son Ngoc

---

① 例如，Ben Kiernan，“Origins of Khmer Communism”，载 *Southeast Asian Affairs* 1981（Singapore，1980），pp. 161－80。又见 Ben Kiernan，*How Pol Pot Came to Power*（London，1985），pp. 8ff。

Thanh）。山玉成在越南出生，到法国接受教育。[①] 三人与佛学院联系紧密，山玉成后来还成为该佛学院的图书管理员。这让他们有机会接触到柬埔寨僧伽领袖、柬埔寨知识分子，还有一个由法国知识分子和官员组成的小组（该小组由佛学院秘书长苏珊·卡尔普勒（Suzanne Karpelès）领导，他是一个富有想法和精力充沛的人，致力于复兴柬埔寨文化）。

《那加拉哇塔》的立场同情柬埔寨人但并不反法。该报反对越南人控制着柬埔寨的行政文职和中国人控制着柬埔寨商业，呼吁提供足够教授高棉语的合适岗位。编辑还谴责中国商人在农村放高利贷，法国人拖延建立现代化的教育体系，对柬埔寨农民缺乏信用，以及柬埔 200
寨公务员薪水过低。这份报纸还努力拉开柬埔寨与越南在历史与志向方面的距离。一个编辑甚至把希特勒在欧洲的领土扩张比作越南 19 世纪对柬埔寨的侵略。此报逐渐形成一种反越情绪，这种情绪充斥在柬埔寨独立后到 1978—1979 年越南入侵前的每届政府中。

而从自身的历史发展来看，《那加拉哇塔》报的重要价值在于这是 1863 年以来法国人与其所谓的休眠附属国之间的第一次对话，也是柬埔寨精英之间的对话。早在 1937 年报纸的发行量就超过 5000 份。毫无疑问，读者人数更高。

哪些人是该报的读者？哪些人是新的精英分子？主要是在政府部分担任较低职务的柬埔寨年轻人，他们至少在法国教育系统中接受过教育。毫无疑问，这些人主要集中在金边。曾在 20 世纪 70 年代短命的高棉共和国中担任要职的 Bunchhan Muul，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那加拉哇塔》将自己的使命定位为唤醒柬埔寨人民——它的这一形象一直持续到 20 世纪 50 年代，那时山玉成从海外流亡回国，创建了另一份民族主义报纸，取名《高棉人觉醒》（*Khmer Krok*）。《那加拉哇塔》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给了成千上万的柬埔寨人第一次用

---

① 关于二战期间和之后山玉成的活动在本章中有所介绍。又见 David Chandler，“The Kingdom of Kampuchea, March - October 1945”，载 *Facing the Cambodian Past*, pp. 165 - 88。

自己的语言了解外边世界事情的机会。

然而，如果用受教育情况来界定柬埔寨新兴精英分子，规模还是比较小的。到1939年，从西索瓦中学毕业的学生数量仅为6人，而全国可能也只有12人在国外大专院校进修过。政治觉醒与技术落后之间的差距一直持续到后殖民时期，这种局面是法国在柬埔寨本土教育上的政策惯性使然，法国人不愿意发展柬埔寨的教育。

在1940年6月法国投降之前，没有一个印支联邦的官员对法国人
201 在亚洲永久存在公开质疑。比如，柬埔寨没有采取行动扩大选举权，没有引入代议制政府（只有一个咨询传统），也没有系统训练柬埔寨人以取代行政部门中的法国人。不过，20世纪30年代在地方行省中有权力下放的迹象，即允许一些经验丰富资历较深的非法国人地方官员准备地方预算和定期报告。[1] 对此，法国官员似乎并没有受讽的感觉。1939年，金边精心举办了纪念法国大革命150周年的庆祝仪式，集会地点就在共和广场。[2]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更准确地说是从1940年6月到1945年10月——绝对是印度支那历史上的分水岭。在越南的确是这种情况，而在柬埔寨也是类似。由于自身实力的衰弱，法国人在柬埔寨的政策和柬埔寨人的反应都与此前有很大的不同。柬埔寨独立在1939年还是难以想象和不现实的事情，到1945年底就只是个时间问题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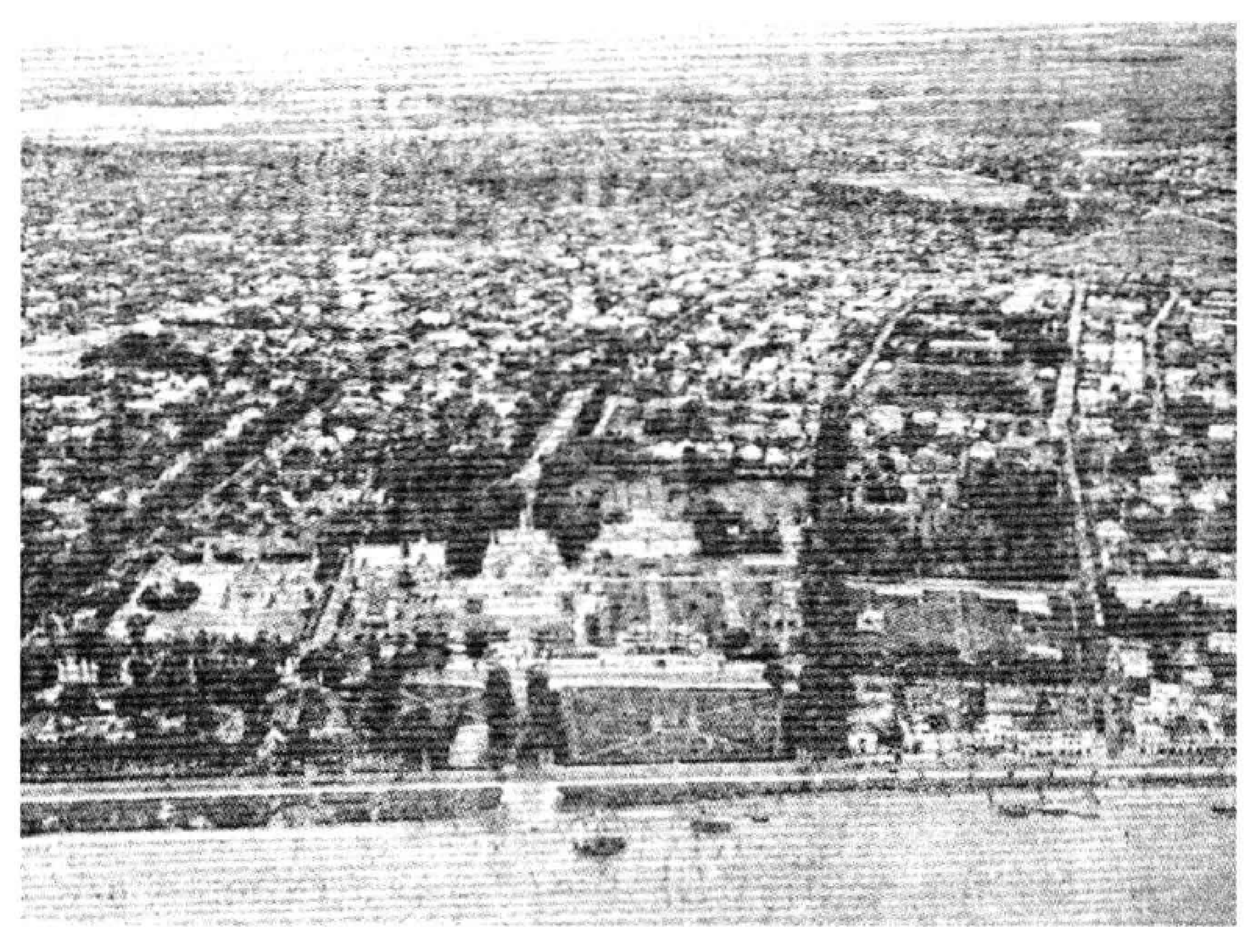
东南亚很多国家的事态都是如此，特别是在缅甸和荷属东印度（今印度尼西亚）。印度支那民族主义发展情况的不同，在于法国是该地区唯一的殖民强国，在二战的大部分时期能够对所占领土维持日常统治。法国人能够如此在于他们向日本人做出了巨大让步。而在东南亚其他地方，从1942年到1945年间日本人将殖民官员投入监狱，转

---

[1] 例如，AOM 3E 8（12），波罗勉省政府1923年报告。

[2] *L'Echo du Cambodge*, July 19, 1933.

而通过当地官员进行统治，这些官员通常是从殖民时期的反对人士中招募的。另一方面，法国在印度支那采取措施努力去除民主主义思潮和实践，包括维持秘密警察监督，向当地人开放政府职位，松绑某些政策。但从柬埔寨的案例中，可以认为正是法国的放松管制以及随之发生的几次事件，催生了柬埔寨的精英民族主义，直到20世纪70年代精英民族主义都发挥着重要作用。[①]



1970年金边空中俯视照片（图片提供：高棉共和国信息部）

有5件事情值得我们详细考察：1940—1941年的法兰克—暹罗人 202
战争；1941年莫尼旺的孙子诺罗敦·西哈努克加冕；1942年7月所谓的僧侣游行；1943年罗马化危机；最后是1945年3月9日日本人发动政变，解除法国对印度支那的控制。

① 关于这一时期一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虽然关于柬埔寨谈得很少）是，A. W. McCoy (ed.), *Southeast Asia Under Japanese Occupa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Monograph Series No. 22, 1980)。

这些事情都发生在维希法国时期，从1940年7月到1945年3月，海军副司令让·德古（Jean Decoux）控制着印度支那。① 与此前第三共和国的统治相比，维希政府的有些统治方式更为灵活，而有些统治方式更具压制性和意识形态化。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法国官员为安抚日本人同时也是遵从自己的意识形态偏好，往往采取支持轴心国、反对英国的路线，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看到自己在东南亚的脆弱地位，只能靠自己微弱的军事力量维持统治。

灵活性政策的例子包括提高柬埔寨官员的薪水，扩大他们的职责；
203 鼓励国家认同感，特别是将这种认同与理想化的吴哥王朝和阇耶跋摩七世时期联系起来；沿维希政府的路线组建准军事性的青年组织。这些组织让很多柬埔寨青年人第一次尝试成为一名家族外组织（除了僧伽）的成员。

维希政权也采取一些压制性政策。1940年后期，取缔整个印支地区民选机构（其中一些机构在越南南部尤其重要）。1942年僧侣发生游行之后，《那加拉哇塔》停止出版，三十多名柬埔寨人长期关进监狱。这些举措对那些在四五十年代领导民族主义运动的人产生了很大影响。据我们分析，在柬埔寨乡村几乎没什么影响。

这几年法国人在法国和印度支那所要做的就是忍受战争。他们希望即便是轴心国取胜之后，法国也能凭借某种身份认同和保留下来的大部分殖民地重新崛起。在柬埔寨和越南，历史上的辉煌和一些尚武英雄（如圣女贞德、征氏姐妹和阇耶跋摩七世）在这一过程中被重新提及。法国人在柬埔寨选择同王室制度合作，而那些反对他们的人则在战争期间日益具有反君主体制倾向，长期存在于柬埔寨政治中的派系从此产生。

1940年后期法泰战争爆发。亲日的泰国銮披汶·颂堪（Phibul Songgram）政府意识到法国军事虚弱，抓住这一时机企图重新占领在

① 德古在他的回忆录 *A la barre de l'Indochine*（Paris, 1949）中对这一时期有所讨论。还见 N. Sihanouk, *Souvenirs doux et amers*（Paris, 1981）, pp. 59 – 114。

20世纪初让给法国的柬埔寨和老挝领土。泰国的军事举动正迎合了这一时期主张收复国土的民族主义思潮。陆战方面，缺乏装备的法军屡屡失败。然而在海战方面，1941年1月，法国航母和军舰取得了对泰国海军的一次大胜。[1] 日本人害怕战争可能会进一步对泰国不利，就迫使法国政府到东京谈判。谈判结果是将马德望省、暹粒省大部分和老挝部分土地——总共6.5万平方公里稍多点——让给泰国，而泰国支付6百万皮阿斯作为补偿。[2]法国人为自己的保护国保住了吴哥，但 204
是丢失领土的耻辱还是让莫尼旺国王怨恨不已，以至于在他生前最后几个月里（1941年4月去世）拒绝会见法国官员或者用法语跟人交谈。

莫尼旺的去世给法国官员提出了难题，军事失败后不久他们就关注宫廷斗争的各种可能结果，即使是非常渺小的可能性。[3] 20世纪30年代，虽然法国人曾建议由诺罗敦·苏拉马里特王子（诺罗敦的孙子，与莫尼旺的女儿结婚）作为储君，但莫尼旺的儿子莫尼雷特（Monireth 1909—1975）一直被认为是王位的当然继任者。在殖民时期，诺罗敦与西索瓦两系之间的竞争就偶尔表面化，很大因素是王室成员之间除了相互争吵之外无事可做。与泰国的战争结束后，法国总督让·德古倾向选择苏拉马里特的儿子，当时还是西贡法国中学的学生的诺罗敦·西哈努克（1922年出生）继任国王。表面上的理由是选择西哈努克而不是莫尼雷特是弥合诺罗敦和西索瓦两系之间的裂缝。其实，很可能是因为在这两位候选人中，西哈努克更具可塑性，并且没有独立倾向。

1941年4月西哈努克继任王位，10月正式加冕。这位害羞男孩一点也不像一个主宰柬埔寨政治六十多年的人。西哈努克的父母关系疏

① 关于战争的讨论见 John Tully, *France on the Mekong*, pp. 333－39。

② Charles Robequai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French Indo－China* (Oxford, 1944), p. 366.

③ 见 Milton Osborne, "King－making in Cambodia: From Sisowath to Sihanouk", *JSEAS*, Vol. 4, No. 3 (September 1973): 169－85。

远，他是他们唯一的孩子；他曾在回忆录中回想自己孤独封闭的童年。[①] 他在学校里是一名优秀的学生和出色的音乐家，但他没有受过王位训练，在统治的最初几年里他与法国顾问密切合作。

刚开始时，西哈努克进行了适度的改革，以树立他在柬埔寨人民中的形象，也是弥补自己祖父执政时最后几个月的隐遁失职。取消法国人每年贡送的鸦片，劝说宫廷部长秀退休，亲王在维希政权领导的青年组织中十分活跃。[②] 然而，他的行动自由不仅受限于法国顾问，还受限于 1941 年 8 月开始驻扎在柬埔寨的八千日军。没人知道日本人的意图。

205 从 1942 年开始，在整个东南亚地区法国军事力量处于弱势，而日本同情某些反殖民运动，很多知识分子（很多是僧伽分子）注意到这些情况，这些人都与《那加拉哇塔》报和佛学院有关系。1940 年至 1942 年间，《那加拉哇塔》报日益采取一种亲日、反殖的立场。这几年里，至少有 32 期报纸遭到法国人的审查，其中有 10 期报纸的主编遭到迫害。有些审查是法国人反应过度了。现在还没有公开早期日本对柬埔寨民族主义的资金支持，但可以推测双方之间存在一些合作，而且山玉成和他的追随者积极寻求同日本人的合作。这群柬埔寨人和法国人的冲突在 1942 年 7 月僧侣游行中达到顶点。[③]

整个 20 世纪，法国人都密切注意着柬埔寨和老挝的佛教僧伽，知道在老挝人和高棉人思想中佛教完全能够替代殖民价值体系。跟泰国一样，柬埔寨僧伽也分为两派，较大的一支称为大宗派（Mahanikay），较小的一支称为法宗派（Thammayut），享有王室供奉。两派在教义上基本一致，但在程序上有所区别。二者经常为管辖权问题争吵，因为法宗派与宫廷和精英关系密切，那些具有反君主政体思想的僧侣多加

---

① Sihanouk, *L'Indochine vue de Pékin*, pp. 19 – 30, and Sihanouk, *Souvenirs doux et amers*, pp. 35 – 50.

② 西哈努克编年史，pp. 136 – 40。

③ 见 V. M. Reddi, *A History of the Cambodian Independence l'Aovement* 1863 – 1955 (Tirupati, 1971), pp. 82 – 84; Bunchhan Muul, *Kuk niyobay* [Political prison] (Phnom Penh, 1971); Kong Somkar, *Achar Hem Chieu* [Venerable Hem Chieu] (Phnom Penh, 1971)。

入大宗派。

其中一个叫汗鸠（Hem Chieu）（1898—1943）的僧侣，原是金边上座部佛教学校的老师，被牵涉到一次反法阴谋中，他曾向几个柬埔寨民兵组织成员提出含糊的政变计划。显然，由于一个亲法民兵通风报信，1942年7月17日他同另一名僧侣被逮捕。汗鸠是僧伽一名重要成员，他被捕的方式——世俗当局不允许他按照寺庙规矩离开——冒犯了他的宗教同事，当时他们正交给《那加拉哇塔》的民族主义团体一个重要案子。接下来的3天里，这些民族主义者与日本人进行秘密商讨，寻求日本人支持他们发起一场反法游行以支持被捕的僧侣。据山玉成说，西贡的日本权力机构（他们对金边的日本人有管辖权） 206
含蓄地同意支持柬埔寨人在7月20日进行集会游行的计划。[①]

那天早上，一千多人（大约有一半是僧侣）沿金边主要大道行进到法国总驻扎官让·德·朗斯（Jean de Lens）的办公室，要求释放汗鸠。法国、柬埔寨和越南的警察一直尾随游行队伍，并拍下照片。《那加拉哇塔》的主编巴真热情地领导着队伍前行，当他向法国人居住区的一名法国官员提交请愿书时被捕。接下来几天游行市民一直聚集抗议，巴真很快被审判。巴真先是被判处死刑，后又被维希政府减刑为终身监禁——17年前对杀害巴尔代的凶手也是这样的判决。山玉成在金边躲藏了几天后逃至泰国控制的马德望市，他后来承认参与策划游行。1943年初，山玉成获得日本庇护，他在东京生活了两年，给马德望的民族主义同事写过几封充满惆怅的信，希望他们保持民族主义的热情，保证他们继续同日本人保持慎重的合作。

这次示威游行的最终瓦解说明，山玉成和他的同伴高估了日本人的支持，同时也低估了法国人的严肃对待。不管怎样，法国人更急于显示他们仍然掌控着局势。这次游行和汗鸠的名字跟1916年事件和巴尔代事件一样，成为反殖民故事在民间流传，到1945年反法抗争时，

---

① 这一信息源于山玉成1943年流亡期间与在柬埔寨的民族主义同伴之间未公开的通信往来。这些信件保留在莫奈什大学的图书馆。

此事的影响在各个派别中再次显现，此后1970年反西哈努克政变时此事又被提及。金边一条大道此前以莫尼旺国王的名字命名，在越南占领后的1979年，为纪念汗鸠改为他的名字。1992年又恢复了从前的名字。1943年，汗鸠因为疾病死于法国保罗·孔德雷（Poulo Condore）监狱岛。① 从短期看，游行没有取得任何成果。西哈努克在他的回忆录中称这次游行是一场“悲喜剧”。此时，他显然接受其法国顾问的观点，这次游行是愚蠢的、毫无理由的。

民族主义的发展和法国人重返柬埔寨

207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三年在柬埔寨历史中非常重要，但却很难研究这段历史。关于这段历史的法国档案大部分还未公开，这一时期法国控制的媒体，如同尚未出版的西哈努克的编年史一样，大部分是强调仪式或官僚方面的事。民族主义分子或保持沉默，或逃亡马德望，或被关进监狱。出于这些原因，我们很难评价1943年的罗马化危机。

1943年新任法国驻扎官乔治斯·戈蒂埃（Georges Gautier）宣布要用罗马字母替代柬埔寨模仿中世纪印度文字的47个字母。著名的语言学家乔治·戈岱斯设计了两种文字的音译；从获得的样本看，新的字母表很好保留了高棉语的语音。戈蒂埃和他的同事将这项改革视为走向现代化的重要一步，当然是件好事。在一份解释这项改革的小册子中，戈蒂埃批评“柬埔寨人看世界的态度”已经“过时”，并把柬埔寨语言比作一件“做工很差的衣服”。②戈蒂埃认为，如果把据称是更为合理的法语词汇加到罗马式高棉语中，会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柬埔寨人的思维。戈蒂埃引用土耳其文字罗马化改革作为榜样，但出于外交考虑避而不谈越南语的罗马化改革。似乎戈蒂埃深信这场改革的好

---

① 有意思的是，卷入巴尔代被杀事件的那位不识字的农民——Sok Bith，知道汗鸠，但其他民族主义人物他就知道的不多。

② G. Gautier, *Jeune Cambodge* (Phnoru Penh, 1943), p. 4. 又见 *Indo - chine*, No. 153 (August 5, 1943) and No. 210 (August 10, 1944)。AOM E 11 (7)，菩萨省1944年的记录中称，当时所有学校都教授罗马式高棉文字。罗马化改革造成复杂的后果，不必然都是不好的。(Eveline Porée - Maspero, 1982年8月27日书信)。

处非常明显，他认为这就像柬埔寨人原始落后的思想一样显而易见。

然而，很多柬埔寨人，特别是那些僧伽中的人，将这项改革视为是对传统教育的攻击，也是对传统教育工作者（他们在柬埔寨社会中享有很高地位）的攻击。虽然西哈努克也宣称为此问题正考虑退位，但是对于普通市民来说，这项改革没有什么冒犯之处。尽管遭到种种反对，法国人还是在1944—1945年间全力推行这项改革，特别是在政府出版物和学校中；但在宗教文献中没有实行罗马化法令。然而，1945年3月日本人推翻法国统治后，新成立的柬埔寨独立政府的最先举措之一就是停止使用罗马文字；从此之后，再也没有柬埔寨政府试 208
图进行语言的罗马化。[①] 这样的事件在柬埔寨历史上多次发生，法国人视为改善现状的举措却被柬埔寨人看作对他们文明精髓的攻击，柬埔寨人深信他们传承了吴哥时期的灿烂文明。新政府在取消文字改革的法令中表示，如果柬埔寨人采用罗马字母，意味着我们的社会会变成“一个没有历史、没有价值观、没有道德和没有传统的社会”。[②]

1945年3月9日，日本解除印度支那法国军队的武装，撤销法国官员职务，罗马式字母也就成了一种死文字。日本采取此举动意在防止法国人的武装抵抗；日本人也在实施向东南亚当地军队提供装备的计划，以抵制下半年可能发生的盟军登陆。3月13日，在对一份日本正式请求的回复中，西哈努克国王宣布独立，并把国名Cambodge（法语）改为Kampuchea（高棉语词汇）。[③] 西哈努克宣布法兰克—柬埔寨协议无效，柬埔寨独立，并宣誓与日本人合作。

敕令发布两周后，有传言说法国人要杀死至少是囚禁所有在法国的越南居民，金边越南居民发动反法暴动。鉴于示威造成的暴力事件，日本人出面干预保护法国人，他们把法国人赶进为战争中幸存者准备

① Robert Ollivier, “Le Protectorat français au Cambodge” (Ph. D. diss., University of Paris, 1969), p. 213.

② 西哈努克编年史，p. 339。

③ Ollivier, “Le Protectorat français”, p. 198. 具有讽刺性的是，柬埔寨的独立宣言是用法语写的（1981年9月作者对涅刁龙的采访）。1946年柬埔寨的法语名字再次变回Cambodge。

的居留区内。4 月初，西哈努克在给新强化的柬埔寨民兵的讲话中，谴责法国军队不愿意帮助日本保护柬埔寨免遭敌人的威胁。他劝柬埔寨人“要醒悟”。这个演讲很可能反映了日本政治顾问 Tadakame 中尉的观点，大约就在这个时候他担任柬埔寨王宫顾问。[1]

这一时期采取的其他独立措施包括重新使用佛教阴历代替阳历，用高棉语取代法语识别政府部门。当然，独立是相对的，日本在柬埔
209 寨驻军。同时，在 1945 年夏天，一群柬埔寨知识分子介入一场君主制和殖民主义或新殖民主义强权之间的斗争中——1970 年 3 月和 1975 年 4 月也发生过类似的情况。

在这个时期，柬埔寨人第一次能够公开表达爱国思想，也是第一次鼓励结成有政治倾向的团体。7 月 20 日，西哈努克主持纪念 1942 年僧侣大游行的集会。他同巴真（刚从监狱放出）和山玉成（4 月从东京回到柬埔寨）一起出席了这一场合。[2] 在集会中，一名发言人（不是国王）引用很多事例激发群众的爱国精神，他提及 19 世纪 60 年代的反君主政体的起义、1884—1886 年起义、1916 年事件、巴尔代事件和 1942 年僧侣大游行。这位演讲者没有提及在 1884—1886 年起义中柬埔寨国王唯一一次站在“正确的一方”，但西哈努克没有错过其中隐含的信息，这些民族主义事迹在他此后的统治时期一直遭到压制，20 世纪 40 年代后期到 50 年代，这些事迹在柬埔寨共产党和民主党的反君主制派别中广为流传。

柬埔寨战后民族主义的另一股力量源于官方助长的反越情绪以及居住在越南南部的高棉人与越南人之间的冲突。此时的西哈努克没怎么采取措施改善柬越关系，除了与西贡的越南政权签署了一份纸上盟约，制定了共同战略抵制法国人（当时法国人已重返印度支那）。西哈努克这时的思想很难懂。不过，1945 年 8 月 9—10 日发生的政变，加深了国王对巴真和山玉成这些人的敌视。这场政变是由一群柬埔寨

① Lt. Tadakame 担任王宫的政治顾问，二战后留在柬埔寨，加入一支伊沙拉（Issarak）队伍。

② 西哈努克编年史，p. 493。

青年组织中的热血分子发动，隐约带有反王室的目的。

后来，7 名参与者被法国人逮捕，5 人成为反法游击运动中的活跃
分子，3 人加入了柬埔寨共产党的前身。据西哈努克编年史记载，8 月
底，日本投降之后，柬埔寨举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民族主义游行，吸引
了 3 万人参加，包括武装的民兵成员和各种青年组织成员。4 天后，山 210
玉成发起一场公投，据称有 54.147 万人投票支持独立，只有两票反对。
虽然在政府的备忘录中有请求批准公投的建议，但是目前没有证据表明
此时柬埔寨曾举行过全面公投。山玉成提出的公投数字意在加强同法国
人谈判的筹码，当时法国在英国人的支持下已经开始填补印支南部的权
力真空。整个 9 月份，山玉成都在劝说其他人跟他一起同越南人结成抗
法同盟。很多人不同意他的想法，而是脱离越南寻求柬埔寨独立。有些
人宁愿法国人重返柬埔寨也不愿意山玉成继续掌权。正因为此，当 1945
年 10 月 12 日法国官员在金边逮捕山玉成时，没人反对。山玉成则对自
己被带走感到惊讶。那天早上他还作为柬埔寨首相主持西索瓦中学的重
开仪式，中午却在西贡的中央监狱吃饭。①

随着山玉成退出政治舞台（在此后 6 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在法国过着舒服的流亡生活），西哈努克国王开启同法国人的谈判，很多法国人似乎已经准备好像 1940—1941 年间那样控制柬埔寨。1946 年初，法国和柬埔寨代表团暂时达成妥协，不过，这是一份前景模糊的文件，淡化了法国的控制，让柬埔寨加入两个不存在的联邦。一个是印度支那人联邦，似乎比印度支那联邦要好一点，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当地人的参与程度。另一个是法兰西联邦，是一个由法国殖民统治下的各民族结成的模糊松散的联邦，他们都经历过法国文明的同化。协议承诺柬埔寨制定宪法，并有权结成政党，但是法国仍然控制着金融、防务和外交等领域。换句话说，1946 年的早期法国人替代了 1945 年夏的日本人的位置。然而，他们并未能恢复到之前的状态。

---

① 见 Charles Meyer, *Derrière le sourire khmer* (Paris, 1971), pp. 115 – 16; Reddi, *History of the Cambodian Independence Movement*, pp. 105 – 9; and *Realités cambodgienne*, July 9 and 16, 1967。

第 10 章　柬埔寨获得独立

211 我们很容易认为 1945 年夏法国在印度支那的统治实际已经结束。然而，情况似乎并非如此，戴高乐政府派新的法国官员替换 1945 年之前看管该地区的原官员。实际上，战争还未结束，戴高乐就着手恢复法兰西帝国，尤其是印度支那，是他的流亡政府的重要目标。

1945 年 10 月，法国人在柬埔寨不得不向当地精英阶层做出妥协性姿态，法国人需要他们打理王国的日常事务。这些人正是 20 世纪 30 年代法国人曾为之觉醒而赞美的那批人。他们现在成了爱国者，从法国人的角度看，他们体现出知识分子的好斗性。他们把 1945 年夏天更多地视为柬埔寨人的胜利而不是法国人的耻辱。他们认为柬埔寨需要重新获得独立。转为持有这种思想的人主要是诺罗敦・西哈努克国王，虽然他比大多数人表现得要矜持。

1946 年初签署临时协定后，法国人即着手清理殖民地。他们恢复金边街道以前的名字，这些名字都是纪念法国殖民英雄和法国重大事件的，1945 年时柬埔寨人曾重新命名。[1] 另一举措是取消新设的全国性节日，包括 1945 年西哈努克宣布独立和 1942 年僧侣大游行的纪念

---

① Chandler, *The Tragedy of Cambodian History: Politics, War and Revolution since 1945* (New Haven, 1991)，第 1 章。

日。第三点是以叛国罪审判山玉成，控告他勾结日本人（顺便提一下，法国对日宣战很晚）。 212

政党的发展

1946 年夏，在如同往常的商业氛围中，柬埔寨正式实施选举法令，这在精英阶层产生了难以预料的深刻裂痕。柬埔寨人在历史上第一次允许组建政党，很快就有 3 支政党出现。如 V. M. 雷迪（V. M. Reddi）指出的，所有政党"都要由王子领导，所有人都要担心邻国，所有人都忠诚于君主政体"。[①] 第一条和最后一条没什么奇怪的，但是"担心邻国"这一条需要解释一下。

1946—1947 年间，泰国仍然由相对激进的文官政府掌权，自从 1944 年夏銮披汶政府倒台后，他们先是资助柬埔寨边境的反日游击队，后又资助反法游击队。1945 年这些游击力量组成高棉伊沙拉（the Khmer Issarak，即"自由高棉"）组织，并在曼谷迅速组建起流亡政府。在这期间，泰国一直控制着柬埔寨的西北省份（1941 年泰国取得控制权）。这一地区成为一些人的避难场所，包括参与 1945 年 8 月政变的 12 个人中的 4 人避难在此，还有其他人，如 Bunchhan Muul（他参与了僧侣大游行，现在不愿意回到法国）。在金边的柬埔寨新政党害怕泰国人干扰柬埔寨政治，更担心越南国内局势的发展。越南南方的共产党游击队正威胁着法国的统治，而北方一个共产党政府已事实上独立。[②]

柬埔寨的两个主要政党——西索瓦·尤特维翁亲王领导的民主党（Krom Pracheathipodei）和诺罗敦·诺伦德（Nornideth）亲王领导的自由党（Kanaq Sereipheap，字面意思是"自由集团"）之间还是存在显

① V. M. Reddi, *A History of the Cambodian Independence Movement 1863 - 1955* (Tirupati, 1971), p. 124.

② 这段材料来自 Ben Kiernan, "Origins of Khmer Communism", 载 *Southeast Asian Affairs* 1981 (Singapore, 1980), pp. 161 - 80; Bunchhan Muul, *Charet Khmer* [Khmer mores] (Phnom Penh, 1974); and Wilfred Burchett, *Mekong Upstream* (Hanoi, 19 57)。还见 John Tully, *France on the Mekong*, pp. 457 - 70。

著差别的。两个亲王之间的意见分歧集中代表了柬埔寨的两种观点。

213 尤特维翁亲王（1912—1947）在法国接受了十年教育，娶了一个法国妻子，希望柬埔寨实行他所推崇的法国民主道路。他的政党纲领号召尽快通过谈判实现柬埔寨独立。诺伦德亲王属于保守派，作为柬埔寨最大的地主之一，他认为柬埔寨现在的主要政策应该是让人们接受教育（不用太快）并与法国维持依附关系。他的观点得到很多王室成员的认同。法国人害怕民主党在民众中扩大影响，便暗中资助自由党。第三支政党是由诺罗敦·蒙塔那亲王领导的进步党，但其地位有限，很快就退出了政治舞台。进步党跟自由党一样属于保守派，可能会得到来自国王及国王顾问的支持。①

很多在20世纪40年代早期受《那加拉哇塔》报和巴真、山玉成思想影响的人支持民主党。民主党的力量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僧伽中的大宗派、年轻公务员、伊沙拉运动的支持者和柬埔寨的知识分子阶层（高棉语 *nak cheb dung*）。一些党员支持暴力方式，同伊沙拉游击队结成联盟，可能在前期还同共产党组织越盟（Viet Minh）结成联盟。②

自由党想维持现状，该党的力量主要来源于政府中的年老公务员、富裕地主、占族人和华裔商业精英阶层。自由党有很强的地域根基，尤其是在磅湛省附近的种植园主（*chamkar*）之间很有影响。它的力量很大程度上源于特定区域内的支持网络。

西哈努克在回忆录中讲述，他不倾向于任何党派，同时这些党派也不拉拢他。实际上，很多民主党成员似乎早将西哈努克视为法国人傀儡，1946—1949年间他的行为似乎也印证了这一点。至少可以看

---

① P. Preschez, *Essar sur la démocratie au Cambodge* (Paris, 1961), pp. 17 - 19; Reddi, *History of the Cambodian Independence Movement*, pp. 124 - 26; and AOM, Cambodge, 7 F 29 (4), "Etude sur l'évolurion de la politique intérieure et les partis politiques khmers" (1951), passim. 还见 Chandler, *The Tragedy of Cambodian History*, 第2章和第3章; Michael Vickery, "Looking Back at Cambodia", 载 Ben Kiernan and Chanthou Boua (eds.), *Peasants and Politics in Kampucbea, 1942 - 1981* (London, 1982), pp. 89 - 113。

② AOM, Cambodge 7F 29 (7), "Etude sur les mouvements rebelles au Cambodge, 1942 - 1952" (以下称 "Etude sur les mouvements"), pp. 9 - 10.

出，西哈努克似乎认为维护国家独立的唯一方式是用外交方式友好地同法国人谈判。西哈努克不信任民主党，这可能源于他多疑的思想意识和1945年夏天时的伤心经历，可能还有一种被民主党抢走风头的失落感。 214

1946年9月，各党派成立不久，就选举召开协商会议，为制定宪法做准备。超过60%的选民参加投票（比泰国选举投票率还要高）。民主党赢得67席中的50席；自由党14席；独立候选人3席。

这一结果显示出民主党在柬埔寨政府官员中得到广泛支持，正是这些人负责"寄送选票"。在这次选举以及此后大约二十年的其他选举中，很多农民都是由他们习惯听从的人告诉他们怎么投票。[①] 而且，就像在1916年事件中所表现的那样，柬埔寨人（在这一事例中指民主党人）显示出的组织和动员能力实在令人不敢恭维。民主党的捐助者主要是地方官员、教师和僧伽人员，而那些投票给自由党候选人的是那些传统的经济捐助者。同时，民主党与伊沙拉的联系，以及同像汗鸠这样的早期爱国英雄之间的渊源，可能要比自由党支持地主精英的党纲更能吸引投票者。从1945年3月到10月间，法国在柬埔寨乡村的控制已经不复存在，乡村到底是什么情况已无从考究。土匪强盗（殖民时期是法属柬埔寨警察的主要打击目标）很可能在数量和重要性上都有所增加。1946年初之前，很多土匪自称是伊沙拉，不少农民特别是距离比较远的可能还把他们视为爱国英雄。[②]

西哈努克对民主党赢得选举的结果非常沮丧，视之为一种倒退。他在回忆录中痛斥民主党特别是尤特维翁亲王，暗示即便是在1946年自己不成熟的政治思想都要比尤特维翁的好。30年后，西哈努克仍然不尊重尤特维翁，把他及其追随者轻蔑地称为"贱民"。

---

① Reddi, *History of the Cambodian Independence Movement*, p. 129. 1947年和1951年还有殖民时期的选举。妇女直到1958年才被允许投票。1947年和1951年选举公认是1993年联合国在柬埔寨举行选举之前最后两次自由公正的选举。不管怎样，这两次选举是柬埔寨历史上最早的选举。

② 还见Kiernan, "Origins of Khmer Communism", pp. 163 - 67, and Reddi, *History of the Cambodian Independence Movement*, pp. 151 - 54。

215 现在，民主党人有权颁布宪法，而不仅限于就宪法向国王提建议，而1946—1947年间他们起草的宪法削弱了国王的权力，于是西哈努克很快被排挤出制宪过程。实际上，1947年宪法是以法国第四共和国宪法为模板的。根据这一宪法，实权转移到国民议会手中，因为民主党占有多数席位，也就是转到了民主党手中。

但是掌权意味着什么呢？因为不能再像1945年夏天那样宣布独立，民主党的权力受到很大限制，其他人也是如此。只有得到法国人的批准才能有所行动。然而，在1949年年中之前，法国人在印度支那没有什么让步。迟迟不能宣布独立，民主党内部开始发生争吵。1947年7月尤特维翁亲王死于肺结核，接着几名民主党高级成员又受诬告被捕（所谓的“黑星事件”），1950年又发生了尤特维翁继任者尤·库斯（Ieu Koeuss）遇刺身亡事件，这一系列事件加剧了民主党内的分裂。[①] 所谓的1949年条约（后面会讲到）后，法国警察逮捕了12名被指控勾结伊沙拉武装力量的民主党领导人，后又予以释放。民主党已无力做任何事情；柬埔寨的独立，正如1946年以来很多民主党人所认为的，只是一个面具。

伊沙拉对法国人的武装袭击给1946—1947年的柬埔寨经济带来很大破坏，但到1947年，马德望和暹粒两省回到柬埔寨控制后，再加上此后不久新上台的泰国政府并不同情伊沙拉，伊沙拉的袭击事件有所下降。1949年，几千名伊沙拉成员，特别是那些反对越盟的人，接受首相严森保（Yem Sambaur）的特赦。随着非共产党领导的反法抵抗的式微，民主党不再疲于应付法国人关于他们支持越盟的指责。

限制民主党行事的另一个因素是那些掌握国家经济命脉的人——法国人、王室成员、华人和华裔柬埔寨人——反对出现各种混乱局面，
216 而争取独立的斗争必然会造成国家混乱。他们中大多数人都满足于现

① 尤特维翁亲王没有受到很多学术关注。1947年他死的时候正在金边的法国医院接受肺结核的治疗，当时有传言说他是被法国人谋杀的。见 Reddi, *History of the Cambodian Independence Movement*, p. 137n. , and Chandler, *The Tragedy of Cambodian History*, p. 37，现在还没有这方面的证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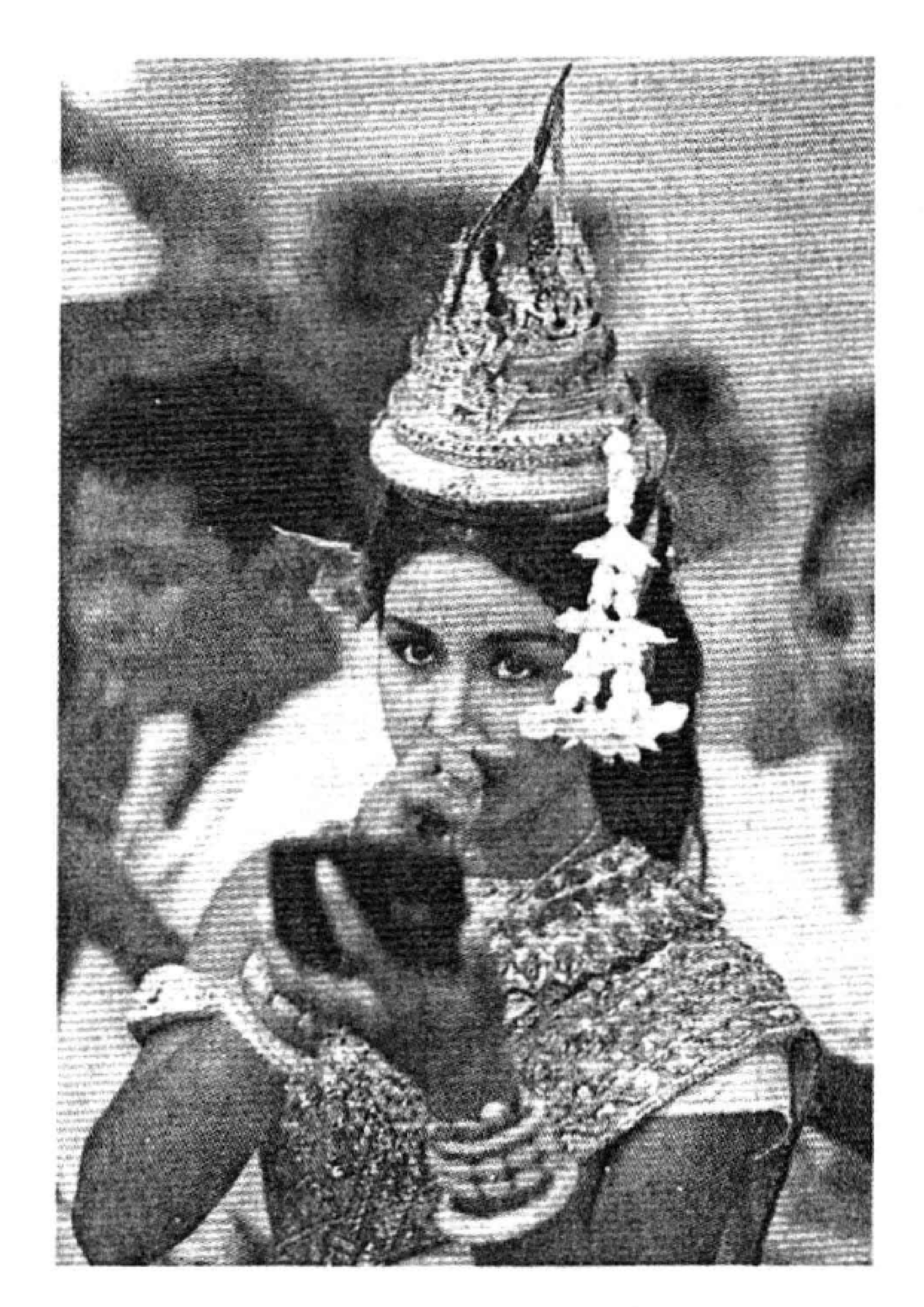
状。如果参与政治，他们也会支持自由党，法国政府也是如此。这意味着民主党缺乏资金用于影响官员、争取胜选或资助武装起义。民主党虽然在国民议会中占有多数席位（因而在理论上掌握政治权力），但实际上没有能力向国内精英、法国人或者是选民施加影响——实际上，几乎看不到他们的主张。

民主党囿于国民议会，又受到一部鼓励党派分裂的宪法的制约，逐渐从知识上、经济上和现实中脱离了大部分柬埔寨普通人。他们能使用的唯一武器就是拒绝通过预算案或批准协议来影响政府。具有讽刺性的是，柬埔寨内阁像旋转门一样换了一届又一届（因为不像在英国体系中，柬埔寨议会危机后没有举行选举），越来越像法兰西第四共和国政府，而作为法兰西的成员国又急于将自己从中解放出来。而且，巴黎每届政府人员变化之快、上台时间之短，以至于让希望在政治上有所改变的柬埔寨人——像西哈努克在1953年要寻求的——不知道法国连贯性的政策或者找不到能够进行谈判的部长。实际上，出于目前还不无完全清楚的原因考虑（虽然经济动机非常重要），1953—1954年前没有一届法国政府愿意退出印度支那。

在1949年底之前，法国人似乎只是做出部分让步，在印度支那成立一些虚假的独立政权，其目的是能够让美国同意向这些“政府”提供援助，也是间接的援助法国——已深陷第一次印支战争的困境。当时法国与柬埔寨签署的条约足以让西哈努克在后来称为“50%的独立”。[①] 该条约允许柬埔寨拥有一些外交自主权，在包括马德望和暹粒两省的地方建立一个自治军事区。法国人仍然把持着对财政、国防、
海关和政治改革的控制，但是正如西哈努克声称的，独立趋势已经开 217
始，很难再逆转。民主党反对这一并不彻底的条约，但该条约最终还是生效。

---

① Sihanouk, *Souvenirs*, pp. 158 – 168; Reddi, *History of the Cambodian Independence Movement*, pp. 165 – 73.



2003年金边的一名古典舞蹈员（图片提供：道格拉斯·奈文）

多重因素导致法国在此时向柬埔寨做出让步。印支战争吃紧，而且共产党在中国取得胜利，成为越盟的一个军火库、避难所和盟友。1949年苏联掌握核武器，接着在1950年初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签署30
218 年合作协定。从1948—1949年开始，法国人就以印支战争不是殖民战争而是反对共产主义的十字军东征为理由，寻求美国增加军事援助。对于很多美国和法国人，1950年6月朝鲜战争的爆发确认了上述观点，不断增加的美国援助源源不断地进入印度支那。

左翼力量的增长

接下来的4年对于理解今后柬埔寨的历史至关重要。我们先要讨论3种趋势。一是民主党力量的衰退和国民议会地位下降。二是与第一种趋势相关的相对右倾的政治势力和反共军方领导人兴起，他们很受国王青睐。实际上，与这派势力有关的政府官员，包括涅刁龙和朗诺，多次在独立时期西哈努克的内阁中担任要职。更重要的一个趋势，可能要算柬埔寨国内反法左翼力量在这一时期的整合，整合过程从1950年开始，到1951年以柬埔寨共产党成立结束。从某种意义上说，在整个西哈努克统治时期，三股力量一直活跃在柬埔寨政治舞台上。

民主党没落的原因可以归纳为：法国人不愿意同其谈判，国王长期持敌对态度，党内一些机会主义分子为了得到照顾转向更加亲王室的立场。况且，由于西哈努克的阻挠，议会在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几乎没有正常召开过，这样民主党在议会中的掣肘作用也就大打折扣。

不过，根据宪法需要在1951年选举新一届议会，面对压力西哈努克还是退让了。民主党可能感到这是一个陷阱，声称鉴于农村地区日益恶化的安全状况，他们不愿意参加投票。当自由党和几支匆匆建立起来的右翼政党（一支由当时还是一名中等军官的朗诺领导）威胁要参加大选与民主党竞争议会控制权，民主党改变了初衷。

选举结果至少在表面类似于1947年，民主党夺取了78个竞选席 219
位中的55席。从民主党的角度看，也露出点不祥的预兆，大约有498名基本没有获胜机会的候选人参选这些席位，他们吸走了数以万计的选票。因此，依靠长期积攒下来的实力，民主党获得不到半数的选票，14.8万张，而自由党有8.2万人投票支持，还有其他新成立的各个政党获得近10万张选票。正如迈克尔·维克里指出的，“很明显，只要右派力量联合起来，就能立即削弱民主党的票源基础”。①

① Vickery, “Looking Back at Cambodia”, p. 97. 又见 Martin Herz, *A Short History of Cambodia* (New York and London, 1958), p. 83。

民主党赢得大选后不久，西哈努克就劝说法国人允许在法流亡的山玉成回国。西哈努克在回忆录中解释为什么要这样做时，提到山玉成与他父亲苏拉马里特亲王的友谊，但实际上，他（包括他的法国顾问）想让山玉成回国以分化民主党，同时让山玉成这个政治威胁保持中立。不管怎样，1951 年 10 月 29 日山玉成回到柬埔寨，迎接过程很富戏剧性。当他抵达金边机场时，成千上万百姓夹道欢迎，还有数千人沿路线来到金边。300 辆车的追随人员用了 1 个小时行进了 10 公里路（6 英里）。法国情报官员估计欢迎人群超过 50 万人——显示出民主党难以置信的组织能力和群众的支持程度——部分是对山玉成个人的支持，部分是对早期解决继续依附问题方案的支持。

就在山玉成回国的当天，法国专员让·德·雷蒙德（Jean de Raymond）被他的越南童仆谋杀。虽然两件事出奇的巧合，但那个时期的学者从未公开将二者联系起来。两周后，一个共产党的秘密广播节目，谈及该事件的意义，声称：

> 雷蒙德的死亡，对于法国人来说意味着失去一位宝贵的合作
> 220 者。对于傀儡政府来说，意味着失去了一位慷慨的主人。对于柬埔寨人民来说，意味着一个重要敌人的终结。对于佛教来说，意味着一个魔鬼被杀，他再也不能危害佛教了。[①]

1951 年剩下的时间里，山玉成在政治上一直表现得不活跃，拒绝新内阁中的几个职位。不过，在 1952 年一二月份，他借同自己的老朋友巴真（刚刚被民主党提名为信息部长）到各省旅游的机会试水民意。这次旅行冲击了西哈努克的地位，让国王非常生气，法国人也怀疑山玉成得到美国人的支持，后者为他旅行提供车内播音系统。回到金边后不久，山玉成创办了《高棉人觉醒》（*Khmber Krok*）报。他在

① U. S. Foreign Broadcast Information Service (FBIS), *Broadcasts from the Far East*, November 7, 1951.

创刊号中这样解释这个名字："我们知道柬埔寨人被麻痹了很长时间，现在要觉醒了……现在没有障碍能够阻止柬埔寨人的觉醒。"①

此后不久，1952 年 3 月 9 日，也就是日军在柬埔寨发动军事政变的 7 周年纪念日，山玉成携带一部广播信号发送器和一群追随者（其中最著名的是左翼知识分子 Ea Sichau）逃出金边。一个月内，山玉成在暹粒省北部沿泰国边界建立自己的总部，并加入一支由高达（Kao Tak）领导的伊沙拉武装队伍。从 1952 年到 1954 年日内瓦会议召开，山玉成和他的支持者一直得到泰国情报机构一定程度上的援助。他在自己的控制区域内尝试着一种松散的治理理念，他称之为民族社会主义，部分源于二战时期他在日本流亡期间对日本政治制度的推崇。②我们不清楚他是否认为即便是进入深山流亡他也能领导独立运动，好像自己已经踏上凯旋回到金边的路程，但是他试着争取亲共游击队支持的努力并没有成功，只有几百人——大部分是充满理想主义的高校学生——来到他的丛林营地（*maquis*）。柬埔寨独立之后，山玉成地位下降，他的追随者也开始减少。在 50 年代后期和 60 年代，他在柬埔寨境内竭力维持一个灰色地带，同时为破坏西哈努克政权稳定的泰国
人和越南人工作。我们不怀疑 1957 年前后他的民族主义热情，但很难 221
弄清楚 1952 年他抛弃金边的真正动机。或许，他高估了自己在非共产党伊沙拉中的受支持程度（或者是相反，低估了共产党在伊沙拉中的受支持程度）。法国情报报告断言，他仍然在金边一些老的民主党人中享有很高的支持度，或许他还想获得国际社会的支持。然而，山玉成流亡之后，已经不再是西哈努克或者是法国人要考虑的政治力量。③

到 1952 年山玉成叛逃时，共产党控制的游击队，通过同越盟展开合作，已经控制柬埔寨大约 1/6 的国土，牵制法军数千人。两年后，

---

① Quoted in Reddi, *History of the Cambodian Independence Movement*, p. 183.

② 作者于 1981 年 9 月在清迈和 1988 年 5 月在曼谷对 Channa Samudvanija 的采访。

③ 见 Chandler, *The Tragedy of Cambodian History*, pp. 59 – 61; Donald Lancaster, *The Emancipation of French Indo – China* (Oxford, 1961), p. 272; M. Laurent, *L'Armée au Cambodge et dans les pays en voie de développement en Sud Est Asiatique* (Paris, 1968), 特别是 pp. 283 – 91。

日内瓦会议召开之时，一些人估计共产党武装已经控制超过一半国土。

柬埔寨共产党是从哪里来的？1930 年印度支那共产党在香港成立时，并没有柬埔寨成员，在二战结束前，也只有十几个高棉人加入印支共产党。[①] 然而，在 1945—1947 年间，越盟武装尽力支持老挝和柬埔寨的“解放斗争”。同一时期，如我们所看到的，泰国政府奉行向所有印支反法游击队和高棉伊沙拉提供援助的政策，这些武装力量在沿泰柬边界和泰国控制的马德望和暹粒两省活动，成员后来分化为左、右两派。左派人员包括山玉成（Son Ngoc Minh，这是化名，本名叫 Achar Mean，原是一名僧侣）、秀亨（Sieu Heng）和 Tou Samouth。1950 年 4 月 17 日，在山玉成的领导下，第一届高棉人抵抗力量全国代表大会在柬埔寨西南举行（25 年后这一天正是共产党“解放”金边的前夕）。大会宣布成立统一伊沙拉阵线，由印支共产党中的柬埔寨成员控制。根据 1973 年编写的柬埔寨共产党历史，那时只有 40 人。然而根据本·基尔南（Ben Kiernan）所指出的，早在 1947 年在越南人的资助建立的共产党政治学校中，有数百柬埔寨人接受培训。其中最著名的是 1950 年以异议僧侣汗鸠命名的一支力量。[②]

222 1951 年初印度支那共产党宣布解散，老挝、柬埔寨和越南很快各自成立了自己的共产党。1951 年 9 月高棉人民革命党（KPRP）成立。党的规章是从“新成立”的越南党照搬而来，直接将越语翻译成高棉语。据人民革命党的记录，这时大约有 1000 名党员；而 1952 年的法国情报估计共产党控制的伊沙拉武装力量大约有 5000 人。[③] 后者很可能是一个被低估的数字，一方面因为法国人似乎不大可能渗透进人民革命党内部，另一方面法国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考虑，也是为自己的代理人西哈努克考虑，有意低估共产党人的数量，尤其是在公开文件中。

---

① “Etude sur les mouvements”, p. 64ff. 又见 Steve Heder 的权威研究，*Cambodian Communism and the Vietnamese Model. Vol l: Imitation and Independence*（Bangkok, 2004）。

② Kiernan, “Origin of Khmer Communism”, p. 168.

③ 见 “Etude sur les mouvements”, pp. 84, 87。第二次引用有这样的注释，在 1952 年一些“磅湛省的专制集体农场，像 *kholkozes*，已经引起人们注意”。有意思的是，这一地区是 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激进活动的要点，也是 70 年代民主柬埔寨干部的发源地。

随着很多柬埔寨人对法国控制不满情绪的日益高涨和印支其他地区越南游击队力量的壮大，柬埔寨境内的亲越武装力量在人数、效率和凝聚力方面都有所增长。高棉人民革命党也是如此。到1954年7月，也就是柬埔寨独立8个月后，人民革命党估计发展到2000名党员，其中很多人在日内瓦协议之后逃至越南寻求庇护。表明人民革命党力量增长的另一个指标是，1952年法国当局认为百姓向革命党缴纳的赋税和捐献相当于国家财政预算的一半。

虽然游击队中的越南人干部逐渐放弃自己的职位让给当地高棉人（他们一直控制着高棉人民革命党），但是这些高棉领导人反抗法国殖民主义的方式还是与民主党和其他政治势力有所不同，这一点很明显。首先，他们将自己的抗法斗争视作受马克思列宁主义历史法则支配的国际运动的一部分。其次，对他们来说，把柬埔寨从法国人手中解放出来后并不意味着继续维持柬埔寨人之间的关系现状，或是加剧柬埔寨人和越南人之间的传统仇恨。换句话说，他们把从法国人手中获得解放看作柬埔寨革命的一个阶段而不是目的。况且，50年代初，在印支反法解放斗争中和组建地区社会主义政党中，高棉人民革命党领导人接受越南的领导，但没有成为越南人的傀儡。根据当时的相对实力， 223
这一政策是明智的。从法国和西哈努克的视角看，他们努力把反法抵抗组织说成是亲越、亲共的非柬埔寨人叛徒。当然，他们所背叛的是具有柬埔寨历史特征的等级社会安排。实际上，1952—1953年间，西哈努克及其侍臣多次荒谬地将山玉成贴上共产党的标签。10年后，他又把法西斯分子的标签贴到他这位前首相身上，并称他拿着美国人的薪水。

跟其他国家一样，在柬埔寨共产主义运动中也存在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的影响，两派的较量让柬埔寨共产党深受其苦。应该把柬埔寨的利益（不管是什么利益）放在第一位吗？什么是柬埔寨的社会主义？继而，它又怎样与历史及同越南人的结盟相适应？柬埔寨民族主义否认存在社会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成分，宣扬柬埔寨自身固有的伟大，不断重申吴哥的辉煌历史，制造种族主义思想诋毁越南人。60年代后

期西哈努克选择追随这一路线，朗诺选择的也是这条路线，波尔布特政权在有些方面也是如此。在50年代初期，激进分子也偶尔使用民族主义争取支持。比如，1951年11月，一位共产党发言人在一次讲话中声称：

> 柬埔寨民族源于高贵人种。在涉及抗击敌人、拯救宗教和解放祖国的问题上，我们不怕死亡。整个民族都遵从佛经教诲，宁可选择死亡也不受奴役或宗教迫害。耶输跋摩国王是我们的典范。[①]

这些激进分子从柬埔寨历史、反王权英雄和佛教方面寻找自己的合法性，撒下一张网，这张网要比西哈努克国王周围的人所能或愿意撒下的网还大。他们把柬埔寨独立视作自己的目标，没考虑对柬埔寨
224 社会结构或对自己地位的影响。他们没有认识到动员柬埔寨人民和推翻现政权的意义。正是这些原因，像西瓦索、汗鸠和波贡博这些英雄人物——他们在早期得到伊沙拉、部分民主党人和共产党宣传的支持——很快就从教科书和意识形态中消失。经历了一系列政权更替后，这些英雄的命运成为柬埔寨历史上一支有趣的乐调。被遗忘了数年后，他们同很多前民主党人又重新出现在高棉共和国政权中，只是到波尔布特掌权之后他们又突然消失。在波尔布特的正式理念里，既有亲吴哥的倾向，也强调政权组织的非人格化。英雄的生命是短暂的，而革命组织（angkar padevat）却可永葆生机。1979年柬埔寨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些名声受损的英雄名字再次出现，成为金边一些街道的新名字——1993年西哈努克成为国王后又取消了这些命名[②]，结束了这种循环往复。也是在1979年，以五塔吴哥窟为蓝本的柬埔寨国旗（50年代时伊沙拉曾使用过）取代三塔吴哥窟国旗（以前政权使用，1993

① FBIS, November 28, 19 51.

② FBIS, April 4, 1979. 金边可能是中国之外唯一用毛泽东——西哈努克的前保护者——命名林荫大道的城市。

年又重新确定为柬埔寨国旗）。

在法国留学的柬埔寨大学生是柬埔寨共产主义运动的另一力量来源。1945 年至 1960 年间，数百青年男女沉浸在掺杂着激进政治、个人自由和团结反殖的氛围中。一些人加入了法国共产党；而更多的人看到法国人思想、生活方式同他们在殖民地表现之间的巨大差别。还有人认识更为深远，他们看清革命前法国、革命前俄国同 20 世纪柬埔寨之间的相似之处，都是由一个反动封建阶层统治。西哈努克对民主党的压制进一步促使很多高棉青年人接受激进思想——包括像桑罗沙（波尔布特）、英萨利（Ieng Sary）、宋先（Son Sen）和乔森潘（Khieu Samphan）这些民主柬埔寨的未来领导人在内。

西哈努克和独立大业

在 1952 年前几个月，民主党继续在国民议会中尽力挫败西哈努克的政策。山玉成还是一个远在的威胁。法国情报估计 2/3 的国土已不 225
在金边政府日常管理之下。在西哈努克和他的保守顾问看来，是时候采取激烈措施脱离法国争取独立，维持自己的统治了。

1952 年 6 月初，西哈努克对议会发表了一番措辞严厉的讲话，他宣布“一切都陷入混乱。等级秩序不复存在。没有合理使用人才……如果变成异议分子是正确的，那就意味着所有最优秀的爱国者都要到丛林中避难”。[1]此后不久，在法国人的默许下，西哈努克发动了一场反自己政府的政变。一支摩洛哥军队从西贡秘密赶到金边，包围了国民议会，国王罢免了内阁中的民主党人。政变没开一枪。西哈努克担起首相职权，组建自己的内阁，把民主党控制的议会抛在一边。此时他要求人民授权他接管政府，并承诺在 3 年内，也就是 1955 年 6 月之前实现完全独立。虽然没有举行全民公投，西哈努克还是履行职责，似乎已得到人民的授权，开始后来自称为十字军东征式的王家独立运动。

---

① 有关进一步的详情，见 Chandler，*The Tragedy of Cambodian History*，pp. 61 – 67。

虽然政变是和平进行的，但还是在柬埔寨公学中引发了抗议示威，那里反王权、同情民主党情绪特别强烈。留学法国的一些柬埔寨激进学生指责西哈努克背叛了国家。1952 年 6 月 6 日，他们向国王发表一份谴责宣言，要求西哈努克退位，为最近发生的法国军事行动负责，为解散议会负责，也为以同法国媾和代替抗争的政策负责。[①] 声明还指责西哈努克的曾祖西索瓦和祖父诺罗敦同法国人勾结残害民族英雄。1952 年剩下的时间似乎是西哈努克的一段困难时期，因为法国人实际上决定向他摊牌。

民主党的不妥协立场实际上帮助了西哈努克。1953 年 1 月议会拒绝批准西哈努克政府提出的预算案。西哈努克随即宣布国家陷入危险状态，解散议会，发布军事法令，并命令逮捕一些民主党议员（此时
226 他们已被剥夺议员豁免权）。当逮捕 V. M. 雷迪的时候，西哈努克正在接受事先安排的采访。他向一名法国记者为自己辩解说，“我是国家天生的统治者……我的权威从未遭质疑。”[②]他越过民选出来的官员向人民求助，同时他也计划直接向法国人求助（当时他没这样说）。

国王新焕发的政治活力和坚决独立的立场震惊了法国人和一些王室成员。或许是因为国王长期给人以滑稽、媚外（指同法国人合作）的形象，一些记者只能用丧失理智来解释他的突然觉醒。

1953 年 2 月，西哈努克宣布要到法国治病——这只是他就任国王

---

① “Lerrre de l'Associarion des Etudiants Khmers en France à sa Majesté Norodom Sihanouk”, Paris, July 6, 1952. 根据 Ben Kiernan 的观点，这份宣言是由一名叫 Hou Yuon 的柬埔寨激进分子所写，他在 1975 年遭清洗。宣言以高棉文发表在《高棉学生》[*Khmer Nisut*, No. 14 (August 1952)]。同样关于这一问题，桑洛沙（也就是后来的波尔布特）也发表了两篇文章。其中一篇（《君主制还是民主制?》）见 Ben Kiernan and Serge Thion, *Khmers Rouges*! (Paris, 1981), pp. 357 – 60；另一篇，名为《通向欧洲国家的王室之行》，文章最后用一首诗称，“王室的公告毫无诚意”并企图破坏“学生的团结”。有意思的是，没有一篇文章用国际主义视角看待印支战争。他们都持反对王权、支持议会的立场，说明波尔布特和他的同伴在这一阶段支持山玉成异议形式而不是越南人资助的高棉人民革命党（KPRP）。

② Reddi, *History of the Cambodian Independence Movement*, p. 205. 还见 Norodom Sihanouk, *La Monarcbie cambodgienne et la crorsade royale pour l'indépendence* (Phnom Penh, c. 1957), passim; Chandler, *The Tragedy of Cambodian History*, pp. 67 – 72; and John Tully, *France on the Mekong*, pp. 475 – 81。

期间经常使用的一种策略。实际上，正如他在回忆录中所揭示的，他带去了精心准备的几卷宗要与法国人商谈的重要问题。他的病是政治需要，但此行的赌注却很高。他一到法国就立即写信给没有宪法实权的年迈的法国总统——樊尚·奥里奥尔（Vincent Auriol），称“他已把作为国王的前途和自己王朝的前途都放在坚持法兰西联邦一员和同法国合作的政策基础之上，我现在忠于法国，将来也会忠于法国”。[①] 他补充说，如果共产党入侵柬埔寨，他不能保证他的臣民会采取行动保护法国的利益。

奥里奥尔的顾问显然认为西哈努克的这封长信以及随后寄到的另一封信只是杞人忧天，奥里奥尔等了两周才予以回复。他在回复中表示仔细研究了两封信，邀请西哈努克共进午餐。此时，有担心印度支那局势的法国政府官员郑重地告知国王应该回到柬埔寨，并暗示有人可能取代他的王位。[②]

接下来的几个月，西哈努克不紧不慢地驶回柬埔寨，先后在加拿大、美国和日本停下来接受报社、电台采访，把柬埔寨面临的困境和法国人的不妥协态度公之于众。他用这种策略把本应毕其余生都应保密的谈话公开。不管怎么说，1953年出访是一次大胆的行程，因为他 227
不仅是在同法国人和潜在的外国盟友赌博，也是同国内反对派、越南人和高棉人民革命党赌博。

西哈努克5月回到金边后，戏剧性地拿自己的生命换取柬埔寨的独立。因为在巴黎的谈判进展缓慢，国王就在6月份自愿流亡，他先到泰国，他在那儿并不受欢迎，然后来到暹粒军事自治区，在吴哥窟附近的别墅住下来，他拒绝同在金边的法国官员讲话。法国人在越南的战争变得越来越糟糕，在法国国内也大不受支持。西哈努克的越来越强的抵触心理和柬埔寨国内的日益加剧的反抗行动，让法国人不得不比原计划更为认真地考虑他的要求。

---

① Norodom Sihanouk and Wilfred Burchett, *My War with the CIA* (Harmondsworth, 1973), p. 153, and Reddi, *History of the Cambodian Independence Movement*, p. 20.

② Ollivier, "Le Protectorat français," pp. 344 – 46.

1953年10月，法国做出让步，还给国王对柬埔寨武装力量、司法和外交方面的权威。然而，他们依然把持着柬埔寨的经济控制权——特别是在进出口领域和具有高额利润的橡胶种植园方面。尽管还保留着这些殖民统治的残余，但总的说来，把法国人的失败说成是西哈努克的个人胜利，并不为过。借助信息沟通网络（这一网络曾在1916年和1951年两次让法国当局害怕），西哈努克命令暹粒和金边之间省份的官员组织支持他的群众游行。1953年10月29日，也就是山玉成海外流亡回国第二个周年纪念日那天，西哈努克乘车回到首都金边，数以万计的百姓夹道欢迎，他们或许并不清楚独立对他们意味着什么，但是此时此刻足以让他们为自己的国王而欢呼，为战乱即将结束而兴奋。此后不久，西哈努克被正式冠以民族英雄的称号。[1]

从短期看，法国的撤离带来3个影响。第一，柬埔寨的独立和1953年11月至1954年中期之间相对低层次的国内冲突强化了出席1954年夏日内瓦会议的西哈努克代表团的立场。代表团由涅刁龙率领，对柬埔寨本土共产党采取顽固立场。柬埔寨共产党不被允许参加
228 协商，而且被越南共产党代表团逼走，越共急于想为越南争取让步，并只在较低程度上照顾到亲越南的"寮国战斗部队"（Pathet Lao，即"巴特寮"）利益。[2] 奇怪的是，在整个五六十年代很多柬埔寨激进分子还是继续接受越南的领导。对于他们之中的一千多人来说，1954年标志着一次漫漫征途的起始，他们从此开始了在河内的流亡生活，直到70年代初才回到柬埔寨，那时他们中很多人或者被美国炸弹炸死，或者是被朗诺军队打死，或者被波尔布特（他当时已是柬埔寨共产党的领导人）在共产党内部煽动的大清洗所清除。一些艰难幸存下来的人进入1979年后的柬埔寨政府（越南入侵柬埔寨之初建立起来的）中担任要职。[3]

---

① 同上.，p. 358ff.。给我们的印象是当时金边正濒于无政府状态。这种氛围或许推动法国人同国王进行谈判的意愿。

② Sihanouk, *Souvenirs*, pp. 209–12.

③ Kiernan, "Origins of Khmer Communism", p. 179.

西哈努克所谓十字军东征的另一个结果是，民主党和山玉成没有为柬埔寨争取到独立，从而失去了号召力。与此同时，一些忠于国王的偏右人物占了上风，并在政府中担任要职，如陆军中校朗诺、涅刁龙和宾努（Penn Nouth）等。

1953年独立最为深远的影响或许是西哈努克认为自己已经获得管理柬埔寨的合法性，他自视自己是一个合适人选。后来，高棉人民革命党大批被杀，民主党力量式微，这让西哈努克认为（很多外国访客和他的侍臣也这么赞扬他）他的王家独立运动不仅成功而且英明，他还认为“西哈努克的柬埔寨”这一观念的扩散是政治上的一次进步。由此产生的一个结果，就是西哈努克感到没有义务同泰国和南越维持和平，也没有义务给他不喜欢的人以行动自由。就像他在1953年只身前往法国赢得独立一样，柬埔寨也能借助同遥远大国（中国、法国和南斯拉夫）的友谊，在充满敌意的邻国之间保持独立。

随着形势的发展，从1945年夏兴起的各派政治势力正变得声名狼藉。西哈努克和他的顾问从未对社会变革抱有什么偏袒之心，他们准确地认识到这些政治势力置国家稳定于危险之中。正如我们以前所说，柬埔寨内在的稳定性（经常是殖民学者滑稽可笑的浪漫主义话题）就 229
是要人民接受掌权者定义的现状，这种稳定性几乎贯穿整个柬埔寨历史的始终。

那么，独立意味着什么呢？法国人的撤走对于大多数柬埔寨人来说没什么影响，他们还是要向毫无同情之心的金边（以前是乌东或吴哥）政府缴税，所谓的王室工作（仅仅是从定义上这么说）完全脱离了群众，并在最大程度上促使官员变得以自我为中心，只关心自己的地位，不安于别人的野心。换句话说，独立仅仅是让柬埔寨精英和相对少量的知识分子摆脱了法国人的控制。法国人的撤离让这些人能够随意管理其他人而无需他们的同意，比管理自己还自由。因为乡下人从来没有被邀请参与政府管理，他们也看不到有什么眼前利益推动他们抵制这些掌权者，更何况至少现在这些掌权者是柬埔寨人而不是法

国人或越南人。[1] 虽然柬埔寨在1953年底庆祝获得独立并在1954年日内瓦会议后获得军事自治，当时越盟军队及其柬埔寨的同情者逃至北越避难，但学界一般认为，1955年的选举和此后西哈努克作为主要政治人物登上历史舞台才是柬埔寨政治历史的转折点。

这次选举是按照日内瓦会议规定举行的，作为印度支那非共产党控制区域治愈战争创伤过程的一部分。民主党受派系斗争之困并且下台近三年之久，实力大不如以前，但他们仍然是组织最好的政党，民主党领导人对赢得大选充满期待。很多年轻民主党人反对西哈努克在日内瓦会议后奉行明显的亲美路线，主张柬埔寨应该保持中立。这一点他们与一支刚刚建立的亲共党派保持一致，也就是披拉钦空（Krom Pracheachon）或叫人民派。成立于1951年的柬埔寨共产党的核心力量，仍然隐而不出。1954年后期，年轻民主党人把民主党带向偏左立场，推翻Sims Var和宋双等党魁的领导，代之以反王权的中立派（如Keng Vannsak和Svay So）和更具激进思想的人物，包括一名法国共产
230 党成员——秀木（Thiounn Mumm）。秀木同桑洛沙，即波尔布特（曾于1953—1954年间在越南丛林中生活了几个月）合作，协调民主党同披拉钦空的选举策略。1955年初，很多在柬埔寨的观察人士预期两党能在议会中赢得多数席位。

民主党的复兴和披拉钦空在民众中的受欢迎程度让金边的保守派非常郁闷，也激怒了国王，他一直自我标榜为“柬埔寨独立之父”，希望自己控制这个国家的政治局面。他在都城以外的地方和非知识分子中间仍然享有很高的支持度。1955年2月举行了一次公投，选民被要求在一张白色选票（印有国王头像）和一张黑色选票（标记柬埔寨文字“不”）之间选择。选民害怕丢弃国王头像被认为是对国王不敬，因而遭到逮捕，这大大提高了支持国王的选票数。以后，西哈努克非常善于使用这种伎俩加强自己的支持度，几乎能得到百分之百的支持。

① 1981年涅刁龙称，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当时他在西哈努克的内阁中任职，新独立的柬埔寨政权几乎不能征收土地和农业税。对于柬埔寨农民来说，独立似乎就是减轻了这些课税（作者在1981年8月对涅刁龙的采访）。

西哈努克认为他现在比其他政党更受人民爱戴，便孤注一掷，没有事先通知就在 3 月让位给自己的父亲苏拉马里特亲王，自己以普通公民身份投身政界。此后不久，西哈努克成立一全国性政治组织——萨克姆党（Sangkum Reastr Niyum），通常翻译为人民社会同盟。要成为该组织的一员，必须放弃其他任何政治团体成员资格，西哈努克此举意在冲击现存政党。1955 年期间，很多政党宣布解散，领导人也都加入萨克姆党。这样就还剩下自由党、民主党和披拉钦空参加竞选。自由党领导人诺罗敦·诺伦德亲王接受在巴黎的外交职位，自由党陷入混乱。

建立萨克姆党不久，已是亲王的西哈努克赶赴印度尼西亚万隆参加亚非领导人会议。在动身出行之前，他宣称自己放弃王位就是要击败“政客、富人和受教育的人，这些人习惯用……他们的知识欺骗别
人，设置无数障碍，我必须领导人民越过这些障碍”。[1] 在他出访期 231
间，大量政府公务员被强迫加入萨克姆党，这一举动使民主党失去数百注册党员。

西哈努克的策略让民主党人和披拉钦空感到意外，他一方面在万隆决定奉行中立外交政策，同时又继续接受美国的军事和经济援助。在会上，西哈努克被很多反西方国家的领导人奉为名人，包括印尼的苏加诺和中国的周恩来。他回到柬埔寨后，加紧通过选举粉饰他的重要地位。

1955 年选举是 20 世纪 90 年代之前柬埔寨最后一次由多个政党自由竞选，也是第一次尝试动用国家安全工具来保证特定团体胜选。1955 年 5 月至 9 月，很多反对派报纸被关掉，它们的主编未经审判就被关入监狱。民主党和披拉钦空候选人经常受到骚扰，在一次组织混乱的工人运动中一些工人被杀死，这次运动只是含糊地反对代表少数人的特殊利益。投票当天选民还受到威胁，一些被认为装有支持民主党选票的票箱失踪了。统计选票后，萨克姆候选人赢得议会所有席位

---

① *Cambodge*, April 14, 19 55.

和超过3/4的选票。根据日内瓦会议建立的国际管制委员会负责监督此次选举，但因人手不足不能或者是不愿意查清选举中的舞弊行为，可能是因为在委员会中总体亲西方的印度和加拿大代表在票数上胜过亲共的波兰代表。①

从此，一种新政治生态超越并取代自1947年时断时续的缺乏生气的宪制政治。1955年至1970年间柬埔寨政治的突出特点就是西哈努克垄断政治权力和柬埔寨登上国际舞台。西哈努克的行事风格广受欢迎，柬埔寨也走上繁荣。然而，如同过去一样，柬埔寨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邻国的行为和更大、更远强国的政治情况。换句话说，只要柬埔寨的中立符合其他国家的利益，它才能够保持中立与和平。
232 西哈努克的强硬政治手腕或许把推翻他统治的预兆推迟到70年代，但最终还是未能阻止它的出现。从此后发生的事情看，近些年很多柬埔寨人把西哈努克执政的这段时期视为构建的一段黄金时期。其他人认为他的统治风格作威作福、荒唐可笑，排除任何走向多元化、政治成熟、健全规划或者理性辩论的可能性。西哈努克把柬埔寨视为自己的封地，把子民视为自己的孩子，把对手视为叛徒，他花了很多精力来制定议程，无意中被此后懒散混乱的高棉共和国、恐怖的民主柬埔寨和后革命时期单一政党制政治所利用。

① 关于1955年选举见Chandler, *The Tragedy of Cambodian History*, pp. 81-84, and Philip Short, *Pol Pot: The History of a Nightmare* (London, 2004), pp. 110-12。

第 11 章　从独立到内战

西哈努克亲王和萨克姆党控制柬埔寨长达 15 年。因为西哈努克是 233
在 1970 年被自己控制的国民议会赶下台的，所以很容易就此认为自己的影响力在下降，但这是一种被误导的观点，当时很少有观察者注意到西哈努克处于衰落过程。尽管如此，西哈努克的政治生涯于 1966 年出现转折，从那时起他对政治过程的掌控能力伴随着自信心一起开始弱化。发生这些变化可能与越南战争的升级以及柬埔寨国内的政治因素有关。不管怎样，1966 年的议会虽然据称是由萨克姆的忠实党员组成，但毕竟议员们是被选出来的而不是由亲王自己挑选的，这是 1951 年以来的第一次。1970 年正是这些人投票将西哈努克赶下台。

议会选举

民主党——西哈努克 1955 年时的主要竞争对手——在 1958 年大选前就已被赶出政界，但西哈努克继续打压这一集团就让人费解了。该党在 1956 年时就已名存实亡，原来的党员几乎都加入了萨克姆。1957 年 9 月，西哈努克指责民主党危及他的政治领导，将该党五名领
导人召到金边皇宫进行会谈。会谈过程通过高音喇叭转播，皇宫附近 234
聚集了大批民众。或许是慑于民众气势，民主党没能清晰表明观点，在被西哈努克及其同伙数落了 3 个小时后，才被允许离开。出了皇宫

的围墙，他们遭到一帮士兵和警察的殴打，其中一人被送往医院救治。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有三四十名被怀疑有亲民主党倾向的人在金边遭到殴打，西哈努克在去海外度假前秘密嘉奖了参与皇宫袭击事件的部分士兵。[①] 此后不久，民主党宣布解散，在政治舞台上从此消失。

因此，在1958年，萨克姆的反对派就剩下左派力量披拉钦空了，后者在1955年选举中获得2万多张选票。披拉钦空摆出一副誓死一搏的架势，提名一批候选人参加选举，但是面对警察的压迫，除一人外都在选举举行前退出竞选。这位仅剩的候选人乔密（Keo Meas）在所在选区内获得几千选票中的350张。选举结束后，他为避免被捕不得不隐藏起来。他的候选人资格标志着多党制选举政治在柬埔寨的终结，除了朗诺简短统治期间，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恢复。

在接下来的两年多时间里，西哈努克的政府经历了一系列推翻它的阴谋，这些阴谋都是西贡和曼谷当局借助美国的支持策划的。[②] 这让西哈努克比以前更加怀疑他的邻国及其后台美国，美国的冷漠行为与来自法国、印尼及共产党国家阵营的领导人和外交官的热情形成鲜明对比。这一时期充斥着冷战氛围，西哈努克被美国贴上亲共的标签。对于西哈努克来说，他利用这些阴谋活动给自己的对手贴上反柬埔寨的标签，这也是金边后两届政府惯用的一种策略。

到60年代初期，西哈努克同柬埔寨国内的左派力量及共产党中国结成战术同盟。这一结盟带来4个短期影响。第一是柬埔寨印刷媒体

---

① 关于这次冲突的详情见 Chandler, *The Tragedy of Cambodian History: Politics, War and Revolution Since 1945* (New Haven, 1991)，第4章；Michael Vickery, "Looking Back at Cambodia"，载 Ben Kiernan and Chanthou Boua (eds.), *Peasants and Politics in Kampuchea*, 1942 - 1981 (London, 1982)。

② 美国情报机构卷入1958—1959年的桑萨利（Sam Sary）和1959年2月的 Dap Chhuon 两次阴谋。桑萨利原是深受西哈努克恩宠的高官，后来成为异议分子，逃亡泰国，可能是在1959年初受到美国的鼓动。希望推翻西哈努克的泰国官员试着让桑萨利同另一位流亡异议人士山玉成结成联盟，但没有成功。2月西北军阀 Dap Chhuon 在泰国的鼓动下威胁起义，并得到西贡政权提供的金块、武器和电台援助，可能泰国也给予了援助。美国中情局觉察到这次阴谋，但没有告知西哈努克。详细讨论见 Chandler, *The Tragedy of Cambodian History*, pp. 99 - 107。到20世纪90年代，桑萨利的儿子桑兰西（Sam Rainsy）成为柬埔寨一位重要政治家，反对执政党。

（大部分都在西哈努克亲王的监视下）立场向左转向。与此相关的是，政府容忍柬埔寨学校中的左派老师。那几年，很多男女老师相继被招 235
入柬埔寨共产党的秘密运动中，并拉拢他们的一些学生一起加入。第二个影响是1962年一些在法国接受教育的左翼分子被选入议会，如乔森潘，胡荣（Hou Yuon）和胡宁（Hu Nim）。这些人没有承认自己的共产主义倾向，从而加入萨克姆，并受到西哈努克的褒奖，而他们在披拉钦空中的同志却受不到此种礼遇。第三个影响是1963年西哈努克决定拒绝接受美国的经济和军事援助。与之相关的举措是他将柬埔寨的银行和进出口行业收归国有。西哈努克做出这样决定的具体背景尚不清楚，只知道是在吴庭艳（Ngo Dinh Diem）在越南被刺之后发生的。可能是西哈努克期望法国和中国能够填补美国人撤离后留下的空白，不过这两个大国虽然对柬埔寨保持友好，但却不愿意承诺任何空头支票式的资金援助。像柬埔寨的很多政策一样，国有化似乎也是西哈努克一时冲动做出的决定，目的是想让柬埔寨成为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西哈努克容忍左派的第四个影响是几乎所有柬埔寨激进分子能够在五六十年代幸存下来，而免于被枪杀或投入监狱。而那些右派反对者被西哈努克认为是为外国势力工作，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1960年西哈努克的父亲苏拉马里特国王去世。经过一系列运作，西哈努克自任国家元首，而让自己的母亲哥沙曼（Kossamak）王后仍然作为象征的君主。这一决定严重削弱了持续统治柬埔寨超过一千年的君主制。

对于即将进行的新一届议会选举，西哈努克寻找那些更为年轻、受过更好教育的新人取代旧人。西哈努克对知识分子有一种天生的不信任感，但他相信一旦他们进入议会或政府其他部门，他就能操控、哄骗和算计他们，在他眼里议会归他私人所有，是自己的橡皮图章。1962年议会选举发生在南越爆发战争（一方是忠于亲美的吴庭艳政府，另一方是由河内共产党领导，旨在争取国家统一）后不久，这次 236
选举反映出西哈努克亲王在国内广泛的支持度，进一步助长了他的自信心。

柬埔寨很快沦落为越南人内斗的人质，如同近代史上经常出现的情况那样。西哈努克努力让越南双方两虎相争，避免柬埔寨卷入进去，他的政策让人想起19世纪安赞国王的手法。1961年至1970年间，西哈努克的政策挽救了成千上万柬埔寨人的性命。然而，当他被推翻后，他却通过广播号召柬埔寨“兄弟姐妹”发起一场内战。如果他主动下台是否能避免此后30万柬埔寨人的死亡——都是由越南南北方、美国和柬埔寨军阀混战造成的——还很难说。

越战破坏了柬埔寨经济，最终将西哈努克赶下台。否则，他本可能不会被推翻，柬埔寨共产党也不会掌权。冷战时的紧张关系在越南体现得淋漓尽致，造成大量人员牺牲，虽然与柬埔寨基本没有什么关系，但却不能避免柬埔寨被拖进冲突中。从某种意义上说，1965年至1993年间的柬埔寨历史都是由南越或更远的城市（像河内、华盛顿和北京）所安排的。

1965年，超过20万美军涌入越南支持西贡政权，阻止共产党取得胜利。一年之内就在越南使用了数以十万吨的弹药，自我伤亡和造成他人伤亡数以万计。同时，北越军队潜入南方活动，支援当地游击队。随着战争的激化，柬埔寨也受到波及，如同早已受影响的老挝。

在1965年一年里，西哈努克多次表态柬埔寨保持中立，希望从大国那里寻求对其国家边界的保证。1964年他断绝与美国的外交关系，寻求召开国际会议推动东南亚中立化和美军撤退，但没有成功。到
237 1966年他秘密同北越人结成联盟，做出这一决定虽然难以避免，但毕竟这是四年后他被罢黜的主要原因。西哈努克确信越南共产党将会赢得这场战争。他既想维持自己的统治地位和柬埔寨的独立，同时也要避免柬埔寨人遭到杀戮。同北越人结盟，只要秘而不宣，似乎是实现上述目标的一条美好途径。

根据盟约，北越人获许在柬埔寨境内驻军，并使用柬埔寨港口城市西哈努克城（Sihanoukville）从北越和中国运送武器和补给。作为回报，北越承认柬埔寨的边界，承诺不影响柬埔寨市民生活，并且不与柬埔寨军队接触。南越人和美国官员很快意识到在柬埔寨境内驻有北

越军队，并运送武器和补给，但是他们并不了解西哈努克同北越秘密协定的详情。多年来西哈努克一直否认在柬埔寨境内有越南军队，这让美国非常生气，但在外界树立起西哈努克无辜受害者的形象。

1966 年 9 月，西哈努克在政治上的偶像——查尔斯·戴高乐（后来成为法国总统，是东南亚中立化的支持者）同意到柬埔寨进行三天访问，时间就定在柬埔寨议会选举开始前几天。西哈努克没有时间和精力同时应付这两件大事，他认为戴高乐访问更为重要。然而，很多中产阶级早就觊觎议会席位，一部分原因是担任官职能够获得牟利的非常规机会。正当西哈努克忙于为戴高乐来访做准备时，他受到数百名潜在候选人的签名请愿。西哈努克不愿意同自己的支持者为敌，于是决定公开竞选，超过 425 名萨克姆候选人就 82 个议席相互之间展开竞争。

柬埔寨皇家芭蕾舞团在吴哥窟平台的表演将戴高乐总统的访问推向高潮。法国总统做了热情洋溢的发言，他高度赞扬柬埔寨的热情接
待，支持东南亚中立化。西哈努克努力使访问成功——耗费几百万美 238
元，国外媒体给予广泛正面报道，这次访问或许是西哈努克亲王执政这些年来事业的一个高潮。然而，当戴高乐将军离开后，西哈努克面临的全国选举是 1951 年以来第一次候选人同他没有多大关系的选举。

选举中，那些照顾地方利益的候选人击败了那些主要靠对西哈努克的忠诚才获得资格的候选人。一些评论者（包括当时西哈努克自己）称选举结果是反动力量的胜利，当然这次选举也是 1951 年以来候选人第一次要密切联系选民。为了获得选民支持，很多候选人也像其他国家的候选人一样，做出不切实际的承诺，花费大量金钱。很多候选人思想偏于保守，不过大多数柬埔寨人也是如此，特别是在农村地区。然而，有趣的是，3 个左派候选人（多年来一直密切关注所代表的选区）在 1966 年高票重新当选。

新任首相朗诺（Lon Nol）将军是柬埔寨陆军司令，人们对他的了解是忠于西哈努克亲王，政治上没有野心，并且军队效忠于他。他还赢得中年保守派的支持，特别是在柬埔寨华裔商业精英中间很受欢迎。

这些人认为西哈努克的行事风格让人尴尬，而他的经济政策更是让他们损失惨重。包括绝大多数军官在内的很多人后悔柬埔寨断绝同美国的关系，反对将进出口行业国有化，这块利润丰厚的经济领域落入那些无能的政府官员手中。新一届议会中很多议员都已失去耐心，以西哈努克为一方、议会和商业精英为另一方的冲突开始显现。

西哈努克的政策

20世纪60年代一位美国记者写道“柬埔寨就是西哈努克”。这一观点得到一名法国作者的响应，她将自己关于柬埔寨的书中的一章命
239 名为“他即国家”，同17世纪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朕即国家”的名言有异曲同工之妙。[①] 两种说法在这一点上是真实的。西哈努克亲王坚称他就是柬埔寨的化身，柬埔寨人都是他的孩子。这让很多外国访客、记者或者外交官很难从西哈努克的主张中分清哪些才是柬埔寨真正的国家利益、问题和优先目标。

结合当时的形势和此后发生的事情，我们如果不考虑西哈努克或者是降低他言论的影响力，就很难重构那个时代柬埔寨的政治和社会状况。西哈努克的言论、他控制的报刊和外国评论者的赞美之词经常掩盖其他声音。更不用说他的舆论监督。20世纪60年代西哈努克的影响力总体呈下降趋势，看到这一点的人中有人可能会夸大反对派的重要性（特别是在共产党中），缩小他的真实功绩，并把他下台后困扰国家的混乱局面归咎于他。

公平的讲，考虑到西哈努克在20世纪60年代面临的选择，他的外交政策现在看来比国内政策更具防御性。政策的关键内容包括同中国建立友好关系，尽可能多找些外国保护人，以及同北越秘密结盟。

---

① Robert Shaplen, *The Lost Revolution: Vietnam 1945 – 1965* (New York, 1966) pp. 367ff.; Simone Lacouture, *Cambodge* (Lausanne, 1964), pp. 133 – 52. 相关的传记概览还见 Milton Osborne, *Sibanouk: Prince of Light, Prince of Darkness* (Sydney, 1995)。Julio Jeldres 是西哈努克的私人秘书，现在正撰写西哈努克的官方传记。西哈努克关于这段时期的回忆录 *Souvenirs doux et amers* (Paris, 1981) 写得非常生动，但研究时要谨慎使用。

这些政策的必然结果是对美国、泰国和南越丧失信任。

如我前面所指出，同北越正式结盟很可能是不可避免的。不管西哈努克是否禁止越共军队借道柬埔寨，后者都会这样做的，而且会消灭前往阻止的所有柬埔寨军队。在1970—1971年间，越共就这样做过，当时的西哈努克政府企图把北越军队赶出柬埔寨，导致数千柬埔寨人伤亡。如果西哈努克同南越结盟，那么越南内战就会扩散到柬埔寨境内。同泰国结盟也不会保护柬埔寨免于北越人的威胁。泰国或南越都不准备给柬埔寨以能让西哈努克脱离河内的承诺。西哈努克同中国的友谊是制衡邻国的一次尝试，中国是一个能够约束柬埔寨境内北越人的大国。这也是被西哈努克称之为真正友谊的反映和中国总理周 240
恩来提供支持的体现。

西哈努克旨在维护独立、避免卷入越战的政策有些不切实际，他对同共产党大国之间的真正友谊充满期待的想法也有些天真。但是他又能怎么样呢？20世纪50年代后期，美国清楚表明自己的政策，即一如既往地支持泰国和南越，两国都奉行反柬埔寨政策，这让柬埔寨非常担心。西哈努克有理由相信他被敌对国家所包围，美国并不重视他。他也是被爱国主义所鼓动，看到如果卷入越南战争柬埔寨是没有前途的。①

西哈努克不能容忍国内异议人士，并且他有将反对者同外国势力联系起来的倾向，这是他国内政策中最相辅相成的两项内容。根据他的观点，作为一名柬埔寨人，就要像西哈努克爱戴自己的人民一样爱戴西哈努克，他就是柬埔寨这个大家庭的父亲。在这个国家里不存在多元政治的真正传统，在整个西哈努克时代，异议人士被视为同时犯有叛国和忤逆之罪。

西哈努克是个精明的政客，善于让自己的反对者处于不平衡中，

---

① 有关西哈努克外交政策的深入分析包括 Roger Smith 的 *Cambodia's Foreign Policy* (Ithaca, N. Y., 1965) 和 Nasir Abdoul Carime 的 "Mise en perspective de la diplomatie sihanoukienne" (*Péninsule*, Vol. 36 [1998]: 175-91。) 还见 Kenton Clymer 的 *United States and Cambodia, 1870-2000* (New York, 2004)。

他一会儿似乎支持这个人，过段时间又支持另一个人。发起针对右派的运动后，接着发起针对左派的运动，竞争对手的建议偶尔也会正合他意——1955年选择中立外交政策就是这样。西哈努克把自己置于柬埔寨政治光谱（如果视为一面三色旗，激进的红色高棉在一侧，保守的蓝色高棉在另一侧）的中间，代表白色高棉，他拒绝同任何力量结成正式联盟。他是总的负责人，在技术上持中立立场（并且内心深处还有亲法倾向）。

反对西哈努克

从1955年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反对西哈努克统治的力量组织得并不好，效果也不明显。除了遭到少数激进分子、一些精英阶层和部分宗教人士的反对外，西哈努克几乎如他所宣称的那样广受爱戴。
241 他的顾问告诉他，在柬埔寨不存在不同政见者的基础，他自己可能对此也深信不疑。民主党被清除后，摆在眼前的对手就只有披拉钦空和自由高棉（Khmer Serei），它们的力量并不强大。

构成自由高棉的基层单位都是由高棉人组成的，泰国和南越负责招募、提供资金和武器，并且自由高棉或多或少受到早已过气的流亡者山玉成的指挥。自由高棉主要在外国土地上活动，受外国势力资助，很容易成为西哈努克的攻击目标。当组织成员在国内被抓，会遭到秘密审判，然后执行枪决。记录行刑的电影会公开展映几周。

至于披拉钦空，其成员经常受到严密监控，他们的报纸虽然持亲西哈努克、反对美国的立场，但还是频繁遭关闭。1957—1963年间，多名披拉钦空成员被杀害或关进监狱。披拉钦空是共产主义运动秘密组成部分，一直由杜斯木（Tou Samouth）领导，直到1962年他被西哈努克的警察所暗杀，此后由桑洛沙所领导。在1954年之前披拉钦空在农村地区很有号召力，但此时早已不复当年之势。不过，在城市中，桑洛沙和他的同伴及其议会中的共产主义分子在知识分子、僧侣和高年级学生中很有影响。对他们来说，像桑洛沙和他妻子乔藩娜莉（Khieu Ponnary）这样的共产党员教师（他们从不谈论自己所属党

派），以自己的坚定信念和正确行为树立了榜样，与懒散腐败的柬埔寨精英形成鲜明对比。作为老师他们是无私和严厉的，但正是他们在道义上的激情，对特权、腐败和不公正现象的憎恶，使他们深受学生和很多佛教僧侣的爱戴。

1963 年早期，西哈努克发动了一次反左运动，在广播中公布 34 人的名字，指责这些人密谋推翻政府。名单中包括一些金边学校中的左派老师（包括桑洛沙和英萨利）、议会中的左派议员，甚至一些最近曾受西哈努克恩宠的学者。富有戏剧性的是，西哈努克把他们全部召来，主动提出要把政府交给他们。当这些人予以拒绝并发誓效忠后， 242
西哈努克才让他们中大部分人恢复原职。①

桑洛沙和英萨利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秘密成员，直到这时他们还没有遭到警察的威胁。西哈努克似乎还不知道他们的所属党派，但是他们慑于西哈努克的所作所为，逃至柬越边界一越共军队营地（他们后来称之为 100 办公室），企求得到保护。留下来的左翼教师发表观点变得小心谨慎，金边地下党成员也是如此，现由农谢（Nuo Chea）和文韦（Von Vet）领导。接下来三年，左派力量的反西哈努克运动没有取得什么进展。

北越同西哈努克的联盟一直受到柬埔寨本土反西哈努克力量的威胁，他们对柬埔寨共产党施以严格约束。北越建议柬埔寨的同志等到越南取得胜利后再发动政治斗争，但反对军事斗争。这一恩赐式的指导实际上让柬埔寨人没有选择：要么什么都不要做，要么被警察抓住。在很多柬埔寨共产党人中间开始出现对北越不满思想也就不足为怪了。一些人或许天真地认为，他们应该同越南人一样有搞民族革命的权利。他们的不满积存了很长时间，直到 1975 年柬共取得军事胜利后才爆发出来。

---

① 见 Ben Kiernan, *How Pol Pot Came to Power*（London, 1985）, pp. 202ff.，该书主要是基于 1979—1982 年间的采访。还见 David Chandler, *Brother Number One: A Political Biography of Pol Pot*, 2nd ed.（Boulder, Colo., 1999）, pp. 64－71；Philip Short, *Pol Pot*, pp. 143－44。

西哈努克的统治：一张平衡单

1955—1977 年间，西哈努克的最大贡献是避免柬埔寨卷入越战风暴中。做到这一点需要有巧妙的策略，并且付出一定代价，即招致西贡和曼谷亲美政权的憎恶，这两国的领导人本来就没把柬埔寨人自称的真正自治放在眼里。

我们总结认为西哈努克在内政方面的记录是复杂的。他称之为佛教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早已摇摇欲坠，其中最积极的一面或许是他坚
243 持在教育方面的投入（很多年都占到国家预算的 20% 多）。不幸的是，西哈努克亲王没有预见到，当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成千上万名高中和大学毕业生因为很难找到满意的工作而日益不满。一些青年男女投入到共产主义运动中，而更多的人将自己面临的困境归咎西哈努克。

尽管把西哈努克同柬埔寨的贫困联系起来这种想法有些感情用事，但却激发起柬埔寨人的自我价值和国家认同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柬埔寨人民政治觉悟的提高和对不公正待遇的认识，反过来加速了西哈努克政权的灭亡。西哈努克不断强调柬埔寨的伟大和独特性，这或许会误导一些年轻人认为：他们能够成功抵制越南和其他敌人，（如果发生）柬埔寨的共产主义革命要比目前为止其他革命更为纯洁、影响力更为深远。

借助一年两次在皇宫外举办的所谓国家议会这一平台，西哈努克也在一定程度上鼓励政治参与和辩论。在理论上，所有萨克姆成员都受欢迎出席这些会议，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议会只处理一些没有争议的议题，像柬埔寨人生活中的其他方面一样，西哈努克掌控着这些会议，他的政策通过举手表决。1963 年后可供辩论的空间越来越小，西哈努克利用这些会议攻击他的敌人，躲避批评，宣称柬埔寨优于邻国，至少在人种上说，要优于大部分大国。

西哈努克的另一长处是他能够勤于理政。他经常一天花 18 个小时来审阅政府文件，他精力充沛，经常到乡村旅行，同众多普通高棉人面对面交谈。这些接触满足了他获得认可的渴望。然而，他的过度活跃也是一个弱点，因为他更愿意说教而不是倾听并且不愿意或者不能

委托权威机构去处理，即便是在他知之甚少的议题上也是如此。他还把柬埔寨普通百姓视为自己的孩子——从法国人继承来的观点——而不是能够做出选择或处理自己事务的普通人。

20 世纪 60 年代的金边是东南亚最漂亮的首都，很多从越南战场退 244
至此地休息的西方记者都被柬埔寨的魅力所陶醉。他们热情讴歌西哈努克打造的“和平岛”、满足安宁的高棉人和西哈努克的“个人魅力”。至少从文化角度看，生活在金边是非常吸引人的。[①] 西哈努克亲王接受他们中很多人的采访，他们写出非常优美的采访稿，但很少提及他统治的暴虐一面和国家面临的经济困难，这一点并不奇怪。如果这些记者这样做了，他们就得不到新的签证。实际上，在 1967—1968 间的几个月中，根据西哈努克的命令，没有外国记者获准进入这个国家。

与西哈努克统治方式中这些积极方面同时存在的是他的自负，他的不纳忠言和他不愿面对柬埔寨所面临的经济、基础设施和社会问题，这些影响到柬埔寨的方方面面。他肆意镇压反对派。在他掌权期间，数百异议分子消失——据推测是被暗杀了，1967 年在西北地区一次共产党领导的起义之后，几千农民被杀害。

像他的先辈一样，西哈努克将柬埔寨视为一个大家庭和自己的私有财产。他同样也把柬埔寨视为一个演出剧团。他的很多臣下，尤其是那些老人，甘心当配角，赋予西哈努克超自然的能力。围在他身边的众多情妇也是如此，她们在他的电影中担当角色。西哈努克的爱国真情和勤政能力被他的自恋和任性大打折扣。他的出现只是法国人选择的政策工具，到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当他的国外靠山和敌人密谋消除他的中立立场时，当自己曾经慷慨照顾的学校学生拒绝永远被视为他的孩子时，西哈努克已不能承受积累起来的反对自己和自己国家的压力。

西哈努克统治地位下降

西哈努克统治力下降的第一个转折点可能要算 1963 年 11 月他终

---

① 关于西哈努克时期艺术和文化的分析见 Ly Daravudh and Ingrid Muan (eds.), *Cultures of Independence* (Phnom Penh, 2001)。

245 止美国的军事援助项目，该项目为柬埔寨军备武装提供财力支持，实际补助金额相当于国家预算的15%。虽然此后中国在接下来几年里提供了一些军事装备，但是再也没有国家给予像美国这样的援助，柬埔寨军队战斗力下降。西哈努克继而做出决策，将进出口经济实行国有化，关闭柬埔寨的私人所有制银行。西哈努克切断美国援助的动机与其想置身越战之外并同共产主义阵营国家保持友好关系的愿望有关。而进出口国有化和关闭私有银行有控制国家经济、打击金边的华人和华裔高棉人商业精英的考虑。①

上述两项措施产生了不可预见的后果。西哈努克断绝同美国关系使其更易遭到来自右派势力的压力，降低军队士气。外贸行业的国有化促使商界人士秘密同越南的共产党起义部队做生意。到1967年时，柬埔寨收获的大米有超过1/4流入这些武装部队，他们能够出比柬埔寨政府更高的价钱。同时，因为出口税收通常来源于大米，政府因而减少了很多财政收入。对外贸易也因过去企业积累下来的经验丢失和政府管理的不称职而遭受打击。

为了根除大米外流，1967年早期，柬埔寨政府决定由军队负责在几个产粮区收集余粮，按政府定价付钱，并运送到政府粮仓。在马德望省的西部，靠近三洛（Samlaut）的地区，民众对此项决定的愤怒情绪演变成武装暴乱。上万农民逃离家园或者躲入森林，政府军从未停止对他们的追捕和消灭，他们匆忙自发组成巡逻小组。数年后，西哈努克曾在一次即席讲话中谈及他从别处了解到在这次镇压中有一万人被杀害，其他资料也证实了这一数字。这次屠杀当然是根据西哈努克的命令执行的。②

---

① 见 Kenton J. Clymer, "The Perils of Neutrality: The Break in US – Cambodian Relations, 1965", *Diplomatic History*, Vol. 23, No. 4 (Fall 1999): 609 – 31。又见 George McT. Kahin, *Southeast Asia: A Testament* (London, 2003), pp. 249 – 60，该书更为批判美国。

② 有关西哈努克对三洛事件反应的分析见 Kiernan, *How Pol Pot Came to Power*, pp. 249ff.; Elizabeth Becker, *When the War Was Over* (New York, 1986), pp. 119 – 22; Chandler, *The Tragedy of Cambodian History*, 第5章。或许是因为起义失败，高棉共产党从未宣称对三洛事件负责。

这次起义让西哈努克非常气馁，因为在他看来柬埔寨与北越结盟的一个目的就是把柬埔寨共产党人置于越南人的严格控制下。他很难相信他的“子民”会因为不满其政策（在上面例子中也就是武装收粮）而反对他。他怀疑越南人表面答应约束柬埔寨共产党人，背后却 246 支持他们，但是他又没有能力做些什么。

西哈努克对左翼力量的疑心逐渐加重，但是他又过于自负不愿意主动向柬埔寨保守力量示好（他过去经常攻击保守派）。三洛事件后，西哈努克的策略是保持对左派力量的打击态势，拉拢中间派，并努力重修同美国的外交关系以期恢复经济和军事援助。然而，此时大多数美国政策制定者只把柬埔寨视作他们越战的附属议题，只能按照他们开出的条件恢复同西哈努克的关系。

秘密贸易、国营企业管理混乱以及铺张浪费，造成国家收入锐减，柬埔寨经济在 1967—1968 年间陷入困境。西哈努克从未持续关注过农业问题。这些问题包括产量低下，水利灌溉落后和农民身上的高利息贷款，再加上受人口快速增长和国际粮价波动的影响，更加剧了农民的困境。到 1967 年，这些问题变得更加严重，然而，西哈努克仍然对此无动于衷。他逐渐把政治大权交给朗诺和施里玛达。他希望能够出现挽救这个国家经济的奇迹，或者这几个负责人会表现得更为糟糕以再次提升他自己的权力。然而，觉察到西哈努克此时的脆弱，他的敌人开始积聚力量。

从 1963 年到 1966 年底，柬埔寨的主要共产党分子都驻扎在柬越边境，处于越南人的保护之下。后来因西哈努克同美国断绝关系，柬埔寨共产党曾得到信任，但实际上，这些年他们对重大事件的影响力几乎为零，1965—1966 年间的共产党领导人桑洛沙在国外待了 12 个多月。

1965 年桑洛沙被召至北越商量事情。他沿胡志明小道一路向北，花了两个月抵达河内，他在河内因柬共的民族主义议程而受到北越责备。越共书记黎笋（Le Duan）告诉他柬埔寨的利益要服从越南的利益，要

帮助越南打败美国，推迟开展武装斗争，要等到时机成熟的时候。[①]

247 桑洛沙的感情受到很大伤害，但他不想与自己的保护者反目，什么也没有说。然而，此后不久他就来到中国，受到中国激进派官员的热烈欢迎。中国此时正处于“文化大革命”初期，桑洛沙深受鼓舞，对中国这一新保护者和更为活跃的革命模式推崇之至。事后分析，当时中国发生的事情对柬埔寨代表团产生多大影响，是一种颇为有趣的推测。他们会对毛泽东飞赴上海、畅游扬子江、发动“文化大革命”作何反应？他们又对中国国防部长林彪在公开讲话中强调共产主义革命中保持独立的重要性作何理解？这篇讲话一定让越南人焦虑不安，中国的援助对于他们同美国的战争至关重要；另一方面，这一讲话或许让那些高棉人暗中高兴，他们一直视越南的援助为一种窒息。

无论如何，中国之行是桑洛沙事业的一个转折点，或许也是柬埔寨历史的一个转折点。不过，慎重起见，桑洛沙并没有向越南人透露他思想的转变。回国后，他在森林茂密的偏远地带建立自己的总部。接下来的 4 年里，他同一群志同道合的同伴一起，与世隔绝，打造自己的乌托邦思想，积聚仇恨之情，考虑着如何夺权。

一年之后，就在越共发动春节攻势（Tet Offensive）之前，柬埔寨共产党（CPK，他们自己这样称谓）发动武装起义反对西哈努克，从东北和西北的基地出击。开始起义影响不大，两年之后才成规模，到 1970 年早期，起义队伍已经占据或者构成威胁的地方几乎占柬埔寨领土的 1/5。同时，城市中很多学生和老师长期被西哈努克自我陶醉式的统治所疏远，他们着迷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和法国 1968 年的“五月起义”。在很多柬埔寨年轻人看来，这些运动似乎提供了一条可行的选择，能够根除长期困扰柬埔寨政治的腐败问题和保守主义倾向。

---

① 关于桑洛沙访问越南见 Thomas Engelbert and Christopher Goscha, *Falling Out of Touch: A Study of Vietnamese Communist Policy Toward an Emerging Cambodian Communist Movement, 1930 – 1975*（Clayton, Australia, 199 5），该书引用了越南档案文献。还见 Chandler, *Brother Number One: A Political Biography of Pol Pot*, 2nd ed.（Boulder, Colo. 1999），pp. 69 – 73；Philip Short, Pol Pot, pp. 156 – 58。有关当时中国政治环境的讨论见 Roderick MacFarquhar and Michael Schoenhals, *Mao's Last Revolution*（Cambridge, Mass., 2006），pp. 15 – 34。

在这段不稳定的时期，西哈努克则忙于自己制作电影。他集编剧、导演、制片和主演于一身，将制作影片作为他从事政治游戏之外的放松方式。对他来说，政治已经变得异常复杂和危险，以至于自己难以取胜和参与。西哈努克还在努力同美国重新结盟，同时又对美国在越南的敌人重申友谊。这些前后矛盾的举措加剧了内部敌人对他的不信任，到 1969 年后期，一些保守派高级官员开始密谋推翻他。他们是否受到重新开放的美国大使馆官员的鼓动，这还是个猜测。[1] 248

最主要的密谋者是西哈努克的表兄弟西索瓦·施里玛达。他是一个职业公务员，在朗诺政府中担任副首相。他对西哈努克乱管经济造成的混乱局面日益失去耐心，还对西哈努克允许在柬埔寨境内建立越南基地和他冒进冲动、自相矛盾的外交政策感到沮丧。他奉行亲西方立场，同金边的商界精英关系密切。他厌倦了在西哈努克无休止的歌剧中扮演一个配角。

首相朗诺更是一个谜一般的人物。我们不清楚他是否对西哈努克断绝美国援助、结盟越共并允许他们通过柬埔寨境内运送武器等政策持反对立场。其实，他手下的很多官员在同越南人的武器、药品和补给品的交易中大发横财，越南人非常慷慨。然而，到 1969 年，柬埔寨军队受到共产党起义队伍的攻击，越南人管理的很多基地地区招致当地百姓的抱怨。朗诺同样面临来自下属官员的压力，他们将柬埔寨孤立于美国援助和越南战争的政策视为他们财富野心的障碍。况且，朗诺也是个愿受吹捧的人，他逐渐将自己视为唯一能够挽救柬埔寨于异教徒威胁的人（他称越南人正在捶打自己国家的国门）。

西哈努克在承受日益加重的压力的同时，对治理国家的兴趣也在下降。多年的超负荷工作让他精疲力竭，开始显露出没有能力或没有意愿

---

① 有关当时针对西哈努克亲王的举措，见 Charles Meyer, Derrière le sourire khmer (Paris, 1971), and J. C. Pomonti and Serge Thion, *Des courtisans aux partisans: La crise cambodgienne* (Paris, 1971)。还见 Laura Summers, "The Sources of Economic Grievance in Sihanouk's Cambodia", *Southeast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Vol. 14, No. 1 (1986); Remy Prud'homme, *L'Éconornre du Cambodge* (Paris, 1969)。Summers and Prud'homme 都令人信服地描述了 20 世纪 60 年后期经济乏力对柬埔寨的影响。

249 去吸引挽留年富力强的顾问。为了增加财政收入，他决定在金边开办一间赌场，造成灾难性后果。1969 年下半年，上千柬埔寨人在赌桌上损失了数百万美元。几位显赫人物和几十名穷人在连续输钱后自杀身亡，上百家庭破产。西哈努克自己不赌博，但也对赌博造成的混乱局面漠不关心，而他的花销持续上涨。11 月份差不多达到顶点，当时由西哈努克领导主办了一场国际电影节，电影节最后授予他创作的电影《黎明》一座实心纯金塑像，由柬埔寨国家银行捐赠。当 1970 年 1 月西哈努克离开柬埔寨开始他的年度休假时，留下的很多人都把他的离开看作外逃。

1970 年政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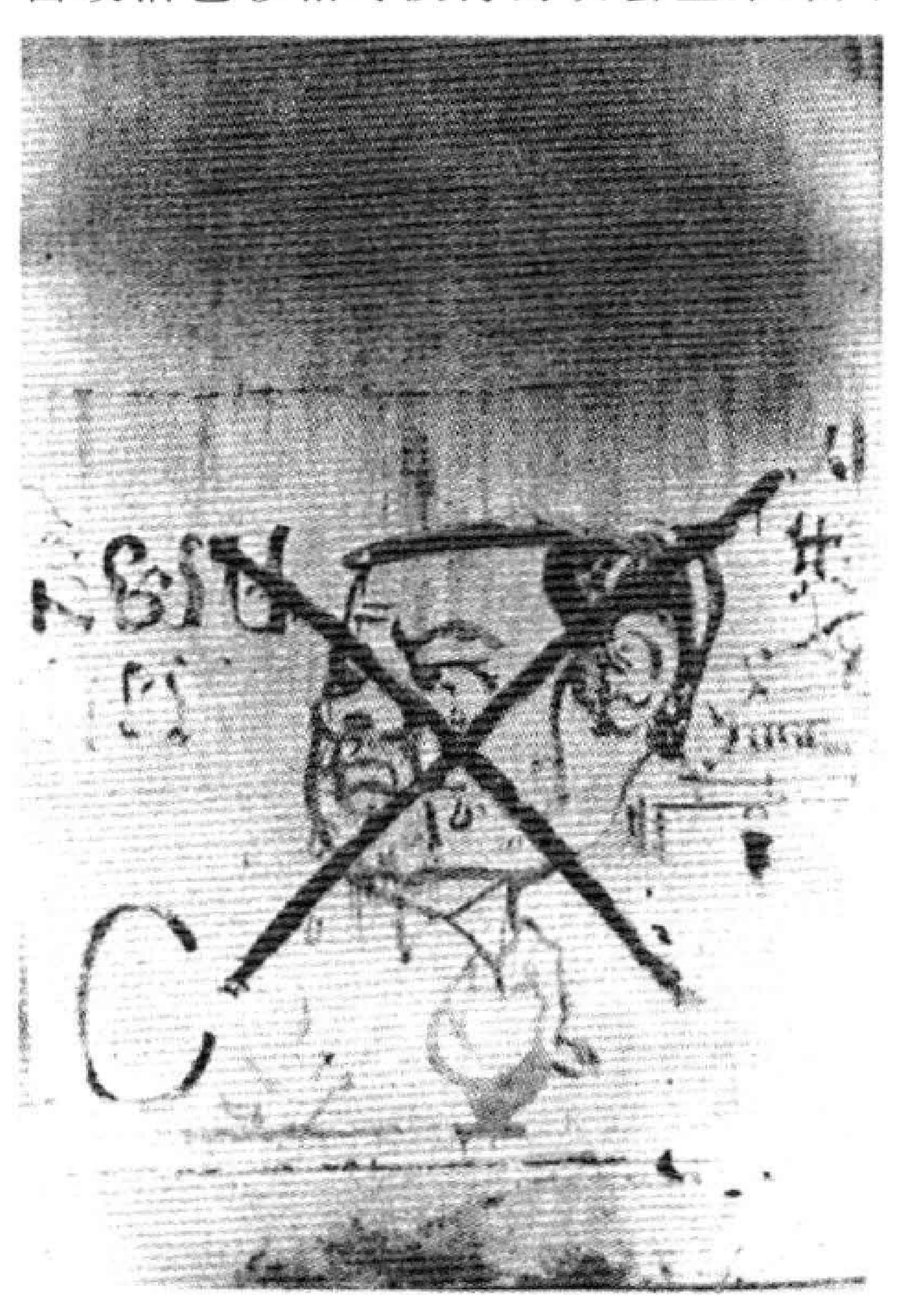
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西索瓦·施里玛达和他的同事们努力恢复柬埔寨的秩序，关闭赌场，银行私有化。施里玛达秘密访问河内，试探如何使得越南军队离开柬埔寨。西哈努克签署的同意建立越南人基地的文件让施里玛达非常生气。柬埔寨境内的为越南军队运送物资的补给线暂停，一场同越南的全面冲突日益迫近——西哈努克为避免出现这一局面奋斗了 15 年。

3 月初，金边发生骚乱，目标直指北越大使馆及其在南越的代理人——民族解放阵线的使馆。骚乱失去控制，两座使馆遭到严重破坏。西哈努克在巴黎对暴力行径予以谴责，而实际上骚乱是在他同意下发生的。施里玛达谋划政变已有数月，现在时机已经成熟，而且担心西哈努克可能很快回国，政变时间提前实施。3 月 17 日晚上，施里玛达和 3 名军官造访朗诺寓所，用手枪威胁他签署一份声明，该声明支持在次日召开的国民议会中表决推翻西哈努克亲王。当朗诺签署文件后，似乎意识到此举的长期后果，不禁眼泪夺眶而出。[①]

---

① 关于这次政变见 Chandler, *The Tragedy of Cambodian History*, pp. 197－99。又见 Pomonti and Thion, *Des courtisans aux partisans*; Justin Corfield, *Khmers Stand Up*!（Clayton, Australia, 1994）; William Shawcross, *Sideshow: Nixon, Kissinger, and the Destruction of Cambodia*（New York, 1979）。Kahin, *Southeast Asia*, pp 279－99，指出美国特别是通过西贡当局支持这场政变。虽然关于华盛顿策划这场政变的证据缺乏说服力，但是华盛顿几乎即可接受了政变结果。

随后发生的事情有些虎头蛇尾，也与西哈努克歌剧式政治形成鲜 250
明反差。赋有权力的国民议会以 86 票对 3 票对西哈努克丧失信任，并在紧接着举行的选举中，由政治色彩相对淡薄的议会主席郑兴（Cheng Heng）取代西哈努克成为国家元首，朗诺留任首相职位，施里玛达作为他的副手。在金边和军队中受过教育的人欢迎政变，但是农村地区的柬埔寨人对此毫无准备。很多政变策划者想宣布柬埔寨为共和国，但是在一些省份爆发支持西哈努克的骚乱后暂缓这样做。



这是 1970 年西哈努克被罢黜时出现在金边墙壁上的漫画（图片提供：作者）

西哈努克是在途经莫斯科的回国路上获悉发生政变的，此时他正在北京。他首先想到寻求法国
的政治庇护，但是经过与 251
周恩来和越南总理范文同（Pham Van Dong）会谈后，他同意领导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政府，同北越结盟，其武装力量主要由共产党组成，就在一个月前他的政府军还在努力摧毁柬埔寨共产党。3 月底西哈努克通过广播呼吁柬埔寨“兄弟姐妹”（显然他们不再是他的孩子）拿起武器反对朗诺。支持西哈努克的骚乱几乎立即就在柬埔寨东部地区爆发。柬埔寨军队出于恐惧、傲慢和种族主义情绪，屠杀了金边附近数百名手无寸铁的越南平民，怀疑他们同共产党联盟。这些平民要比北越武装力量更容易确定位置，也更容易屠杀，但是屠杀的罪恶和朗诺未表遗憾的态度，使其政权本在海外赢得的支持蒸发

殆尽。

况且，对于大多数柬埔寨人来说，越南武装力量离开柬埔寨要比政变本身更受欢迎。朗诺要求越共 48 小时内离开柬埔寨——这很可能是柬埔寨现代史上最不切实际的一项命令——很多柬埔寨人认为越南人无视他们的要求因而非常气愤，上万人涌向越南武装队伍驻地，要把“侵略者”赶出去。在接下来的几周里，越南士兵向毫无还击之力的柬埔寨人开枪射击，这些士兵都有二十多年的战斗经验了，结果造成数千柬埔寨人被杀或受伤。1970 年 5 月，美国—南越联合部队侵入柬埔寨东部，把北越武装赶到西部更远地方。这次入侵行动虽然有助于保护美国从越南撤军，但却意味着柬埔寨作为独立主权国家的终结。[①]

高棉共和国慢慢走向崩溃

朗诺在 1970 年后期和 1971 年发动两次对越南人的进攻行动都冠以真腊（吴哥之前的王国）的名字。行动受到美国的鼓励，但是朗诺的军队缺乏训练，装备落后，领导混乱。富有作战经验的北越军队把他们分割成小部分，1971 年后朗诺的军队再也无力发动大规模攻势。
252 1970 年 10 月建立共和国后，朗诺政府存在了四年多，主要受惠于美国的军事经济援助和对北越大规模轰炸行动。

高棉共和国在最后四年充满了暴力和伤感。1971 年初朗诺经历了一次中风。虽然他很快恢复，但再也不能完全掌握政治控制权。缺乏强有力的领导，金边很多政客都忙于组建自己的派系和聚拢财富。一个主要人物是朗诺的弟弟朗农（Lon Non），他的主要精力都集中在阻止西索瓦·施里玛达——或其他任何人——从朗诺手中夺取权力。

在乡下地区，共和国军官经常虚报他们手下的士兵数量，这样就可以把多领的军饷（由美国援助的）装入自己的口袋。一些军官还卖给共产党武器装备；没有人为下一次攻势备战。朗诺没有因渎职或腐败行为而惩罚那些忠于他的军官。相反，他把大量时间用于给自己的

① 有关这一时期见 Robert Sam Anson, *War News* (New York, 1989)。

朋友尼克松总统写信，请求美国援助，以及听信佛教徒承诺用法力解决战事。截至1972年底，高棉共和国仅控制着金边、一些省会城市和马德望省大部分地区。剩下的地方要么是在共产党手中，要么是朗诺政府无法进行有效统治。

1973年上半年，美国对柬埔寨展开一次轰炸行动，推迟了共产党在全国取得胜利。这次轰炸相当惨烈，可以与二战期间任何一次轰炸相比。就在美国国会通过议案禁止再进行轰炸之前，美军把超过十万吨炸弹投到柬埔寨乡村。对于这次轰炸，目前还没有一个可信的死亡数字，但它很可能延缓了共产党军队包围金边，虽然也有人认为它让幸存下来的共产党军队变得更加意志坚强。战争虽然因这次轰炸又拖了一年半，但尼克松总统对轰炸结果的反应是对自己的助手称，美国最终“失去”了东南亚——美国实际上从未拥有过这块地方。[①]



1972年身穿革命服装的年轻女孩（图片提供：Serge Thion）

① 有关美国轰炸的记述，见 Shawcross, *Sideshow*, pp. 209 – 19; Ben Kiernan, “The American Bombardment of Kampuchea, 1969 – 1973”, *Vietnam Generation*, Vol. 1, No. 1 (Winter 1989): 4 – 42。

对给予柬共运动二十多年帮助的越南人，他们的回报是在 1972 年底北越军队刚撤出柬埔寨（根据越南与美国达成的停火协议，北越军
253 队撤出柬埔寨）就屠杀了大部分北越派来的柬埔寨人。这些屠杀是秘密进行的。柬共也在他们控制的区域尝试实行集体化项目，1973 年初，在美国轰炸期间，柬共在一些地区引入义务合作社。这时，有关柬共叛军立场坚定决不妥协的谣言流传金边，说他们不留俘虏，每占一座城镇或村庄就把居民赶入树林。金边很多人都把这些谣言视为是一种宣传，仍然认为红色高棉是越南人的傀儡。同时，战争也使他们精疲力竭，他们也想更换这个腐败低效的柬埔寨共和国。

1975 年初，战事接近尾声。共产党人破坏通往金边的河道，阻止运送大米和军火的船舶抵达金边。美国安排的空运并不能满足金边生计所需的大米和防卫所需的军火。接下来的 3 个月，柬共进一步缩紧对金边的包围，大约两百万人沦为难民。3 月初，朗诺携政府奖给他的 100 万美元逃离柬埔寨。由美国安排同西哈努克的谈判没取得任何结果，最后的努力也告失败。此时（或者在此之前），桑洛沙和他的同事没等越南盟友的批准，就决定占领金边。

1975 年 4 月 17 日早上，数个纵队的柬共武装，身着农民服饰或简易卡其布制服，携带重装备，悄悄从 3 个方向占领金边。他们中很多人还不到 15 岁。他们清空路上的交通，缓慢走过金边的主要街道，冷淡回应金边百姓的欢迎。柬共占领金边正赶上柬埔寨新年和共产党在南越取得胜利前两周。这一巧合是有意安排，因为柬共可能希望他们占领金边的这年，像发生法国大革命的那年一样，成为开创柬埔寨历史新时期的开始，而这与越南革命没有任何关系。[1]

---

① 有关共产党进入金边的记述除此之外还见，François Ponchaud, *Cambodia Year Zero* (New York, 1978), pp. 1 - 22; Someth May, *Cambodian Witness* (London, 1986), pp. 100 - 5。红色高棉在他们的宣传中没有用“零年”或“一年”，但他们经常称柬埔寨过去的历史已经终结，新的历史从 4 月 17 日开始。

第 12 章　柬埔寨的革命

我们不清楚一百年后的柬埔寨历史学家是否会给予这个国家短暂 255
的革命时期同更为悠久、复杂和神秘的吴哥时期以同样的关注。对于21 世纪的柬埔寨成年人来说，1975 年 4 月柬共占领金边后的 3 年 8 个月 20 天是令人无法忘怀的伤痛时期。鉴于柬埔寨革命的残忍程度和行事方式同很多人关于 1970 年前柬埔寨的观念大相径庭，我们用一章的篇幅来讨论这一时期，这完全符合这种叙述性历史书。

从 1975 年 4 月 17 日到 1979 年 1 月 7 日柬共政权统治柬埔寨，也就是有名的民主柬埔寨时期。幸存者对这段时期的记忆就像品尝未熟的果实一样苦涩。民柬政府发起的惨痛革命就像一场森林大火或台风一样席卷全国，政府发言人在取得革命胜利后声称“两千多年的柬埔寨历史”已经终结。货币、市场、正规学校、佛教、书籍、私有财产、各式服饰和行动自由等也都取缔。没有哪届柬埔寨政府曾试着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改变这么多事情；也不曾有人像这样无情地引领国家走向未来或如此离谱的偏向穷人。

民柬政府领导人，也是柬埔寨共产党成员，很大程度上是隐藏 256
在人民视线之外的，而以自称为“革命组织”的形式出现。他们试图改变柬埔寨，用革命热情和动力取代他们认为阻止国家自治和社会正义的障碍。他们认为家庭生活、个人主义和人们思想深

处对封建制度的偏爱，同封建制度本身都是阻止革命的拦路石。他们称，柬埔寨的穷人一直受剥削和奴役。革命带给他们解放，胜利赋予他们权利，无论男女都成为自己生活的主人，也集体成为国家的主人。

柬共密切注视着革命的每一步，但局外人却看不到他们的存在，他们从未公开自己的社会主义议程或领导人的名字。柬共从不说与越南共产党的长期联盟，也很少谈及自己政权从中国和朝鲜那里获得的资助。在开始几个月里，柬共领导人甚至允许外国人相信西哈努克（他一直作为反朗诺抵抗运动的领导人）仍然是柬埔寨政府的元首。通过掩盖自己的联盟和日常事务，民柬政府给人以真正独立进行革命的印象。1978 年，桑洛沙（波尔布特）向到访的南斯拉夫客人鼓吹柬埔寨“不模仿任何人建立社会主义”。柬埔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从 1975 年 4 月开始，持续整个民柬政府时期，但是为了兑现他们所做的是没有先例的社会主义，波尔布特及其同事开始了一段危险的探索。①

为了一次性彻底改变柬埔寨，柬共干部命令所有人离开城市和县城。1975 年 4 月 17 日后的一周，超过两百万柬埔寨人被赶进农村，他们并不清楚自己的命运。只有柬共高官家庭和几百名红色高棉士兵被允许留下来。柬共从未对这一残忍命令做出详尽解释，内战已经造成 50 万人死亡，该命令又在这死亡数字上增加了几千人。在西方国家流传的报告称，住院的病人被从病床上赶下来，随意执行死刑，沿路
257 都是死亡或被弃的病人、老人和小孩。清城行动让受害者震惊，也让

① 见 David P. Chandler，“Seeing Red：Perceptions of History in Democratic Kampuchea”，载 David P. Chandler and Ben Kiernan（eds.），*Revolution and Its Aftermath in Kampuchea：Eight Essays*（New Haven，1983）；Serge Thion，“The Pattern of Cambodian Politics”，载 David Ablin and Marlowe Hood（eds.），*The Cambodian Agony*（Armonk，N. Y.，1988），pp. 149 – 64；François Ponchaud，“Social Change in the Vortex of Revolution”，载 Karl Jackson（ed.），*Cambodia 1975 – 1978：Rendezvous with Death*（Princeton，N. J.，1989），pp. 151 – 78；Ben Kiernan，*The Pol Pot Regime：Politics，Race，and Genocide Under the Khmer Rouge*（New Haven，1995）；Steve Heder，“Racism，Marxism，Labeling and Genocide in Ben Kiernan's The Pol Pot Regime”，*Southeast Asian Research*，No. 5（1997）：101 – 53，该文对 Kiernan 的一些观点提出不同见解。

其他国家的观察者震惊，他们本以为柬埔寨新政权会以和解的方式进行治理，但是这些经历内战磨炼的人或许已经忘记了残忍。也有颇为同情革命理想的观察者认为，清城是柬埔寨的唯一选择，能够生产出用以生存的足够食物，打破根深蒂固的落后时代的社会等级、愚忠思想和社会安排，能够将革命乌托邦战略付诸实践。①

清城的决定是在柬共领导人解放金边前不久做出的，但这一命令非常保密，让一些共产党军队指挥员都感到吃惊。柬共之所以这么做，一是因为金边真的非常缺粮；二是因为管理几百万不支持革命的人难度很大；三是因为柬共领导人担心自己的安全。不过，可能还有另一个易被忽视的原因，即他们急于维护柬共取得的胜利，维护自己在农村远超过在城市的统治力，维护穷人的权利。桑洛沙和同事在森林中待了近七年，经过近五年的内战，就进入城市担任公职。他们把城市视为滋生反革命的温床。他们在经济上优先考虑的是柬埔寨农业的转型，特别是要提高全国大米的产量。政府希望靠出口余粮赚取外汇，可以用于进口产品，最终是为工业化提供资金支持。为了获得足够的余粮出口，柬共需要所能找到的所有农业劳动力。

此后 6 个月里，那些从城市中被赶出来的人——新政权称他们为“新人”或“4 月 17 日人”——在士兵和柬共干部的监督下忙于种植大米和其他农作物。条件虽然艰苦，尤其是对那些不适合体力劳动的人说，但由于大部分地区有足够吃的，以至于很多被从金边赶出来的民柬幸存者回忆那段时期还算是相对的黄金时期。这么多年来，柬埔寨第一次没有战争，很多所谓的“新人”急于帮助重建被战争蹂躏的国家。或许，毕竟柬埔寨的问题过于严重，只能用革命的方式解决。258

① 关于清城行动早期生动记载，见 François Ponchaud, *Cambodia Year Zero* (New York, 1978), pp. 1 – 51; Pin Yarhay, *L'Utopie meurtrière* (Paris, 1980), pp. 39 – 56。又见 Kevin McIntyre, “Geography as Destiny: Cities, Villages and Khmer Rouge Orientalism”,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Vol. 35 (1996): 730 – 58。民柬采取这一举动也可能是想努力超越中国和越南更为谨慎的革命。Philip Short, *Pol Pot: The History of a Nightmare* (London, 2004), pp. 300 – 1. 中国也部分程度上实行过这样的政策，即 20 世纪 60 年代的强迫“下乡”运动。见 John Bryan Srarr, *Understanding China* (London, 2003), p. 127。

一位前工程师说道："开始，革命的很多想法是好的。"他补充道，然而"在实践中没有产生效果"。①

对于很多柬埔寨乡下人来说，特别是那些15—25岁的年轻人，70年代初期的反封建和反美斗争向他们提供了一次感受自由、自尊和权利——还有武器——的机会，这对于他们的父母或者大多数柬埔寨人来说是不可想象的。借用毛泽东的话说，这些年轻人是一张"一穷二白"的纸，通常很容易将革命的教义涂写在上面。他们把一切事情都诉诸革命组织，视组织为他们的父母，年轻人没有过去，他们被寄希望能够带头把柬埔寨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动员人民走向独立、自主和自立。相比于很多上年纪人心中的惊慌和迷茫，这些经常诉诸暴力的年轻人成为革命的先锋。

1975—1976 民柬的执政

民柬时期的柬埔寨根据地区和时间的不同各有特色。基本上来说，那些被柬共控制时间最长的地区往往配有最好的设备去完成党分配的任务，给新人提供最好的住宿条件。东部、东北和西南地区的干部要比西北地区更为训练有素。对于新人来说有些不走运的是，西北地区（主要是马德望和菩萨两省）在革命前就一直是最主要的粮食产区。正因如此，1976年初，数十万名新人被赶到西北地区。当地政权分配的粮食余粮任务要比其他地方更为繁重，新人承受的痛苦也就更重。②

柬共把全国分为7个大区（*phumipheak*），继而把7个大区分成32个行政小区（*dombon*）。总体而言，在整个1976年，东北和东部大区
259 的条件相对还能忍受，西南、中部和西部大区就有些糟糕，条件最恶

① 1987年4月作者采访一位曾经的土木工程师。还见 David Chandler, Muy Hong Lim, and Ben Kiernan, *The Early Phases of Liberation in Cambodia: Conversations with Peang Sophy* (Clayton, Australia, 1976)。

② 见 Michael Vickery, *Cambodia 1975 – 1982* (Boston, 1983), pp. 64 – 188。维克里关于民柬时期时空变化的发现得到其他学者和我在20世纪80、90年代采访的证实。

劣的是东北和西北大区。在同一大区内部也有很大的不同，反映出领导层、资源和外部因素的区别，例如1977年中的对越战争就发生在东部大区的最东地方和西南大区。①

在哪儿生活都很困难。在民柬时期，就全国范围估计大约有200万人——每4个人中有一人——死于民柬的政策和行动。包括劳累致死、生病没有救治或误诊而死和缺少足够生存的食物而饿死。大约有40万人被作为革命敌人杀害，他们中大多数是死在各省监狱中。如果平均计算，考虑到民柬统治时间之短，由某一政权造成的死亡人数也是世界历史上的最高纪录之一。如此大规模的死亡人数 260
是否已构成联合国对种族灭绝的规定一直以来激烈争论。那些赞成适用种族灭绝概念的人认为柬埔寨的案例同亚美尼亚和卢旺达发生的大屠杀行为非常类似。那些反对适用种族灭绝的人认为在民柬的日程中种族主义动机（除了在1978年有体系的屠杀越南居民和一些地方屠杀占族穆斯林）要远低于消灭政治敌人的动机，而这类受害者在联合国关于种族灭绝的界定中被有意疏漏了。对于这些批评，反人类罪要比备受争议和有些误导的种族灭绝罪行更为适合柬埔寨发生的事情。②

民柬时期可以分为4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占领金边持续到1976年初民主柬埔寨正式出现，颁布新宪法，启动新一轮移民潮（从人口稠密但农业欠发达的中部和西南地区迁向稻米产量丰硕的西北地区）。西南区很早就得以解放，这里有很多革命基地。这里挤满了从金边逃来的难民。西北区大多数地方恰恰相反，一直受高棉共和国军的控制，直到1975年4月。新政权指望此地能够带头扩大柬埔寨的大米生产，

---

① 见 Timothy Carney, "The Organization of Power", 载 Jackson, *Cambodia 1975 - 1978*, pp. 79 - 107; John Marston, "Khmer Rouge Songs", *Crossroads* 16/1 (2002): 100 - 12。

② 见 Ben Kiernan (ed.), *Genocide and Democracy in Cambodia: The Khmer Rouge, the United Nations,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New Haven, 1993); Patrick Heuveline, " 'Between One and Three Million': Towards the Demographic Reconstruction of a Decade of Cambodian History (1970 - 1979)", *Population Studies*, VoL 52 (1998): 49 - 65。又见 Steve Heder, "Racism, Marxism, Labeling and Genocide in Ben Kiernan's *The Pol Pot Regime*"。

而新人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工具。他们被视为不可救药的人，这成为他们的优势，因为新政权毫不在意他们的生死。很多幸存者都回想起一句冷酷格言，他们经常听到的一句话，“留着你也没有好处，失去你也没有损失”。[①]

在这一时期，金边广播电台通过匿名发言人和革命歌曲命令人们“建设和保卫”柬埔寨，反对国内外不知名字的敌人和叛国者，这让人联想到毛泽东时期中国的模式。考虑到1979年民柬政权就垮台了，这些发言充满着一种强烈的乐观情绪，但在革命初期阶段，很多柬埔寨人似乎都相信革命将会取得成功。而且，从党的领导人角度看，无论是真正还是假想的敌人都还没有浮现。

261 第二阶段到1976年9月底，民柬政权达到顶峰，虽然农村大多数地区生活条件日益恶化。我们不清楚为什么柬共领导人等了这么长时间才公开露面。他们无须公开自己的身份，用了差不多一年半的时间就控制了全国人口。或许通过隐埋姓名他们感到安全。中国持续拥护西哈努克可能也是柬共推迟公开掌权的一个因素。中国总理周恩来是西哈努克亲王最重要的保护人，他在1976年1月去世后，柬共领导人准备扫除西哈努克，迫使他从国家元首位置上退休。1976年3月一份柬共秘密文件称“西哈努克已经体力不支，不能继续前进，因此我们决定让他退休”。[②] 三天后西哈努克辞职。在金边电台广播的报道中，可能主要是给外国人听，政府提供给西哈努克一笔退休金，并为他树立一座纪念碑，但退休金从未支付，纪念碑也未树立。从1976年4月开始，西哈努克同妻子和儿子西哈莫尼（2004年西哈努克退休后成为柬埔寨国王）一直生活在皇宫地区的一座别墅中，由警卫看管。西哈努克在此生活虽然相对舒适，但却为自己的性命提心吊胆，直到1979年1月作为民柬政府的外交使节派往联合国。1976年3月民柬文件强调新政府“必须是纯洁的党组织”，并任命“波尔布特同志”（桑洛沙

---

① 见 Henri Locard (ed. and tr.), *Pol Pot's Little Red Book: The Sayings of Angkar* (Chiangmai, 2004), p. 210。

② Norodom Sihanouk, *Prisonnier des khmers rouges* (Paris, 1986), pp. 87 – 110.

的假名，他自己从未确认过）担任政府总理。

1976 年 1 月颁布民主柬埔寨宪法，宪法没有对人权做出保障，只规定了少数政府机关，实际上，该宪法取消私有财产、有组织的宗教信仰和家庭式的农业生产。宪法不承认任何外国模式，否认同外国结盟和获得国外援助，对柬共和马列主义思想只字不提。相反，它让这次革命听起来像是柬埔寨自己特有的事情，跟外部世界没有任何关系。①

3 月举行国民议会选举，柬共候选人全票当选。柬共中央委员会 262
成员全部当选，他们都是农民、橡胶工人等以及其他难以确认身份的人。毋庸置疑，波尔布特是“东部大区橡胶工人”的代表。候选人没有地域之分，而是作为高棉人某一阶级的代表。新人不能被提名，也没有资格投票，因而柬埔寨很多地方似乎都没有举行选举。议会只召开过一次，为了批准宪法，此后在民柬时期再没发挥作用。跟选举本身一样，召开国民议会似乎就是为了安抚国外舆论。

在新政府中占据显著位置的人，有从法国学习的知识分子，包括波尔布特、英萨利、英萨利的妻子英蒂迪（Ieng Thirith）、符宁（Hu Nim）、乔森潘、Thiounn Thioenn 和宋先；老印支共产党成员像农谢、涅罗（Nhek Ros）、朱杰（Chou Chet）、嫩顺（Non Suon）、塔莫（Ta Mok）和绍平（Sao Phim）；还有一些年轻的好战分子，他们从未离开过柬埔寨，如文韦、克宾（Khek Pen）和 Chhim Samauk。那些大区负责人没有一个是从法国留学回来的；这些留学人员集中在金边的新成立的各个部委中。

四年计划

此后数月里，波尔布特和他的同事起草了一份“旨在各领域建成社会主义”的四年经济计划。1976 年 9 月计划开始实施，不过没有举

① 关于这部宪法的文本见 Ponchaud, *Cambodia Year Zero*, pp. 199 - 206。还见 David P. Chandler, “The Consritution of Democratic Kampuchea: The Semantics of Revolutionary Change”, *PA*, Vol. 49, No. 3 (Fall1976): 506 - 15。

行正式启动仪式。政府号召对所有私有财产实行集体化，不断提高全国稻米产量，建议全国平均每公顷产量达到3吨。即便在条件不很差、还有金钱刺激的情况下，革命前全国平均值还不到每公顷收成1吨，属于东南亚地区产量最低的国家之一。现在将均产提高至原来的3倍，柬共为实现这一目标主要靠大范围的水利灌溉，扩大2—3倍的种植面积，延长耕作时间，以及激发民众的革命热情，他们认为这种热情源于民众从被剥削中和狭隘的个人利益关注中获得解放。计划仓促写成，
263 并没有考虑这些目标是否适应具体地区的土壤和水资源条件，也没有考虑实现这些目标的基础设施是否完备。相反，这一计划号召在全国范围内人人要"竭尽全力、暴风骤雨式的展开攻势"。一些编写者将这一计划与20世纪20年代初苏联所谓的战时共产主义相媲美；还有人把民柬的政策比作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大跃进"。计划中不提供任何物质奖励，除了一个荒唐的承诺，即到1980年时每个人每天都可以享受到甜点！柬共认为柬埔寨新成立的独立政权、穷人翻身掌权和剥削现象的消除就是足够的刺激和奖励。①

根据这一计划，像棉花、黄麻、橡胶、椰子、糖和木丝绵等作物都用于出口。出口赚来的钱用于发展轻工业，最后是重工业。后者在柬埔寨尤其不现实，因为重工业需要铁、钢和石油等原材料，民柬当时是没有这些原材料的。柬埔寨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在其海域中发现石油储存。

一位不具姓名的发言人，推断可能就是波尔布特，在向党内其他高级党员说明这一计划时，表示该计划会迅速完成。毕竟，民柬革命"对于整个世界来说是一次全新、重要的尝试，因为我们不效仿他人。我们跨过社会主义革命，迅速建成社会主义制度。我们不需要一段长

① 关于四年计划的文本见 Chandler, Kiernan, and Chanthou Boua, *Pol Pot Plans the Future* (New Haven, 1988), pp. 36 - 118。关于民柬经济见 Charles Twining, "The Economy", 载 Jackson, *Cambodia 1975 - 1978*, pp. 109 - 50; Marie Martin, *Le mal cambodgien* (Paris, 1989), pp. 156 - 202。

期过渡期"。①

计划没有谈及休闲、宗教、正规教育或家庭生活。虽然该计划认为"消除文盲"至关重要，但没有说明什么样的人能够接受教育或什么样的人可以读书。到 1976 年时，在根据地还存在一些小学，但在 1977 年或 1978 年前教育还不能惠及新人和他们的子女。在 1978 年之前小学程度以上的教育根本不存在，1978 年时才尝试在金边建立一所技术高中。很多有教师经验和敌视柬共的人都被怀疑有叛逆企图，经常作为阶级敌人被杀害，因此，民柬官员在一定程度上把本应必须办的教育当作善事来做。像波尔布特、英萨利等柬共党员，以前也是老 264
师，现在有更值得他们做的任务去完成。

民柬时期多数柬埔寨人不得不一天工作 10—12 个小时、一年 12 个月，以完成计划指标。许多不适合做体力劳动的人很快就死于营养不良和劳累过度，即便那些革命前就是农民的人也感到要比 1975 年之前工作时间更久、强度更大，还没有物质奖励，限制接触自己的配偶和子女，以及非常有限的自由时间。到 1976 年初，食物匮乏，因为第一次收获后的余粮全被征走，用于供给军队、储存或出口。1977—1978 年形势更为恶化，很多地方遭受饥荒困扰。很多幸存者回想起那段岁月只有大米稀粥充饥。其中一位现在生活在澳大利亚的幸存者说："我们看起来像在电视中看到的非洲难民。我们的腿像根木棍；我们几乎不能走路。"②

20 世纪 60 年代初中国"大跃进"之初也遭受过类似的饥荒。在柬埔寨，饥荒的消息过了很长时间才传到金边的领导人那里。领导人认为饥荒是那些负责分发食物的干部疏于管理和背叛造成的。这些人很快遭到逮捕、审讯以致处死，他们中很多人都是柬共的忠诚党员。民柬领导人似乎相信他们动员起来打败美国人——比越南早两周取得

① Chandler, Kiernan, and Boua, *Pol Pot Plans the Future*, p. 36.

② 1988 年 3 月，作者在墨尔本对原佛教僧侣的采访。

这样的胜利——的武装队伍是可以胜任英明柬共交给的任何任务。①

在民柬第二阶段期间，缺乏经验的柬共干部为了达到中央设定的目标，就给他们所管理的“4月17日人”和其他人施以通常难以承受的压力。为了实现粮食有余粮，办法之一就是削减用作种子和食物的大米数量。每人的粮食配给足够人生存，有些地方的人在1976年的多数时间里都有足够吃的。然而，在西北很多地方，因为中央实施不切实际的优先目标，定额配给大幅减少。1976年初，几十万“新人”被
265 赶到此地，其中很多人被派往开垦丛林。数千人因得不到西药治疗而死于疟疾、劳累过度和营养不良。

党内危机

1976年9月初，毛泽东在柬共庆祝成立25周年前不久逝世。波尔布特在评论毛的逝世时第一次公开表示柬埔寨遵循马列主义思想。他差一点就确认“革命组织”为柬共。柬共很有可能打算在9月30日25周年纪念日时向世界宣布自己的存在，并正式启动四年计划。然而，一个月过后，柬共内部出现分裂，一派人主张1951年柬共正式建立，另一派人主张1960年柬共成立，当时在金边召开一次特别会议，波尔布特和英萨利被提名当选为中央委员。在那些喜欢把1960年当作党的成立日的人看来，之前的日期有越南人主宰柬共的嫌疑。他们把那些支持1951年说的人视为忠于越南。波尔布特后来镇压了一次据称是反对他统治的潜在政变，这次镇压很可能是对一些党员先发制人的清洗，他们对党（或者是越南）的忠诚远高于对波尔布特的忠诚。②

---

① 民柬官员借用中国的术语称自己的经济计划是“大跃进”[*maha lout ploh*]。很可能我们永远不会知道20世纪70年代波尔布特和他的同事是否已经知道中国的大跃进已经失败；见 William Joseph, “A Tragedy of Good Intentions: Post-Mao Views of the Great Leap Forward”, *Modern China*, Vol. 12, No. 4 (October 1986): 419-57。

② 有关1951/1960的争论，见 Chandler, Kiernan, and Boua, *Pol Pot Plans the Future*, pp. 164-76; David Chandler, “Revising the Past in Democratic Kampuchea: When was the Birthday of the Party?” 载 David Chandler, *Facing the Cambodian Past* (Chiangmai, 1996), pp. 215-32。

柬共两名领导人，乔密和嫩顺遭逮捕，被控犯有叛变罪名，他们都与越南主导柬共的那段历史有密切关系。他们在认罪书中声称支持把 1951 年作为柬共成立日。[1]

总共有数千份打印和手写的认罪书从位于金边郊区多斯楞（Tuol Sleng）的民柬审讯中心保存下来，这个审讯中心在民柬时期以代号 S－21闻名。从 1975 年底到 1979 年初，至少有 1.4 万人在此被审讯、受刑和处决，有关他们的4000 份卷宗保留下来。有些长达几百页。这些供认书对于历史学家来说是无价之宝，但是单靠这些文件不可能确 266
认当时是否存在旨在将波尔布特及其同伙赶下台的阴谋。同西哈努克和朗诺一样，波尔布特把所有不认同他政策的人都等同于叛国，有关建党年份的争论提醒他有些人想把他赶下台。[2]

9 月底，还有 4 天就是柬共成立周年庆祝日的时候，波尔布特突然“以健康原因”辞去总理职务，代之以党内第二号人物农谢。在此前一年半的时间里，波尔布特的身体状况一直不好，他在此时宣布辞职很可能是意在打破均势，吸引对手暴露。其实，他并没有真正辞职。到 10 月中旬，他又重新担任总理职务。11 月，中国逮捕四人帮后，波尔布特和 5 名同事秘密访问中国，确保能够继续得到中国的支持。到 1978 年时，中国提供的援助包括派出两支工程队帮助建设磅清扬省附近的军用机场。这一援助项目很可能是在那时达成的。[3]

然而，直到这时领导层仍然没有公开柬共的存在，他们决定将此事暂时保密，推迟正式推出四年计划，并抓紧查找党内敌人。与此同

---

① 见 David Chandler, *Voices from S－21: Terror and History in Pol Pot's Secret Prison* (Berkeley, 1999), pp. 57－62。

② 关于这一机构见 Chandler, *Voices from S－21*, passim; Anthony Barnett, Ben Kiernan, and Chanthou Boua, “Bureaucracy of Death: Documents from Inside Pol Pot's Torture Machine”, *New Statesman*, May 2, 1980。还见 Douglas Niven and Chris Riley (eds.), *Killing Fields* (Santa Fe, N. M., 1996); Rachel Hughes, “The Abject Artifacts of Memory: Photographs from the Cambodian Genocide”,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25 (2003): 123－44。

③ Chandler, *Voices from S－21*, p. 57. 关于波尔布特对中国的访问，其他地方没有报道，见 Short, *Pol Pot*, p. 362。具有讽刺性的是，这个一直未建成的飞机场就在 1925 年巴尔代被杀的村庄附近。数百高棉工人在此死于因处置失当引起的爆炸和过度劳作（Henri Locard，个人信件）。

时，S－21 集中营扩大行动。1975 年时只有 200 名犯人送到此地，但是到 1976 年就有超过 10 倍的人（2250）被关到该地，其中超过 2/3 的人是在 9—11 月间囚禁于此的，正是上面谈到的柬共内部不稳定的时期。1977 年另外 5000 犯人被因于此，1978 年又关了大约同样数字的犯人。金边的工人知道审讯中心的存在，但对于铁丝墙里面的情况就不得而知了，他们称其为“进去了就出不来的地方”。只有 12 个人带到此地审讯而免于被处死。①

1976 年 12 月，党内清洗活动进一步强化，波尔布特主持召开仅
267 限于党内高级成员参加的“学习会议”，号召在党内对柬埔寨革命的进程进行检查。波尔布特在这次会议的讲话流传下来，他把当前局势说得比当年早些时候更为黑暗和悲观。其中有一段话，他形象地说在 1976 年间“党的肌体已经生病了”：

> 我们不能准确确定发病位置，但它一定会冒出来被我们发现的。因为（在前一阶段的革命中）群众斗争和阶级斗争的热度还不够……所以我们没能成功找到党内的病菌。它们被掩盖起来了。然而，随着我们社会主义革命的推进，会渗透到党内、军内和群众间的每一个角落，我们就能确定病菌的位置……那些保卫我党的人要讲究技巧。他们应该熟练运用监视。他们必须监视一切事物，但是不要让被监视者觉察。②

268 谁是监视的人，谁是被监视的人？柬共领导层的政策和偏好不断演变，这决定着哪些反对革命的人成为打击目标。在民柬短暂历史中的各个阶段，所谓“罪恶的病菌”包括那些具有中产阶级背景的人、曾为朗诺打仗的士兵、在越南领导时期参加柬共运的人，以及那些同国外有关系的人。1977 年柬共高层又将注意力转移到发生饥荒的北部

① 同上，pp. 35－36。还见 Vann Nath, *A Cambodian Prison Portrait: One Year in the Khmer Rouge's S－21* (Bangkok, 1998)。

② 见 Chandler, Kiernan, and Boua, *Pol Pot Plans the Future*, p. 183。



1979 年泰柬边境上的民柬干部（图片提供：布赖恩·L. 史蒂文斯）

和西北大区，到 1978 年遭迫害的人扩大到一些党内高官、军队指挥员和东区官员。只要在 3 个人的认罪书中被提到名字，就会被列为嫌疑对象。那些受指控的人又会提到他们认识的人的名字，如此继续下去。那些被带到 S－21 集中营的人中，数百人甚至可能数千人都是无辜的，但是严刑逼供后他们都会认罪，几乎所有受审问的人都被杀害了。为了维护党内稳定，被抓的人常以失踪形式通报，而他们的死亡和集中营的存在从不公开。当局从未对冤死的人表示后悔。对于波尔布特和他的同事来说，他们更关心革命的成功、政策执行情况以及自身的安全，以至于在打击党的敌人方面决不能犹豫。1976 年 12 月底，波尔布特在一次演讲中称，敌人“接连不断地进入党内……他们可能只有一两个人，但是他们确实存在”。[①]

像这些冷酷而又模糊的威胁对那些收听演讲的人带来什么后果，

① 同上，p. 185。

他们不可能清楚。在一年时间里，很多人在 S－21 集中营被逮捕、审讯、受刑和处死。很多情况都是他们被逼承认早期曾加入“美国中央情报局”（秘密从事反革命活动）。其他人承认曾为苏联和越南情报机关工作。我们不清楚波尔布特和 S－21 集中营逼迫人们认罪的干部是否相信这些阴谋或者仅仅是借口处决那些有嫌疑的实权人物。[①]

柬越冲突

269 从 1976 年 9 月的政治危机到 12 个月之后波尔布特的讲话（他在讲话中承认柬共的存在）是民柬时期的第三阶段，这一时期的特征是一波又一波的政治清洗和领导层越来越将柬埔寨的困难与反革命活动归到越南头上。自从 1975 年 4 月以来，柬越之间爆发公开冲突的可能性就越来越大，当时柬埔寨军队袭击了泰国湾中越南人控制的几个岛屿，希望能够在越战最后阶段有领土收获。柬埔寨军队被击退，两个共产党政权之间的分歧被临时掩盖下来，但是对于越南人的领土企图民柬还有深深的怀疑。波尔布特也对越共有很深的疑虑，多年来越共领导人一直资助柬共，柬埔寨武装斗争的发展也一直笼罩在越南的阴影下。1977 年 7 月越南同老挝签署合作协议，波尔布特的疑虑进一步加深，他认为这是越南包围柬埔寨、重新构筑和控制曾经的法属印支联邦计划的一部分。[②]

然而，波尔布特意识到两国力量的差距，起先还努力维持两国恰当的关系，不愿为预防越南人可能的入侵扩充柬埔寨东部的民柬军队。越南人从近三十年的战争中刚刚恢复，同样非常谨慎。1975—1976 年间，越南多次提出就边界问题同柬埔寨谈判，但遭到柬埔寨人的拒绝，

---

① “The Last Plan”，载 Jackson，*Cambodia 1975－1978*，pp. 299－314。这篇文献保护革命后继续阶级斗争的思想，与“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领导人的观点有相同之处。见 Andrew Walder，“Cultural Revolution Radicalism：Variations on a Stalinist Theme”，载 William Joseph et al.（eds.），*New Perspectives o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Cambridge，Mass.，1991），pp. 41－62；又见 Chandler，*Voices from S－21*，pp. 44－76。

② 见 Nayan Chanda，*Brother Enemy*（New York，1986），pp. 94－96，109－10。关于柬埔寨最近确认石油储量，见第 13 章。

他们要求越南人遵守 60 年代同西哈努克达成的口头协议。柬埔寨人对泰国湾提出部分领土要求，希望能够从刚被发现还未开采的石油储藏中获利，但这遭到越南人的拒绝，他们也有类似的打算。1976 年，边界两侧军队都配有重装备，又缺乏约束，经常发生小规模冲突，这让两国领导人都对对方的诚意产生怀疑。柬埔寨的袭击更加野蛮，不过 270
这与当时的情况有所矛盾，在 1977 年中期之前，军队都由中央控制，发动攻击要得到中央批准。①

此时形势更加复杂，波尔布特和他的同事认为在南越处于少数民族地位的柬埔寨人正准备推翻越南人的统治；他们企图把这些人纳入民柬范围。西哈努克和朗诺也曾梦想建立一个大柬埔寨。实际上，不管越南的高棉人有何想法，他们都没有足够装备、动机和组织能力发动起义。起义没有发生，波尔布特怀疑是他派去煽动起义的特工叛变。波尔布特的军队也非常残忍，由于越南高棉人没有按照他的意愿进行起义，在从 1977 年 4 月开始的跨境袭击中，这些高棉人只要碰到民柬军队，就会遭到屠杀。

柬埔寨现代史上经常是如此，本来是柬埔寨的内部事务或者是同邻国的争吵却未曾料到会在国际上产生反响。中国在毛泽东去世和"四人帮"被捕后数月里一度政局混乱。虽然激进分子"四人帮"被捕，但是新的领导人华国锋继续维持毛时期反苏态势，赞扬毛的观点，支持像民柬这样的第三世界革命。很多中国官员，包括华国锋的继任者邓小平，都把亲苏的越南视为中国南部边界的威胁——有些类似于当时美国对古巴的看法。对于中国人来说，柬埔寨是一个便利和激进的盟友。从 1977 年初开始，大量武器、弹药和军事装备从中国运到民柬。讽刺的是，中国要求民柬扮演的角色类似于民柬推翻的高棉共和国此前所扮演的角色，当时高棉共和国成为为美国利益服务的"仆

① 关于这次冲突见 Chanda, *Brother Enemy*, 以及 Grant Evans and Kelvin Rowley, *Red Brotherhood at War* (London, 1984; rev. ed., 1990)。

人”。[1]

这一阶段结束于1977年9月末，那天波尔布特在金边广播电台上做了5个小时的发言，在柬共成立17周年之日宣布它的存在。[2] 演讲没有解释为什么柬共存在的秘密保守了这么长时间，公开柬共的存在
271 可能是回应来自中国的施压，以换取持续的军事援助。就在演讲后的第二天，波尔布特就秘密飞赴北京，受到华国锋（一年前曾秘密见过波尔布特）的公开盛情款待。中国人向处于同越南对抗的柬埔寨提供了广泛帮助。他们比民柬领导人更加现实，不支持发动全面战争，他们知道如果爆发战争柬埔寨必然会失败，直到1978年波尔布特和越南人的不妥协态度才将中国推向支持战争的立场。[3]

波尔布特的长篇演讲含糊地向越南发出警告，但主要目的是评论柬埔寨历史轨迹，柬共胜利标志柬埔寨历史达到顶峰。演讲以编年体形式，分为1960年前、1960—1975年和民主柬埔寨的自身发展。他声称1960年党的会议标志着柬共确立“正确的路线”，但是因为武装斗争被推迟了八年多以及党的领导人不得不在1963年逃离金边，他从革命实践中没有找出多少源于该路线的成就。反西哈努克政变后，有了一些成就，但是波尔布特没有提及其中最重要的一点，越南人对红色高棉的军事援助。同样，西哈努克也未被提及。

演讲结尾，波尔布特强调“我们满怀信心，依靠人民的强大革命精神、经验和创造性”，也没有提及中国的军事援助。他乐观地预言柬埔寨人口很快会达到2000万（“我们的目标尽快增加人口”），宣称每人每年的平均食物摄入量超过300公斤。后来很多难民对这一点提出异议，指出到1977年中期，柬埔寨很多地方在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在饮食中没有大米。

---

① 见Chanda, *Brother Enemy*, pp. 255ff.，以及Evans and Rowley, *Red Brotherhood at War*, pp. 115ff。

② 1977年9月27日，波尔布特在金边奥林匹克体育馆发表演讲《柬埔寨共产党成立17周年万岁》，两天之后在FBIS广播。

③ 关于这次访问中国见Chandler, *Brother Number One*, pp. 137 - 38，借鉴了Chanda, *Brother Enemy*, pp. 100 - 2。还见Short, *Pol Pot*, pp. 375 - 76。

很可能是中国盟友鼓励波尔布特发表此次演讲，将柬共公开，鉴于与中国结盟的重要性，他很愿意遵从。

1977 年 9 月末，波尔布特开始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在北京机场，民柬代表团见到中国总理华国锋和邓小平（他在 1978 年取代华国锋）。这次访问可能标志着民柬发展到顶峰（至少对于波尔布特是这样）。柬埔寨代表团受到的热烈欢迎很可能让波尔布特相信如果柬埔 272
寨和越南之间爆发敌对战争，中国会支持民柬。实际上，中国支持民柬对越南采取敌视政策，但他们同样希望能够和平解决。[①]

民柬倒台

波尔布特访华期间，民柬同北京的联盟进一步加强，越南将其视为是挑衅，1977 年 12 月中旬发动一次对柬埔寨的军事进攻。越南以 14 个师的兵力深入柬埔寨国境 32 公里。1978 年第一个星期，在民柬断绝同越南外交关系后，大部分越军撤回国内，并带走数千名柬埔寨村民作为人质。越南人接着开始从人质中选择一些人作为柬埔寨流亡政府；对其他人进行军事训练。流亡政府中有一人原本是民柬军队地区指挥官，叫洪森（Hun Sen），他于 1977 年逃离柬埔寨，1985 年成为柬埔寨人民共和国的总理。除了 1992—1993 年联合国托管期间，他一直掌控着柬埔寨的政局。

波尔布特把越南人的撤退宣扬成是一次“全面胜利”，同时开始秘密清洗东区的军队指挥官和柬共党员干部，那里是越南人突入最深的地方。这些人被说成是身体是柬埔寨人但思想是越南人。几百人在多斯楞被处决，其他数百人现场观看行刑。[②] 很多来自东区的民柬士兵十分恐慌，逃至越南寻求避难。其中一个叫韩桑林（Heng Samrin）

---

① 有关洪森见 Harsh and Julie Mehta, *Hun Sen: Strong Man of Cambodia* (Singapore, 1999)，有点偶像化的研究。

② 关于东区的清洗见 Kiernan, *The Pol Pot Regime*, pp. 369 – 75, 405 – 11。1977 年 4 月，Margaret Slocomb 出色地让暹粒省的一场起义夭折，“Chikreng Rebellion: Coup and Its Aftermath in Democratic Kampuchea”,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6/1 (April 2006): 59 – 72，文中包括对幸存者的采访。

的人后来成为柬埔寨人民共和国的政府元首，在以后的政权中他一直是一个受尊敬但又不是很重要的人物。此外，在 1978 年初，东部数千人被强迁至西部地区。东部的当地军队遭到屠杀，代之以从西南地区调来的军队。东区主要负责人绍平，是一名 ICP 老兵，1976 年 6 月被
273 召至金边接受咨询时自杀。在东部的屠杀持续了数月。①

1978 年民柬政权试着向外界开放，以改善其在柬埔寨人民中的形象。采取的举措包括实行大赦和在金边建立一所技术高中。当局欢迎对民柬持同情立场的记者、外国激进分子和来自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的非共产党国家（如缅甸和马来西亚）人的访问。

这些行动产生混乱的后果。例如，1978 年一个南斯拉夫电视摄制组访问民柬，下半年该片向外界公开，展示了对当地人的生活和波尔布特的第一印象。后来其中一名摄像人员称摄制组在柬埔寨看到唯一笑的人是波尔布特。同情民柬的其他访问者都对所见到一切表示赞扬。他们被带去参观当局引以为傲的地方，他们所见的正符合他们此前的预期。

然而，在很多幸存者记忆中 1978 年是民柬最艰苦的一年，当时很多地方引进公社食堂，配给口粮比 1977 年饥荒时还低。

也是在这时，越南重启同民柬政府谈判的努力归于失败。到 1978 年 4 月，也就是波尔布特镇压东区敌人之前，约十万越军在越柬边界集结。越南同苏联签署了一份 25 年的友好条约以平衡来自中国的威胁，在 12 月初越南宣布柬埔寨救国民族救亡阵线政府已经在“获解放的柬埔寨领土”建立，以推翻民柬政府。该阵线包括数名后来的高棉政治领导人，如韩桑林、谢辛和洪森。②

越南和柬埔寨开始了一场长期高昂的战争，而他们的命运又掌握在大国手中。这些大国反而不愿意承担风险。这方面的证据，例如，波尔布特请求中国派遣志愿军，但这一请求遭到拒绝。民柬不得不独立面对越南人（为中国利益服务）。讽刺的是，民柬政权的最后日子

① Elizabeth Becker, *When the War Was Over* (New York, 1986), p. 389.

② Evan Gottesman, *Cambodia after the Khmer Rouge* (New Haven, 2003), pp. 7 – 8.

同朗诺政权惊人的相似。

1978 年 12 月，两名美国记者和一名苏格兰马克思主义学者马尔科姆·卡德威尔（Malcolm Caldwell）访问柬埔寨。两名记者伊丽莎白·贝克（Elizabeth Becker）和理查德·杜德曼（Richard Dudman）曾在 70 年代初在柬埔寨工作过，他们是第一个非社会主义作者访问民柬。 274

几年后贝克在回想起这次访问时，这样写道：

> 我看到金边的第一眼印象是像陵墓一样的美丽……街道上没有垃圾、碎屑和灰尘。但是也没有人，没有自行车和公共汽车，非常稀少的小轿车。①

卡德威尔曾经写过同情民柬政权的文章，这次被当作朋友邀请访问柬埔寨，但是贝克和杜德曼被当局视为为美国中情局工作，三人的行动受到严密监视。12 月 22 日，他们在柬埔寨的最后一晚，卡德威尔在酒店的房间内受到一些不明身份的人攻击而死，他们可能是与反波尔布特派系有关，急于破坏政权稳定。

1978 年圣诞节，超过十万越南军队从几条阵线向民柬发起进攻。因为民柬部队集中在东部和西南区，越军在东北区的进攻遭遇很小抵抗，到年底，通向金边的几条主干道都落在了越南人手中。越南人最初是要占领柬埔寨东半部分，此时他们改变战略，决定占领首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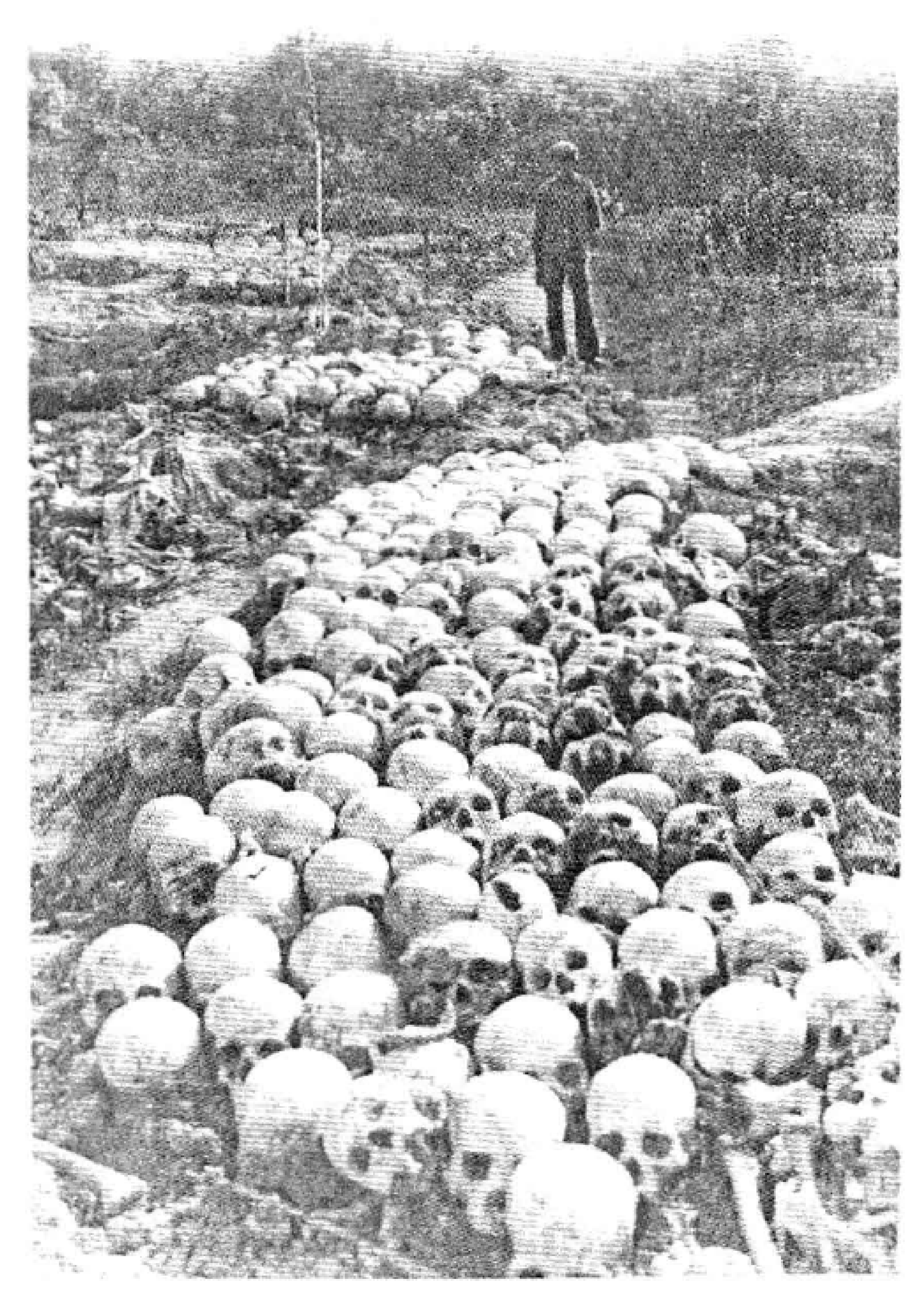
1979 年 1 月 7 日，柬共放弃金边，当时金边城内有大约五万名官员、士兵和工厂工人。直到最后时刻，民柬官员还自信会取得胜利。波尔布特像 1975 年的美国大使一样在最后时刻乘坐一辆吉普车逃离；其他高官和外交使节乘火车撤离。随后是剩下的残兵，徒步撤离，他

---

① 关于这次访问见 Becker, *When the War Was Over*, pp. 387 - 435, and Chandler, *Brother Number One*, pp. 153 - 55. Short, *Pol Pot*, pp. 394 - 95，文中说波尔布特认为 Dudman 是“一名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工”，是他杀死了 Caldwell。Short 自己认为最有可能的凶手是一支越南突击队。

们食不果腹、装备破败。①

民柬领导人及其乌托邦设想遭到耻辱的终结。对于自从 1975 年柬埔寨“解放”以来发生的骇人听闻的死亡人数，革命组织从未表示遗憾。即便是在民柬灭亡之后，一直到 90 年代，数以万计的高棉
275 人，尤其是年轻人仍然愿意为革命组织献出生命，该组织给予了他们权利和自尊。在 80 年代，他们中一些人成为红色高棉游击队的骨干力量。虽然清洗运动曾让他们失去热情，但柬共领导人（尽管或者也正是因为 1981 年柬共正式解散）仍居原职，指挥 80 年代和 90 年代的抵抗运动。②



1979 年在金边附近挖掘出的民柬杀人场地（图片提供：凯尔文·罗利）

几乎每个人都欢迎越南人的占领，接受由侵略者迅速组建的政府，要比此前的政府好。新政府自称是柬埔寨人民共和国（PRK），高层职务都是由 1977—1978 年间叛逃至越南的前柬共成员，也有一些在民柬时期生活在越南的高棉人。大部分柬埔寨人都对“阿布”（对“布特”

① 有关民柬政权最后的日子见 Short, *Pol Pot*, pp. 396 - 400。

② 有关 20 世纪 80 年代红色高棉的活动见 Christophe Peschoux, *Les ‘nouveaux’ khmers rouges: Enquête 1979 - 1990* (Paris, 1992)。

的蔑称，他们以这个名字称呼前总理）的失踪感到高兴。对于每个人来说，民柬时期是一段彻底充满迫害、暴力和迷茫的时期。幸运的是，大部分柬埔寨人认为他们能够在在流亡政府或者是柬埔寨人民共和国下恢复革命前的生活，民柬曾经对此予以蔑视。[1]

① 见 Kate Frieson, *The Impact of the Revolution on Khmer Peasants: 1970 – 1975* (Ann Arbor, Mich., 1992)，书中记录大部分农村柬埔寨人对 20 世纪 70 年代早期的革命压力漠不关心。又见 Frank Smith, *Interpretive Accounts of the Khmer Rouge Years: Personal Experience in Cambodian Peasant World View* (Madison, Wis., 1989)。

第13章　1979年后的柬埔寨

柬埔寨人民共和国（PRK）：早期阶段

277 1979年初，柬埔寨被一个外国列强所控制，这是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第一次。现在的形势让人想起19世纪30年代，当时控制柬埔寨的列强也是越南，但更类似于法国保护时期的最后几年，当时法国攫取柬埔寨的国防、国内安全和外交事务，没有几个关键领域（在柬埔寨人眼中）还留在柬埔寨人手中。

几乎是在占领金边的同时，越南人就扶植他们的傀儡建立起柬埔寨人民共和国。主要官员包括1978年投靠越南的民柬军官、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就生活在越南的柬埔寨人和没有为民柬政府做事这样污点的少数民族人员。最初领导团体中的几个人物——韩桑林、谢辛和洪森——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一直掌握大权。洪森在1985年成为政府总理（同时担任外长职务），逐渐掌握越来越大的权力。

新政府承诺尊重人权，包括言论和结社自由，但它对政治对手非常严厉，手法不亚于此前的几届政权。直到1981年政府才举行大选，但没有反对党参加竞选。柬埔寨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后仅一个月，就
278 同越南签署友好合作条约。这一举措，再加上当时的艰苦条件，让很多人相信如果移民到国外生活可能会好转起来。

越南占领柬埔寨并与苏联结盟激怒了中国人，后者在美国的默许下于 1979 年 2 月发动了一次对越南北部的军事进攻。中国调集 30 万军队参战，军事行动持续了两周。双方都有数千人阵亡，沿边界的一些越南城市成为废墟。中国人撤退后，越南没有改变对柬埔寨的政策（其实，中国对柬埔寨的政策也未改变）。中国对越自卫反击战的主要后果是数万华人逃离越南，加强了刚刚萌发的美中联盟。在美国的鼓励下，泰国也同中国结成类似联盟，这让渗入泰国境内的民柬残余部队受益，也让越南人更不愿意从柬埔寨撤军。像 1978 年的民柬领导人一样，越南领导人认为自己被敌人所包围。①

开始，几乎所有柬埔寨人都对越南人的到来表示欢迎，不是因为他们宁愿遭受侵略也不愿意自治，而是因为越南的入侵终结了民柬政府。越南入侵后，几乎所有柬埔寨人开始考虑迁移。在整个 1979 年及 1980 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数以万计的移民潮纵横交错，或投奔亲戚，或返回家乡，或从事贸易，或到海外避难。虽然越南军队追击民柬残余部队一直到西北部，但是政府并没有采取措施阻止这种缺乏组织的民众迁徙和贸易行业的非正式复兴。当柬埔寨人民共和国努力站起来时，很多革命前的制度，包括市场、佛教和小农经济，重焕生机。不久之后，佛教寺庙和学校重新开门。不过，新政权的自由放任政策并没有延伸到政治领域，政府和柬埔寨人民革命党（柬共的一个派别，1975 年从名誉扫地的柬共中分离出来）垄断着权力。②

在时局混乱期间，1979 年播种的水稻大部分都未受到很好的照料。到当年中期，一场饥荒席卷全国。很少有柬埔寨人留在家里种植 279
下一季的水稻，越南军队消耗或挪用了 1979 年之前储存的水稻，成千

① 最早对这一时期做出详细研究的是：Michael Vickery, *Kampuchea* (London, 1986)；对该政权做出全面分析，并尽量不掺杂个人感情因素的是：Evan Gottesman, *Cambodia after the Khmer Rouge* (New Haven, 2003)。又见 Margaret Slocomb,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Kampuchea: The Revolution after Pol Pot* (Chiangmai, 2004)。有关洪森，见 Harsh and Julie Mehta, *Hun Sen: Strong Man of Cambodia* (Singapore, 1999)。

② 见 Denise Affonço, *La digue des veuves* (Paris, 2005)；U Sam Oeur, *Crossing Three Wildernesses* (Minneapolis, 2005), pp. 281 – 302。

上万的高棉人粮食短缺。干旱加剧了饥荒。正在这时，柬埔寨受到西方国家的关注，西方国家的电视观众已经隐约意识到民柬统治的恐怖，他们看到骨瘦如柴的高棉人艰难地流亡到泰国，有的饿死在柬埔寨路边，非常震惊。苦难场面在西方掀起一场大规模的慈善募捐活动，但是从国外运来的食品和药品经常延误，这里既有官僚机构相互竞争方面的因素，也有泰国及其盟国的限制措施，一定程度上还有越南人自身因素，可以想象他们对西方国家的动机持怀疑态度，而且挪用部分援助食品药品给财政紧迫的军队和行政人员。①



1980年，一名柬埔寨妇女和越南士兵（图片提供：格兰特·伊文思）

1980年稻米丰收，比此前翻了一番，局势有所稳定。在农村地区，越南军队撤回营地，当地百姓能够再次管理自己的事务。农村社会还是一片荒凉。很多村庄被遗弃或摧毁；没有农具、种子和肥料；成千上万的百姓或者迁走或者被杀；很多地方幸存下来的人还饱受疟疾、惊吓和营养不良之苦。在民柬时期很多男人死亡或失踪，以至于在一些地区超过60%的家庭是寡妇当家。数千寡妇独自承担起养家重

① 有关这一时期的不同论述，见 William Shawcross, *The Quality of Mercy* (New York, 1984) passim; Michael Vickery, *Cambodia 1975 – 1982* (Boston, 1983), pp. 218ff.; Stephen Morris, *Why Vietnam Invaded Cambodia* (Stanford, 1999)。

任，非常艰难。为了应对这些状况，也是践行集体主义理念，新政府规定由数个家庭组成“团结组”（*krom sammaki*），作为一个集体单位耕种土地。私人产权不被认可，但在民柬时期就遭轻视的集体农庄和公社也未重新引用。区和省一级别的官员，尽量采用中央控制，但并不急于征税或征募青年男子服兵役。1979 年在全国范围内重办学校，1980 年货币重新流通。①

对于大多数柬埔寨人来说，重获一定程度的个人自由和新政权的去革命化色彩，同他们在民柬时期的经历形成鲜明反差。同时，他们 280
知道人民共和国政权的存在仰仗于外国的入侵和越南、苏联阵营的支持。很多中央高官和地方干部曾在民柬时期就幸运的担任过职务，还有一些受过教育的柬埔寨人觉察到从一种社会主义政权向另一种社会主义政权这种无益的过渡。不过，新政权官员拒绝脱离马列主义和一党统治。相反，他们更愿意妖魔化“波尔布特—英萨利种族灭绝集团”，把 1975—1979 年间的灾难算到这二人头上而不是极端但得到柬共认可的社会主义政策。1979 年 8 月，在金边对这两个恶魔进行缺席判决。在审判中很多关于民柬的重要证据浮现在世人面前，但在很多方面这次审判只是一场闹剧。在波尔布特和英萨利的辩护中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这二人被判处死刑。此后，越南人把民柬在多斯楞的审讯中心改成为种族灭绝博物馆。使用“种族灭绝”这个词，并把波尔布特比作希特勒，表明柬埔寨新政权极力把民柬说成是法西斯政府而不是共产党政府。②

---

① Gottesman, *Cambodia after the Khmer Rouge*, pp. 79 - 101.

② 关于这次审判见 Gottesman, *Cambodia after the Khmer Rouge*, pp. 60 - 65; Tom Fawthrop and Helen Jarvis, *Getting Away with Genocide*?（Sydney, 2005）pp. 40 - 52; Affonço, *Digue des veuves*, pp. 221 - 44。在这次审判中阿方科是一名很有口才的证人。法庭任命一名非洲裔美国共产党人作为英萨利和波尔布特的辩护律师，他在法庭上说：“我不会绕半个世界过来向罪恶表示赞成……很明显，波尔布特和英萨利是罪无可赦的疯狂魔鬼。” Howard J. de Nike et al.（eds.）, *Genocide in Cambodia: Documents from the Trial of Pol Pot and Ieng Sary*（Philadelphia, 2000）, p. 504. 又见 David Chandler, *Voices from S - 21*（Berkeley, 1999）, pp. 4 - 10; Charles McDermid, “Looking Back at the 1979 People's Revolutionary Tribunal”, *Phnom Penb Post*, January 16 - February 28, 2007，文中有对学者和审判中一些证人的采访。

反对柬埔寨人民共和国

281 柬埔寨人民共和国并不能得到受过教育的幸存精英的广泛信任。他们中大多数人不愿意将柬埔寨的命运交给外国人，也不愿意再忍受社会主义。1979—1980年间数万人流亡到泰国，最终在国外或沿泰柬边界涌现的难民营中找到容身之处。大量受过教育的人逃离国家，再加上民柬政府杀害的数万知识分子，这对柬埔寨是严重的打击。

到1979年底，借助难民营的保护，几支反越抵抗派系建立。其中最大的一支，由前总理宋双（Son Sann）领导，寻求外国支持，驱除越南占领军，恢复革命前的制度，但不包括西哈努克，他不信任西哈努克。这一派吸引了很多一直生活在海外但又思乡心切的柬埔寨人的支持，也得到刚刚来到边界的人的支持，20世纪70年代国家遭受的破坏和远看不到头的越南统治让这些人非常愤怒。然而，宋双不能建立一支有效的武装队伍，并且从越南的敌对国家（中国、泰国和美国）那几乎得不到物质支持。从军事角度，这些列强更愿意支持民柬。

同时，流亡中的民柬领导层保持未变。柬共继续像影子一样存在着，民柬代表团占据着柬埔寨在联合国中的席位。中国和美国支持这种状态，作为对越南入侵柬埔寨、抵制中国和打败美国的惩罚。新加坡和泰国也加入到他们的行列中，两国都奉行反共、亲中政策。对于这些大国来说，支持民柬只是为维持更重要的联盟不受损害而付出的微小代价。在1979年和1980年，泰国军政府向散落到泰国境内的几千民柬士兵提供食物、衣服和医疗，这些士兵也接到中国通过泰国港口海运来的武器、弹药等军事援助。到1982年，民柬残部发展成为一支相对有力的武装队伍。他们的家属被作为政治难民对待，得到联合
282 国机构提供的食物和住处。然而，因为柬埔寨人民共和国被排斥在联合国之外，联合国发展署被禁止在柬埔寨境内活动。①

---

① 西方对柬埔寨人民共和国相当漠视，见 Eva Mysliwiec, *Punishing the Poor: The International Isolation of Kampuchea* (Oxford, 1988)。

1980年与1981两年越来越多的关于民柬政府恐怖罪行的信息在柬埔寨出现。对波尔布特—英萨利进行审判时的证据得到难民证言、回忆录和在多斯楞找到的坦白书的确认和丰实。政府在1982年举办"仇恨日"，为民柬时期的幸存者提供告知他们经历的机会。民柬的发言人，只承认犯了一点错误，并指责越南人处死了超过200万高棉人。虽然柬政府的宣传经常有夸张和不准之嫌，但即便谨慎估计，在民柬时期因为劳累、饥饿、虐待病人和处决造成的死亡人数也接近200万，接近当时人口的1/4。①

中国和其他大国，为改善民柬的形象，同时也是要继续惩罚越南，开始向西哈努克亲王（他当时在北京流亡）施压，要他重返政坛。西哈努克只愿意在满足他的条件下才这么做。他不想同民柬重新结盟，害怕越南人，也知道宋双派别反对他回国掌权。但是，他很难抗拒中国的压力，也难以继续过隐退的生活，因为他的命运仍然与柬埔寨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在1981年和1982两年时间里，通过运作，西哈努克、宋双和民柬三方力量联合起来，同时柬政府同其越南顾问也在努力提升自身海外形象。1981年6月，一部在很大程度上模仿越南宪法的柬埔寨宪法草案公布。这部宪法草案赋予柬埔寨人民一系列权利，但是叮嘱要执行"国家的政治路线"。紧随着，一些新的政府部门建立，一直隐匿的柬埔寨人民革命党正式出现，选举国民议会批准宪法。柬政府的政策符合越南人所好，然而随着政府的不断扩大，一些具有职权的岗位逐渐落到不信仰社会主义的人手中。柬埔寨人民共和国一点一点地变成一个负有职责的功能型政府，其军事、警察和外交仍然由越南人控
制。在这一点上，有些类似于法国保护时期最后几年的柬埔寨。超过 283
10万越南军队仍然驻留在柬埔寨土地上。

---

① 最近试图对民柬时期死亡人数作出评估的见 P. Heuveline, " 'Between One and Three Million': Towards the Demographic Reconstruction of a Decade of Cambodian History (1970 - 1979)", *Population Studies*, Vol. 52 (1998): 49。又见 Craig Etcheson, *After the Killing Fields: Lessons of the Cambodian Genocide* (Westport, Conn., 2005), pp. 118 - 19。

民主柬埔寨联合政府

柬埔寨人民共和国的发展和民柬名声的扫地，促使外部列强急于在柬埔寨组建一个联合政府，以与他们的冷战政策保持一致。1981年初，西哈努克会见代表民柬的乔森潘，商讨怎样组建这样一个联合政府。宋双很不情愿地参加这一会谈，1981年9月三派势力宣布准备合作。不久，柬共中央委员会宣布柬共解散，该党改奉资本主义思想。英萨蒂发表谈话说，民柬已经完全改变，此外还恢复宗教信仰。她的丈夫英萨利补充说，柬埔寨在“很多代”之内不会实行社会主义。没人相信柬共解散，但是此举可以使得民主柬埔寨联合政府（CGDK）宣布是一个资本主义政府。所有的柬共高官，包括波尔布特和英萨利，都在联合政府内担任要职，非共产党分子没有担任任何实权职位。尽管转向了自由市场经济，但是在民柬控制地内要比其他派别控制地更为严格。不允许人们离开，军队指挥员就像20世纪70年代一样要出席每年的学习会议，来自中国的军事援助继续流向该派别。①

联合政府在1982年中期揭开面纱。为了展示它的领土基础，一些追随者和武装队伍前行几英里，跨过边境进入柬埔寨。民柬代表控制着联合政府的外交事务（对于一个流亡政府来说，外交是唯一有意义的部长职务），并占据在联合国中的席位。民柬的武装部队是三派中训练最好、数量最多和最为活跃的。西哈努克留在北京，受到中国人
284 的监督，宋双甚至很快就失去了有限的机动自由。接下来的10年，三派力量仍然互不信任，如果将来联合政府掌权他们对柬埔寨是如何设想的，三派力量的发言人没有做出承诺。在军事上，联合政府武装人员大约有4万人，作用有限。

1983—1985年间，越南和柬埔寨人民共和国军队将联合政府武装及其家属赶回泰国境内，并破坏了他们的营地。政府然后招募10万工

---

① 中国对民柬派别的援助估计每年大约有3千万美元，不过这方面的数字从未公开过。自从1956年以来，中国一直向历届柬埔寨政府提供大量援助，除1970—1975年和1979—1993年两个时期，当时中国支持反政府运动。

人沿边界布满地雷，封锁从泰国进入柬埔寨的路径。数千人死于疾病和地雷，然而这一工作从未停止。①

到1983年，越南人已经为柬埔寨人民共和国培养和训练出一支3万人的强大军队，以在他们撤出柬埔寨后能够担负起防务任务。开始时，募兵非常随意，享有特权的柬埔寨人，特别是人民革命干部的子女，经常能够免兵役。而且，这些人能够获得奖学金资助到国外学习。到1988年，大约五千名柬埔寨人在国外接受技术和学术培训，主要是在苏联、古巴和东欧。②

在80年代的最后几年里，柬埔寨陷入军事僵局，但在1989年越南军队撤出之后，联合政府军巩固了国内据点，民柬军队占领了盛产宝石的柬埔寨西北拜林一带。民柬军队无力或不愿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反政府力量从未控制任何大城镇。

尽管如此，在1990—1991年间，尤其是民柬军队对人民共和国构成严重威胁。民柬军队占据着西北和西南几处人口稀少的地方。他们在晚上袭击村庄，沿道路和稻田埋下杀伤性地雷，这些地雷迟早会爆炸，炸死缺乏警觉的人或炸掉他们的四肢。每周被地雷所伤亡而送进医院或诊所的有八九十人，据推测，还有数百名受害者没有得到治疗或被炸死。声称发起战争是为反对越南人，就像70年代朗诺政府所做的那样，现在却只杀高棉人。地雷造成的伤亡在90年代继续增加，直到国际非政府组织同高棉受训人员合作将雷场清理干净。

越南撤军

两个关键因素促使越南于1989年9月将最后的军队从柬埔寨撤 285
出。一是柬埔寨人民共和国——当年早些时候改名为柬埔寨国

① 见 Margaret Slocomb, "The K－5 Gamble: National Defense and Nation Building under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Kampuchea", *JSEAS* 32/2, (June 2001): 195－210; Gottesman, *Cambodia after the Khmer Rouge*, pp. 223－37。

② Gottesman, *Cambodia after the Khmer Rouge*, pp. 336－50. 20世纪90年代初有一本关于柬埔寨文化的有意思的论文集，见 May Ebihara, Carol Mortland, and Judy Ledgerwood (eds.), *Cambodian Culture Since 1975: Homeland and Exile* (Ithaca, N. Y., 1994)。

（SOC）——逐渐能够自力更生。另一个因素是来自苏联和苏联阵营的援助在 1989 年苏联和东欧发生危机后急剧削减。

越南撤退之前，柬埔寨政府推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受到人民的广泛欢迎，特别是在金边。这些改革包括修改国歌，更换国旗，修改宪法，将佛教作为柬埔寨国教，取消仅限中年高棉人才能出家当僧侣的法令。新法律还允许农民可以将土地所有权传给他们的子女，并且房产所有者能够自由买卖不动产。迫于对柬埔寨人权记录的批评，政府取消死刑。虽然人民革命党还控制着柬埔寨政坛，但在经济上自由市场和黑市兴盛起来，传统文化活动复兴，集体主义消亡。另一方面，柬埔寨政府保持未变。洪森自从 1985 年成为政府总理来，一直稳固着他的权力。[①]

关于佛教的新法规造成大量钱财用于在全国兴建佛教寺庙，在外流亡过的高棉人尤其乐于此道。取消对不动产的限制带来房产投机、修复和重建市场出现小的繁荣，当时很多金边家庭在政府的许可下占据着别墅，受到有关和平的传言和新外国援助即将到来的美好愿望的鼓舞，他们纷纷把别墅投入市场出售。在这段繁荣期，到金边参观访问的人注意到一小部分新精英集团出现，他们鲜明的特征是开着汽车，住着别墅，经常在餐厅或酒吧中表现出令人反感的举动。此时期的腐败问题没有像西哈努克或朗诺时期那么严重，但是人民革命党的干部
286 和政府高官经过这些年悄悄攫取了一些特权。他们中很多人进入商界，包括在泰国与柬埔寨西北之间进行秘密交易；其他人则能获得舒适的住房、汽车和其他额外补贴。

东欧的政治巨变和东南亚其他国家的经济繁荣，给予柬埔寨政府一定程度的机动空间，同样也对它的生存产生威胁。欧洲的变化使得柬埔寨不能再从共产党国家中获得援助，而经济景气促使商人和政府官员投入建筑行业或贩售国家财产和原材料，以期在短期内获得利润回报。木材、珠宝、干鱼及其他产品被非法出口到泰国和越南，政府

---

① Gottesman, *Cambodia after the Khmer Rouge*, pp. 316 – 35.

不能在这些非法贸易中获得财政收入，再加上外国援助的丧失，政府财政匮乏。另一方面，抵抗力量的生计需求却能得到联合国和外国援助的满足，他们没有多少官僚机构需要供养，也无需提供公共服务，尽享游击运动的优势。

就像以前一样，此时柬埔寨的很多问题仍然是由外界强加的。在 1989—1990 年间，很多分析人士认为如果外国势力对柬埔寨国政府和流亡政府的支持不发生大的变化，柬埔寨问题是不会得到解决的。1990 年 7 月，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克宣布美国不再支持民主柬埔寨联合政府在联合国中的代表席位。

贝克的举动促使中国缩小对民柬的资助，观察人士对柬埔寨问题出现外交突破的可能性变得乐观起来。有人希望联合国能够广泛参与到柬埔寨问题解决中，可以在即将举行的全国大选之前组建一个看守政权。

联合国过渡权力机构时期及之后

1991 年 10 月关于柬埔寨问题的国际会议在巴黎召开，此次会议的决议实现了人们的期望。根据在巴黎达成的协议，由现任政权代表
和 1981 年以来的反对派代表在金边组成临时政府。4 个派别联合组成 287
最高全国委员会（SNC），委员会由西哈努克亲王主持，他在流亡 12 年后于 1991 年 11 月短暂回到柬埔寨，在金边受到热烈欢迎。联合国代表现场监督最高全国委员会的决定。

巴黎协定恰巧在冷战结束时达成。协定要求各大国取消对柬埔寨各派的资助，柬埔寨在理论上成为一个不结盟国家，免于各大国为获得政治优势而竞争。然而，那些在金边握有实权的人占有优势地位，政治资源通常是流向现任者手中。

由联合国驻柬埔寨人员负责监督巴黎协定的实施，眼前的主要工作是解除各派武装并安排宿营地，遣返在泰国的难民回国，全国普选成立制宪大会。为了完成上述目标，联合国建立起多国参与的对柬埔寨保护机制。1992 年一年时间里，大约有 1.3 万名士兵和超过 7 千名

文职人员（包括警察）入驻柬埔寨。联合国的烦琐程序延误了招募人员和部署工作。联合国驻柬埔寨过渡权力机构（UNTAC）来得太迟、行动太慢以至于不能得到柬埔寨各方的尊重。1992年5月，红色高棉扩大控制领域，拒绝接受联合国的监督。作为应对，金边政权（SOC）也拒绝解除武装，并拒绝让联合国视察强大的国家警察机构的日常工作，虽然这种视察是巴黎协定的内容之一。[①]

联合国过渡权力机构开始缓慢执行着它那不切实际的使命，将来的困难可想而知。它的权限模棱两可，组建时间仓促，工作人员对柬埔寨知之甚少。到1993年10月过渡权力机构结束时，已经花费了二十多亿美元，是联合国历史上最昂贵的一次行动。工作人员高涨的薪水占了花费的一大部分。金边越来越拥挤、越来越繁华，但是在农村地区，经济仍然停滞。国家的基础设施仍然非常糟糕，安全状况也因
288 频发的政治谋杀而受损。红色高棉声称越南还秘密控制着柬埔寨，并在过渡时期屠杀了一百多名越南平民。金边政权的警察把目标指向反对政党的活跃分子。1992—1993年间，二百多名手无寸铁的人成为政治暗杀的受害者。没有人因此被捕或受审判。

积极方面的变化是，柬埔寨的媒体在过渡时期享受到前所未有的自由。当地人权组织也纷纷成立，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这些组织受到西哈努克的支持和联合国过渡权力机构中人权部门的援助，后者培训了数百名高棉族人权工作人员，调查了数百件案件。

从联合国过渡权力机构的角度看，这一时期的另两个积极变化，一是超过30万名柬埔寨难民从泰国和平遣返，二是举行全国选举（先是在联合国工作人员的指导下进行大范围选民登记，接着于1993年7月按计划举行选举）。同很多人的担心相反，选举虽然遭到红色高棉

① 关于联合国过渡权力机构见 Peter Bartu, "The 'Fifth Faction': The United Nations Intervention in Cambodia 1991 - 1993" (Ph. D. diss., Monash University, 1998); Michael Doyle et al. (eds.), *Keeping the Peace: Multi - Dimensional UN Operations in Cambodia and El Salvador* (Cambridge, 1997); Trevor Findlay, *Cambodia: The Legacy and Lessons of UNTAC* (New York, 1995); Steve Heder and Judy Ledgerwood (eds.), *Propaganda, Politics, and Violence in Cambodia in the UNTAC Period* (Armonk, N. Y., 1996)。

的抵制，但还是和平完成。超过 90% 的登记选民——至少 4 百万人——参加了柬埔寨自殖民时期以来最为自由、公平和保密的投票。选民所要传递的信息比较模糊。按首字母缩写为奉辛比克（FUNCIN-PEC）的王室党派（由西哈努克亲王的大儿子拉那烈领导）在制宪会议中比柬埔寨人民党（CPP，前身为柬埔寨人民革命党）多赢得 7 个席位。一个反共、反越政党占据剩余 11 个席位中的 10 个。

柬埔寨多数人投票反对一个握有军队的现政府，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不像过去很多柬埔寨选民，现在的选民敢于拒绝现状。他们所选的只有和平，这再清楚不过了。

不过，洪森和人民党拒绝接受败选结果。1993 年底，奉辛比克党和人民党勉强达成妥协，组建联合政府，两个首相分别为拉那烈亲王和洪森。内阁职位由制宪会议中的各党代表所瓜分。各省长官、防务、 289
警察和整个公务员队伍等日常政治权力都被人民党所掌握。很快奉辛比克党就在事务决策中丧失了发言权，政党的活动自由也受到很大限制。

柬埔寨新宪法恢复君主制，把西哈努克推到王位位置上（他在 1955 年放弃王位）。重新成为国王让这位 71 岁的君主和他妻子非常满意，他们急于清除自己一些不光彩的历史，重新树立为柬埔寨的正统统治者。不过，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剩余时间里，鉴于国王的健康状况，夫妇二人每年都在国外待很长一段时间。

1993 年的失败者除了投票反对政府的人民之外，就是红色高棉了。1994 年红色高棉被正式宣布为非法组织，数千追随者向政府投诚。而红色高棉的领导人仍然顽固不化，隐藏于丛林中，且身体状况良好。90 年代中期，红色高棉仍然领导着超过 5000 人的武装队伍。然而，随着 1994—1995 年间泰国支持的减少，投诚人数不断增加，红色高棉变得更为暴力，屠杀木材工人，绑架和杀害 6 名外国人，发起零星的军事攻击。此时零散的迹象表明红色高棉领导层在全国大选之后发生分裂，后来得到证实。一部分人愿意同金边当局达成临时性妥协，另一部分人妄图重新发起大范围的革命斗争。

红色高棉的终结

1996年8月，前民柬外交部长英萨利向金边政府投诚。他很快得到国王原谅，并允许他及数千追随者仍然留在拜林控制的地盘上。接下来几个月，国家军队吸收了几百名红色高棉士兵。此时，要求以反人类罪对红色高棉领导人进行审判的努力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可能一定程度上有来自外国的压力。[①]

290 此时，红色高棉进一步分裂。实际领导人是塔莫，一名残忍的军队指挥官。波尔布特因身体状况恶化，受到排挤，但在1997年6月，这位前独裁者为了重新掌握大权，命令暗杀了另一高级领导人也是他的亲密伙伴宋先，宋先被指责有叛变之心。包括宋先的子女和孙子都惨遭杀害，此举震惊了红色高棉的中层领导干部，他们推测自己或许是接下来的被杀对象。波尔布特担心被抓，逃离他的指挥部，但很快就被抓到并受到审判。美国记者纳特·塞耶（Nate Thayer）被邀请参加了这次审判，他将这一奇异的审判程序用电影胶片记录了下来。红色高棉残忍的司法系统曾经在民柬时期将数十万柬埔寨人判处死刑，而这次波尔布特却被判处终身监禁，他被带到一个两间的房屋中，受到警卫严密看管。[②]

1997年军事政变

与此同时，金边政权也遇到了自己的困难。1997年3月有人向举行和平游行的桑兰西（Sam Rainsy）支持者投掷了一枚手榴弹，造成20人死亡，另外，洪森将很多红色高棉的投诚者吸纳到国家军队中，

① 关于组建特别法庭的前期准备，见 David Chandler, "*Will There Be a Trial for the Khmer Rouge?*" *Ethics International Affairs*, 14 (1) (2000): 67 – 82, and Tom Fawthrop and Helen Jarvis, *Getting Away with Genocide: Elusive Justice and the Khmer Rouge Tribunal* (Sydney, 2004), pp. 155 – 88.

② 关于波尔布特的最后几年见 Chandler, *Brother Number One: A Political Biography of Pol Pot* (Boulder, Colo., 1999), pp. 178 – 88; Philip Short, *Pol Pot: The History of a Nightmare* (London, 2004), pp. 435 – 42。

实际上是他的私人卫队。这进一步加剧了人民党与奉辛比克党长期的紧张关系。忠于奉辛比克党的将军企图同塔莫领导的红色高棉进行合作谈判，没有成功。这激怒了洪森，1997 年 7 月，他发动了一次先发制人的政变，动用私人卫队向在金边的奉辛比克党部队和追随者进行攻击。行动中有 100 多名奉辛比克党官员和支持者被杀，还有一些人被捕并受到折磨。人民党的伤亡非常微小。伴随此次政变发生了大范围的掠夺事件。①

虽然政变的暴力程度不足为奇，但是从国际视角看，选择的时机却不好。一些援助国中止了援助。外国投资撤走。柬埔寨想成为东盟正式成员也被推迟。洪森用这种方式巩固他的统治，在过去似乎习以为常，但现在他却一度遭到国际社会的蔑视。援助国劝他在 1998 年届 291
时召开的国民议会举行一次自由公正的选举。

人民党和奉辛比克党都不想重复 1993 年的经历。人民党害怕再一次败选，而奉辛比克党和其他小党害怕受到新一轮暴力打击。虽然如此，双方为此次大选勉强进行了谈判，当时很多分析人士认为人民党将会取得压倒性胜利。

选举前的准备活动似乎证实了上述猜测。反对党不能使用电子媒体，也不允许他们在农村地区进行备选活动。反对党的工作人员经常受到骚扰，甚至一些人的死亡很值得怀疑。没有一位暴力行凶者受到司法审判。1998 年 3 月拉那烈亲王就在选举举行前不到 4 个月的时候回国，以出乎意料的热情准备竞选。桑兰西也是如此，他敢于攻击柬埔寨人民党，吸引到广泛的支持。

根据当地和国外的选举观察员的看法，选举本身是自由公正的。反对党派获得 60% 的投票支持，但是他们不愿意结成联盟，因而奉辛

① 见 Nick Cummins, *The 1997 Coup in Cambodia: The Prince, the Comrade and the Revolutionary* (Clayton, Australia, 2007)，其中有新颖准确的论述。此后的 9 年多时间里，我问过很多关于这次政变的问题，从没有人提到人民党的死亡情况。可能就没有人在此政变中死亡。2001 年，洪森否认下命令杀人，他告诉一名记者说，“如果我果真下命令杀奉新比克党官员……今天就不会有奉新比克党了。” Nayan Chanda, “The Ruler's Rules”,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10 May 2001.

比克党和人民党之间达成协议，再次联合治理国家。1998 年底，新政府有一个相对较好的开始。1999 年 4 月东盟欢迎柬埔寨成为其正式成员国，它是东南亚最后一个被接纳入该组织的国家。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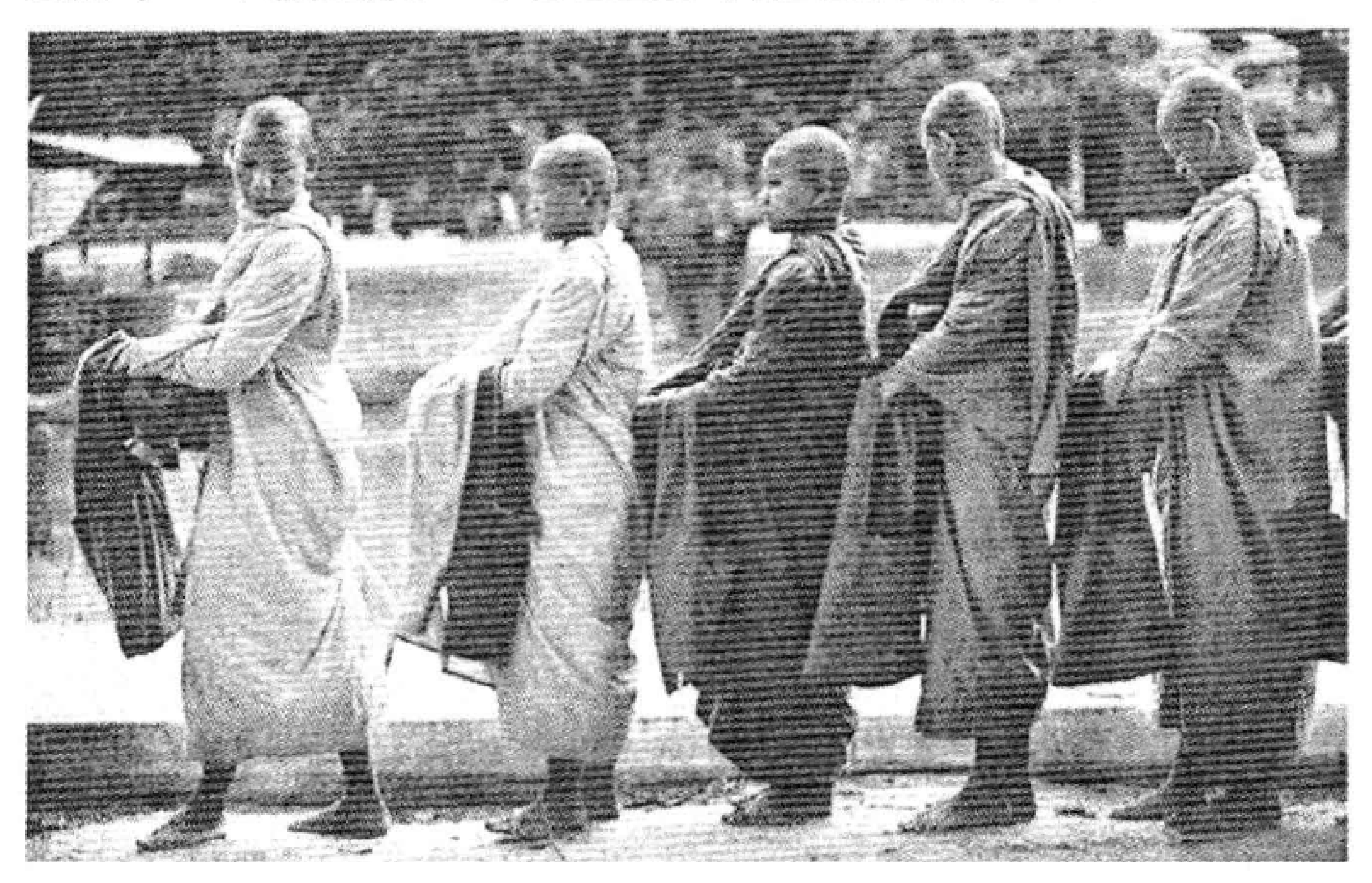
在很多分析人士看来，20 世纪末柬埔寨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状况让人不安。柬埔寨是东南亚地区中婴儿死亡率最高的国家。全国能够使用到清洁水的人口不到 1/3，2% 的成年人口感染了艾滋病毒。政府每年用于卫生医疗的资金只有 5%，而用于国防的高达 40%，大部分是用于供养庞大的军队，到 2003 年柬埔寨共有 10 万军队，其中 500 人是将军。外国捐助者和非政府组织虽然也公开表达对柬埔寨失去耐心，但是依旧继续对医疗、教育、社会福利和农村发展提供很多资金，
292 而柬埔寨人民想从这些领域中致富，机会很少。国民议会（通常是反对党成员）起草出反腐败法律，但在委员会中就胎死腹中，年复一年经历了好几次。教育系统水平低下，以至于全国文盲率高于 60 年代水平，超过 50%。暴力犯罪在革命前的年代还比较少见，现在却变得频发，军队经常毫无节制地采伐贩运木材，造成灾难性的生态后果。

比较积极的方面，1999 年是柬埔寨自 60 年代以来第一次处于和平状态。几十年来柬埔寨政府第一次不依靠一个居于支配地位的外国势力。相反，柬埔寨参与到东南亚事务中，冷战和柬埔寨独立以来的历届政权都曾对此疏远。尽管有洪森威权式的作风，但柬埔寨的印刷媒体相对没有限制，外国人权组织仍然可以在柬埔寨自由运作。柬埔寨服装业兴起，为三十多万名年轻妇女提供了就业机会，旅游业也繁荣起来，受二者带动，1998 年至 2006 年间柬埔寨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 6%。而另一方面，农村经济却增长缓慢。一个喜忧参半的
293 情况是，1979 年至 2006 年间柬埔寨人口增加了一倍，达到 1400 万，

---

① 关于 1998 年选举见 Sophie Richardson, *The July 1998 Cambodian National Election* (Washington, D. C., 1999); Caroline Hughes and Kim Sedara, *The Evolution of Democratic Process and Conflict Management in Cambodia: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ree Cambodian Elections* (Phnom Penh, 2004); Caroline Hughe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ambodia's Transition, 1991 - 2001* (London, 2003), pp. 67 - 76。

虽然每 10 个婴儿就有一个会在出生时或出生后不久死亡。



2003 年暹粒省的僧侣（图片提供：道格拉斯·奈尔文）

在新世纪的头几年里，洪森提升他强人形象，巧妙地巩固自己的权力。他随身都有重重保卫，得到军队、多数人民党成员和地方商业利益团体的支持，后者得到中国不附带任何条件的援助扶持。他在农村地区获得广泛支持，农村地区的救济网络很大程度上都是由人民党控制，他的慷慨大方（经常是由外国资助）像过去的西哈努克一样，在短时间内受到人们的阿谀逢迎。他那马拉松式的演讲和旺盛的精力，以及经常使用一些粗暴的语言，也为他带来支持。他也像西哈努克当政时那样蔑视议会程序，也漠视法治。在洪森主政下，没有官员因为腐败，或因被怀疑参与政治暗杀而受审。在其他方面，洪森是一名新型的国家领导人。不像以前的柬埔寨统治者，作为一名信徒他没有把时间花在佛教上。不像西哈努克、朗诺和波尔布特，他对柬埔寨的历史没有表现出多大兴趣，除了作为旅游收入的来源，2005 年有超过 100 万人到柬埔寨旅游，2006 年再次达到这一数字。或许是有他将自己现在的地位归功于越南人的缘故，他从不纵容一些反对派的反越种

族主义声音。最后，洪森在很大程度上靠自己努力获得现在的地位，他并不听从外国支持势力。可以说他是柬埔寨第一个真正的现代领导人。他想把柬埔寨变成一个繁荣的现代国家——像新加坡或许还有马来西亚那样——他的急切愿望显然是真诚的，但他没有能力或者是不愿意打击政府内的日益猖獗的腐败行为或者把国家收入从军队和其他既得利益者转向农村地区，这阻止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也让外国的长期投资者气馁。①

21 世纪的柬埔寨

2002 年，柬埔寨人民党赢得全国 2/3 的选区（全国共有超过 10
294 万个选区）。此时，洪森表示他愿意至少再领导柬埔寨 10 年。不过在 2003 年的国民议会选举（当地和外国观察员再次宣布大选自由公平）中，反对党仍然赢得大量选票，尤其是在金边和其他大的城镇。在这次选举中，参加投票的人比以前更少。选举结果是柬埔寨人民党增加了 5 席，奉辛比克党减少了 17 席，桑兰西党增加了 9 席。人民党未能达到宪法规定的有权组建政府的 2/3 多数席位。政治僵局持续数月，直到洪森和他同伙从中安排才组成新的人民党—奉辛比克党联合政府，拉那烈亲王受到排挤，人民党掌握实权。②

2003 年初，金边发生骚乱，毁坏了泰国大使馆，一些泰资企业也遭受严重损失。事件缘起是有传言说泰国一电视女演员在她的节目中主张吴哥窟“属于泰国”（后经证实消息失实），一些民众听到此传言后做出激烈反应。似乎这次骚乱得到洪森的暗中支持（警察和消防员的反应非常迟缓），而且那些与当权者有利益关系的驻金边的泰国和柬埔寨企业也卷入其中。柬埔寨迅速按泰国要求支付了 2000 万美元

---

① 更为严厉的评价见 Steve Heder, “Hun Sen's Consolidation: Death or the Beginning of Reform?” *Southeast Asian Affairs* 2005, pp. 113 – 30。Heder（从政治角度）把柬埔寨称为“充满附庸、腐败和压制的迷宫”（p. 114）。又见 Kheang Un, “Patronage Politics and Hybrid Democracy: Political Change in Cambodia, 1993 – 2003”, *Asian Perspective* 29/2（2005）: 203 – 30。

② Hughes and Sedara, *The Evolution of Democratic Process*, pp. 25 – 32. 大选之后的运作见 Heder, “Hun Sen's Consolidation,” pp. 115ff。

（大部分资金来源于柬埔寨人沿柬泰边界经营的赌场，这些赌场主要是迎合泰国赌客兴建的）作为赔偿，两国关系才得以恢复。这次骚乱表明特别是在柬埔寨的民族自尊心受到挑战的时候，暴乱民众能够在金边迅速组织起来；也表明政府能够迅速拿出大量资金来应付不期而遇的危机事件；还表明柬埔寨民众对泰国控制高棉经济情况的不满之情日益深入，尤其是在金边。[①]

2004 年 10 月，诺罗敦・西哈努克一方面由于身体状况恶化，另一方面也厌倦了这些年来同洪森之间的口舌之争，宣布退位。他的小儿子诺罗敦・西哈莫尼（Norodom Sihamoni）继任王位。西哈莫尼是一个温良恭谨的单身汉，多数时间是在国外度过的。一段时间，西哈莫尼的画像跟他父母的画像一起在公共建筑中悬挂，但是西哈努克不再参与王室仪式，并且几乎所有时间都是在北京度过。西哈莫尼没有孩子，洪森对王室仍持有戒心，这预示着可能在西哈努克去世之后柬 295
埔寨的君主制可能会终结。[②]

2004 年以来柬埔寨取得两个突出成就，一是在泰国湾的柬埔寨水域中发现大规模石油储存，二是经过多年的讨价还价后，终于于 2006 年在金边建立特别法庭起诉前红色高棉领导人。

海上石油探测开始于 2000 年，由美国雪佛龙—德士古公司主导，早在革命前时期该公司就做出了评估，耗费两千多万美元。2006 年雪佛龙宣布柬埔寨已经确认在其海域储有 7 亿桶石油和 1 千万立方米天然气。这还只是对该公司已经探测的部分水域做出的估测，实际存储量可能更为可观。从 2009 年或 2010 年开始，在之后至少 10 年里，油气资源会给柬埔寨每年带来 10 亿美元的财政收入。[③] 这一数字是柬埔

① Tin Maung Maung Tan, "Cambodia: Strong Man, Terrible Man, Invisible Man", *Southeast Asian Affairs* 2004, pp. 73 – 89, and Alexander Hinton, "Khmerness and the Thai 'Other': Violence, Discourse and Symbolism in the 2003 Anti – Thai Riots in Cambodia", *JSEAS* 37/5 (October 2006): 445 – 68.

② Heder, "Hun Sen's Consolidation", pp. 120ff.

③ 有关石油储量的内容见 Adam Piore, "Cash Strapped Cambodia Eyes Black Gold",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August 30, 2006。

寨 2006 年财政预算的两倍，也是柬埔寨每年接收外国援助的大约两倍。油田的发现是好事还是坏事还有待观察。这取决于政府如何花费这笔收入，特别是在今后一个时期里因为油田的发现，外国援助将会大幅降低。考虑到政府没有对旅游收入——特别是吴哥窟的门票收入——的使用给出解释，以及政府不愿意向富人征税以能够向医疗卫生、社会福利、基础设施和教育提供更多投入，因而很难预测政府会在多大程度上将石油收入用于农村贫困人口脱贫或改善全国人民的福利。

柬埔寨政府和联合国之间就建立国际法庭对红色高棉领导人进行起诉的谈判断断续续持续了近 10 年，终于在 2006 年年底达成协议。三年的工作就估计花费了 6000 万美元，几乎都是由外国援助提供。柬埔寨政府坚持法庭设在柬埔寨，有柬埔寨法官和律师同国际法官和律
296 师共同参与。尽管参与这一案件的柬埔寨法官经验缺乏，尽管一些国际观察者担心柬埔寨人会听从洪森（他一直拖延建立国际法庭之事，对此从未表现出很大的热情）的指示而不是表现出自己的独立性来，还是接受了柬埔寨政府的要求。2007 年年初，当所有程序问题解决之后，诉讼才迟迟开始。①

结论

二战至今的柬埔寨政治史，甚至可能在将来更长的一段时期内，在某种程度上是一部记载了相互竞争的外国势力及其代理人妥协、合作或共享权力最终走向失败的编年史。这种追求支配权的偏好深深植根于柬埔寨的历史中，这在其他东南亚国家中也很常见。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西哈努克亲王自恋式的统治风格促使后来取而

---

① 法庭称为柬埔寨法院特别法庭（ECCC）。见 Seth Mydans, "Proceedings to Open on Aged Chiefs of Khmer Rouge",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August 4, 2006。又见 Tom Fawthrop and Helen Jarvis, *Getting Away with Genocide? Elusive Justice and the Khmer Rouge Tribunal* (Sydney, 2005)；Steve Heder and Brian Tittemore, *Seven Candidates for Prosecution*, 2nd ed. (Phnom Penh, 2004)；John C. Ciorciari (ed.), *The Khmer Rouge Tribunal* (Phnom Penh, 2006)。

代之的竞争对手采取同样专横、不妥协和固执己见式的统治风格。作为另一种选择，多元主义理念或者是权力的和平过渡，在当时并不存在，在之后的 35 年历史中也没有发挥多少作用。

1970 年以后，西哈努克、朗诺和波尔布特都在为自己谋求绝对权力，甚至洪森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如此。在波尔布特时期采取一种全国仇杀的形式。他所坚持的列宁主义政治和所奉行的清洗政策比柬埔寨近代史上的任何事件造成的伤害更为严重，但这也体现出一个经久不衰的政治理念——赢者通吃。在越南保护时期，柬埔寨的政客更为谨慎（就像西哈努克在法国控制时期所表现的那样），但是在后过渡时期，这些当权者重新变得露骨、复仇、阴险和鲁莽。

在金边波尔布特的秘密集中营中，审讯者用"做政治"这个词来描述他们习以为常的工作——灌输、质问和折磨。对于之前和此后很多没有权利的柬埔寨人来说，政治就是有时被剥削有时被漠视的代名词。对于很多高棉人来说，政治已经主宰这个国家很长时间了，1993 年选举是解放自己的一次尝试。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以后的选举并没有改变现状。

虽然从一个柬埔寨人的视角研究柬埔寨的政治史会有很大成果， 297
本书也是试着从此视角进行，但是这个国家的地理位置、地形状况和人口统计上的弱势意味着它的历史经常同泰国、越南和优于它的政治实体纠缠在一起。这些国家继而凭借自己的实力规模，接连不断地扶持或吸收这一邻国。邻国越南在 19 世纪二三十年代曾建立起越南人主导的保护体制，泰国在过去几个世纪里也多次建立起事实上的保护体制。19 世纪 60 年代法国人松动了泰国对柬埔寨朝廷的控制，使柬埔寨脱离东南亚而成为印度支那的一部分，印度支那只不过是越南的代称。20 世纪四五十年代，柬埔寨人反法运动由越南人主导，并为他们的利益服务。后来的越南战争因美国的干预而加剧，这进一步限制了柬埔寨保持中立或控制东部疆界的能力。西哈努克知道他的国家将会卷入这场战争，而且绝不会成为一个胜利者。不像朗诺或波尔布特，他对柬埔寨的军事力量从没抱过幻想。

在1979年之前，任何柬埔寨政府都很难轻视同越南的结盟。西哈努克同越南共产党匆忙结成的友好关系就在西哈努克被推翻后瓦解了。受怨恨情绪的刺激，朗诺和波尔布特狠狠地报复越南，但这种反越军事行动注定会失败。1978年底，越南侵占柬埔寨，强行建立起保护体制，在某些方面让人回想起法国的殖民主义和19世纪30年代的情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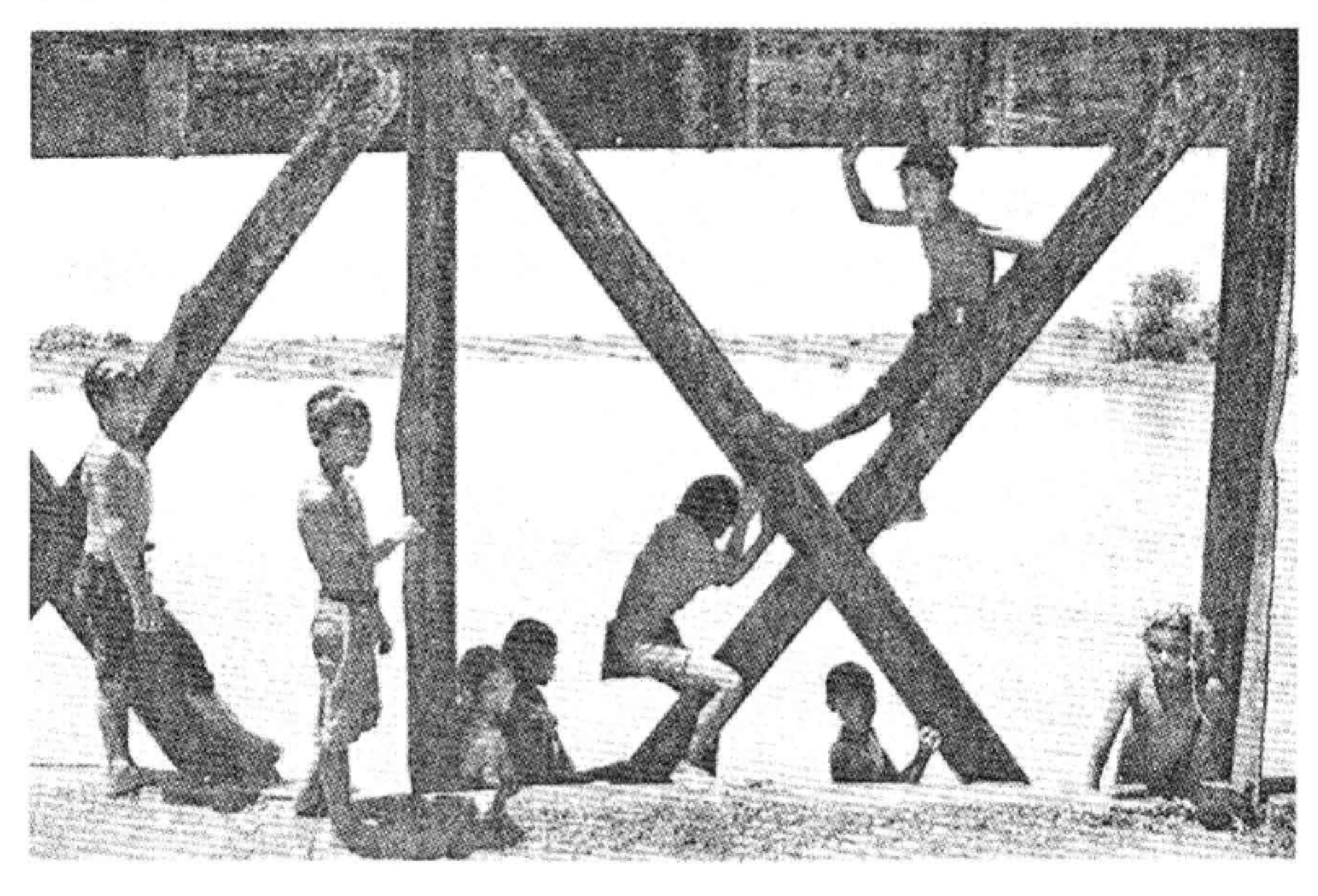
柬埔寨同泰国的关系有些不同。尽管有文化上的渊源关系，或许也正是因为此，柬泰关系中一个明显特征是曼谷从未将柬埔寨当作一个主权国家认真对待。在19世纪30年代，在二战期间和在20世纪的五六十年代及80年代泰国人都在努力颠覆他们认为有敌对倾向的金边政府。最近，两国关系开始变得成熟，但是2003年的反泰骚乱表明两国之间建立起真正的友谊还很难实现。

298 巴黎协定、联合国过渡权力机构和1993年大选，把柬埔寨从18世纪以来的孤立状态推入东南亚的世界中，这或许是次偶然，也或许是有意设计的结果。柬埔寨不再是一个孤立的玩家、不再是一个受大国保护的国家，也不再是印度支那的一部分，而是成为东南亚地区的一部分，尽管柬埔寨人民对东南亚了解甚少，对于他们的现代化程度柬埔寨人也没做好准备。

法国人将柬埔寨历史上的辉煌重新展现在柬埔寨人面前，而这只是它历史的一个方面，但让柬埔寨以后的多数领导人都背上沉重的负担。20世纪五六十年代，西哈努克让别人把自己比作阇耶跋摩七世加以颂扬。类似的，朗诺声称他有将柬埔寨从“异教徒”中挽救出来的神圣使命。波尔布特宣布他的队伍单独打败了美国，也是类似的误导。在他1977年马拉松式的演讲中称，“如果我们的人民能够建立吴哥窟，他们就能做出任何事”。让洪森光荣的是，他似乎已经抛弃了这种怀旧嗜好，将自己视为在现代世界中一个正在实现现代化的小国领导人。

领导人的个性、专横跋扈的政治传统、同泰国和越南的毗邻位置和不切实际的天生优越心理，这些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就融合成一种反复无常的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主宰柬埔寨政坛很多年，甚至现在偶尔还会被金边的反对派政客重新唤醒加以利用。

或许是广泛强烈的保守主义思想和1970年以来暴风骤雨般的社会变革，让很多柬埔寨人不愿意反抗甚至不愿意考虑去改变现有的社会安排和政治领导层，虽然后者给他们造成数个世纪的痛苦和不公正。服从的传统、宿命论的传统和追求霸权的传统深深铭刻于这些社会安排中，它们构成了柬埔寨两千年历史不成文的本质，提供给我们对这个国家政治和文化的深刻见解，而将它们应用于泰国和越南时就不怎么适用。



1996年金边的男孩和一座桥（图片提供：道格拉斯·奈尔文）

我认为，柬埔寨的独特性很大程度上源于它根深蒂固的历史持续性或拒绝变革的特性，而不是源于它对当今时代快速传播而又经常带有破坏性的影响力的估计或谨慎反应。波尔布特革命的失败，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很多柬埔寨人发现它的前提条件非常痛苦且毫不相干，不愿意再实行。类似的，越南人占领和实验的10年，虽然不再苛求于社会主义的形式，但也没留下持久的印记。1993年大选，虽然数百万 299
柬埔寨人投票支持变革，但是着眼于过去，而不是着眼于未来。最近几年，柬埔寨人的这种倾向有所改变，特别是在城镇中，但是根深蒂

固的保守主义仍然在老人和农村地区中盛行。

所谓柬埔寨的永恒性，一直是多年来吸引旅游者和学者的部分原因所在，它在很大程度上也弥补了柬埔寨人长期积累下来的只关注自己权限范围的习惯。在波尔布特时期，保守主义是重要的力量源泉；最后，也正是保守主义在付出庞大人员损失的代价后，打败了民柬政权。但是当这个国家向迷茫和令人迷茫的世界敞开大门的时候，它不能对任何人的持久安全感做出承诺，现在很难确定，这种内向的、家庭导向的保守主义虽然曾经在外国列强和外国思想闯入时为柬埔寨的生存提供了帮助，但现在能否帮助柬埔寨人实现 21 世纪国家的期望。也很难确定，近些年引入柬埔寨的人权、多元主义和法治等理念能否扎根于国家的掌权者之中，他们现在还是像以前的领导人那样行事，
300 似乎这些引进概念对他们的行为和他们如何治理国家没有产生什么影响。迅速增加的石油收入（上面有所论述）很可能会降低外国捐助者从 1992 年以来对柬埔寨的影响力。柬埔寨新建立起来的经济独立性能否使得普通高棉人比那些手握大权的人受益更大，还有待观察。鉴于出生率的迅猛提高，医疗卫生条件落后，以及政府似乎对民众的需求还没有认真准备，从短期和中期看，柬埔寨的前景似乎非常让人失望。然而，柬埔寨民族具有的自我恢复、天赋和愿望，以及他们公然向预言挑战的能力，暗示一个关于他们未来更为乐观的评价或许才是正确的。

参考文献述评

这篇文章旨在选取并点评关于柬埔寨历史的法文和英文的原始或二手资料。对于那些对1954年前柬埔寨历史感兴趣的人来说，掌握法语是必要的。

概括性著作

Helen Jarvis 的 *Cambodia*（Santa Barbara, Calif. , 1997）是一本非常好的介绍柬埔寨的参考性著作，其对大量的引用材料做出了敏锐的评论。Justin Corfield 与 Laura Summers 的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Cambodia*（Lanham Md. , 2003）是一本有价值的可作为研究工具的书；Bruno Brugier 编的 *Bibliographie du Cambodge Ancien*（Paris, 1998）则是一本非常详细的资料汇编。

早期的柬埔寨史研究，如 Adhémard Leclère 的 *Histoire du Cambodge*（Paris 1914; reprinted 1975），主要依靠编年史料，但其在运用资料时漫不经心，难以证实。最近一本侧重于柬埔寨早期历史的综合性研究著作是 Ian Mabbett 和 David Chandler 的 *The Khmers*（Oxford, 1995）。John Tully 的 *A Short History of Cambodia: From Empire to Survival*（Sydney, 2005），则对柬埔寨历史做出了最新而且娴熟的概述。关于柬埔寨传统文化最优秀简短的研究是 Solange Thierry 的 *Les Khemers*（Paris,

1964）。David Chandler 的 *Facing the Cambodian Past: Selected Essays 1971 – 1994*（Sydney and Chiangmai, 1996）是一本关于柬埔寨的文集，其中大部分是研究历史的文章。Saveros Pou 的 *Selected Papers on Khmerology*（Phnom Penh, 2003），收集了她过去 40 年间发表的法文和英文的珍贵文章。Trudy Jacobsen 在 *Lost Goddesses: The Denial of Female Power in Cambodian History*（Copenhagen, 2007）一书中深入追踪研究了妇女在柬埔寨漫长而僵化历史中的作用、活动和受到的迫害。

关于柬埔寨的城市生活目前还没有严肃的研究成果，不过 Milton Osborne 和 Paul Reeve 正在金边进行这项研究工作，承诺填补这项空白。Michel Igout 的 *Phnom Penh Then and Now*（Bangkok, 1993）则提供了这方面有趣的图解。关于柬埔寨农村生活的研究占主要地位的仍然是 Jean Delvert 的权威性著作 *Le paysan cambodgien*（Paris and The Hague, 1961），以及 E. Porée – Maspéro 的三卷本著作 *Etude sur les rites agraires des cambodgiens*（Paris and The Hague, 1962 – 69）。Ang Choulean 的 *Les Etres surnaturels dans la religion populaire khmère*（Paris, 1986）和 Alain Forest 的 *Le culte des génies protecteurs au Cambodge*（Paris, 1992）也很有价值。关于西哈努克时期的农村生活，两本优秀的专题研究著作是 May Ebihara 的 *Svay*（Ann Arbor, Mich., 1971）和 G. Martel 的 *Lovea*（Paris, 1975），而 Eve Zucker 尚未完成的以 21 世纪初期的一个山中高棉人村落为研究对象的见解深刻的著作将对这方面做出补充。关于柬埔寨佛教，最新的优秀研究成果包括 Ian Harris 的 *Cambodian Buddhism: History and Practice*（Honolulu, 2005）；John Marston 和 Elizabeth Guthrie 主编的 *History, Buddhism, and New Religious Movements in Cambodia*（Honolulu, 2004），以及 Anne Hansen 的 *How to Behave: Buddhism and Modernity in Colonial Cambodia*（Honolulu, 2007）。Caroline Hughes 的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ambodia's Transition, 1991 – 2000*（London, 2003）则对最近的历史进行了有益的分析。

从史前历史到吴哥衰落

关于柬埔寨史前历史的研究虽然近些年取得了令人兴奋的进步，

但仍未达到越南和泰国史前历史的研究水平。Donn Bayard 的文章 *The Roots of Indo - Chinese Civilization* [*Pacific Affairs*, Vol. 53, No. 1 (Spring 1980): 89 - 114] 对这一课题做出了短而精的介绍。还有 Charles Higham 的 *Early Cultures of Mainland Southeast Asia* (Bangkok, 2002), 以及他早期的综合性著作 *The Archaeology of Mainland Southeast Asia* (Cambridge, 1989)。最近这方面的学术发展情况见 Miriam T. Stark 的 *The Transition to History in the Mekong Delta: A View from Cambodi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2/3 (1998): 175 - 203], 该文讨论了在柬埔寨东南吴哥博瑞正在进行的挖掘工作, 现在很多人认为那里是扶南王国的都城。还见 J. Nepote 的 *Mythes de fondation et fonctionnement de l'ordre sociale dans la basse vallee du Mekong* [*Peninsule 38* (1999): 33 - 64]。

Michael Vickery 集几十年研究成果而成的经典著作 *Society, Economics, and Politics in Pre - Angkor Cambodia* (Tokyo, 1998) 对前吴哥时期历史的编纂产生了革命性影响。还见 M. Vickery 的 *Funan Reviewed: Deconstructing the Ancients* [*BEFE*0 90 - 91 (2003 - 4), pp. 101 - 43]。关于印度化问题见 Vickery 的 *Society* (pp. 51 - 58) 和 I. W. Mabbett 的 *The 'Indianization' of Mainland Southeast Asia: A Reappraisal*, 该文刊载于 Natasha Eilenberg et al. 主编的 *Living a Life According to the Dharma: Papers in Honor of Professor Jean Boisselier's 80th Birthday* [(Bangkok, 1997), pp. 342 - 53]。

关于吴哥研究, L. P. Briggs 的经典著作 *The Ancient Khmer Empire* (Philadelphia, 1951) 仍然有价值。最近一本杰出的概述性著作则是 Michael D. Coe 的 *Angkor and the Khmer Civilization* (New York, 2003)。还有 Mabbett 与 Chandler 的 *The Khmers*; Charles Higham 的 *The Civilization of Angkor* (London, 2001), 以及 Claude Jacques 与 Philippe Lafond 的 *The Khmer Empire: Cities and Sanctuaries from the 5th to the 13th Century* (Bangkok, 2006)。

若要研究吴哥碑铭, 可以参考 A. Barth 与 A. Bergaigne 的 *Inscript-*

zons sanscrites du Cambodge [2 vols.,(Paris 1885, 1893)],以及 G. Coedes 的 *Les inscriptions du Cambodge* [8 vols.(Hanoi and Paris, 1937-66)],该汇编资料的第 8 卷是整个碑文集的索引。Saveros Pou 的 *Nouvelles inscriptions du Cambodge*(Vol. 1, Paris, 1980; Vols. II and III, Paris 2001)则延续了 Coedes 的工作。

关于吴哥文化和制度的专题研究包括 S. Sahai 的 *Les institutions politiques et l'organisation admimstrative du Cambodge ancien*(Paris, 1970);Jean Boisselier 的 *Le Cambodge*(Paris, 1966),这是一本考古学手册;K. Bhattacharya 的 *Les religions brabmaniques dans l'ancien Cambodge*(Paris, 1961);B. P. Groslier and Jacques Arthaud 的 *Angkor: Art and Civilization*(New York, 1966)。还有 Alexis Sanderson 的 *The Shaivite Religion among the Khmers* [*BEFE*0 90-91(2003-4): 345-462],该文进行了大范围的研究。Bruno Dagens 的 *Angkor: La Forêt de pierre*(Paris, 1989),跟踪研究了吴哥在以后历史中的作用,而 Michael Freeman 和 Claude Jacques 的 *Angkor*(Bangkok, 2003)是一本图文并茂的著作,吸收了最新的研究成果。还有 Jacques 和 Lafond 的 *The Khmer Empire*;Helen Ibbetson Jessup 和 Thierry Zephir 主编的 *Sculpture of Angkor and Ancient Cambodia: Millennium of Glory*(New York, 1997)则提供了高棉精美艺术展品的目录。到柬埔寨的旅行者应该看一下 Dawn Rooney 的 *Angkor: Cambodia's Wondrous Temples*(Bangkok, 2007)。

关于吴哥王权的两项重要研究成果是 H. Kulke 的 *The Devaraja Cult*(Ithaca, N. Y., 1978)和 Ian Mabbett 的 *Kingship in Angkor* [*Journal of the Siam Society*, Vol. 66, No. 2(July 1978): 1-58]。另一项新颖的研究成果是 Eleanor Mannika 的 *Angkor Wat: Time, Space, and Kingship*(Honolulu, 1996),该书强调了吴哥寺的度量规模和天象含义。

关于阇耶跋摩七世统治时期最详细的研究是 B. P. Groslier 的 *Les inscriptions du Bayon*(Paris, 1973),本书的参考文献值得一看。学生还应该看一下 Phillipe Stern 的 *Les monuments khmers du style du Bayon et Jayavarman VII*(Paris, 1965)。Joyce Clark 和 Michael Vickery 主编的

The Bayon：*New Perspectives*（Bangkok，2007），是一部杰出的论文集，收录的部分文章对以前的观点进行了修正。1296—1297年，中国外交官周达观访问柬埔寨数月，亲眼见证了13世纪末吴哥的日常生活。Peter Harris 编译的周达观的 *Cambodia*：*The Land and its People*（Chiangmai，2007）是最新译本，比以前的版本更为准确。

吴哥之后的柬埔寨

柬埔寨历史上的这一关键时期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学界关注。关于15世纪的历史见 Michael Vickery 的开创性论文 *Cambodia and Its Neighbors in the l5th Century*（Singapore，Asia Research Institute，Working Paper 27，2004）。还见 Claude Jacques 的论文 *Les derniers siecles d'Angkor*［*Comptes rendus de l'Acade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 - Lettres*（2001）］，该文把吴哥历史跨度延长到15世纪。还见 Clark 和 Vickery 的 *The Bayon* 一书中 Laude Jacques 负责的一章。还见 Ashley Thompson 的 *Changing Perspectives*：*Cambodia After Angkor*［刊载于 Jessup 和 Zephir 的 *Sculpture of Angkor*（pp. 22 - 33）］和她另一篇非常吸引人的论文 *Introductory Remarks Between the Lines*：*Writing Histories of Middle Cambodia*（刊载于 Barbara Watson Andaya 编的 *Other Pasts*：*Women*，*Gender and History in Early Modern Southeast Asia*［（Honolulu，2000），pp. 47 - 68］）。这一时期继续受到忽视的一个原因是柬埔寨编年史文本非常不可靠，Michael Vickery 在 *Cambodia After Angkor*：*The Chronicular Evidence for the Fourteenth to Sixteenth Centuries*（Ann Arbor，Mich.，1977）一书中已经指出。Vickery 在书中最后一章勇敢尝试搞清这一时期的整体情况。关于16世纪的历史，B. P. Groslier 的 *Angkor et le Cambodge au XVIe siècle d'après les sortrrces portugarses et espagnoles*（Paris，1958）很有帮助。Saveros Pou 在 *Bulletin de l'E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 Orient* 的59卷（1972）和62卷（1975）已对后吴哥时期的碑文进行了编辑。Dr. Pou 还编辑翻译了柬埔寨文学经典名著 *Reamker*（Paris，1977 - 79），共3卷；还有一些在柬埔寨文化中非常有影响的规范性诗歌（chbab），

见 Saveros Pou 编译的 *Une guirland de chbab*（Paris，1988）。还见 Judith Jacob 的 *The Traditional Literature of Cambodia*（Oxford，1996）。对这一时期柬埔寨一项有价值的综合性研究见 May Ebihara 的文章 *Societal Organization in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y Cambodia*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Vol. 15, No. 2（September 1984）：280 – 95]；还见 Khin Sok 编译的 *Chroniques royales du Cambodge*：*De Bana Yat à la prise de Lanvek*（Paris，1988），以及 Mak Phoeun 编译的 *Chroniques royales du Cambodge* [（de 1594 à 1677）（Paris，1981）pp. 179 – 208]。Mak Phoeun 的文章 *Essai d'un tableau chronologique des rois de Cambodge de la periode post – angkorien* [*Journal Asiatique* 290（2002）：101 – 61]，是研究这一时期有用的指导。

关于 16 和 17 世纪，在柬埔寨的欧洲人的研究见 Jean – Claude Lejosne 的文章 *Historiographie du Cambodge aux XVIe et XVIIe siècles* [刊载于 Pierre L. Lamant 编的 *Bilan et perspectives des Ètudes khmères*（*Langue et Culture*）（Paris，1997）]；Carool Kersten 编译的 *Strange Events in the Kingdoms of Cambodia and Laos*（*1635 – 1644*）（Bangkok，2003）；Gabriel Quiroga de San Antonio 的 *A Brief and Truthful Relation of Events in the Kingdom of Cambodia*（Bangkok，1998）。Gregory Mikaelian 的文章 *La gestion administrative du royaume khmère d'aprés un code institutionel du XVIIe siècle* [*Peninsule* 35（1998）：65 – 168]，是一份很有价值的重要行政文献译文。Yoneo Ishii 编的 *The Junk Trade from Southeast Asia*：*Translations from the Tosen Fusetsugaki 1674 – 1723* [（Singapore 1998），pp. 153 – 93]，深入解析了 17、18 世纪日本和柬埔寨之间的贸易（借助中国人的舢板船）。

关于 19 世纪前半叶的情况，见 David P. Chandler 的 *Cambodia Before the French*：*Politics in a Tributary Kingdom*, *1794 – 1847*（Ann Arbor，Mich.，1974）；Khin Sok 的 *Le Cambodge entre le Siam et le Vietnam*（de 1775 a 1860）（Paris，1991）；Khin Sok 的 L'annexatron du Cambodge par les Vietnamiens au XIXe Siècle（Paris，2002），这是对 19 世纪 50 年代两

部高棉语诗歌编年史的评论。

法国保护体制（1863—1954）

有关殖民时期的评论性概括见 John Tully 吸引人的著作 *France on the Mekong: A History of the Protectorate in Cambodia*（Lanham, Md., 2002）和 Penny Edwards 关于殖民时期高棉民族主义开创性的分析 *Cambodge: The Cultivation of a Nation, 1860 – 1945*（Honolulu, 2007）。有关殖民时期早期的历史，有 G. Taboulet 编的 *La geste franCaise en Indocbine*（Paris, 1955），这是一部两卷本的文件集，很有使用价值；Milton Osborne 的 *The French Presence in Cochinchina and Cambodia: Rule and Response（1859 – 1905）*（Ithaca, N. Y., 1969）也很有用。关于 20 世纪早期的历史，见 Alain Forest 的 *Le Cambodge et la colonisation française: Histoire d'une colonisation sans heurts（1897 – 1920）*（Paris, 1980）和 John Tully 的 *Cambodia under the Tricolour: The Sisowath Years*（Clayton, Australia 1996）。关于殖民时期的最后几年的历史见 Philippe Preschez 的 *Essai sur la démocratre au Cambodge*（Paris, 1961），这本书尤其对二战之后柬埔寨的政治场景写得非常好。

关于柬埔寨的激进主义早期阶段，见 Ben Kiernan 的 *How Pol Pot Came to Power*（2nd ed., New Haven, 2005）；Philip Short 的 *Pol Pot: The Anatomy of a Nightmare*[（New York, 2005）, pp. 47 – 144]；J. C. Pomonti 和 Serge Thion 的 *Des courtesans aux partisans: La crrse cambodgienne*（Paris, 19 71）。还见 Steve Heder 的 *Cambodian Communism and the Vietnamese Model. Vol l: Imitation and Independence*（Bangkok, 2004）。Ben Kiernan 和 Chanthou Boua 主编的 *Peasants and Politics in Kampuchea, 1942 – 1981*（London, 1982），收录了很有价值的原始材料。关于柬埔寨去殖民化的讨论见 Donald Lancaster 的 *The Emancipation of French Indo – China*（New York, 1961）。诺罗敦·西哈努克的回忆录 *L'Indocbine vue de Pékin*（Paris, 1972）和 *Souvenirs doux et amers*（Paris, 1981），两本书都写得引人入胜，但要谨慎使用。

柬埔寨历史（1955—1975）

关于这一时期历史事件的概况介绍见 Chandler 的 *The Tragedy of Cambodian History: Politics, War, and Revolution Since 1945*（New Haven, 1991）的第3章到第6章。还见 Kiernan 与 Boua 主编的 *Peasants and Politics in Kampuchea, 1942 - 1981*；Kenton Clymer 的 *United States and Cambodia, 1870 - 2000*（New York, 2004）是一部两卷本的很有帮助的概览性著作。Milton Osborne 富有见解的著作 *Before Kampuchea*（London, 1979）是关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柬埔寨历史的。Charles Meyer 的 *Derrière le sourire khmer*（Paris, 1971），对西哈努克时期持敌视立场，但其内容至今仍然站得住脚。关于西哈努克时期（那个时期开始使用大范围的采访）文化启蒙的概括，见 Ly Daravuth 和 Ingrid Muan 主编的 *Cultures of Independence: An Introduction to Cambodian Arts and Culture in the* 1950*s and* 1960*s*（Phnom Penh, 2001）。U Sam Oeur 的 *Crossing Three Wildernesses*（Minneapolis, 2005）是一本生动而有权威性的回忆录，跨越从20世纪40年代以来的50年历史。

关于朗诺时期的历史，William Shawcross 的 *Sideshow: Nixon, Kissinger, and the Destruction of Cambodia*（New York, 1979）小心翼翼地对美国在1970—1975年的柬埔寨政策提出批评；Justin Corfield 的 *Khmers Stand Up!*（Clayton, Australia, 1994）是一本有见识的政治史著作。关于柬埔寨共产党和越南共产党关系的历史见 Thomas Engelbert 和 Christopher Goscha 的 *Falling Out of Touch: A Study of Vietnamese Communist Policy toward an Emerging CambodianCommunist Movement, 1930 - 1975*（Clayton, Australia, 1995），这是一本吸引人的文集，收录了以前从未公开的越南档案。

波尔布特时期

关于波尔布特时期有很多可读性的著作，其中一些是由幸存者所写。关于这场革命较早的分析如 François Ponchaud 的 *Cambodia Year*

Zero（New York，1978），仍然是最好的著作之一。两本很好的研究成果是 Michael Vickery 的 *Cambodia 1975 – 1982*（Boston，1983，repr. Bangkok，2004）和 R. A. Burgler 的 *The Eyes of the Pineapple：Revolutionary Intellectuals and Terror in Democratic Kampuchea*（Saarbrücken，1990）。Elizabeth Becker 的 *When the War Was Over*（New York，1986），对这一时期做出了评价。还有两本有用的论文集是 David Chandler 和 Ben Kiernan 主编的 *Revolution and Its Aftermath in Kampuchea：Eight Essays*（New Haven，1983）和 Karl Jackson 编的 *Cambodia 1975 – 1978：Rendezvous with Death*（Princeton，N. J.，1989）。Kiernan 的 *The Pol Pot Regime：Politics，Race，and Genocide*（New Haven，1996）使用了在 20 世纪 80 年代早期收集的有价值的口述证据。Chandler，Kiernan 和 Chanthou Boua 编译的 *Pol Pot Plans the Future：Confidential Leadership Documents from Democratic Kampuchea 1976 – 1977*（New Haven，1988）是一本原始档案文件汇编。还见 Timothy Carney 的 *Communist Party Power in Kampuchea（Cambodia）：Documents and Discussion*（Ithaca，N. Y.，1977）。

David Chandler 的 *Voices from S – 21：Terror and History in Pol Pot's Secret Prison*（Berkeley and Los Angeles，1999）研究了红色高棉的关键机构，引用了大量卷宗。从人类学的视角看这一时期，见 Alexander Hinton 的 *Why Did They Kill? Cambodia in the Shadow of Genocide*（Berkeley and Los Angeles，2005）。Henri Locard 编译的 *Pol Pot's Little Red Book：The Sayings of Angkar*（Chiangmai，2005），是一本关于红色高棉口号的文集。关于此时期柬埔寨政治富有见解的论文集有 Serge Thion 的 *Watching Cambodia*（Bangkok，1993）。Marek Sliwinski 的 *Une analyse demographique du genocide des Khmer rouges*（Paris，1995）一书中涉及柬埔寨大屠杀时的人口统计。

最好的幸存者回忆作品可能是 Pin Yathay 的 *Stay Alive，My Son*（Ithaca，N. Y.，2000）；Someth May 的 *Cambodian Witness*（London，1986）；Haing Ngor 的 *A Cambodian Odyssey*（New York，1987）；Ung

Bunheang 和 Martin Stuart Fox 的 *The Murderous Revolution* (Sydney, 1984)。还见 Dith Pran 编的 *Children of Cambodia's Killing Fields* (New Haven, 1997), 这是一本辛酸的回忆录文集。Laurence Picq 生动的回忆录 *Beyond the Horizon* (New York, 1989), 记述了一名法国妇女的经历, 她嫁给一名民柬官员, 并在民柬外交部工作。还见 Wynne Cougill 编的 *Stilled Lives: Photographs from the Cambodian Genocide* (Phnom Penh, 2004), 这是一本关于红色高棉青年干部的摄影集, 附有生平记录。

关于波尔布特见 Chandler 的 *Brother Number One: A Political Biography of Pol Pot* (2nd ed., Boulder, Colo., 1999), 以及 Philip Short 更详细的著作 *Pol Pot: The Anatomy of a Nightmare* (New York, 2004)。由耶鲁大学资助的柬埔寨大屠杀项目收集和出版（英文和高棉文）了很多档案材料, 现存于金边的柬埔寨文献中心, 对于研究这段时期的学生来说是一批宝贵资料。从 2006 年开始的对红色高棉领导人的审判, 还会有很多新文献会被披露。

1979 年后的柬埔寨

关于 1979 年以后历史事件的评论见 Grant Evans 和 Kelvin Rowley 的 *Red Brotherhood at War* (London, 1984; rev. ed., 1990); Nayan Chanda 的 *Brother Enemy* (New York, 1986); William Shawcross 的 *The Quality of Mercy* (New York, 1984)。对柬埔寨人民共和国最好的学术性概述是 Evan Gottesman 的 *Cambodia after the Khmer Rouge: Inside the Politics of Nation Building* (New Haven, 2003), 这本书是对 Michael Vickery 的 *Kampuchea* (London, 1986) 的补充, 读者阅读此书时可以辅以 Margaret Slocomb 更具同情性的记述作品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Kampuchea, 1979 – 1989: The Revolution after Pol Pot* (Chiangmai, 2003)。Eva Mysliwiec 的 *Punishing the Poor: The International Isolation of Kampuchea* (Oxford, 1988), 批评了国际社会对 20 世纪 80 年代柬埔寨的漠不关心。

Grant Curtis 的 *Cambodia Reborn?* (Washington D. C., 1999) 是关

于联合国驻柬埔寨过渡权力机构时期及其之后的历史。最近有两本很有价值的论文集，即 Kiernan 编的 *Genocide and Democracy in Cambodia: The Khmer Rouge, the United Nations,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New Haven, 1993), Steve Heder 和 Judy Ledgerwood 主编的 *Politics, Violence, and Propaganda in Cambodia in the UNTAC Period* (Armonk, N. Y., 1995)。Michael W. Doyle 的 *UN Peacekeeping in Cambodia: UNTAC's Civil Mandate* (Boulder, Colo., 1995) 深入分析了联合国过渡权力机构时期的历史。

关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历史发展，见 Frederick Z. Brown 和 David G. Timberman 主编的 *Cambodia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Singapore, 1998), Judy Ledgerwood 编的 *Cambodia Emerges from the Past: Eight Essays* (De Kalb, I11., 2002), 以及 MacAlister Brown 和 Joseph Zasloff 的 *Cambodia Confounds the Peace - Makers, 1979 - 1998* (Ithaca, N. Y., 1998)。关于政治现状的读物有见解，敏锐又带有悲观色彩的有 Caroline Hughes 的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ambodia's Transition, 1991 - 2001* (New York and London, 2003), 以及 Sorpong Peou 的 *Intervention and Change in Cambodia: Towards Democracy?* (New York and Singapore, 2000)。Anniksa Dirks 的 *Khmer Women on the Move: Migration and Global Experiences in Cambodia* (Honolulu, 2007), 富有新意地研究了柬埔寨女工。Karen J. Cooke 的 *Cambodia Now* (Jefferson, N. C., 2005), 生动鲜明地传递出当代柬埔寨人的感觉。

近些年关于文化方面的著作，见 May Ebihara, Judy Ledgerwood 和 Carol Mortland 主编的 *Cambodian Culture Since 1975: Homeland and Exile* (Ithaca, N. Y., 1994), 以及 Toni Samantha Phim 和 Ashley Thompson 的 *Cambodian Dance* (New York, 1999)。还见 Alexandra Kent 和 David Chandler 主编的 *People of Virtue: Reconfiguring Religion, Power and Moral Order in Cambodia Today* (Copenhagen, 2007)。Khing Hoc Dy 的 *Contribution à l'bistoire de la littérature khmère* (2 vols., Paris, 1990, 1993), 详细分析了柬埔寨的文学作品；而 Leakthina Chau - Pech Ollier 和 Tim

Winter 主编的 *Expressions of Cambodia: The Politics of Tradition, Identity and Change*（London and New York, 2006），对21世纪的柬埔寨文化政治进行了很好的调查。还见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Vol. 37, No. 3（October 2006）]，该期刊物就"重评变革时代中的传统：战后柬埔寨再思考"这一主题贡献了7篇文章。

关于特别法庭起诉红色高棉领导人犯有反人类罪的著作包括 Tom Fawthrop 和 Helen Jarvis 的 *Getting Away with Genocide? Elusive Justice and the Khmer Rouge Tribunal*（Sydney, 2005）；Steve Heder 和 Brian Tittemore 的 *Seven Candidates for Prosecution*（2nd ed., Phnom Penh, 2004）；John C. Ciorciari 编的 *The Khmer Rouge Tribunal*（Phnom Penh, 2006）。

索　引

（只标注英文第4版页码；说明性译文加圆括号）

A

B

C

D

E

F

G

J

K

M

N

O

P

S

T

U

V

W

Y

Z